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10

中央文献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ISBN 7-3073-1168-6/K · 561

定价: 280.00 元(共 6 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②共产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 IV. ①K260.6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607 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17.75 印张 37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 元(7—12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ЕВ

МОСКВА, 1999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413份，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1927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绍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8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9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7、8、9、10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0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姓名全称。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1927年7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1933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2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1996年版。

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并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1937年4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至8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1937年8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

人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1927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武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1927年至1937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20年代末，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1928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和

“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1928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现在没有发现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1928年3月以后继续活动的材料。从1928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20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中国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文主义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30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谴责和迫害。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1937至1938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1937至1938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院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机关、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左”倾或“右”倾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和执

^① 见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1970年版第170—176、180—188、209—218页。

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用各种“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倾向分子”和“敌对分子”所搞的“阴谋”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中等水平”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工作。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 20 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作出的修改。

随着 30 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

火案中赢得崇高声望的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并能于1934年6、7月间向斯大林提出必须重新审定已明显遭到失败的方针的问题^①——这一切促使斯大林同意（并非没有摇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新的策略。然而众所周知，以前的方针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否弃，而斯大林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七大的决议。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似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是暂时推迟到将来，即到反击日本的时候去实现，这有碍于清醒地总结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和以往的年代一样，在苏联的对外政策^②和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在中国执行的路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对这一构想持批评态度的“左倾”反对派的首领们被解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后，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事实和文献表明，这种看法未被证实特别适用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期。实际上，在国家关系方面转向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政策有其最初的动机，并由直到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冲突发展，即提出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所决定的。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20年代末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出的，正是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和苏联东西方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给苏联国际处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契切林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而使自己能够作出坦诚评价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在

① 关于季米特洛夫在重新审定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方针及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见K. K. 什里尼亚：《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和战争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莫斯科1979年版第36—45页；A. M. 格里戈里耶夫、A. B. 列兹尼科夫：《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载《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274—293页。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5—1974年版第5—10卷。

共产国际内无谓地谈论同子虚乌有的反苏战争准备的危险作斗争只能损害和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①。他认为,从苏联利益角度看, (“继1923至1926年实行的绝妙政策以后”)自1927年在中国采取的行动方针是“极大的错误”^②。契切林在1929年10月写给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信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在我看来,共产国际目前的方针是极其有害的……在中国,我们正穷于应付1927年致命方针带来的后果……我们把1927年对华政策的方针搬到了西方,这是可怕的,它正在全力破坏同德国的关系”^③。

“共产国际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的主导地位在30年代初,在1929至1933年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保持下来并有所加强。这表现在提出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战争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上。在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民主党,通过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在东方,这表现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对中国形势的“左”的估计的升级上——“新的革命高潮”(1930年)、“革命危机”(1931年)、“革命形势”(1932年)和夸大苏维埃运动的规模和实际作用上 (“苏维埃革命在相当多的地方取得胜利”、“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④) (1932年)。这一方针也决定了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国家关系的对抗性质,1929年至1932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① 1929年6月20日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见B.B. 索科洛夫:《鲜为人知的契切林》。摘自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解密档案,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2期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1929年10月18日契切林给李可夫的信。同上,第15页。

④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317、323页。(下称《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在论述苏联外交史的著作中，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不符合它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造成苏联国际处境恶化的左倾政策的原因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些作者这样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正是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充满了“世界革命迅速到来的期望”^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思想家和宣传员们的理论构想和评价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其中许多人，也还有共产国际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善良地陷入了迷途”，把希望当作了现实。但是在分析这种极左倾向的原因时，应当估计到，这种倾向早在 1927 年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进行反“右倾”斗争时早就发展起来了。正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浪潮中，在 20 年代末，许多共产党首先是一些大党（西方是德国共产党，东方是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新的领导。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中，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是一个极其主要的方针，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论证，并被认为是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宣传战争危险即将到来的思想和结合关于苏联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的论点在国内加剧“被围困的要塞”的形势，这些都被用来确立斯大林的专制，用来论证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

30 年代初对中国形势上述评价的暂时冻结以及对“苏维埃革命”的规模和作用的夸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加强联系着的。这些评价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批准的政策“正确性”，尽管文献表明，莫斯科有足够的材料可用来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力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工作

① H. B. 扎格拉金：《苏联外交成败史》，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88 页。

人员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对苏维埃力量的评价“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宣传夸大的极限”。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包括它们的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开始考虑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是1927至1931年间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直接参加下所通过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和中共领导机关的一系列决议中制定的。这些决议的大部分已收入为专家们所熟悉的文件集中^①。这一政策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由斯大林在192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以及布哈林在1927—1928年的著作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对于理解共产国际这几年里制定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其他领导人，如库西宁、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米夫、曼达良等的讲话，也还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中国研究所发表的文献^②。对形成苏维埃政策的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托洛茨基1927年及以后（根据“一个反对者的”原则）的立场^③。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它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方针的反应、中共

① 见П. Е. 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莫斯科1932年版和1960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1917—1949）》，见《1917—1927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76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工人运动（1917—1949）》，见《1917—1949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托洛茨基：《逝世后的共产国际》，莫斯科1993年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卷《论中国》，汉堡1990年德文版。

领导人及其各派在制定和执行苏维埃运动方针时的作用，这一切在其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同共产国际和地方组织的来往信件中，在领导人的著作中和在中共的报刊上都有反映^①。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那些年的许多文件已在西方一些国家^②、在台湾^③、在日本^④和在香港^⑤公开发表。

共产国际文件中涉及到这个时期苏维埃运动的内容和目标的一般性论点通常在中共的文件中毫不修改地加以重述。同其他各党一样，从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就共产国际某些决议和指示作出一些专门的决议。与此同时，和以往一样，党的领导层及其地方组织内的各个派别不仅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对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状况提出自己的评价，在某些时期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计划。总的说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流行的评价和指导方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左”倾向，有时要比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更甚。这是同中共新的领导人中尚未根除的“左”的观点和情绪一脉相承的，这些领导人是在从似乎有可能实现激进方针但失去了机会的角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浪潮中进入党的领导层的。20年代末

① 见《中共党史文件（1920—1949）》，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1927—1937年（五卷本）（下称：《中共党史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1991年版。

②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勃兰特等编，剑桥（马斯）1952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托尼·塞奇编，阿尔蒙特1996年版；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1961、1967年版；肖作梁：《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西雅图1969年版。

③ 《匪祸国史料汇编》，台北1964年版；吴天威：《陈诚遗资料选目题解》，剑桥1972年版；杜诺万：《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共资料》，安国伯1976年版。

④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东京1961年版第1卷，第3—7卷；竹内实：《毛泽东集》，东京1983年版第3—5卷。

⑤ 《中国共产党文件（1927—1930）》、《〈中央通讯〉文件选编》，香港1971年版。

在共产国际内强调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以及在评价中国形势时“左倾”的滋长为中共党内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加强提供了土壤。

中共党内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表现是1930年形成并试图实现的李立三的极左主张和行动计划，李立三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的时期里实际上领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所指望的是，通过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暴动和罢工，借助于红军力量的冲击，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革命的“爆发”，从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①共产国际阻止了这一方针的实施，因为这一方针引起了中共领导层中的尖锐危机并给它的力量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但是在评价中国形势方面的左倾情绪的增长为中共活动中的左倾复发提供了土壤。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正当开始转向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像在1928年初那样又不得不克服中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批准的方针的惯性作用。

在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方面，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第三卷收集的几个主要部分的文件反映了这一过程的轨迹。

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作出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转向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武装暴动，从而形成了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城乡暴动时期。这些暴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组织遭到破坏，同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失去了联系。残存的一些组织和某些共产主义团体以及他们领导

^① 关于李立三的纲领和共产国际在克服这一纲领中的作用，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和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载《共产国际与东方。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战略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328—345页。

的为数不多的军队被驱赶到了偏僻的乡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主要在农村进行发展并同残存的和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取得紧密联系的时期。在进行暴动的过程中，党取得了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土地政策、组织武装部队和在乡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初步经验，进行了总结农村斗争的可能性及其作用的最初尝试。1927年底，时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中国的特殊条件，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军阀战争、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软弱，“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开始时它可能波及几个县并成为“初期暴动”，与发达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不同，“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冲而决的形势”发展^①。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出现了“割据”这个术语，反映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通向“最初在一两个省内”夺取政权的道路^②。同时，建立小块苏维埃地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可能性是同当时国内似乎存在着革命形势联系着的，当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暴动会与城市的暴动结合起来。

关于党遭到惨重失败和巨大损失的消息促使莫斯科修改了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在中国的行动策略，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的决议中和以更全面的形式在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定了下来。暴动的结局被认定为工农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的衰退和惨重失败。与此相联系，建议党采取暂时退却和在“争取群众”口号下恢复和积聚力量的政策^③。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载《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第10期第294—296页。

② 《布尔塞维克》杂志1928年第13期第410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22、25页。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中所阐述的主要纲领性理论观点总的说来反映了早在1927年确定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向“左”转，这首先表现为否认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统治阵营中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反帝爱国主义潜力，否认它们有解决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任务的能力。与此相联系，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的反帝革命、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①。

尽管统一国家也属于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评价形势时却指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分裂的开始”，作为中共斗争的主要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制度的任务。与斯大林的理论相适应，认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②。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文件中和宣传中试图把苏维埃运动同时看作是反帝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走狗和亲帝国主义势力）。这种尝试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没有带来明显的实际结果，因为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中国各阶层居民对这种运动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改变为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形式有所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

在20年代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中，对南京政权的评价的演变也是与上述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和潜力的评价相联系着的，从认定南京政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演变到认为它是地主资产阶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第16、18页。

级性质的政权^①。无论在这个时期还是稍后一个时期，共产国际都未能对南京政权的潜力作出恰当的评价。在评价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南京政权活动的性质和前景中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缘由：否认中国有按照“凯末尔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在 20 年代末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斯大林的讲话中所作出的有关结论的惯性作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们从世界经济危机中看到了有助于作出这种评价的补充论据。在中国和世界报刊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国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城市里广泛的失业现象和许多乡村地区闹饥荒的材料也对作出这种评价有影响。南京政府成立后相继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战争使人们得出“上层”深刻危机的结论。甚至在 30 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趋向调整和寻求实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尽管事实上承认南京政权是能够对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没有清醒地分析国民党在发展经济和统一中国方面的政策的内容和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只是“半承认”季米特洛夫在 1936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总之，蒋介石能够组织起四分之三的民族，但他不是争取统一中国、反对各派军阀、反对分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斗士”^②。这番话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长时期内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南京政府把孙逸仙的学说作为官方的理论，这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这一学说的各个方面以及一些国民党派别和左翼国民党人团体要维护和利用孙逸仙学说中最激进部分的企图采取否定的态度。

与“左”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排斥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①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机构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对南京政府评价的演变，见 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史学家论中国问题》，第 177—179 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86 年版第 265 页。

(“改组派”)以及谭平山和邓演达一类的“第三条道路”党进行任何交往的方针^①,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某些担心,唯恐这些势力会吞噬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共产党。此后,由于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解释为激化同“中间”势力的斗争,这一方针又成为共产党同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宗派主义自我隔绝的根源。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策略方针规定了对党在城乡的活动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城市来说建议采取退却和积聚力量的策略:恢复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恢复党在工会中的阵地,通过组织罢工以及口头和报刊的鼓动宣传工作将城市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②。

在农村,尽管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初尝试几乎各地都遭到挫折,而共产党人领导的小股部队经受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还是采取了“扩大苏区,巩固可能成为开展更大规模运动的根据地的地区”的方针。扩大游击队被认为是通向建立中国红军之路^③。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斯大林在接见代表时的讲话都谈到了这一前景。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建立中共武装力量的工作^④。

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指导党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人组织,争取在工会中发挥决定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1—32页。

② 中共六大关于组织工作、关于共产青年运动、关于职工运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和决定,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节40—59、72—77、78—86、112—123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0页。

④ 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39、92—99、107—110页。

性作用和最终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没有考虑到中共从事活动的现实条件。在这里，以及往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指示和中共的文件^①中都保留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原先固有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斗争水平、关于工人阶级由于受本国和外国资本最深重剥削而具有“特殊革命性”的过高估计。

随着南京政府工会政策及其工厂法^②效果的显露，对中共在城市里的地位开始产生影响的，是对残酷的警察监控措施与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宣传对于主要工人阶层和城市基层群众的影响的估计不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流行着这样一些观念，既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人贵族”的土壤，那就有利于将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些观念没有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即国民党的工厂法和工会法给大城市的熟练工人阶层所提供的最低限度工作保障，使他们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更不用说同失业工人分离开来了。

对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所积极响应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爱国主义要求和口号对于工人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不可避免地要对 30 年代初中共的活动产生影响。

从 1931 年底起，共产国际试图实施“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党组织应当独立领导爱国主义团体和爱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1929 年 8 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 248—251 页；第五次全国职工会代表大会决议（1929 年 11 月）—《中国职工运动文选》，北京 1958 年版第 2 卷第 309—312、339—340、343—344 页；又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 1957 年版第 238—358 页。

② 关于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工会政策见：B. И. 霍里科夫：《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2）》，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80—94、112—142 页；又见 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68—86 页。

国主义行动,同时把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这些尝试导致了爱国主义团体的分裂,使共产党人处于孤立状态,并成为警察容易获取的猎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代表于1932年初在“上海保卫战”期间批准的策略,即上海各阶层居民和保卫上海的部队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发动以武装抗击日本军阀占领上海的图谋的策略使中共的组织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和党在城市积极性的衰退^①。这一情况以及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屡遭失败、工作人员屡遭逮捕,促使中共作出决定,于1933年初将中共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这实际上是默认固守城市的尝试失败。

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具有另一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在表述一系列重要理论原理,首先在确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农民……希望拥有土地”)上^②,表现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原先固有的想法,要把从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搬到中国来,深信在中国自发的土地革命也业已成熟^③。同时,在考虑到中共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了中国农村形势的许多特征和特点、农村各阶层和各种组织包括传统性组织在内的行为和作用,以及中共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和途径。在代表大会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共以后在军事工作中所要碰到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答复^④。总

① 关于中共组织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立场及其后果,见T.H.阿卡特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79—188页。

② 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页。

③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1920—1925年)第13页。

④ 《中共六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和《中共六大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有关于农民组织、游击战和建立红军的专门章节,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34—39、92—98页。

的说来,在中共六大以及随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制定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的决议,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不断加以利用,转入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和各种类型的中国农村反抗运动以及分化瓦解军阀队伍的轨道。实施这一方针使中共有可能利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利用当时统治阵营内部各派力量的混战,以便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地区,在国民党各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管辖范围的间隙地带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①。

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关心中共这方面的活动分不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中共农村活动的经验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拟定了一些指示,明确指出和规定了在农民土地政策、军事建设和红军作战策略方面的方针。这项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技术专家、参谋工作和侦察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许多人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领导了中国红军的集团军、红军的司令部和苏区的军事院校。具有在俄国和中国内战年代工作经验的苏联军事专家为军事院校的中国学生编纂了有关军事组织、游击战争策略方面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中国红军院校里也曾广泛加以利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曾设想“在总的革命高涨形势下,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是可能的”。同时认为,“这些省的政权也将会在几个中心城市里夺得”^②。以后的事态发展——苏区的扩大和红军在农村的发展、党在城市的阵地明显薄弱——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自己的方针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

^① 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 1980 年版第 125—129 页。

^②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 24 页。

年7月)》中,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主要是同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联系着的^①,而将“建立有充分战斗力和政治上经得起考验的红军”^②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在1931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城市处于政府当局和外国列强严厉管制的情况下,“工农红军自然将成为积聚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的中心,成为整个革命运动高潮的极重要的杠杆……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主要形式”^③。由此可见,在1927年秋至1937年夏的时期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计划夺取政权和首先在一些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类似广州革命根据地那样)建立苏维埃到得出结论,在“牢牢控制并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加强红军”作为压倒其他一切工作的主要任务^④。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把中共全部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农村中来。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这个术语。

事态发展表明,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的设想和预测相反,“苏维埃阶段”在中共的活动中不是战略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向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转变使中共有可能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尤其是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了根据地,而主要是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成为反对南京的各个地方派别有实际兴趣与之结盟的一支力量。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

①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280页。

②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页。

③ 同上,第296页。

④ 同上,第296页。

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收入本系列文件集第三卷的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还阐述了制定和实施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大量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的文件及其同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决定中共于1927年下半年转向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口号内容的演变过程和莫斯科在准备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一些专门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一时期在通过一些重大决议和向中国发出指示以前进行讨论的内容,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等等。

很大一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在实施六大后恢复中共组织的计划方面,在组织在苏联为中共培养干部方面,在分析党的领导层、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方面所做的工作。

破天荒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工作人员1929至1931年间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关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同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来往书信、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的记录。

第一次发表了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中国的米夫关于远东局活动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决议草案，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红军建设和农民土地政策问题的指示信，补充说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制定苏维埃运动方针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编者发现的关于莫斯科给中共及其工会经费援助的文献资料。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些文件对于了解经费援助的规模，而主要是对于了解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系统为在城市里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领导机构的活动提供财政补助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概念。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会国际系统在中国的工作大大加强，第三卷收入了大量资料，揭示了工会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方针和工作成果。

总的说来，本卷的文献资料和以前出版的文献资料一样，包含许多新的材料，既可以大大充实，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纠正现有文献中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评价。这里发表的文件为研究本文件集的中心议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内容，在每个部分的引言中都作了简短的说明。当然，在这些简短的引言中不可能详尽地探讨在文件中所涉及的议题和内容，这需要吸收其他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史专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者，都会对本卷发表的材料为对这一领域内迄今很少研究或者颇多争论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所提供的可能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在这些不仅为中国史和苏中关系史的专家而且为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中，作为例子，我们列举了莫斯科对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当时和以后将他们推举到党的领导地位上的作用问题。很自然，这里说的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第三卷和第四卷发表的文件，包括在共产国

际刊物上发表的已为人知的材料表明，从 20 年代末起，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都积极促使毛泽东进入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的行列，竭力维护和加强他的地位。早在 20 年代末，由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特别重视农村武装斗争的作用，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经常不断地特别提到“朱毛军队”（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的作用。从 1929 年底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已经讲“毛泽东的军队”，它的内部结构、政治工作的组织在 1930 年就被认为是其他部队的范例（第 221、260 号文件）。1930 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同意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决定，尔后又建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在项英和周恩来到达那里以前，毛泽东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远东局领导下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建议重新审查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选举结果，毛泽东被留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同意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使他进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在 1932 至 1933 年间给予毛泽东以重要支持，当时由于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苏区的很大一部分军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开展批判毛泽东的运动，解除他的军队领导职务，甚至以“赴苏治病”为由让他离开苏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与莫斯科协商后发出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关于让毛赴苏的建议也被拒绝了，认为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冒险，是危险的。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坚持，在 1934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任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闻天取代他担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是没有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同意的。很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收到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作出决定将毛泽东的报告以单行本形式用俄文和其他多种文字出版。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当中只有毛泽东的名字被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以中国苏区名义向代表大会所发的贺词中也同样如此。王明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鉴于上述情况，莫斯科对1935年秋所收到的关于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共主要领导集体的消息作出积极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①。

文件表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至少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起高度评价了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并支持推荐他担任政治局的一些最重要职务（负责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和特种工作）。早在1920年至1930年初，远东局认为他与李立三不同是最有才能和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第206号文件）。周恩来1930年4至8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亲自确认了对他的这种看法。在此期间，斯大林曾接见过他，莫洛托夫也几次接见过他，他受委托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30年底至1931年初，远东局实际上随时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周恩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和苏区的工作。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他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兼红军总政治委员。

^① 应当指出，对阐述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的这种意见，近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上也得到了承认。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杂志北京1997年第4期第21—23页。

现在发表的文件为以下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提供了补充证据，即莫斯科曾极力主张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提拔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各级领导层中去，总之，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建立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体制。

本卷中发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秦邦宪（博古）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许多学生绕过中共同共产国际的通常联络渠道同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领导人交往的书信表明，东方书记处领导特别器重这批人，把他们看作是“可靠的”和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指望得到他们提供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情报，而往后逐渐地把他们提拔到中共和共青团领导机构的各种岗位上。毫无疑问，陈绍禹由于跟米夫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往的联系受到了特殊的信任。1930年7至8月间李立三主义“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冲突，随后在党内对批评自己方针的人进行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决定加速选拔“莫斯科派”的进程，以便保证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持久忠诚。众所周知，结果在1931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陈绍禹、沈泽民和其他许多“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被选进中共中央，陈绍禹还被选进中央政治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青团中央局推荐选拔秦邦宪为中央局书记（见第409号文件）。

然而，陈绍禹的这一提升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莫斯科派”在党内领导中占居主导地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完全清楚他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在党内缺乏根基。把大部分“老的”政治局委员，如周恩来、项英、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仍留在党的领导成员内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和张国焘还担任各大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一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1931年底陈绍禹去莫斯科后，被任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代表团领导人的高级职务，还得到了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重要职务的任命。他本人开始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所熟悉，并被选进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取得了国际性的知名度，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被认为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正如文献所表明的，莫斯科没有把他看作是“党的领袖”，是党的总书记的候选人。

本卷和以前的几卷一样，不可能收入值得人们注意的所有材料。出于篇幅的考虑，编者不可能将东方书记处会议的许多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解决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时的争论和探索的速记记录以及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决议草案都一一收入。莫斯科一些档案馆的某些尚未为研究人员开放的材料也未能收入本卷。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在发表一些用糟糕的俄文书写的文件（如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陈绍禹给米夫的信）时，编者只对某些明显的语法错误作了修正，总的说来保留了文件的语言特点。文件中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当时在文件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人民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苏区、国民革命军。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和词典中常用的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共产主义小组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И.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M. Л.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 M. 莱特奈

尔，教授 И. 克吕格尔，教授 P. 费尔帕和博士 T. 特拉姆彼达赫。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工作的人员 Л. А. 罗戈娃、Е. Е. 基里洛娃和 Ю. Т. 图托契金，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А. И. 卡尔图诺娃帮助发掘文件，卡尔图诺娃还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发掘了一些文件。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В. И. 格卢宁、М. Л. 季塔连科、К. В. 舍维廖夫、М. 莱特奈尔、И. 克吕格尔、P. 费尔帕和 T. 特拉姆彼达赫撰写。书目索引由 К. В. 舍维廖夫编写，并有 И. 克吕格尔参加。人名索引由 В. В. 拉林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编写，并有 К. В. 舍维廖夫、В. Н. 谢契林娜和 М. Н. 斯莫林娜参加。在编写人名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工作人员 К. К. 米罗诺娃提供的材料。

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Н.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Е. К.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Н.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

本卷俄文版责任编辑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责任秘书 Н.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言

**第四部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 1931 年的
对华政策，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形成**

360. 马马耶夫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
（1931 年 1 月 7 日） (19)
3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
（1931 年 1 月 11 日） (23)
362.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摘录）
（1931 年 1 月 17 日） (25)
3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 年 1 月 17 日） (34)
3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第 114 次会议记录（摘录）
（1931 年 1 月 25 日） (37)
3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4 日） (38)
366.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
（1931 年 2 月 4 日） (44)
367. 雷利斯基同王稼祥和沈泽民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8 日） (51)
368.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 (1931年2月10日) (55)
369. 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
(1931年2月11日) (73)
370.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
(1931年2月19日) (79)
371.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
(1931年2月19日) (83)
372.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
报告
(1931年2月20日) (91)
3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年2月20日) (112)
3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定
(1931年2月22日) (114)
3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摘录)
(1931年2月22、23、25、28日) (116)
376.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和王稼祥谈话记录
(1931年2月23日) (144)
3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24号记录(摘录)
(1931年2月28日) (148)
378.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1年2月28日) (149)
379.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摘录)
(1931年3月1日) (153)
380.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1年3月1日) (156)

-
381.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张闻天和赵容谈话记录
(1931年3月2日) (160)
3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25号记录(摘录)
(1931年3月3日) (165)
3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1年3月6日) (166)
384.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就》
(1931年3月11日) (168)
385.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运动的薄弱方面》
(1931年3月15日) (170)
38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28号记录)
(1931年3月18日) (173)
3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
(1931年3月18日) (175)
388. 张闻天给雷利斯基的信
(1931年3月20日) (180)
389.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
(1931年3月27日) (182)
3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信(摘录)
(1931年3月28日) (191)
3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电报
(1931年3月30日) (210)
392. 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记录

- （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211）
393.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委员的信
（1931年4月5日）……………（220）
3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30号记录（摘录）
（1931年4月5日）……………（223）
395.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陈绍禹谈话记录
（1931年4月7日）……………（224）
39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1年4月13日）……………（231）
3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35号记录（摘录）
（1931年4月14—15日）……………（235）
398. 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
会议上的讲话
（1931年4月15日）……………（236）
3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
（1931年4月23日）……………（251）
4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38号记录（摘录）
（1931年5月7日）……………（257）
401.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的报告（摘录）
（1931年5月7日）……………（258）
402.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

-
- (1931年5月7日) (272)
4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会议
 简略速记记录
 (1931年5月16日) (285)
40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41号记录(摘录)
 (1931年5月17日) (312)
4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42号记录(摘录)
 (1931年5月23日) (314)
4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共产主义学院
 中国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决议
 (1931年5月25日) (315)
407.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1年6月10日) (317)
408. 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
 (1931年6月12日) (334)
409. 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国青年团中央局的信
 (1931年6月23日) (337)
4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52号记录(摘录)
 (1931年7月3日) (339)
411.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编写
 的第38号记录
 (1931年7月31日) (341)
412. 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
 处上海局工作的决议
 (1931年9月5日) (342)

413. 皮亚特尼茨基给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年9月10日)	(345)
人名索引	(347)
勘误表	(430)

第四部分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在1931年的对华政策，
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形成

收入第三卷最后一部分的文件阐述了1931年1月至9月这个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以及由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所引起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政治史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统治营垒主要派系冲突持续不断，对抗尖锐激烈。蒋介石力图巩固南京集团在1930年战争中取得的对自己对手的胜利，于1931年初宣布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宪法草案实际上授予作为政府首脑的他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无限权力，限制了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这种从法律上确立南京和蒋介石个人最高领导地位的企图引起了他在南京本地的部分原支持者和许多地区的军政集团的反对。1931年3月，过去同他结盟的很有影响的国民党活动家胡汉民起来反对蒋介石。他在南京的被捕成了各地反蒋势力联合的信号。操纵广东政权的陈济棠将军同广西集团的将领签订了共同对抗南京的协议。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1年5月5—17日）通过了临时宪法，确立了蒋介石的权力，大会开幕后不久，华南和西南反蒋联盟的首领们和“改组派”首脑汪精卫就在广州召开会议。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部分委员，其中包括过去曾在南京身居要职的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陈友仁，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底，中国第二个“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南方将领同华北将领建立了联系。7月下半月，冯玉祥集团的石友三将军试图占领天津市。7月下旬，“讨伐”蒋介石的行动在广州宣布开始。8月初，部分南方军队开进湖南省。只是由于日本公开侵略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才迫使敌对集团停止军事行动，并在10月采取措施，从政治上调解冲突，制定联合的协议。

至于说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它在城市里的力量——党自身的组织、与之相联系的工会、青年组织等在进一步削弱。它对罢工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也更小了。由于警察加紧追捕，中

共在城市里的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它积极利用统治阵营持续不断的内讧局面，扩大和加强了原有的中共军团和苏区——红军在农村地区的根据地，并建立了新的中共军团和苏区。正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了主要苏维埃根据地的位置：赣南和闽西一些县境内，也就是南京集团与广东集团控制范围交界地带的中央苏区，以及湘鄂皖（原文如此。似应为湘鄂赣——译者。）交界地区和湘鄂西部的根据地。红军部队在1931年利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及国内的军政形势，击退了南京政府对它发动的两次——第2次和第3次——“围剿”。这年年底，红军部队已拥有指战员10万余人。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1931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①确定了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基本原则、对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作用的评价、关于苏区农民土地政策内容的指导方针及非苏区的工作。这一构想的制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②召开之前各种法律文件的起草，以及与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远东局活动的基本内容。

这里发表的文件大大扩展和充实了包含在已知文件集和著作^③中有关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资料。从新鲜的角度来看，令人最感兴趣的是两组材料：远东局的文件（它的报告、决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6—257页。

^② 由于种种原因，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几次更改。代表大会未能在1930年召开之后，曾设想于1931年春或夏召开。1931年2月，主要法律草案已由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第375号文件），并于3月9日在“红旗周报”第1期上发表。中国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最终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开幕。

^③ 有关这个题目的主要文件集和著作，参见本卷第三部分引言的注^①和^②；以及肖作梁：《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一文，载《文件研究》，西雅图1969年版；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1993年版。

议、与莫斯科和中共领导的书信往来)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基本原则的制定过程。此外，收入这部分的一些材料还含有关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活动的其他方面、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和中共许多领导人的活动等的新的信息。

正如远东局的文件所表明的，该局 1931 年工作的最活跃时期持续到 5、6 月份。由于有被捕的危险，米夫和远东局成员、军事顾问组领导人 A. Ю. 盖利斯于 4 月被迫离开上海（第 391、394、408 号文件）。在这个不长的时期内，远东局注意的中心是党和工会领导机构内在 1930 年底 1931 年初出现的分裂问题^① [据远东局估计，这种分裂在 2 月得以消除（第 366、375 号文件）] 和党、中国共青团、工会、党报党刊领导机构新的组成人员的工作安排（第 367、369、371、381 号文件）。解决那些与红军主力部队在苏区的地位和与加强它们的军政领导的任务有关的问题在远东局工作中仍然占有特殊的位置。

远东局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促使中共领导确定了 1930 年底开始向苏维埃和军队建设问题及其在实践中实现的问题的转变。

除了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局之外，远东局在实施组建其他地区中央局的计划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第 375 号文件）。曾经设想各地区中央局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在解决军事行动问题以及在与上海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赋予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以主要作用（第 381 号文件）。这一决定是与协调红军主要军团的行动、击退敌人进剿的任务以及将来把所有地区联成一片的设想密切相关的（第 402 号文件）。远东局积极参与了主要苏

^① 关于这一点，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 1927—1931 年的革命运动（战略策略问题）》，第 230—232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231—233 页。

区中央局和军政领导机构组成人员主要人选的挑选工作（第 369、381、389、392 号文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出了派周恩来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该决定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第 400 号文件）〕和派张国焘去鄂豫皖边区（第 389、392 号文件）的决定。1931 年春，由于远东局的坚决要求，党在上海的各级机构 60% 以上的工作人员被派往苏区（第 402、407 号文件）。

1931 年初，由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努力〔苏联军事顾问在该委员会的工作安排中起了重要作用（第 366 号文件）〕，同苏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通信联系，红军主力军团配备了无线电发报机（第 402 号文件）。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根本改变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部队严重脱离上海党中央的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掌握的情报仍然是有限的和断断续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和远东局就苏区政策问题，包括地方党的机构和军队中的冲突问题〔例如关于富田事变问题（第 387 号文件）^①〕作出决定时，只能依据来自地方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通报（第 368、369、371、375 号文件）。顺便说一下，这种来自地方的关于冲突原因的通报表明，冲突各方充分掌握了共产国际用来搞臭对手的“游戏规则”：给他们贴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看来是最可恶的倾向和政党的标签（“右派”、“富农路线支持者”、“李立三分子”、“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人”），指控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由于没有自己的情报来源，远东局常把这样一些消息当成真的，如关于江西“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第 387 号文件）或“改组派”在一军团活动地区（第 390 号文件）活动范围的消息。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当这类消息显得十分离奇时，如来自闽西的消息说，那里 90% 的党

^① 关于富田事件，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 1927—1931 年的革命运动（战略策略问题）》，第 223—227 页；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2 卷，第 259—282 页。

组织已落入当时在中国还不太知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远东局才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第 407 号文件）。总之，远东局未能对 1930 至 1931 年间波及主要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部队中的激烈内部冲突的性质作出正确的结论，并阻止其蔓延^①。

实际上，在上海的党中央和远东局只能监督苏区在政治上和干部问题上的最重大决定。中共农村组织的活动及其武装力量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从上海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有效的领导（第 368 号文件）。这些任务落到了苏区中央局和主要军团司令部的肩上。这一时期莫斯科有关党的军事政策的指示（第 361 号文件）以及远东局的方针（第 366 号文件）（这些指示和方针成了中共中央 1931 年 2 月和 5 月给苏区指示^②的依据，它们涉及到红军对付敌人新的围剿的行动计划）大体上包含了在具体情况下应遵循的一些普遍原则（保存红军有生力量、避免同敌人的优势兵力作战、采用游击战方法、在敌人占决定性优势的情况下退向其他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依靠群众是唯一不可更改的原则。

如上所述，未能进入苏区的米夫、盖利斯和军事顾问团（第 368、378 号文件）离开上海，明显减少了远东局积极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不久，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1931 年 4 月 21 日）以及于 1931 年初接替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职务的鲁德尼克（1931 年 6 月 15 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31 年 6 月 22 日）的相继被捕，导致党的中央机关和

^① 关于这一点，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 1927—1931 年的革命运动（战略策略问题）》，第 239—244 页。

^② 《中共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和各特委的指示（1931 年 2 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43—153 页；《中共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的补充指示（1931 年 3 月 2 日）》，同上书，第 153—162 页。

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处工作的长期停顿（几乎到年终）。试图以稍许变化了的方式恢复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共领导机构中的军政代表机构系统的建议和计划（第408号文件）在1932年以前未能实现。

在解决党的日常工作问题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也深入研究了苏维埃运动的普遍性问题和中共城乡政策的基本方针。共产党在多事的1930年的工作经验和成果，首先是在数量和面积有所增多的苏区实行农民土地政策的实践，以及1931年初中共在农村的阵地的明显加强而在城市的力量的普遍削弱的这种反差，促使（它们）这样做。

同苏区建立较为正常的联系和让远东局直接参与领导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的成果之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得了大量关于军队和苏维埃根据地的状况，特别是关于城市里党和工会组织状况的可靠信息。这就为更清晰地了解中共在城乡的现实力量提供了可能，这一点在关于红军行动的指示中和关于城市日常工作的指导方针中有反映。但是总的来说，原有决定的惰性和共产国际政策中左的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对综合这些信息、作出总的评价和判断中国局势的发展前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共在城市中的阵地的削弱，特别是1931年头几个月在远东局的文件中、在其工作人员给莫斯科的信中和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讲话中十分清楚地指出了。例如，远东局在2月下旬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在评述红色工会状况时说，“我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安排整个工会工作”（第375号文件）。这封信是米夫写的，1930年春夏他在莫斯科时，还乐意引用中共有关党在城市里的工作成绩的材料，认为这些材料是革命高涨的征兆之一，但现在他很不相信这些材料，认为需要不断重新加以审查（第375号文件）。看来，米夫提到的上海红色工会会员人数（500人）也是个大概的数字。埃斯勒在这一

时期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有 600 名会员（第 372 号文件）。米夫在 3 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说，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了 1000 人（第 390 号文件）。但他从中国回来后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却说，上海党员人数是 1000 人（其中，党的领导机关 600 人，基层组织 360—400 人），而党员人数比红色工会会员人数要多些（第 401 号文件）。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的（第 401 号文件），这些数据说明，在上海——中共在城市中的主要活动中心——实际上只保留了同基层工人联系很不密切的一些工作人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文件中也指出，基层支部没有党的生活（第 372、401 号文件），党内工人比重在下降（第 385 号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把红军的壮大和苏区的扩展看成是中共工作的成绩（第 372、375 号文件）。这种观点在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库丘莫夫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绩和薄弱方面的书面报告中有反映，这个报告是为曼努伊尔斯基准备的，他要在 1931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3 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上作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红军的壮大和苏区的建立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地区以其最高形式——“武装暴动和国内战争”表现出来的革命高涨的标志。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围剿的失败被看成是“革命持续高涨的证据”（第 384 号文件）。关于“缺点”，报告中提到中共对罢工运动进程影响的急剧下降、红色工会的软弱无力和工人党员比例太小。报告中说：“因此，对苏区运动的组织和其规模与工人运动之间的不相适应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首先由于党本身的错误而更加加剧了”（第 385 号文件）。

库丘莫夫关于中国革命运动成绩的报告的基本论点，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革命危机在发展和深化的提纲而得到了加强，这些论

点收入了曼努伊尔斯基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①和全会通过的主要决议。在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和全会的决议中,中国的形势现在被说成是“革命危机”,而不是原先的估计(“革命高潮”),这种危机表现在“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内成立了苏维埃、组建了红军”^②。决议中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与苏维埃和红军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联系在一起”^③。曼努伊尔斯基在报告中解释,中国革命危机,“这是革命高涨的最高阶段,是正在变成国内战争的武装起义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的胜利”^④。

这些论点决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最初设想,这一决议将作为单独文件由十一次全会通过。^⑤但是,由于中共在城市中处境的困难,以及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与远东局在一系列问题上,首先是在关于农民土地政策方针问题上出现了需要作专门探讨的重大分歧, these 问题和决议草案便提交全会闭幕后不久于4月14至1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审议。在主席团会议上进行的意见交换,包括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的意见交换,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反而暴露出新的分歧。因此决定将决议草案作为基础,将其交给专门委员会作最后审订,实际上是进行修改(第397号文件)。一个月后,在专门委员会专家工作组会议上,以新的决议

① Д. 曼努伊尔斯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一些国家革命危机前提条件的成熟,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危机)第1册,莫斯科1932年版,第53—54页。

②③ 《共产国际文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会决议、提纲和呼吁书(1919—1932)》,第959页。

④ Д. 曼努伊尔斯基:《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一些国家革命危机前提条件的成熟,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危机)第1册,第54页。

⑤ 决议草案初稿是为十一次全会准备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全宗495,目录2,卷宗145,第1—9页)。

草案为基础对主要问题继续进行了讨论(第 403 号文件)。1931 年 6 月 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执行局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分送了决议草案文本，并要求在 5 日内提出意见^①。7 月底，决议得到正式批准(第 411 号文件)。

收入本部分的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31 年 4 月 14 至 15 日会议讨论中共政策问题的材料(第 398 号文件)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 1931 年 5 月 16 日会议的速记记录(第 403 号文件)，这些材料和记录反映出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提出中国革命的总的构想以及在工农运动方面的工作任务和方法时遇到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4 月 14 至 15 日会议上的一些发言的内容，特别是已经发表的东方书记处主任库西宁的发言，反映出共产国际许多工作人员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指出的，包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上指出的中国革命发展“路线”的特点和对夺权斗争的主要准备阶段以及革命政权的措施“转换”的特点，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中国的革命进程与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经典理论”中关于革命发展成熟阶段的传统观念有明显区别，这就是中共是从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开始的，也就是从俄国苏维埃政权用以巩固自己阵地的那个步骤开始的(第 398 号文件)。

库西宁认为，讨论所审议的决议的任务之一，是要结合中国的特殊条件和苏维埃运动的实际进程，用共产国际的术语对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由于提出苏维埃运动总的构想和作出关于中国的形势是经济和政治总危机日益加深的评价(第 390、401、407 号文件)，无论在主席团会议上还是在进一步讨论决议的过程中，揭示苏区和非苏区发展进程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48 σ ，第 4 页。

的特点和实际内容的任务都未能实现。

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0 年决议和第十一次全会决议的对中国形势及其发展前景作出的评价，对确定像农民土地政策和工会政策这样一些中共主要工作方面的内容产生了影响。

这里发表的文件阐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农民土地政策问题的讨论过程，揭示了在 1931 年最终作出不仅没收地主土地，而且也没收富农土地，并给富农分坏田^① 的指示的缘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在 1930 年底 1931 年初的基本分歧引出了关于平分土地的作用和范围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 年 7 月）中，作出了没收地主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在贫农和中农中间进行平均分配的指示，其中特别说明，没收原则不扩大到富裕农民^②。同时建议允许自由贸易，不禁止买卖土地^③。换句话说，富农的土地以及原先属于中农和贫农的土地或者由于分配地主的土地他们所获得的土地，都作为他们的财产固定下来。这一原则表明在那个阶段放弃了原先土地国有化的口号。总之，在中共三中全会决议中重申的这些方针成了纠正 1930 年在红军活动地区广泛流行的各种极左表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有土地国有化、不断重新分配土地、直至从肉体上消灭富农）^④ 的依据。

但是，1930 年 10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苏区土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51 页。

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05 页。

③ 同上第 206 页。

④ 关于土地法及其在这个时期实施的实践，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 1927—1931 年的革命运动（战略策略问题）》，第 194—197 页；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第 336—347 页。

地农民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却建议把平均分配的原则扩展到所有土地，包括富农的土地，甚至中农和贫农的财产^①。这一建议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念，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是“正统的”，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种观念认为，普遍的平均分配是消灭农村各种前资本主义关系最根本的方法。远东局和中共领导机构的代表对这种偏离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七月决议原则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第335、339、372、390号文件），但遭到了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的严厉驳斥（第379、383、393号文件），东方书记处的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②和在专门委员会中（第403号文件）捍卫自己的立场，结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的最后文本中，建议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按农民群众本身的意愿”，“在拥有自己土地的贫农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采用平均分配的方式^③。实际上，这意味着把问题的解决交由苏区当局酌定。

同时，1931年初，远东局接受了将平均分配原则扩大到富农土地上的主张，并使之更加激进了。在远东局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起于1931年2月通过的土地法草案（第375号文件）中含有关于不仅没收地主土地，而且没收富农土地和富农分坏田的原则^④。东方书记处的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坚持的也正是这样的立场。库丘莫夫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平均分配土地只有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2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30页。

^② B. H. 库丘莫夫：《1931年4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2，卷宗114a，第48—49页）。

^③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52页。

^④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法草案——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版第8—9卷，第191—205页。

在反对富农并依靠富农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像沙皇俄国或其他西欧国家那样。地主并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经营活动。在土地上劳作的是小佃户,因此,要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只能依靠别的什么人——或者依靠富农,或者依靠中农。显然,这需要靠富农来实行……”^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科拉罗夫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土地法草案中谈到没收富农土地的问题,其条例是以多数富农是高利贷者和小地主为论据制定的,这也是中共土地政策以前所特有的“错误倾向”的表现。在科拉罗夫看来,对富农的政策应当包括取消高利贷债务、把富农多余的土地拿来平均分配、向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有在他参与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没收。科拉罗夫在援引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时说:“但多走一步,宣布剥夺富农的土地,那就是冒进。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阶段,无产阶级也不应着手剥夺富农的土地,中国还没有这样做的社会前提和技术条件”^②。

由于有这些反对意见,最后根据科拉罗夫的建议(没收富农所谓“封建部分”的多余土地,即富农出租的那部分土地),对专门委员会讨论过的新决议草案稿作出了修改。但是,在专门委员会上这些修改意见遇到了坚决的反对。多数人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给富农分“坏田”(第403号文件)。黄平发表的“简短”意见成了有利于作出这种决定的决定性论据,他说:“如果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就不够,因为地主土地已经出租,在由中农和贫农耕种。除了贫雇农之外,还应分给红军战士土地。到哪里去取得这些土

^① 见《B. H. 库丘莫夫讲演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a,第48页)。

^② 见B. 科拉罗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4月15日会议上的讲话》(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a,第85页)。

地呢？我的意见是，不得不从富农那里取得土地”（第 403 号文件）。

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当时激烈地、但总的说来毫无结果地辩论的另一个难题，是寻找避免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的阵地的日益削弱和产业工人在党内的比重的不断下降的途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引用的数据资料表明，1930 年底中共内的产业工人总共只占 1.9%，这被认为是“党内事情不顺”的证据^①。这种情况对共产国际也具有理论意义：党同工人阶级联系薄弱，使人对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特别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关于通过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实现无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国家领导权^②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如上所述，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注意到了中共在城市中的许多现实情况、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数量的增加和在工人中影响的扩大。但是，涉及党的城市工作的总的纲领和方针的性质以及认为存在极其有利的条件来实现这些纲领和方针（第 401、407 号文件）的信念，妨碍了对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的揭示。

1931 年上半年，党对罢工运动影响的下降、红色工会的发展进程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文件中都被说成是立三路线造成的。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库丘莫夫在《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薄弱方面》的书面报告中作出结论，认为党在城市里的阵地的削弱是从 1930 年年中开始的（第 385 号文件）。毫无疑问，当时中共领导的纲领和行动在这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试图把所发生的一切的全部原因仅仅归于李立三方针带来的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44a，第 41 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会决议、提纲和呼吁书（1919—1932）》第 959 页。

后果，把李立三路线出现以前中共城市工作成绩理想化的情况同以后的困难处境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只会使现实情况变得模糊不清，并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继续推行以前的没有前途的政策，即在中共领导下，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1929年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在旧的框架内寻找新的工作方式组织独立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

1931年初，远东局在成立红色工会和向“黄色”工会渗透遇到困难后，提出了在现有组织——由地下党员建立的茶馆、阅览室、夜校、俱乐部等的范围之外利用合法条件的计划，并把这看成是同工人和失业者建立联系的途径，看成是散发中共报刊的手段（第375号文件）。拟定“用这种组织网覆盖全上海”（第390、401号文件）。在这样的范围内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可观的资金以及大量的组织干部，而这些资金和干部中共并不具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仍然认为，按以前的策略方式——在“黄色”工会内组建“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地下小组、揭露它们的头目等——打入“黄色”工会仍是工会运动工作的主要方向。1931年5月，中国委员会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这种策略的拥护者对建立合法组织网的主张极不信任，认为它会导致“合法主义倾向”（第403号文件）。讨论的许多参与者都难以明确回答哪个方向是主要的问题（同上文件）。

由于提出的工作方式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效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些著名工作人员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在寻找工作方式上，在“来回兜圈子”。在专门委员会讨论工会工作问题时，库西宁和马季亚尔说，他们不清楚，应该如何国民党工会中进行工作（第403号文件）。马季亚尔特别谈到：“我们当然不应撤消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任务，但如果中国同志问，如何进行这种工作，我会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同上文件）。

由于听到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遭到失败和被逮捕的消息

(第 390、401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说明党在城市中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难时，越来越特别注重当局恐怖政策造成的后果，注重警察对工会和全体居民的活动的严密监视。这里有很大的真实成分。但这种看法忽视了以下情况：保证当局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黄色”工会的进一步发展的，不仅有警察的监视，而且还有它与民族改良主义政策和宣传的结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最后稿中关于中共在非苏维埃地区的工作的部分，对如何确定加强党在城市中的阵地的方法，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见解，而建议中共“重建和加强红色工会”，“克服对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的忽视”，继续进行利用合法条件的工作。决议中说：“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组织和准备经济斗争……”^①。决议接着说，“有了党的正确政策，这种罢工运动就将在短期内发展成为在保卫苏维埃的直接口号下反对国民党的强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把进行政治罢工的任务提上了日程”^②。

决议提议下达以下指令性指示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工人比重下降的问题，而这种指示并没有对现实可能性作出分析和提出具体的建议：“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的胜利发展只有在以下条件下，即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路线方面，而且在其组成和工人在其所有领导机构的作用方面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得到保证”^③。决议建议在恢复“国内各大中心城市”的党组织，在大企业建立支部等的过程中实现这项十分必要的任务^④。

尽管决议表现出了公式化的乐观主义，断言城市党组织的发展和罢工运动会在“短期内”发展成为在保卫和支持苏维埃口号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44、245 页。

② 同上第 246 页。

③ 同上第 242 页。

④ 同上第 242—243 页。

下的反政府斗争,但文件作者还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成长壮大上。决议对武装力量作用的界定(这种界定延续了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思路),是形成共产国际的苏维埃运动构想的最后一笔。决议中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当统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对工农运动的直接军事镇压来维持时,“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会成为聚集、团结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的中心、促进整个革命运动高涨的重要杠杆、发生革命危机的最高表现和推翻国民党的基本斗争形式,成为切实保证革命进一步蓬勃发展的力量”^①。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当时共产国际的刊物正是这样来说明决议中所确定的中共活动的先后次序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的著名工作人员瓦西里耶夫积极参与了决议各个阶段的讨论。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种连续性完全是由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决定的:(从政治上和战斗力上)加强红军是中心任务……依靠红军,彻底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在此基础上巩固苏区,将其中最重要的联合起来并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作为具体实现总路线的最重要环节”^②。在谈到城乡工作的相互关系时,文章作者写道,党不应削弱非苏区的工作,“但十分清楚,在当前的政治路线下,巩固苏区的利益应当占主导地位”^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带着这样的纲领进入了始于1931年9月即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的中国政治历史的新时期。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8—239页。

^{②③} 王富[B. A. 瓦西里耶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1年第23期,第55页。

360

马马耶夫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

1931 年 1 月 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致别尔津同志

抄送共产国际执委会萨发罗夫同志

昨天，1931 年 1 月 6 日，在动身前往中国时，蔡和森同志邀请我同他进行交谈。谈话从 12 时持续到 15 时 30 分，参加谈话的有：伊思美洛夫^①、蔡^②、克雷莫夫和沃罗夫斯基（临结束时才到）。向我提出了下列问题：

1. 军阀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新情况？
2. 中国的国际处境有什么新情况？
3. 到达苏区后的工作从何着手？
4. 应不应该组建“铁军”（突击队、优秀部队）？
5. 红军现在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样的？
6. 红军会不会被打败？
7. 怎样保存红军？
8. 在哪里可以建立根据地？
9. 怎样提高红军的素质？
10. 应该实行政治委员制还是需要一长制，什么是政治委员制？

① 张闻天。

② 以下分别是：郭绍棠和黄平。

11. 是否需要士兵委员会？

所有这些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军事决议^①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各种指示中都已经做过十分详细的说明。在东方委员会^②会议上也曾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相当详细的讨论。我也曾本着这些决议的精神作过答复。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同志非常关切地一再提到政治委员、党组织、根据地和建立红军可靠的（“铁的”）部队的问题，提到在苏区从何着手的问题。同志们向我提问时的那种关切态度说明，他们并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特别强调了这样几点：

1. 应当从土地问题开始，因为不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军事建设问题。这似乎很清楚，但中国同志当即指出，邓中夏同志就未能这样做，他专注于军事事务，而忘记了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干了一大堆蠢事（我还没有看到邓中夏关于土地问题的信）^③。

2. 在军队建设中应当依靠：

（1）明确建立的军队党组织体系，

（2）政治委员制，

（3）政治指挥人员中的工人骨干，

（4）士兵群众的贫农中农成分（“农民化”），

（5）在拥有坚强的党政机关的军队中，不要士兵委员会；士兵的主动精神可以通过各种设置——公开的党的会议、小组、俱乐部、墙报、促进委员会等表现出来。

关于作战战术问题，我表示了如下看法：如果地方领导人给

^① 见第260号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③ 文件没有找到。

蒋介石提供打败我们的主要军团即朱德、彭德怀和贺龙军团的机会，那是极端愚蠢的（如果不更糟糕的话）。

红军有可能避免决定性的失败。山地、巨大的空间、人民的支持、机动灵活性——这一切说明，投入江西的大部队（达20个师）击败红军不是不可避免的。

遗憾的是，过去的经验说明我们地方上的同志在作战战术问题上有很大失误。从对材料的研究中，有以下几点引人注目（我已给同志们作了说明）：

1. 红军战士总是正面进攻敌人——正面突击对他们来说好像成了一条规律。

2. 为避开敌人的打击，红军战士经常是沿直线撤退到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平行追击对红军战士来说始终是致命的。

无论进攻还是退却，红军战士都没有采用迂迴包抄，打击敌人后方。其次，倘若红军战士拉来农民队伍，后者总是走在队列前面。

3. 侦察工作很糟糕。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因为敌人由于其军队的阶级本性不可能做好侦察工作。

5. ① 拒绝占领县城很有害。令人惊奇的是，赣西占领了20个县，却未占一个县城。在贺龙辖区内人们乐于在农村建新房（欧式石头房），只要不占领县城就行，如此等等。

整个谈话使我得出结论，中国同志想要理解这些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但是看来，这对他们来说很难。需要帮助他们。

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合适的。

1. 给弗 [赖利赫]② 发去指示，让中央东方③ 部对所有这些

① 原文如此。

② A. Ю. 盖利斯。

③ 原文如此，应为军事。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最详细的细则形式下达给地方。

2. 应该让《红旗》和《布尔什维克》^① 报重视军队建设问题。迄今为止，它们对军队建设还没有登过只言片语。中央和地方都有军报就好了。

3. 在国际列宁训练班^② 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4. 加快编辑、出版和发行由西纳尼^③ 同志委员会根据您的指示拟定出版的一套小册子。

5. 给中央发去指示，让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使红军不至受到白军的打击和被歼灭。在现阶段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蒋介石的进攻不可能是长时期的和持续不断的。进攻断断续续已进行了4个月，由于缺钱、在当地缺粮、士兵暴动和新的军阀混战危险的增大，它很快就会停止下来。

在交谈中提出一个问题，即蒋介石开始广泛组织绿色游击队，为此给地主富农提供武器，广泛利用半神秘组织（“红枪会”、“北极会”、“天门会”等）。这不仅说明农村阶级斗争在加剧，也说明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建设问题在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正规红军不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形式，需要有“农民队伍”，需要有军队式的游击队。

马马耶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0，第 213—215 页。

打字稿，原件，最后一段和签名为亲笔字。

① 指《红旗日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

② 指国际列宁学校。

③ Г. Б. 斯卡洛夫。小册子出版计划没有找到。

3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

1931 年 1 月 1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电报稿^①

1. 同意以北方以及南方不可避免的军阀战争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出发点。同时考虑到因蒋介石讨伐行动^②而出现的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请商讨旨在务必保留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核心的措施，这个核心是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来扩充正规军所绝对需要的。例如，不迷恋于进行大战役，这是适宜的，首先以小股正规部队和农民武装队伍的游击行动同政府军进行斗争和扩大斗争范围，首先要在敌后采取行动。同时，为了给敌人的交通线制造困难，分散敌人的力量，必须千方百计在赣北和鄂东开展游击斗争，同时应当给游击队提供具有同蒋介石作战经验的干部。此外，宜将各军（特别是第 1、2 军和第 3 军）^③的主要核心撤到较为安全的地区，从中组织有坚固根据地的正规军骨干力量，无论如何要

① 此文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1 年 1 月 18 日会议审议。会议决定压缩电报稿内容并考虑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提出的修改意见（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81，第 4 页）。文件的最后稿没有找到。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③ 当时为军团。

将其保护好，使其不至于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时所进行的冒险行动中遭到被歼灭的危险。关于根据地问题，同意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

政治委员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2，第 1 页及其背面。

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

362

马季亚尔^①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摘录)

1931 年 1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爱的朋友们：

很高兴收到你们内容详尽的来信^②。请你们以后将你们对国内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评估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对苏区的情况非常感兴趣。一收到你们的电报^③，我们总是力求尽快作出答复。但是由于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原因，这一点并非总能做到。例如，我们不能把 [共产国际执委会] 主席团的决议及时通报给你们，因为相应的上级忙于其他事情。我们认为，你们也定期收到了我们的电报，并得到了关于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情况的通报。

1. 我们同意你们对国内形势的评估。毫无疑问，不只是在北方，而且在南方，包括四川都面临着新的军阀战争。这种战争会给我们提供扩大苏区、建立红军和完成党在今年错过了的许多事情的机会。但是，国民党会利用并不是全面休战的短暂休战，借助蛊惑人心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注意到 6 月 14 日的土地

① 作者是根据第 375 号文件确定的。

② 见第 339 号文件。

③ 电报没有找到。

法^①、治外法权谈判、归还租界、提高海关税率等。南京企图扮演“国民”政府的角色。根据党报判断，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是反帝斗争。这是一个错误。南京也接过了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托派口号。我们对南京这种手腕揭露得太少太抽象。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各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同南京进行贷款谈判。银元贷款、食糖贷款^②、宋子文前往美国^③等等。党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者没有放弃中国，他们想更多地剥削中国。在1925至1927年间，反帝斗争曾摆在首位，党没有理解土地问题的意义。现在不能犯相反的错误。

2. 同立三路线斗争的问题。李立三抵达后，我们在〔东方〕书记处进行了广泛辩论^④。李承认犯了许多错误。在辩论时斯特拉霍夫^⑤的古怪表演受到严厉批评。他在这里也跟莫斯克文^⑥、邓〔中夏〕和余〔飞〕一样投票赞成各项决议，但后来又同李〔立三〕结盟。莫斯克文的立场也令人失望。后来，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⑦上进行了讨论。党的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给你们寄去速记记录，以便你们对这里的情绪有所了解^⑧。远东局给〔三〕

① 见《土地法》。民国19年6月30日发表。载《中国法律学报》，哈尔滨1931年第1集第215—226页。

② 关于向中国提供银元和食糖贷款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③ 宋子文访美没有成行。

④ 指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

⑤ 瞿秋白。

⑥ 周恩来。

⑦ 见第344、345号文件。

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0年12月12—15日会议速记记录的缩略中译文刊登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上海，1931年第4卷第3期第2—66页）。

中全会的信^①很不妥当。我们这里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朋友让人愚弄了。且看是否真是这样。

李[立三]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报告了党的领导^②内部的派别情况。我们将随下次邮件给你们寄去这个没有多少内容的文件。至于李[立三]的问题，政治委员会决定征询你们的意见^③。这个问题将在得到你们的答复后再作决定。我们觉得，他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吸取一些教训。此外，政治委员会的同志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现在在中央委员会内已开始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立三]、张彪^④、蔡和森都宣称自己忠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这就不排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争夺首脑地位。谨慎是智慧之母，你们也应该小心谨慎。我们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关于[中共中央]四中全会的详细书面报告。你们的电报给这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我们只能根据决议作出最后评价。似乎新的政治局和中央要比以前的政治局和中央好得多。在这里，人们希望政治局最终着手解决革命的现实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应当最终得到贯彻执行。政治委员会已电告，你们要为政治局的政策和可能出现的错误负责^⑤。

3. 我们将竭尽全力让红色工会国际派出一名翻译。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我们这里要看的材料比你们那里多，而你们没有可能及时看到全部材料。存在这种状况是不能容许的，需要改变。

4.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在党的领导中确立一种布尔塞维克的秩序。至于腐朽的外交手腕、要两面派手法、无原则地结成

① 见第301号文件。

② 指李立三1931年1月5日向国际监察委员会递交的声明和1月9日的补充材料。

③ 见第357号文件。

④ 张国焘。

⑤ 文件没有找到。

集团，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国同志继承了国民党的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非常坦诚地谈到过党的领导内的“封建残余”，并且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不会对这些做法采取任何腐朽的外交手腕，而是希望与这些做法公开进行斗争。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历史^①不应在全国范围内重演。我们已经声明，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央委员会之间以及远东局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采取任何腐朽的外交手腕。我们希望，新的政治局组成人员在这些问题上能够确立布尔塞维克式的秩序。应当消除这方面的“封建残余”。[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开得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中央委员会希望“保全面子”。李立三自己就是这样说的。斯特拉霍夫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②后在政治局会议^③上宣布，6月15日^④决议和7月15日呼吁书^⑤是正确的，李[立三]其实只是在8月1日和3日犯了错误等等，这实际上是鼓励了这种做法。他想证明，李立三路线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是一致的。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否则，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不可能的。应当结束这种腐朽的做法。我们希望，你们和政治局能够做到这一点。

5. 我们将在最近几天内用电报向你们提出一系列有关红军、战略和战术的建议。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有工作能力的军事部。在重要的苏区必须设立军事局。对于是否为同苏区建立牢固和正常的联系采取了一切措施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出自己的看法。但这项任务应当解决。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的。

① 见第190号文件。

② 见第329号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④ 原文如此，应为6月11日。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

⑤ 指193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声明》。

我们明确指望，这一头等重要的具体任务将得到解决。那时将更容易对苏区的运动和红军施加影响。这会使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来提供援助，并会减轻党在同富伊（音）^①问题上的困境。苏区犯了一些最愚蠢的错误，邓〔中夏〕的文件^②是最明显的例证。不让工人进苏维埃机关，而贵族富农和小地主却端坐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里，工资被取消，企业主把持着工会，往往还领导工会，工会运动没有发展，农业工人好不容易才组成工会，农村的贫农团还没有组成，赏赐给地主土地，散布关于苏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富农和资产阶级理论，等等。而邓和邓之类的人物除了关心对地主寡妇和孩子怎么办以外，没有其他可关心的。在这方面他制造了小脚女人应当比大脚板女人分田少之类的混账理论。在革命现阶段，解除游击队武装和建立红军是公开的反革命。不想占领小城市，而想攻占武汉和长沙。关于苏区贸易，威廉^③作了十分正确的论述。我们只应在必要的情况下破坏、消灭贸易以及不像对待地主那样^④对待商人。当然，合作社问题也应该更坚决地提出来。

6. 我们从收到的材料中还看出，“剪刀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你们只是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我们觉得，合作社可以提供某种帮助。据悉，农民的产品经10至20道手才能到达市场，有时商业利润是〔原始〕价格的70—80%。从城市运往农村的工业品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苏区现有状况下，不可能绝对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向群众说明这一点。正好可以用这个例子向群众表明，为了彻底解决这

① 原文如此。

② 可能是指邓中夏1930年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第508页注①）。

③ П. А. 米夫。

④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像对待地主那样。

些问题，必须消灭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正如列宁说的，群众就是这样学习政治和地理的^①。如果我们的贸易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损害贸易，那么，商人自己就会关心把大米从苏区转运到价格更高的地区。中国商人定会为更高的利润竭尽全力。今后，苏维埃政权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干预。乐意接受纸币的地区可以通过合作社采购一定数量的储备粮，在封锁或收成不好引起物价波动时就可以出售。现在就可以为建立储备进行宣传，而如果农民自愿同意这样做，那么农会可以建立这种储备。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是有传统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剪刀差”问题也是个阶级问题。农村贫农在革命后大米也很少，贫农要按不仅对工人不利，而且对贫农也不利的过高价格买米。我们想以此为缩影来研究这个问题。

7. 现在谈谈土地问题。首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含糊不清之处。我是这样理解七月决议^②的：没收土地的原则不应扩展到富裕农民。我们只没收地主、寺院等的土地。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决不是说我们应该给富农留下他的全部土地。这只是说，在平分土地时富农有权得到土地。因此，两封信^③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我看来，在实行平分土地时我们不仅应当重新分配所没收的地主土地，而且应当重新分配所有土地。当然，我们将在这里向领导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并将权威的上级机关的观点通报给你们。我在这里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反映了东方部^④同志的观点，虽然他们对这封信的表述

① 引文来源不详。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57号文件注⑦）。

③ 指1930年7月29日《关于苏区土地农民问题的决议》和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苏区土地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29—638页）。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不承担责任。

十分清楚，这种措施跟苏维埃政权的任何类似措施一样，不应作为上面下达的法令强加给农民。而糟就糟在这里，我们的中国同志经常想从上面做所有的事情，经常把自己的措施强加给群众，指望在不吸收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来实现革命。首先需要将农业工人组成工会，建立乡村贫农团并在其中讨论分配土地的问题，争取中农并把他们聚集在苏维埃周围，只有到那时才能分配土地。有些同志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我们颁布法令，而为了统计农民人数、测量土地成立一个官僚机构，就这样来分配土地。这很可笑。我们分配土地要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

在鄂西，从现有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错误在于没有同地主富农作斗争，同样的情况也涉及南通州。例如，鄂西发生了贫农反对富农的事情，引起了中农的恐惧。富农会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很清楚的。阶级斗争将尖锐化，这也是很清楚的。中国没有一个地区^①中农占农民总数的80%，这也是很清楚的。即使革命后也不会有这样的地区。必须同不想分田给中农的不能容忍的左倾白痴作无情的斗争，并把他们驱逐出党。应该尽全力把中农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这也是很清楚的。而我们的路线也应该是很明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非苏区，我们的口号仍然是没收〔土地〕。那里不提平均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提出来。当然，在根本没有地主或地主很少的地区，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关于税收、高利贷等口号。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的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意见，我们将在3月底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②前同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省（或区）。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见第374页注^①）。

领导同志认真研究和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将给你们寄去我们第二个草案^①。该草案还没有最后定稿[……]^②

干部：我们提请你们注意，奥布霍夫^③不想前往。他给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仿佛是个懒汉。需要对他和他的工作进行审查。正在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对人员提出的要求。正在培训优秀的同志。但是，你们应该尽全力加快向军校派人的工作。我们一得到首批名额，就能提出大量增加名额的问题。

将来，我们将向你们通报〔东方〕部的所有重大事件，以使你们了解我们担心的是哪些问题。今天这件事没有办成，因为邮件就要发出了。你们可以指望，我们将尽全力减轻你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在进行。任务加重，工作增多，只有人手没有增加。

红色教授学院对东方问题^④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各种倾向都被揭露出来了。很有意思。

对中国的兴趣非常大。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够，我们打算更好地安排这件事。

关于远东局：你们收到了政治委员会的电报^⑤。这里心情是这样的：认为远东局不应解散。你们应该分配工作，一切问题都由集体决定。你们那里任务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增加。经验表明，没有你方领导的主动干预，事情就办不成。现在中共领导改善了，但

① 指土地法草案。

② 下面删去了文件中关于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日本和朝鲜的部分。

③ 竺廷璋。

④ 可能是指红色教授学院对Г. И. 萨发罗夫《东方学战线的形势》报告的讨论。报告提纲已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于1931年1月13日寄给了红色教授学院教学部（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48，第8页。）

⑤ 见第361、363号文件。

任务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想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可能认真仔细地讨论这封信。可以说，它是非正式的，但或多或少正确地转达了同志们的意见。

工会问题。这个问题在红色工会国际讨论过。决议将给你们送去。这个问题是非苏区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里没有向好的方面的根本转变，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我们太软弱。我们希望，我们能在这方面实现迅速的转变。

失业者日^①。你们已经收到了指示^②。现附上呼吁书^③。我们就这个问题同就要动身的中国同志谈了许多。我们觉得组织南京路游行是错误的。在工厂区进行会更恰当一些。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6—9、11—12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2月25日。

②③ 文件没有找到。

3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年1月17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

1931年12月9日，蒋介石开始发动对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红军的作战行动。尽管这些行动进展缓慢，但应该承认，红军因为有巨大的财政、粮食等困难，处境是艰难的。红军的处境以及农民土地运动的开展之所以非常困难，是因为中共中央迄今为止没有为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指示采取重大的措施，这就是：（1）没有为领导当地苏维埃运动建立真正的中共中央局^①。（2）没有建立地区根据地。（3）没有成立临时苏维埃政府。（4）没有着手组建坚强的军队核心，依靠这个核心，党就能贯彻自己的政策。（5）直至今日中共中央还没有在上海与苏区之间建立正常的联系。（6）中共中央没有为军队的同志进入苏区提供必要的协助。

对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和南京政府经济形势进行的综合分析说明，现在蒋介石的作战行动尽管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但在红军军团实行正确斗争策略的情况下，即使在江西，更不要说在湖南、湖北等省，也不会使红军主力面临毁灭的命运，因为那里没有出现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不知道1931年1月15日建立中央局的事。

反对红军的重大行动。江西红军有可能暂时避开敌人决定性的打击而保存主要军事核心。保存主要军事干部和保证军队核心的进一步扩充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 1931 年春农民运动新高涨的前景和中国南北即将爆发的军阀战争。

鉴于以上所述，东方书记处认为目前采取以下组织措施是适宜的：

(1) 指示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必要时向地方下达红军可以采取最灵活的策略的指示，以便红军在首先以游击活动方式抗击政府军的同时，采取措施保存自己的主要干部（特别是第 1、2 军和第 3 军）^①，使之从被毁灭的危险中解脱出来，保证正规军核心的形成（电报草稿附上）^②。

(2) 为了保证切实和尽快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地区苏维埃根据地和组建正规红军核心的指示，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预定作为苏维埃政权和扩充军队根据地的地区真正组建中共中央局。

(3) 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立即在中共中央下面成立坚强的有工作能力的军事部。（在远东局组成人员中选派一名领导军事工作的同志，并给他提供翻译）。

(4) 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最短的期限内中央与苏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和正常的联系。询问中央和远东局能否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联系，或者必须派一位同志去中国为建立这种联系进行技术指导。

(5) 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办理立即调遣军事工作人员（从远东局组成人员中选派的同志除外）去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

(6) 在莫斯科立即着手为中国红军编辑出版军事著作和军事

① 当时为军团。

② 见第 361 号文件。

政治著作。

（7）提请特别注意在学校培养除一般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外的技术勤务人员：无线电报务员、爆破手、手榴弹制造厂工作人员等。

东方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81，第 25—27 页。

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

3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第 114 次会议记录

(摘录)

1931 年 1 月 25 日于莫斯科 绝 密

特别文件

听取：4. (1442) . —— 远东局关于罗伯特同志的电报^①。

决定：4. —— 通知远东局，我们必须了解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罗伯特同志应当离开上海，但今后应利用他在上海以外的远东地区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82，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Г. 埃斯勒。文件没有找到。

3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 陈绍禹谈话记录

1931年2月4日于上海

与戈卢别夫^①的谈话

1. 他说,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1931年2月3日,反对派省委决定解散并回到党内。王克全写了声明,请求同陈绍禹会见并进行谈话。上海右翼反对派领导人作出这个突然决定,主要是因为最近一周内上海的几乎所有区委和关键性支部、三个省的某些县委和市委在弄清右翼反对派的分裂和诋毁活动后立即脱离了反对派。他通报了区、县、工会党组织状况的某些细节。例如,在曾经是清一色反对派的沪中区,所有支部现在都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昨天举行了该区积极分子大会,有7个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反对王克全、支持[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支持中央和省委的决议。这个区的几乎所有支部现在都由我们领导。在沪北区,有一部分支部现在处于我们区委的领导下,有10个支部本着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及省委最近一些决议的精神通过了决议,只有两个支部还在胡闹,两个完全消极。在沪南区,有8—10个支部也表示反对分裂分子,反对右翼反对派,支持中央、省委和四中全会。在沪西区,有6个支部同我们站在一起。只有东区情况不妙。反对派在各支部和区委都遭到彻底失败。我

^① 陈绍禹。

们的同志把在支部的解释工作同具体实际任务的提出结合了起来，而这些任务是省委和中央曾经号召支部执行的。

在工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同 250 名红色工会会员建立了联系。而且这些都是生产部门的工会会员。例如：(1)沪东区有 40 名纺织工人工会会员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2)在沪北区我们有丝织厂工人工会的 40—50 名会员，人力车夫工会的 20 名会员和海员工会的 30 名会员；(3)在沪西区，在英租界省有有轨电车工人俱乐部的 30—40 名成员和约 40 名纺织工人工会会员（这 40 人全都在“正泰”厂工作）站在我们一边，在法租界，我们有 8—10 名有轨电车工人、（处于红色工会影响下的）兄弟会的 40 名会员和 30—40 名人力车夫。重新开始对铁路员工中进行工作，因为何孟雄过去的 3 名同志近来躲起来了，不能同他们建立联系。现在在上海联合会分会工作的有 5 人：扎卡托夫^①——分会书记、波戈列洛夫^②的妻子和另外 3 名同志。

王克全特别是在有轨电车工人那里已威信扫地。他从他们工会取走 300 元用于反对派活动。法租界的有轨电车工人主动决定为去年在他们那里领导罢工（这次罢工以工人取得胜利而告终）的一个同志^③举行罢工集会。我们的省委和上海工会分会已决定派同志去领导这次罢工。省里在防止右翼反对派对党组织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某些成果。从南京召来了市委书记^④，在上海省委会议上听取了他关于南京党组织状况的报告，并作出了下列决议：(1)——^⑤说明南京……^⑥流血事件的教训；(2)说明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同情共产党。戈卢别夫谈了以下证实这一结论的事实：市

① 殷缙。

② 秦邦宪。

③④ 何人不详。

⑤ 原文空缺。

⑥ 删节号是原有的。

委书记曾几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但在大会和集会上，在所有场合群众都把他从拘捕中救了出来。

（3）指出南京党组织内由于可怕的白色恐怖而引起的右倾情绪在滋长，并指出在同李立三主义继续作斗争的同时，必须同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然后向南京的组织提出以下具体任务：

- ①在党组织内进行解释工作，揭露右翼反对派的分裂活动；
- ②动员积极分子和全体党员群众团结在四中全会决议周围；
- ③将党的机关同分裂者和右翼反对派分开，建立自己的机关；
- ④市委也应给支部下达同样指示；
- ⑤在士兵、工人和农民中建立支部，现有支部应加强在这些群众中的工作；
- ⑥必须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
- ⑦要跟上海一样加强建立合法组织、自学小组、学校、俱乐部等的工作；
- ⑧市委应根据四中全会和中央近来的四项决定^①制定工作计划。

此外，由于南京遭到重大失败，省委决定更新南京市委和各支部的组成人员，将（原有）工作人员调往别的组织。随后，上海省委召来了平湖县委书记^②，听取了他的报告并作出了在该县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决定。这位书记说，在李立三领导的时期，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已彻底瓦解，没有进行任何工作。近一个半月来，工作明显活跃起来。现在那里实际上有 150 名党员（30 名工人、8 名农民、8 名士兵、其余是知识分子和职员）。有处于我们领导之下的兄弟会（工人合作社）；在铁路员工工会里，我们有 10 个人，还有 6 个自学小组、有名为“兄弟会”的士兵组织，党支部开始定期召开会议并讨

① 不清楚指的是什么决定。

② 原文如此。书记为何人不详。

论问题。

红军已经到达离这个县的一个地区(丰泰)150里的地方。本来可以给它以坚决的支援,但区委害怕犯李立三性质的错误,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拒绝组建游击队,因为据说该地区还没有很广泛的群众运动。上海省委指出了该县党的工作的成绩,同时也对区委和县委的这种态度进行了坚决而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性质的错误。省委还提请这个地区的党组织要重视对农民和士兵组织不力的问题,要重视广泛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性。这个县还有四个区委,其工作比上述这个区还差。

2. 关于实际工作问题,戈卢别夫通报如下:

(1)已经将省委的工作纳入到有计划地系统地讨论区委、县委、党团、群众组织以及党的各个部门的工作问题的范围之中;(2)做到了通过委托一名省委委员在省委会议召开前事先准备好问题;(3)已经讨论了2月7日活动的筹备问题,并对在这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进行了检查。党内状况削弱了最初拟定的计划,但仍可以通过下列方式部分地开展这一活动:在沪西区,举行飞行集会和一次群众集会;在沪南区,在有轨电车工人和人力车夫那里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在沪北区,在丝织厂工人那里举行飞行集会。在沪东区和沪中区大概不能做什么事;在浦东将散发传单,在吴淞也将散发传单,在……^①我们有人力车夫和1000名苦力。也许能组织集会。戈卢别夫还顺便提到,浦东有8名士兵(我们的同志)请求允许他们去参加红军,若不派他们去,他们威胁要逃到红军那里去。省委决定把他们列入将被派到红军去的1000名工人之中。对2月25日活动等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关于军阀进攻问题的指示^②,他们将

^① 此处有一词分辨不清。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击退敌人第二次围剿于1931年2月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43—152页)。

在2月5日的省委会议上进行讨论。

关于被捕的27名反对派分子，他通报如下：由于奸细^①出卖，何孟雄全部招认了，此外，他还向警察局长^②写了申请，请求归还被捕时抄走的全部材料，因为他想写详细报告。此外，何孟雄还给戈卢别夫写了一封信。同志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件事。在龙华监狱（专为共产党人设的军事监狱）关押着500人，其中300—400是我们的同志。他们在狱中成立了支部，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反对派。这个支部的书记^③写了一封信，请求告诉他们党内情况并作出关于如何对待反对派的指示。省委作了答复，让他们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而要尽量通过对个别误入迷途的人做解释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1月21日，被捕的共产党员宣布绝食并取得了胜利；改善了伙食，放宽了制度。关于奸细：出卖何孟雄的奸细还出卖了沪东区的所有工作人员。他是沪东区《红旗》^③报记者。他还搞垮了印刷《红旗》的两家印刷厂。这个奸细从沪东区纺织工人那里取走5000元。此外，还有6名奸细被发现，其中4人在梅尔泽堡^④。他们当中的一人班科夫^⑤曾是沃洛金斯克……，顾世光（音）（沪西区等）^⑥。

关于罗章龙，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向党发出了呼吁书^⑦。他在呼吁书中对四中全会进行了详尽评述，并且全文刊载了所有表示支持和反对的讲话。除这个小册子外，他还谈到反对共产国际代表

① 王拙夫（唐禹）。见《王明文集》第2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175页。

②③ 何人不详。

③ 指《红旗日报》（见第283号文件注⑨）。

④ 莫斯科。

⑤ 彭玉階。

⑥ 原文如此。

⑦ 文件没有找到。

的讲话¹。此外，呼吁书还号召同中央、托派和取消派进行斗争，但根本没有提及陈独秀。罗章龙的小册子传播很广，连国民党士兵中都在流传。戈卢别夫说，罗迈²没有断然拒绝王克全让他参加反对派省委的建议，至少向忠发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戈卢别夫和科穆纳尔³坚持要求他和斯特朗⁴（此人在同右派斗争时保持沉默）必须向政治局表明态度。后两人向政治局递交了这样的声明⁵。

关于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戈卢别夫认为，周[恩来]近来有点玩弄手腕。在召开有王克全和徐锡根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时，对于谁第一个向远东局通报了他们同右派结盟的这个直接了当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他和向[忠发]都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但他不知道。就在这次会议上，向[忠发]却作出不同的回答，他说，他们的工会党团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在同反对派斗争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对戈卢别夫说：“嘿，现在怎么办，我们丧失了所有的党组织。”稍许沉思后他笼统地说，“应当同他们作斗争。”周也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如果不这么尖锐地提出莫斯科人的问题，或许可以避免出现这个反对派。”但是现在，紧张时刻已经过去，他的疑惑也消失了。张国焘表现不错，向[忠发]也不错。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16—17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指罗章龙的小册子《为召开党的非常会议，反对中共中央四中全会而坚决斗争的报告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69—79 页）。

② 李维汉。

③ 王稼祥。

④ 瞿秋白。

⑤ 李维汉 1931 年 1 月 26 日的声明和瞿秋白 1931 年 1 月 28 日的声明刊登在《党的建设》1931 年第 3 期，第 48—50 页。

366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①

1931年2月4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莫斯科文同志^②：

作为对我们最近同你以及同军事工作人员就中央军事部工作问题进行的谈话的补充，我以书面形式简要说明一下目前摆在中央军事部面前的任务，我们认为，这些任务无论如何应该在最短期限内加以执行。不执行或者哪怕是不十分及时地执行这些任务，不仅不能证明中央军事部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且也会使人对中央政治局领导党的军事工作的能力产生疑问。我再说一遍，近来，即在工作的最重要的战斗的时刻，军事部做了工作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做工作，但不够有力，其工作节奏根本不能适应时局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并不仅仅是军事部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认为，中央也要为此承担责任。许多时间都花在诸如中央争论关于士兵起义和暴动之类的毫无结果的话题上，没完没了地开会、辩论，提出问题大都不够具体，而关于派人到苏区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同红军建立联系、领导苏区和红军、由地方党组织派人和提出瓦解国民党军队、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和凡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游击运动的具体任务等等却很少过问。时间在流失，军阀已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二次进攻，而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我们不能同红军一起较为

① 文件上有批注：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经别尔津收到。

② 周恩来。

认真地参加打退军阀进攻的斗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斗争的消极旁观者，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应当在军事工作中实现急剧的转折，而且刻不容缓。我不来具体地历数党的所有缺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同军事部的工作人员反复谈过了，此外，这些缺点在下面谈到的任务中也可以看出。

关于军事部工作人员的构成，我们的意见如下：军事部现在的组成人员可以发挥作用，那里没有立三主义的倾向（我个人没有看到）。同志们不太善于工作，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但他们愿意工作。这是我的坚定不移的看法。某种交易……^①和……协议……飞向毛〔泽东〕（工作很重要）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刘伯承作为参谋长是称职的，他比院士^②柳博奇金^③、尤其是库拉金^④要好得多。西尔内^⑤是一名很好的工作人员（在分化瓦解方面），也是一名好侦察员。我对他了解不多，但他给人的印象很好。他有这项工作的经验。我不认识联络员^⑥和新的书记（如果他已被任命）。我说的是新的通信员。我再说一遍，军事部现在的组成人员可以进行工作，但应该领导他们并在各个方面帮助他们。然而，军事部迄今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足够支持。指责军事部搞立三主义，这是诬蔑，是诽谤。就自己的任务而言，军事部目前应该是最重要的中央部门之一。现在它还不是这样的部门，但需要这样做，以便使它成为这样的部门。需要追究拨弄是非和妨碍军事部工作的人的党内责任。

目前军事部最主要的任务如下：

（1）同苏区和红军建立可靠的联系。现在同红军的联系是极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指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

③④ 中文姓名不详。

⑤ 朱瑞。

⑥ 何人不详。

不可靠、极不正常的。没有联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通过党〔和〕苏维埃系统以及军队系统进行的领导。应该组建联络局，使上海每两周就能从红军各单独行动的部队和单独的苏区获得情况报告。应该制订关于党的系统的问题和关于苏维埃军队问题的紧急报告表（我可以同军事部一起研究此事），并且要求苏区根据此表每两周报告一次。只有在这样的联络体制下才能对红军和整个苏区进行符合实际的领导。应该在这方面的苏区下达严格的指令。

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由绝对可靠的人在下列地点：上海、香港、汕头、天津、厦门、广州、汉口、九江（或南昌）设立联络中心。领导中心工作的是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站长），并要有足够数量的信使和联络员，他们往来于苏区与联络中心之间。联络中心不同党组织联系，不进行任何党的工作，而只从事自己的工作。这些人应该有优厚的报酬，在物质上有保障并且取得合法身分（小店铺……等）。这种联络体制是在香港和汉口率先实行的。应该赶紧向军事部下达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并确定完成任务的日期。我将提供帮助……中心要护送人员进出苏区。每个苏区都应奉命设立这样的中心。

无线电台应该连同无线电报务员一起立即从汉口调往贺龙处……，谈判……三部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①调往毛〔泽东〕处，立即将电台从天津调往第1军。无线电报务员的培训工作，应看作是一项最重要的战斗任务，要非常积极地加速办理这件事。不要设更多……垮台^②，除正在学习的8名同志外，再增加若干人并要教会他们。让最能干的同志在规定日期前毕业。

用同江西做交易所得的3万^③买三部新无线电台。利用政府电报局同中国非苏区的重要中心联系（在有密电码的情况下，这

①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看来指从江西得到的钱。

是完全可能的)。在不能保证苏区的电台供应之前，不应把电台运往那里……^①。把电台运往汉口、天津和香港，这是重大的错误，这证明对同苏区联系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2) 将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前军人、军人和一般大学生)派往苏区。撤出被委任做党的工作的人，把他们也派往苏区。此事应立即办。军事部地区的分配计划可同我商量。

(3) 立即安排从上海、汉口、天津和香港派工人去苏区的事。凡保密条件允许的地方，预先为他们组织短期军政训练班(2—3天)。

(4) 在分化瓦解敌军工作方面实现转折，首先执行同我商定的派遣计划。最后组织颠覆和破坏活动。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一切谈话仍然是纸上谈兵。应当派遣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到这些地区(特别是九江、南昌、长沙、郑州等)去恢复同党组织的联系。

(5) 下达党的指示，派人去北面^②(湖南、安徽、江西)及福建组织游击活动。派专人去桂湘黔三省交界处……以及湘鄂川三省交界处组织游击活动，建立党的组织。有关这个问题的想法——面谈。

(6) 派中央局成员去苏区(毛泽东和贺龙那里及第1军)之事已久拖不决，难以容忍。派人的可能性是有的。应该立即将所有已经任命的人派去。此事由军事部负责办理。

(7) 应该增加从事侦察工作的人手。可是据侦察员^③报告，中央在召回他那里的人。不要召回，而要加强侦察工作，增加侦察工作的预算。有些负责同志认为，侦察工作只应在他们需要情报的时候才进行，不能随时组织侦察，他们对侦察工作的这种看法

① 原文如此。

② 估译——译者。

③ 何人不详。

应该改变，侦察工作是在长期内建立起来的。我们这里进行侦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8) 要安排好苏区和红军关于中国总的形势的准确和定期通报工作。要定期发出《国际新闻通讯》和地方党的书刊、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提纲和决议。这方面的情况至今还很糟糕。

(9) 加快我们已经修订的野战条令的翻译和出版。事情进行得难以解释的缓慢。

(10) 无论如何要实现江苏省委……工作的转折。该省委的工作糟透了。在上海的部队中没有做工作。在兵工厂甚至没有支部。在南京和苏州，情况也是这样。李^①……把分化瓦解上海的部队的任务作为硬性任务提了出来，以期在那里组织士兵暴动并〔确保〕他们在……的领导下前往农村。我们就分化瓦解工作谈得很多，起草了指示，但往往没有弄清楚，由谁来执行这些指示，而在上海，部队就在“眼皮底下”，我们却没有做任何分化瓦解它们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执行这一任务，那么上海党组织（全国最强大的党组织）的整个军事工作又有什么用。我们至今……没有提出这项任务。然而，远东局对此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关于做这项工作的方法也谈过。中央军事部和江西党委^②军事部直到现在一直有70名军事工作人员，他们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干。这些人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工作（基洛夫^③、库拉金和其他许多人）。

(11) 应当改变军事部的工作方法……少谈关于任务等的空话，多给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务并对他们的工作实行严格的监督。领导同志应该经常到地方去，具体检查和帮助地方同志的工作。军事工作人员不了解指示（正如汉口发生的那样），这是不行的。把

① 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显然是指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③ 李特。

他们派往苏区，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给地方工作人员教些什么，向他们讲解些什么（同 C^① 的情况……）。

（12）当然，只有在军事部拥有相应的经费并在工作中得到中央直接支持的情况下，这里列举的任务才能完成。应当经常把问题提到中央会议上……，以便不仅……军事部有……，中央也应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要遵守合适的比例）。总之，谈到钱的问题，中央应重新考虑拨出比迄今为止更多的数额用于军事工作。从贺龙那里得到的 2 万元应分摊给军事部各个方面的工作。此外，应派专人带着指示到毛 [泽东]、贺龙那里的第 10、16、1 和第……军去，从那里带来钱或者贵重物品。他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助上海。贺龙未经请求就这样做了。毛 [泽东] 也想送来，第 10 军准备给钱。钱是有的，只是需要拿到手。

（13）在近日内的第一次会面时，我们当面谈谈我的行程^②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心平静气地谈论的地步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你也许会从这封信中得出印象，我们在军事工作上无所事事，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用不着让你相信这一点。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对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局的诬蔑。有工作，人们想工作，有成绩，有工作干部，在积累经验，人们给予帮助——我们在做分化瓦解工作并有成果——成立了各种训练班等等，等等。但你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一点（大家都应这样来理解），目前在反革命对我们特别是对苏区进行非常野蛮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中国革命最重要关头的时候，我们应该……，我们的工作虽然有成绩，但还是不够的。

你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应该明白，我们不能为取得成绩而自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前往中央苏区。

吹……但现在重要的是不去历数成绩，进行自我吹嘘，而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并加以克服。

在第一次会面时我们要亲自谈谈所有这些问题。应该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军事问题，以便解决它的……实际工作。

还有一个请求。信的语气很严厉，你不要在意。问题不在于信的形式，而在于它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

致同志式的敬礼！

托姆^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9，第 39—4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Ю. 盖利斯。

367

雷利斯基同王稼祥和沈泽民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8 日于上海

同《红旗》、《实话》和《布尔塞维克》^① 编辑的谈话记录

奥斯藤^②：鉴于我们的会晤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建议从你们通报正在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的情况开始。

科穆纳尔^③：最近遭破坏后，《红旗》压缩了版面，每日 1 版。我们以家庭作坊方式出版，所以不能扩版和利用第 2 版。我们每日发行 1000 份。在上海推销约 600 份，其余的发往各省。省委和区委不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无论是在提供文章或者哪怕是通信稿方面，还是在推销《红旗日报》方面。即使在上海我们也是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专门的推销员发售的。

奥斯藤：《红旗》的内容是什么？

科穆纳尔：社论始终是谈当前党的任务，但由于不仅同工厂，而且同各地区联系薄弱，很难获取关于工厂里发生的事情的信息，这些文章不总是按时送来。但我们尽量提供来自苏区、个别工厂等的消息。

《实话》报每 5 天出一期。经常出现停刊现象，但时间不长。我们发行 4000 份。在上海，我们在《红旗》读者中推销 600 份。

① 分别是《红旗日报》、《实话》报和《布尔塞维克》杂志。

② H. A. 雷利斯基。

③ 王稼祥。

我们把纸型送到天津。其余份数发往香港、福建、山东和满洲。我们获悉,我们的刊物可以很正常地发行到鄂西和闽西苏区。同《红旗》一样,《实话》的发行也完全由编辑部负责。《实话》的宗旨是较为原则性地阐述中国和国际实际情况及党内生活。在已出版的几期中,谈得最多的是同右派和立三主义的斗争。发表了党的几份呼吁书和关于国民党“国民”会议等的文章。

奥斯藤:对苏联的生活方面你们作了哪些论述?

科穆纳尔:我们只是从《国际新闻通讯》上转载一些东西。但很少。没有材料。关于中国苏区的情况我们也写得很少。来的材料很少。

《党的建设》^①也出了第一期,其内容是:中央就右派的活动和两条战线的斗争告党员书,[中共][四]中全会以及省委、某些区委和支部近来的决议,投降的右派领袖们的声明。下一期正在准备。《党的建设》发行2000份。

古德科夫^②:《布尔塞维克》杂志我们还未能出版。为十月号准备的材料已经过时了^③,正在准备新的一期。想不晚于2月19日出版,内容是:(1)曼努伊尔斯基的文章《十月革命十三周年》(译自《真理报》)。(2)五年计划第三年的建设纲要(译自《国际新闻通讯》)。(3)德国的法西斯化(译文)。(4)中国的局势。(5)组织问题。(6)李立三主义。然后是关于军阀混战^④与革命战争相互关系讨论专栏。苏区的累进税问题。

奥斯藤:为什么把军阀战争^⑤与革命战争的关系问题和累进税问题作为讨论文章,而不是作为党的方针?

古德科夫:有同志们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两篇文章。文章观点

① 《党的建设》杂志。1931—1933年在上海出版。

② 沈泽民。

③④⑤ 原文如此。

不正确。我们发表这两篇文章并加以反驳。

《宣传员》^①第一期已出版，发行3000份。刊载了关于同右派的斗争、关于失业者日和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文章。也有宣传鼓动专栏。

奥斯藤：从销售我们的机关刊物有多少钱进入党的金库？

科穆纳尔：不好意思说。总共才16元，而光是《实话》报一个编辑部连同全体工作人员每月花费就达2000元。

奥斯藤：你们的读者圈是哪些人？

科穆纳尔：绝大多数是工人，但数量不大。区里没有向我们提供地址。

奥斯藤：你们同共青团和工会编辑部有何联系？

答：我们与工会的编辑部是完全分开的，而同共青团的编辑部通过波戈列洛夫^②联系，他是我们编辑部成员。

奥斯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红旗》是党的群众性机关报，只发行1000份^③并压缩了版面，而《党的建设》纯属党内刊物，却发行2000份？

答：谁都不想出版《红旗》报，又没有自己的印刷厂，而其他刊物警察局不太了解，私商比较乐意出版。

奥斯藤的意见：从你们的通报中得知，不算《布尔塞维克》杂志以及工会和共青团机关刊物，我们已经出版四种党的机关刊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在工人当中推销这些刊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上海，你们拥有600名读者，其中大概不少是虚假的，进入金库的数额说明了这一点。出版机关刊物是必要的，但是

① 《宣传员》杂志。1931年1—5月在上海出版。

② 秦邦宪。

③ 原文如此。

是在劳动群众，至少是党员^①阅读它们的时候。不能为编辑们写文章和发行几千份。建议你们督促省委并通过它督促区委进行推销。如果发行的刊物不在群众中流传，而是进了火炉，那就得好好想一想了。你们最好集中力量办好《红旗》和《实话》这两种必不可少的机关报。《党的建设》和《宣传员》既然是党内机关刊物，只能发行党支部和积极分子所必需的数量。然后要就出版机关刊物所要解决的问题写些文章。例如，《党的建设》杂志在初期首先应该在以下意义上探讨党的建设问题：怎样建立支部，怎样进行秘密活动，并应把同右倾和左倾的斗争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这些文章之中。《布尔塞维克》杂志设讨论专栏眼下是必要的。如果《布尔塞维克》正常出版，如果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在这份刊物上得到充分的阐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拟议的一期中，所有文章都应从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出发，具有指导的性质。我觉得，还需要减少国际问题栏目，而要增加国内问题栏目。曼努伊尔斯基的文章可以作为专门的小册子出版，关于德国的法西斯化，你们可以根据《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写一篇短文。

我不知道，警察的监视怎么能允许你们同工会的编辑部有经常的联系，但尽管这样，我认为有必要劝你们一定要搞好这种联系。现在你们向工会机关报提供援助是必要的。共青团的编辑部里一定要有你们的代表，而且是常设的。可以仅限于偶然的联系^②。

最后，要避免抽象的议论。不要刊载任何不明晰的或虚假的文章。请加紧进行实际工作。下一次我们来谈谈党内教育和同各省的联系方式问题。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19 页及背面。

打印稿，原件，无签字。

^{①②} 原文如此。

368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1 年^① 2 月 10 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老头子^②：

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邮件发送的日期，但我还是想在我们动身去南方之前，对我们关于局势的简要通报作个补充并提供若干新材料。现在局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将从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困难和矛盾的角度，尽可能全面地阐述我们对中国当前形势的理解以及我们的工作和任务。

一、红军的作战态势和状况

红军部队目前的作战部署在附图^③中已经标明。从图中可以看出，同我们在上次邮件（12 月底）^④中说明的相比没有大的变化。除了某些例外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换句话说，从地区分布的角度讲，苏区近来没有重大变化。

在敌人的压迫下 16 军改变了活动区域，在上次邮件前（军阀进攻之初）^⑤离开了萍乡山区（煤矿区）。我们关于该军涣散的消息（我报告的）看来是不正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萍乡工人扩充的

① 原文错为 1923 年。

② Я. К. 别尔津。

③ 图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 631 页注①

这个军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它经常化作游击队，溜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正在南昌附近活动。1月25—27日，该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南昌城下，在那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以至富裕居民可以说随时准备逃走（但因为大风雪火车不通逃不了）。该军有2000多条枪。由一个老农民游击队员^①指挥。

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的确，他们还没有夺回吉安（第10军主要是为执行上海的指示，在敌人的逼迫下部分地离开了自己原来部署的地区，并稍稍南下，现在该军如图所示，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活动。如今它同江西的主力部队有作战联系。第7军根据上海的指示应转移到湘南。它大体完成了这一任务）。它的一部分部队（约2000条枪）在广东北部，另一部分在广西湖南两省边境。第7军到达广东和广西北部也加强了我们的主要战线（第1军和第3军）^②。我不谈贺龙的第1军团和其他军团的不大变化。这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从目前苏区和红军的作战部署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除了我们在江西的主要根据地（这里集中了红军的主力——第1、3军团）外，我们还有许多分布在几个省很大区域内的地方性根据地。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状况使敌人不可能同时将优势兵力派往所有苏区。敌人军队在某个苏区的削弱必然会引起该区域的扩大和区域内红军的增加。敌人不得不为对付苏区而保持大量的军队，在战时状态下，要花费巨额资金来供养它们。一方面，南京财政困难（不能向士兵支付薪俸），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断同我们交战，不能不对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产生消极影响。此外，我们还拥有这样一些部队（诸如第16军和独立1师）和游击队，它们在敌后对敌人的作战路线采取行动，给敌人制造不少麻烦，阻止他们

① 孔荷宠。

② 此处和以下都是指军团。

对我方主力部队发起重大攻势。这种作战态势的消极面是，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彼此没有联系，同所谓外部世界隔绝。协调苏区之间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所有苏区的红军，除江西的第1、3[军团]外，几乎随时都需要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白军的进攻（内线作战）。这些地方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尽管在各个地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直到最近仍处在作战包围圈中。除江西外，我们的区域都不够大，游击活动还不够强有力，不足以消除被包围的态势。我们当然不把这种“包围圈态势”当作可怕的东西。我们的部队已相当强大，必要时可以打破包围圈（它已不那么牢固）。但这会阻碍运动向广度发展。但是，如果说红军的部署没有大的变化，苏区地域没有扩展（甚至可以说，由于军阀对我们的首次进攻，在湖南和部分地在江西有某种缩小），那么在红军和苏区内部状况方面我们则可以断定有很大的积极进展。

粉碎了对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蒋介石关于消灭苏维埃运动的种种期限都已成为泡影。现在不只是报纸在谈论这一点，南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党内党外的右倾取消派关于红军是匪军、没有任何苏维埃运动等等（罗章龙及其一伙）的流言蜚语也已成为泡影。报纸杂志上，现在除了关于共匪部队到处流窜、逮捕和处死“领导人”、关于南京的宏伟计划和尽快消灭我们的大吹大擂的报告外，也常常出现一些文章和短评，指出要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不是几个月的事情，需要几年时间进行有步骤的斗争，等等。一些胆大妄为的军阀（鲁滌平、何键、夏斗寅之流）认为，同红军顺利地作斗争是不可能的，夏斗寅还嘲弄蒋介石的纸上谈兵计划。他们中许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辞呈，以便“保全面子”；的确，这些军阀过高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们的统计中经常出现一些关于我们兵力的数字，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例如，鲁滌平称江西红军的兵力与北伐前的广东国民军相当。这当然是一种未来派式的夸大，是由于

恐慌和围剿部队最近在江西遭到失败造成的。但敌人对我方兵力的这种估价也有相当大的真实成分。第一次围剿的结果，我们的部队大大增强了。不用说事情的道义方面。部队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对指挥人员的信任加强了，上海的情绪也高涨了。（这并非不重要。）第1、3军团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状况。现在我们在江西（第1、3军团，第16和10军）拥有不少于45000支步枪、100挺机枪。现在有了一些炮兵、工兵和通信兵。解除（敌）18师武装、部分地歼灭（敌）5师和25师，为我们提供了1万多支步枪和大量子弹、6门大炮、40挺机枪、1个工兵营，等等。歼敌详细情况简述如下。撤出吉安后南下，第1、3军团没有参加战斗。国民政府的9个师对它们采取行动。兵力优势在敌人一方。但在撤退时我们的部队握紧了拳头。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东固。敌人设想红军在东固会发起决定性的战斗，将5个师调往那里。但到进攻前该市和周围地区已完全疏散。在进攻这座空城时，国民党军乱作一团，彼此混淆，18师同25师激战四个小时。报纸报道这些部队伤亡惨重，当然把这些伤亡记在我们的账上。为红军以优势兵力转入进攻创造了有利局面。红军包围了整个18师盘踞的城市，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将该师全体官兵俘虏，随后就狠揍5师和25师（俘虏了5师的2个旅、25师的2个营）。其余的溜掉了。显然没有去追击（这在中国的条件下是常有的事）。将校级军官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把7000士兵和大约200名下级军官放了，发给每个士兵5元钱的路费（用18师金库里的钱）。工兵和全部技术兵都留下使用。鲁滌平不想要被释放的俘虏，但南京劝他抛弃不可靠的人，其余的人要编入部队。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坏。我写不出1、3军团状况的细节。还没有收到毛〔泽东〕的报告。这里引用的数据是从当地各种消息来源，主要是党的消息来源收集到的。今天（2月5日）收到了这类性质的侦察材料，我还能查实。以前我曾报告过，南京已拨出专款来收买红军领导人和党员。

何键收到一部分这样的钱。他问南京，如果（彭〔德怀〕）第 3 军的部队投靠到何键一方，他拿他们怎么办。这里说的是收买第 3 军中某位有影响的人物。正坐飞机去毛〔泽东〕那里的军事部书记^①（一周后他可能在那里）受命向毛转达此事，以便进行调查。彭德怀是老团长，现在是共产党员。地方的同志有一种看法，如果侦察材料属实，那么彭德怀本人可能会被纠缠到这件事情中。我们正在审查。

贺龙近来进行了艰苦的战斗。约有四个师对他采取行动。他消灭了其中的一个师，解除了一个团的武装。贺龙在军事上是好样的。他极熟悉地形，出色地运用了小规模作战策略。红军战士都很尊敬他。对军阀来说，他是洪水猛兽，他们都很怕他。据刚从那里来的信使^②报告说，（给中央带来了 2 万墨西哥元，钱已收到）他已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现在他连同他辖区内的游击队一起拥有约 3 万条枪。信使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是第 2、6 军发展壮大的事实是确凿的。我们从其他消息来源也了解到这一点。子弹方面的情况很不好：每条枪只有一发子弹（平均）。我们打算采购，但不会有很多。根据国民政府的新法律，买卖武器是要枪毙的。

投机商们很害怕。兵工厂和修配厂都没有。第 1 军那里也是这种状况。它靠四川旅起义（此事我已报告过）^③使步枪数量增加到 8000—10000 条。但该军也没有子弹。因此，它不能发起重大一点的战役。在敌人大部队进攻情况下，不得不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该军已达 2 万人。没有枪的人武装了原始武器（标枪等）。该军有一架全新的经过改装的飞机。但没有飞行员。请从麦加^④抽

① 欧阳钦。

② 何人不详。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莫斯科。

调一名飞行员和机械师来。俘虏的飞行员不可靠。我们可以用这架飞机进行通信联络。该军食品供应不时出现中断。原因是地方当局和该军的给养机关调度不力。现在有三个师对该军采取行动。如果它们至今还没有取得任何战绩，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军成功地发动了农民。在同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农民游击队给该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分配土地和组建该军辖区内的苏维埃政权方面事情很糟糕。土地没有分配，农民不参军，军内有多余的枪，等等。这些消息对于去年夏天来说是确实的（按中国的条件，它们并不那么陈旧）。现在那里情况是另一种样子了。毕业于炮兵学校的武汉教官西尔内^①（现在任分化瓦解〔敌军〕的中央军事工作负责人）在那里工作的三个月期间，区党委书记^②、新的军政治委员^③和其他许多工作人员都到过这里。情况有了改善。现在那里土地已经分配，政权建立起来了，正在开展群众工作。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有缺点。政权发挥作用眼下还很不力。不该得到份地的人（“好”地主）得到了，但总的说来，那里还是有进展。第10军也有所发展。它现在约有3000条步枪。虽然不久前那里的军人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在同反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上有过分歧（军人认为，如果形势需要，放弃地区是可以的，而当局的想法则相反），但没有引起该军政治领导的担忧。在土地问题上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第7军不是从农民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通过一批士兵脱离广西部队而组建起来的。指挥官是一位旧的将领，现在是共产党员（即他已入党）^④。有政治委员^⑤，有由香港

① 朱瑞。

② 曾中生。

③ 余笃三。

④ 李明瑞。

⑤ 邓小平。

委任的政治部。该军约有7000条步枪。在军事方面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他们对党的任务却知之甚少。土地由地方分配，如果农民自己要求这样做的话，但没有为分配土地进行认真的宣传工作。在组建政权方面情况也是如此。该军需要开展严肃认真的政治工作。我们要派人去。第12军约有1200条步枪。它原先约有3000人（约2000名武装人员）。没有预先开展宣传工作就采取了强制动员农民参军的政策。结果，发生了开小差和个别小分队暴动的事件，军也缩小到了现在的编制。军长是拉戈津^①毕业生，他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23岁），没有经验，是政治局委员^②。项英在那里做了某种工作，但他本人也不特别强。现在在那里采取了群众工作方针，工作正在进行。有了政府。土地分配了，现在正在重新分配（贫农要求）。我们同克莱因斯^③路过那里时，将在那里停留几天，并给予必要的指示。军的政委^④显得很任性（因权力而晕头转向），有碍工作，已派去新的人员^⑤。

从对我们正规军（我没有谈全部，例如没有谈11师、15军、9军、独立1师）的这一简短评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军阀之间的公开大战，尽管敌人集中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我们与去年夏天相比还是变得更强大。红军数量增加了，武器装备明显得到了改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敌人以大约17个师的兵力（其中11个师在江西）向我军发起进攻，但至今没能做成任何事情，这一事实绝妙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南京认为这些部队还不够，又向前线投入新的部队。红军已经成长为这样一支战斗力量，需要同它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它使统治阶级产生了

① 左权。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

② 原文如此。左权不是政治局委员。

③ B. П. 马雷舍夫。

④ 谭震林。

⑤ 何人不详。

莫名其妙的恐惧。南京为进行战争已投入巨资。而且这是在国家财政状况很艰难的情况下投入的。我们红军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缺点，我们在技术准备方面简陋得令人可笑，我们没有高水平的指挥员，地方的领导特别是上海方面的领导还远远不够，我们常常犯愚蠢已极的政治和军事错误，我们错过了许多削弱敌人的机会，我们为这一切付出了血的代价，等等，等等。然而，今天的红军是一支能顶住 15 万人的大部队进攻的力量。我们在扩大苏维埃政权领土方面没有取得成绩（同去年夏天相比）。现在苏维埃政权区域的面积大致与去年相同。但如今的苏〔区〕就其内部的巩固程度而言已不能与去年相提并论。我们有那么多的试验，有那样多的错误。这些错误正在改正，当然还远远不够，群众积极性越来越高，政权机关在逐步改善，群众组织在建立。我们的苏区已变得坚强多了。而在目前条件下，这比领土的松散扩展更有意义。这大体上就是对现时的红军和苏区应该作出的结论。

但是，在红军比重增大的同时，我们也在那里看到了使我们对于保持其战斗力感到严重担心的现象。我不是指比方说 7 军领导不问政治和它对革命任务的不理解，12 军内的混乱和反常现象等（我们这里到处都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和毛病，无论对苏区的防御能力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都还是可以改正的并且正在逐步改正。我指的是另一个情况。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 1 月 4 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①与“AB 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四中全会选入中央的书记）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泽东〕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泽

^① 李文林。他不是中央委员。

东]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泽东]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泽东]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德怀]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德怀]同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德怀]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泽东]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泽东]。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泽东]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①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不排除上面援引的关于何键谈到彭[德怀]部队情况的电报的消息与这次冲突有关。也无需证明，领导人中的这种状况会使红军的所有成绩化为乌有，会使红军遭到失败，会有助于敌人实现镇压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如果当地有坚强的中央局，显然就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至少现在，正当为苏区和红军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不会发生。中央局虽然已经委任，但除项英(他1月4日还没有到达江西)外，还没有派出。这件事情进行得太慢了，

^① 周恩来。

慢得不可思议。委任的中央局由9人组成，他们是：项英、布林斯基^①、斯特拉霍夫^②（他在〔中共〕四中全会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身患疾病——肺结核）、科穆纳罗夫^③、蔡和森（从麦加来）、毛泽东、朱德、一名青年^④和被毛〔泽东〕逮捕的江西省委书记^⑤。书记处由项英（政治书记）、布林斯基（组织书记）、毛〔泽东〕等三人组成。没有大人物。我建议让莫斯克文或向〔忠发〕老头子或张国焘作为书记进入中央局，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从这三位杰出工作人员（这里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中派出一位本来是不会给这里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其他同志持另一种意见。他们考虑，过些时候等党内斗争时期的种种乱子过去后，工作做了一定的安排时再派张国焘或者莫斯克文去。

在贺龙（他也被列入中央局的组成人员）那里和第1军也将成立中央局。

二、反革命阵营

在作出关于苏维埃运动前景的最后结论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反革命营垒的情况。首先，现在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南京能在何种程度上使国家趋于安定并把它统一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不谈南京与奉天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比我们这里更好的情报。这里只需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奉天由

① 任弼时。

② 瞿秋白。

③ 原文如此。应为科穆纳尔——王稼祥。

④ 顾作霖。

⑤ 李文林。他不是中央委员。

于参战^①，(虽说它根本没有作战)大大加强了自己对南京的地位。尽管南京作出种种努力，但北方与南方没有实现任何联合。它们是这样联合的，它们之间的争斗仍完全不可避免。在资金援助方面，奉天逼迫南京提供，它需要这种援助，以便把山西和冯的部队^②抓到自己手里。南京在湖北、湖南、江西遇到的麻烦事(苏维埃运动)对奉天有利。但是关于北南战争，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说明，奉天将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现在这未必对日本有利。南京现在不可能打仗。它清楚知道，新的战争一定会使它完蛋。苏维埃运动将获得新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它的道德经是先消灭华中华南的共产主义，然后才能用另一种姿态同张学良谈话。使江西、湖南和湖北平息下来是南京的中心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它的手脚就会被束缚起来。蒋介石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是，除了南京与奉天的悄悄战争外，现时有以下两件事引人注目。吴佩孚是个老坏蛋，他利用时机从四川溜走了，靠自己的部队进入了甘肃南部。他想建立中国西北政府。另一方面，当黄绍竑将军(广西集团)呆在南京并向南京表示效忠的时候，张发奎和白崇禧在广西发动了政变，解除了黄绍竑部队的武装。蒋介石拼命说服广西将领服从南京，意在让他们的一部分部队投入反对苏区的行动。现在这种前景破灭了。我们谈论国家“统一”时，还必须考虑到冯玉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他从未到过天津，而是一直呆在山西^③。他的一名将领^④来到上海，并围着我们党转，说冯[玉祥]派代表团去了苏联^⑤，而他主动到共产党这里来，请求派人到甘肃

① 指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发表的关于派军队到华北支援参与同阎锡山和冯玉祥部队的冲突的蒋介石的武装部队的声明。

② 指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陕西——译者。

④ 何人不详。

⑤ 关于冯玉祥代表团到苏联的文件没有找到。

建立共产主义。我们当然没有听信他这一套，我们指出，如果你真想帮助我们和自己，那就释放共产党人，在冯玉祥的集中营里有很多共产党人。冯〔玉祥〕并非无缘无故呆在山西^①。在对他合适的时候，他必然会浮出水面。要知道，他的所有将领都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们同他们有联系。国家统一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确，“统一”在全速进行。

尽管敌人兵力有很大优势，军阀对我们的第一次进攻还是被粉碎了。其原因如下：各省军队的行动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何键关心的是湖南，鲁滌平关心的是江西，等等。他们互不帮助。福建的几个师到达边界就停了下来。据说，它们藐视江西。湖南部队也一样。蒋介石在南昌时，似乎事情全安排好了。他一走，又各行其事，互不承认，如此等等。国民党军队不愿意同红军打仗。此外，它们同游击队也有许多摩擦，游击队妨碍（它们）采取正常行动。红军一撤离，所有老百姓就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逃走。政府军落得个没有当地财源，没有向导等的境地。它们采取的包围红军的策略没有也不可能有效。红军有足够的力量打破包围圈跑掉。当鲁滌平建议，应该集中兵力对红军采取行动时，他又一次“发现了新大陆”。但据说为此需要有统一的领导。蒋介石现在正调集全部兵力投入战场。三个新编师一部分已经投入，另一部分正在调动。除步兵外，他还想从山东调来骑兵，加强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他想造成巨大优势，扼杀苏维埃运动。他委任陆军部长何应钦为镇压红军的总司令。何〔应钦〕已在南昌。蒋介石本人也打算去前线。他显然准备在出现某种转机时再去。他希望在4月底国民会议^②召开前消灭我们。报纸指出，南京决定再投入10万部队来对付我们。他未必能调集这么大数量的部队。但至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陕西——译者。

② 见第513页注③。

少是在准备新的战斗。蒋介石企图通过任命何应钦为常任总司令来消除军阀们的独立性。不应低估这一措施的意义。我们的斗争条件必然会由此而变坏。何应钦是个在军事方面很能干的将领，被授予了很大权力。国民党军队的状态不是很好。例如，从北方调到湖南的一个师显得战斗力不强。南方人恨北方人，北方人也恨南方人。另外两个师好一些，但它们的驻地离苏区很近，削弱了它们的战斗力。报纸近来直截了当地指出，红军在当地老百姓那里比国民党军队要受欢迎得多。在南昌的 52 师不会同我们打仗。该师已有 10 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那里有我们的支部。专由我们这里委任的一位同志^①在领导。该师在准备起义。其他许多部队也不太可靠。但不管怎样，蒋介石在营造优势。最近两个月将是决定性的。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这一时期的斗争结果。我们的意见是：我们有很多机会打退军阀的第二次进攻。为此，应该像在东固那样，对两三个师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使军阀的整个战线土崩瓦解。这并不是幻想。国民党军队很糟糕。局部的失败就会造成它们的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成片的苏区便是十分现实的事情了。倘若万不得已拖延斗争，那么我们的事业也会取胜。拖延和赢得时间在目前条件下就意味着争取全胜。在上面描绘的中国总的形势下，时间对我们有利。

三、党的工作及其对苏区的援助

党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援助苏区，抵御军阀的进攻，但这种援助是很不够的。我们能向那里派去的人很少。共产国际关于在军队中提高工人成分的决定^②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执行。人员的派遣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有比较认真负

^① 何人不详。

^② 见第 260 号文件。

责的工作人员来到的部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变得好多了，党和苏维埃的工作（贺龙、第1军等处）有所改进。尽管在李立三时期经常派人到苏区来，但这些人这里是来（某种流放地）接受处罚的。联络开始发挥作用，但眼下还很不正常。在有这种联络的情况下，中央对苏区的领导能是什么样的呢？上海、香港、汉口等中心城市对它们的援助又能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红军能打退军阀的第一次进攻，那么可以说上海在这里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是我们善于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地方党组织的功劳。有人可能指出，有时甚至多次指出，这是冒进，是对工业中心的军事意义估计不足，等等。我却仍然认为，为帮助和领导苏区，上海迄今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很少。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实现转折。在这里空谈苏区党组织是全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反革命势力在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城市同我们进行的斗争会削弱敌人的力量等等，不会有什么用处。现在苏区需要的是更加切实的帮助，主要是需要领导。而我们至今未能成立中央局。不应认为，项英的前往就是中央局的成立。

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对苏区援助不力的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是工业中心城市党的组织软弱无力，而首先是党的干部软弱无力。党内工人很少。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工人很少。我们拥有的一部分工人还没有培养好，他们可以说是被提拔的领导干部，即将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在有比较得力的党的干部的情况下，难道能出现这种令人厌恶的立三主义吗？不用说，在〔中共〕三中全会问题上，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同立三主义进行了斗争，但没有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在起草决议时我们退让了，因为三中全会的决议^①，即便周〔恩来〕和斯特朗^②不篡改，把被他们删掉的我

① 看来是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见第578页注③）。

② 瞿秋白。

们的建议也包括进去，那它也还是不会因此好多少，而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调和主义的东西。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无需再加以证明，立三主义，如果说它没有彻底毁灭党，但无论如何也给我们造成了至今还没有消除的麻烦事。事实是，同去年相比党在上海的影响缩小了，我们这里几乎没有工会，党员人数也减少了。由于三中全会事件，我们丧失了太多的时间，放下了实际工作，特别是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后。当然，祸兮福所倚。通过四中全会和粉碎（也许眼下说彻底粉碎还为时过早）右翼反对派，我们为本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开展实际工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中央）领导机构（眼下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培养好干部。不过，额外的付出也是巨大的。近来，由于同右派的斗争，党的全部实际工作几乎停止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保卫苏区和援助苏区的问题上，我们迄今简直就像乌龟爬行一样。我们的所有建议，譬如在一般政治、工会、军事、组织方面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纸面上。中央近来很少研究专门的军事问题。这似乎是周[恩来]（军事工作领导人）的世袭领地。中央的领导方法常常是发发公文，表现出公式化作风。写得很多，争论得很多，反复交谈。军事部也是这样。起草一些冗长的指示，执行某种别的文牍主义^①。很少注重向工作人员和组织提出具体任务，很少进行监督，很少进行组织工作。至于地方党组织，那里的情况更糟。现在甚至很难说是地方党组织，因为在许多大的地区没有党组织。领导机关被摧毁了。广州、汉口、南京、南昌、长沙、香港、汕头、厦门等城市现在实际上没有党组织，只有个别党员、个别党小组。领导（远不止是领导）同志被逮捕并遭枪杀，整个组织被摧毁。现在上海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恢复各地的党组织。

^① 原文如此。

显然，我们意识到这些，并在同所有这些缺点作斗争，但我们还没有实现转折。而现在无论如何恰恰需要有一个转折。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困难很大，我们在各地都有巨大的力量储备，其积极性正在增大，而我们在军事方面提出的基本任务可以从我写给莫斯克文的信^①中看出。在这个报告中我不谈军事工作的成绩。成绩当然是有的，但显然很不够。我们需要做真正能给苏区提供很大援助的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同红军联系、派遣人员（工人、军人、中央局）、加以领导等。

尽管有困难，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将同苏区建立起牢固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和无线电）联系，将以更快的速度派遣人员，在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方面将出现转折，等等。有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我不在这里重复我已用电报^②报告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在建立联系方面还是在其他问题上，仍然有效并在逐步实现。对于迅速实现的日期我不抱任何幻想。工作是按中国方式缓慢进行的。此外，还有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时间。现在在派人的事情上同红军有了联系，但还不十分可靠。我们在加紧进行。已经开始重新派人。如果毛〔泽东〕那里有无线电台（报道说有），那么同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就会很快恢复。军事部书记和无线电报务员^③已经派去。给其他部队（贺龙和第1军）送去无线电台还需要一些时间。三部电台将于最近运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新的无线电学校已开办。目前有8人在学习，我们将再稍稍增加几个人。你们那里也应该培训无线电报务员。

除了为第1军要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外，还请派几名可靠的飞行员和从事专门工作的机械师来。他们不会跑到哪里去（除非遭

① 见第366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何人不详。

到失败)。他们会带来很大好处。依我看，因考虑到可能失败而不派他们来是没有道理的。

外国军人和通讯专家一定要派来。我认为，派他们到苏区去将是可能的。务必要有一位炮兵专家和一位会组织子弹生产的专家。我不再说明必须派他们来的理由。这是显而易见的。只需要派遣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俄文除外）的人。没有这一条最好别派，因为他们不能去上海以外的地方。

在动身来这里之前，我同克列普斯谈过红军用的军事著作的问题。我曾建议他印三种关于政治工作的小册子（已写成手稿，他有这些手稿）^①。这种事应当办。无论如何应当编写一本战术教科书并把手稿（译文）寄到这里来印刷。我们已在这里改写了我们的野战条令并在翻译。但这当然还不够。武装起义的问题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更好的，眼下就应翻译拙著《武装起义》^②，而不是阿努洛夫^③的那本。您有这本书，我们不会翻译。也就是说，关于政治工作、战术和武装起义三种书。这都是迫切需要的。眼下不再多要了。关于战术的书可以委托塞富林撰写。他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请把手稿和译文都寄到这里来。

为了同上海军事委员会工作，请专门派一名同志（马马耶夫、阿片^④、米^⑤、奇赫伊泽、科尔涅耶夫中的一位）来接替我。不能让上海的军事委员会没有我们的领导。这里的同志都忙于其他工作，此外，他们也没有军事素养。这里需要毫不松懈的领导，尽管现在在这里从事军事工作的是我们现有军人中最优秀的。没有

① 手稿没有找到。

② A. K. 奈伯格 [盖利斯]：《武装起义》，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1 年版。

③ 见：Ф. А. 阿努洛夫：《武装起义（及其策略）》，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0 年版。

④ А. И. 赫梅廖夫。

⑤ 何人不知。

专门的领导，工作会比这以前更薄弱。此外，以后还可以把这名同志派到红军中去，派另一名同志（上海将是他的一所好学校）来接替他。

日内我们就将启程。似乎再没什么问题了，能为保密所做的工作都做了。我们将化装成牧师前往。这个角色很不令人羡慕，但可能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在加紧掌握宗教用品的使用方法，不得不学习布道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东西。有证件。一名中国同志（过去是牧师，现在是党员）^①同我们一起去。我们将让这位中国同志返回，如果你们再派人来，他可以护送他们。若事情进展顺利，20天后，也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刻，我们就可以到达江西。

您无疑会骂我们在这里滞留得太久了。滞留的原因我已不止一次地作出过说明。此外，费尔德曼本应向您作详细通报，我不再就这个问题唠叨了。没有中国人我们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中国人直到最近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他们用种种令人胆颤心惊的失败事例来吓唬我们。您骂吧，但请考虑我们所处的环境。我想，其他人会是另一种情况，比我们要好些。

还想专门谈谈党内的失败，但我已电告您，拉姆扎伊^②做了同样的事情。此外，报告拖得太长了。恶梦般的失败处境，一次接一次的挑衅，一次接一次的失败。

致同志式的敬礼！

弗雷利希^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7，第 7—2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P. 佐尔格。

③ A. Ю. 盖利斯。

369

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 和秦邦宪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11 日于上海

绝密

同温裕成和波戈列洛夫^① 同志举行的会议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局讨论了我关于“青年先锋队”的信^②并表示赞同。从苏区来的人报告说，每个苏区的“青年先锋队”都集中起来了。中央决定为三个地区（赣南、赣东西^③和湘南一部分地区）建立“青年先锋队”司令部。“青年先锋队”代表大会应在今年上半年召开。

中央通过了城市“青年先锋队”决议案。将给我送来一份，并在下次会议上讨论。

2.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④。代表团是 1 月 3 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 [裕成] 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 1930 年 12 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⑤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

① 秦邦宪。

②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

④ 段良弼。

⑤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①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泽东〕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泽东〕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②）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③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泽东〕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④。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泽东〕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泽东〕，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⑤。毛〔泽东〕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泽东〕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泽东〕的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见第341号文件注⑧。

③ 指的是省委书记段良弼。

④ 刘获（译音）。时任红20军第174团政治委员——译者。

⑤ 指赣江。

指挥。

红13军^①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泽东〕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泽东〕知道这件事。

意见分歧早已出现。

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②时就已经产生。毛〔泽东〕主张攻打南昌，而彭〔德怀〕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德怀〕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泽东〕没有给彭〔德怀〕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③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④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泽东〕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泽东〕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泽东〕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

彭〔德怀〕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泽东〕断绝关系等等。

毛〔泽东〕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泽东〕建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红12军——译者。

② 中国红军部队1930年7月27—28日夜攻占了长沙，8月5日放弃了这座城市。

③ 原文如此。

④ 中国红军部队1930年10月4日攻占了吉安，11月18日放弃了该城。

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①。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其他问题。在放弃吉安之前，党委想留下几名党员同志在那里开展地下工作。毛〔泽东〕反对说：“吉安不是上海，也不是武汉，我们还能很容易地占领这座小城，不要分散人力。”

党委一向反对农民意识。毛〔泽东〕说：“应该反对富农，不应反对农民意识。”因此他受到党委的指控，说他有农民意识（！）^②毛〔泽东〕还反对提高工人的工资，因为提高工资会造成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彭〔德怀〕等人反对这一理论。

朱德与毛〔泽东〕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德怀〕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党的积极分子也对毛〔泽东〕不满，因为他看来是个军事独裁者，他从不召开军事会议，独自发布命令，等等。

对这份情报的评述。在这份情报中，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人们往往自己也不能对意见分歧问题说出什么肯定的东西。事实是，在苏区无论是在党组织内还是在苏维埃机关和共青团内，都揭露出了“AB团”分子。在一些地区，还是以前的党组织，50%的成份由富农组成。共青团和苏维埃机关内也是这种情况。毛〔泽

^① 指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A. C. 季托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材料》（两卷本），莫斯科1969年第1卷，第252—253页；《毛泽东通向权力之路（革命著作，1912—1949）》第3卷，第552—556页）。

^② 原文如此。

东]以及其他同志都谈过这个问题^①。而且还有过这样的情况：1930年底，一名红军指挥员^②在上海同中央军事委员会谈了话，后回到苏区，在那里策划了反对红军的暴动，因此，对这些人不能完全信任。整个这一事件将由中央局^③派人进行审查。

3. 苏区共青团中央局的组成

对这个问题 [中国共青团] 中央局有过意见分歧。温裕成主张派他去。顾作霖（组织领导人）主张他自己去。我赞成顾作霖这个人选，不能让温裕成去。顾作霖是个有相同作用、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政治上成熟，他可以去。温裕成则坚持要自己去。我答应把这个问题提到远东局讨论（后来远东局和政治局否决了温的建议，批准顾作霖前去）。

关于苏区中央局的组成人员已商定如下：

(1) 顾作霖（局书记），(2) 贺昌（组织书记），(3) 伊祖姆鲁多夫^④（宣传部长），(4) 温裕成在共青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的副手^⑤（局成员），(5) 陆定一（局成员）。这些同志应该立即出发。该局可以由苏区的同志扩充，此事将由该局就地决定并征得党的中央局的同意。

日内还需要物色5名同志，派往各路红军去（贺龙、第10军和其他军）。

4. 在无锡有两家工厂被业主关闭。70名青年工人宣布准备志愿参加红军。

① 看来是指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1930年12月17日和18日的声明和信（见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卷，第98—102页；第2卷，第259—262页）。

② 何人不详。

③ 指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局。

④ 陈昌浩。

⑤ 李白萍。

已商定：把优秀的同志同党动员来的工人一起派去。志愿动员工作应当继续进行。

5. 学校^①公开上课。

6. 已商定：共青团的5—6名同志应交由党的军事委员会支配（委员会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从事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近日内）。

7. 已为福摩萨（台湾）物色一位同志，^②将由（我们）派去。

8. 已开始研究制定对青年工人和对某些工业部门的要求。上海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

9. 由于保密原因，参加四中全会^③的人数中央局确定为20人（我表示同意）。波戈列洛夫正在起草决议案。全会应很快举行。

代表^④

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188，第 27—3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培训共青团积极分子的短期训练班。

② 何人不详。

③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1931年3月11日在上海召开。

④ Г. М. 别斯帕洛夫。

370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 谈话记录

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

托姆、威廉和克里亚因斯同志与 布林斯基^①同志的谈话记录

布林斯基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②也回来了。代表团是由湘东南党委派出的，以党委书记^③为首。（据了解，第一个代表团是由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江西省委的红20军^④派出的。）无论是在逮捕省委和红20军暴动之后几天离开东固的中央司库还是湖南委员会的代表团，在动身前都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因此，我们还没有得到全面的通报。但这个代表团除作出通报外还带来了各种文件，这些文件大大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些事件。

毛[泽东]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⑤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⑥，解除了担负监狱和

① 分是是 A. Ю. 盖利斯。П. А. 米夫、B. П. 马雷舍夫、任弼时。

② 陈刚。（易尔士）。

③ 刘士奇。

④ 原文如此。应为省委。

⑤ 原文如此。实际上是红20军174团政委刘荻。

⑥ 刘特侨。

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 12 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 20 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 [泽东] 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 20 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消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 [泽东] 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 [泽东]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 100 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 20 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 [泽东] 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 [德]、彭 [德怀]、黄 [公略]（彭 [德怀] 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 20 军红军战士书；（3）毛 [泽东] 给省委书记的信；（4）20 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 [泽东] 的呼吁书。

朱 [德]、彭 [德怀] 和黄 [公略] 在声明中称 20 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 [泽东] 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 AB 团分子^① 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 [泽东] 路线，也没有朱 [德]、彭 [德怀] 和黄 [公略] 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 [泽东] 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②

在给 20 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

^① 原文如此。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成员（见第 571 页注^①）。

^② 见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1 卷，第 98—100 页；第 2 卷，第 259—260 页。

容^①。毛 [泽东] 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 AB 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 [德]、彭 [德怀]、黄 [公略] 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 AB 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②

信不是出自毛 [泽东] 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 AB 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 [泽东] 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 4000 名 AB 团分子，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③。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代表团团长）^④ 是 AB 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 20 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 AB 团分子等。

红 20 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 [泽东]，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 20 军暴动惩处他^⑤。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 [泽东] 在 10 月 14 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

① 见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 1 卷，第 100—102 页；第 2 卷，第 261—262 页。

② 同上，第 1 卷，第 104—105 页；第 2 卷，第 264 页。

③ 同上书，第 1 卷，第 105—107 页；第 2 卷，第 264—269 页。

④ 段良弼。

⑤ 见 И. И. 弗拉季米罗夫：《中国特区（1942—1945）》，莫斯科 1973 年版，第 229—232 页。

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①。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 AB 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 AB 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 AB 团分子还是这里的 AB 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泽东〕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泽东〕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 AB 团成员^②，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 AB 团的或受 AB 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③来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 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泽东〕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④。

提款员带来了价值 5—6 万墨西哥元的贵重物品。

① 见第 666 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④ 指中共中央 1931 年 2 月 23 日给 1 军团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地方党委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39—142 页。）

371

雷里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 谈话记录

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

同向 [忠发] 和莫斯克文^①
同志的谈话记录

[1] 关于毛 [泽东] 与彭 [德怀] 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布雷里斯基^② 和莫斯克文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③ 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④ 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⑤ 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以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⑥ 将带着从毛 [泽东] 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⑦ 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

① 周恩来。

② 分别是：张国焘，王稼祥、沈泽民、任弼时。

③ 代表团成员中有段良弼。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517页注①。

⑥ 刘士奇。

⑦ 指中共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会，1930年8月召开。

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①。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指示]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泽东]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②，证明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③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2.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泽东]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④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

^① 指中共中央1930年6月15日给4军前委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37—141页）。

^{②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段良弼。

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 [泽东] 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 [泽东] 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① 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止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②。你们给毛 [泽东] 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③。

莫斯克文：好。根据我们现有的部分材料可以得出，“AB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好地利用了李立三的政策。他们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去攻打大城市，而呆在农村。此外，“AB团”还散布首先是针对毛 [泽东] 的最恶毒的流言蜚语，似乎他决定要枪毙所有领导同志，他想成为个人独裁者，等等。还有毛 [泽东]、朱 [德]、彭 [德怀] 等负责同志签署的决定（大概是声明——奥斯藤注），说他们相互达成了一致^④。（没有问是哪一天的决定。）我们还有前委的决定和通告^⑤，其中公开说，共青团书记是“AB团”成员。

① 项英。

② H. A. 雷利斯基。

③ 信的文本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2月23日会议上通过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39—142页）。

④ 见第667页注①。

⑤ 文件没有找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草案^①至今没有收到。我们对以前收到的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远东局表示同意。关于你们从共青团员那里获得的消息问题，根据这些消息，好像我们修改了关于富农土地的提法——相应的修改是：古德科夫同志在政治局集会^②上建议，鉴于中国的富农实际上是半地主和半高利贷者，因此没有必要在草案中提出富农是特殊的农民阶层，因为在实践中这可能被曲解，同志们可能把中农划为富农。政治局没有赞同这一建议，而接受了你们提出的表述^③。我们建议对经济草案作以下补充：在第3条后写上：苏维埃政权机关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大米和其他食品，以便在封锁和歉收的情况下将这些储备低价出售给贫穷居民^④。在谈到用加盖印章的方法^⑤对地方军阀、银行等的货币实行苏维埃监督的金融条款中写上：对来自其他地区（非苏区）的货币实行同样的监督。在关于红军的草案中，在谈到国民党军队是压迫者的军队时加上：“它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草案中指出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独立的工具”的地方，建议加上：“红军是真正工农的军队，是争取独立的工具”等等。在关于有权参加红军的人的条款中指出，统治阶级出身的人不能参加红军，我们建议阐明并指出，谁不能参加，谁可以参加^⑥。

奥斯藤：请将所有这些修改意见用书面形式寄给我们。依我

① 见《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第419—422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会议。

③ 见《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法草案，土地法草案》，《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第8—9期，第191页。

④ 见《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第8—9期，第200页。

⑤ 说的是维持旧币在苏区境内的流通。建议地方苏维埃对这些货币加以控制并在上面加盖印章。

⑥ 《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第8—9期，第203—205页。

看，除了关于储备大米外，所有修改意见都可以列入草案。最后的修正案应是恰当的表达。

3. 莫斯克文：我们已将我们苏区局的成员名单寄给你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奥斯藤：总体上我们是赞同的。你们需要就这个问题同托姆^①同志谈一谈。约瑟夫^②同志问，你们为何把邓中夏从贺龙那里撤走？

莫斯克文：我们决定撤走邓中夏和阿拉金^③。他们不赞成党在土地问题和建设苏维埃政权问题上的路线。他们认为，现在我们只应同敌人作斗争，而土地问题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要在收拾完敌人后再来解决。在新的同志到来前，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斯皮里多诺夫在政治局提议，不要派梅塔洛夫^④去贺龙那里，而派罗迈^⑤去，因为梅塔洛夫在莫斯科时经常同邓〔中夏〕和阿拉金争吵，这可能妨碍他们协同工作。政治局多数同志认为，既然邓〔中夏〕和阿拉金撤走，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梅塔洛夫是贺龙的私人朋友，因此把他派到那里去也是好的。罗迈将被派到第10军去。

奥斯藤：派遣63人的问题进展如何？曾答应最后一人于2月19日前动身。

莫斯克文：除两人外，他们都已动身前往，但只是去香港，下面的路程眼下还没法定。有两人留下来给贺龙运送电台。三天前我们就已决定，他们应在最近一周内动身。

4. 关于无线电台。莫斯克文：我们买了一台大的、两台小的。

① A. Ю. 盖利斯。

② И. А. 米夫。

③ 李剑如。

④ 夏曦。

⑤ 李维汉。

大的是给毛〔泽东〕买的，两台小的是为第7军和第8军买的。随后我们打算从香港和天津给贺龙和第2军运去无线电台。但结果发现，香港和天津的电台没有马达，它们只有靠电力才能运转，贺龙那里没有电，因此需要为贺龙购买新的带马达的电台。还需要注意到小机器只能在500英里距离内起作用，而上海与贺龙之间相距500英里以上。向托姆同志作通报的同志没有说明是怎么回事。

问题：关于我们同志的行程。

莫斯克文：初步计划是这样的，同志们去香港，在那里等候信使。我们对信使的指望没有实现。

问题：没有信使他们能否前往？要知道，这可能没完没了地拖延呀！

答：从汕头往前走不能没有熟悉当地情况、认识人、懂语言、熟悉地形等的向导。

5. 动员1000名〔工人参加红军〕。没有做任何动员工作。至今我们单个招收的多半是非党的人，10人派到国民党军队去，50人送到红军去。

奥斯藤：这里说的是动员，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单个招募，我们在上海总能招收工人，但问题在于这场运动的群众性。

莫斯克文：这是不可能的，基层组织不起作用，任何动员都无法进行。

6. 政府成员名单：政治局决定，苏区局的全体成员都列入政府成员，此外，向〔忠发〕、张国焘、陈郁、陆宗泽（音）^①、明大英（音）^②等以个人身分参加。斯皮里多诺夫^③建议，任命共产国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恽代英。

③ 张国焘。

际代表为政府机关主席或首脑。

奥斯藤要求送去拟定（进入政府）的同志的名单。我的初步意见是，外国同志在党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广大群众面前是外国同志，无论如何不是来帮助中国工人和农民进行斗争的俄国人。至于苏区局，那就不一定也不需要让它的所有成员都成为政府成员，要把当地居民中有声望的人选进政权机关，要给经过斗争考验的农民等留下更多的职位。

7. 上海省委下面的妇女部未撤消，但迄今为止还没能成立。未谈过撤消中央妇女部的问题，而只建议把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①中的妇女工作委托给这个部。

奥斯藤：无论如何不能把党的机关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机关合并，要保证通过党团贯彻党的路线。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妇女部书记应当是中央妇女部的成员。莫斯科对撤掉斯特朗妻子^②职务一无所知，她曾请求解除她的职务，但我们拒绝了她的这一要求。

8. 在过去的一次谈话中我们曾商定，某些政治局委员要负责一些支部的工作，他们应该同这些支部的书记建立联系。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组织部部长^③表示反对这样做，理由是，在现时条件下，这样的会见是不允许的。任何一个区的所在地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奥斯藤：想法是对的，不过必须实行（对支部工作的监督），不应机械理解，以为政治局委员都应到支部或不可靠的住宅去。你们应该实行政治领导，通过自己的机关检查支部工作。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

③ 赵容（康生）。

9. 来到（上海）的人：**伊思美洛夫**^①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斯拉温**^②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蔡和森**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我们建议派**克柳耶夫**^③和**布勃诺夫**^④去中央苏区，派两人进**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党团。

奥斯藤：任命事项必须同**约瑟夫**同志商量，因为他很了解这些小伙子，可以提提建议，进行帮助。

10. **奥斯藤**：关于中央与省委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工作的合法可能性和财政问题移到下次会议再讨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6，第 96—98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张闻天。

② 李竹声。

③ 潘家宸。

④ 庄东晓。

372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

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

秘密

格哈德同志的报告^①

亲爱的朋友们：

鉴于党^②从6月到8月的状况，大家知道，已经作了充分的讨论。因此，我从三中全会^③讲起。

三中全会本应从过去几个月的冒险主义政策中吸取教训；它本应接受并深入研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六月决议^④，从而同时为动员全党反对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对苏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创造机会。但三中全会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表面上是被接受了，重新建立了工会，重新成立了青年团并恢复了它的独立性。可以说三中全会确实是试图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是斯特拉霍夫^⑤领导下的政治局在这个时候竭力要把共产国际的路线同李立三的政策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要背着党实

① Г. 埃斯勒。报告是根据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发表的，但其中缺少许多专有名词。这些名词一部分是根据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加以恢复的，作者把一些地理名称和中国人姓名亲笔写进了记录（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38，第132—160页）。

② 指中国共产党。

③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④ 原文如此。应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月决议（见第257号文件）。

⑤ 瞿秋白。

现转折，而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消除李立三主义。很清楚，三中全会没有给党提供摆脱困境的保证。三中全会没有保证真正认真准备动员党和群众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全面进攻，更有甚者，在三中全会后还试图更加减轻对过去几个月政策的本来就微不足道和十分不够的调和主义的批判。如果读一读政治局在三中全会后发布的特别通告和提出的建议，那就可以看出，政治局仍然试图向党说明，一切都正常，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斯特拉霍夫的这些怯懦的手法未能推动党前进一步，试问党员群众中的情况怎么样呢？在党员群众中，例如在上海的党员群众中，笼罩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消极态度和沮丧情绪。党和工会完全脱离了群众。我们同工人罢工和日常斗争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薄弱。我们不能认真地开展某种运动，不能动员基层组织进行工作。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其领导已经重新改组）很快就失去了会员。例如，上海如今才 600 名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比党员还少。三中全会前夕，党员知道中央组织暴动、放弃进行经济罢工的方针，中央认为这种罢工不如整个组织问题、使党的生活军事化等等那么重要。但他们突然接到三中全会关于经济问题、政治斗争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指示以及关于现在不举行暴动、关于苏区等的指示。党员群众收到了各种不同的文件，既然三中全会试图把两个指示当作同一个指示下达，那就很清楚，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所有问题之前，党是不会前进一步的。这正是在蒋介石结束同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战争，国民党开始向苏区调动军队，逐步展开攻势要消灭我们的时候，所以就显得更加危险。本需要在城市里，特别是在铁路员工和海员中、在兵工厂工人中开展活动的时候，城市却默不作声，死气沉沉。虽然举行了经济罢工，但谈不上城市的巨大支持，因为党和工会脱离工人群众，消极被动，组织涣散，处于混乱状态。青年团也可以说是这种状况。这时出现了对党的整个政策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和对它的调和主义

态度的来信^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封信对党具有清洗作用。在党和广大党员群众中已经无法执行政治局企图隐瞒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评的调和主义政策。党员群众中的消极和失落情绪开始很快被广泛的非常积极的运动所取代。党员群众开始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在上海、天津、……^②和唐山，尤其是在上海，在支部、基层组织、党员积极分子中、在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中，出现了广泛的运动，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克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戈卢别夫^③和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特别是几个月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保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动力。同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出现了由工人和工会工作人员组成的非常激烈的又非常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一方面在共产国际严厉批评的影响下，另一方面在党员群众的压力下，中国的中央以及共青团中央试图真正同立三路线作斗争，承认它的全部错误以及三中全会的错误。但这是犹犹豫豫地、一步一步地做到的。政治局公布一些仍然包含着或者调和主义观点的残余或者新的错误的决议。例如，严重的错误是，政治局不仅犹豫不决，而且没有头脑，没有充分地指出，陈独秀的托派集团开始极力而有步骤地利用这种局面。这个集团立即试图一步一步地利用党内形成的局面、消极被动和脱离群众的状况；他们打着以下旗帜出来讲话：我们也始终反对立三路线，因此我们也应当留在党内。他们采用了一整套手法。他们派人要求接收他们入党并在党内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支持者——罗章龙和何孟雄。政治局服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共青团的同志们以及党

① 见第375注①。

② 一地名分辨不清。

③ 陈绍禹。

内的同志们——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戈卢别夫、科穆纳尔^①等人——为捍卫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了斗争。不久由于以下原因出现了特别复杂的局面。右的托派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企图利用工人对立三路线的憎恨，自然，他们的行动很狡猾。一开始他们发表的不是政治纲领^②……，因为在这一点上他们会遭到失败。但他们开始提出旨在把党抓到自己手里的组织问题。他们成功地逐渐利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人小组以及中国红色工会指导委员会^③。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徐锡根、中国海员工会领导人陈郁、上海工会工作领导人王克全和各种工会的领导人成了右派及其蛊惑运动提出的组织要求的传声筒，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提出了撤换整个中央和整个政治局的要求。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由它自己承担对党的领导工作的蛊惑人心的要求。宣称必须召开〔党的〕非常代表会议。其实，在整个辩论中，如果不算工人和工作人员对妨碍他们工作的情况的陈述，不断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撤换整个中央和政治局，召开非常代表会议。当一些支部，特别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和其他〔工会〕共产党党团通过这类决议时，这类情绪更加为各种十分卑劣的运动所利用，这自然使得这种复杂工作的局面更加复杂了。当我们在苏区遭到军事失败时，右派便开始小心翼翼地摸底。他们开始说，革命遭到了失败。当然，革命遭到失败都是李立三造成的！^④……〔右派〕企图把暂时的军事失败归作苏维埃的破产，在党内散布恐慌情绪。发出了断定红军似乎就是土匪的叫喊声。他们只鼓吹经济罢工。何孟雄试图说明，同右倾危险的斗争现在^⑤……，但是，共

① 王稼祥。

②⑤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③ 原文如此。

④ 下面一句分辨不清。

产国际的来信〔不〕是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保证。当我们问：“不是有共产国际反对立三路线的信吗，为什么它不是保证呢？为什么要撤换整个中央？”时，他则沉默不语。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中共〕四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第二，同时把〔批判〕的主要火力对准正在发动进攻的右派。在复杂的秘密条件下，全会只能开一天^①。参加会议的大约有 40 名同志：中央的同志，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来自企业的 15—16 名同志或工作人员。也是政治局委员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徐锡根和陈郁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夕同我们谈话时表示准备支持四中全会，虽然有种种保留并很痛苦^②。他们毕竟宣布，准备支持我们的建议，等等。四中全会实际上完全彻底地清算了立三路线，并且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种清算和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承认是在同正在进攻的右派和陈独秀的代理人的斗争中进行的，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一些工人，虽然只是暂时的（这一点后来我们才得到证实）。由于技术原因，我这里没有我的全部记录，虽然说援引许多工人在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有好处的，能看到在李立三领导下党内做了些什么事情。长沙的一名铁路员工，一位十分朴实的人^③讲述了他是如何奉区委书记^④、李立三同志的积极支持者之命，把 50—60 人的整个支部开除出党的，因为按照李立三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名工人向我们描绘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也会被开除〔出党〕。我不想在这里列举所有的情况，但你们可以想象，这些工人是带着何等愤怒的心情来参加全会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目前形势下要设法把党聚集到〔一起〕，为什么右

① 四中全会于 1931 年 1 月 7 日举行。

② 见第 358 号文件。

③④ 何人不详。

派的这些激进的和很不合情理的言词以及他们提出的极端的组织要求意味着党的彻底瓦解。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同志有 30 名。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右派集团没有公开在会上提出政治口号，而只限于提出组织要求：不承认全会，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撤换整个中央和政治局。在这次全会上（这次全会是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警察已经知道，在召开全会），他们采用各种手法，试图通过对日程等的辩论把全会的工作化为乌有或将其推迟。政治局的立场怎样呢？政治局和中央的同志向 [忠发]、戈卢别夫^①、斯特拉霍夫在这次全会上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无条件地承认，对立三路线实行了怯懦的调和主义政策。在全会上他们充分维护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政策。共青团在这次全会上采取了鲜明的立场。我想在这里简要谈谈共青团的发展情况。在与党内经历危机的同时，共青团自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是，青年们较快地使事情变得正常了。经共产国际代表同意，青年代表们考虑到警察监视的情况，没有单独举行共青团全会。如果形势许可，这次全会应在近期举行^②。借助于从苏联学校回到中国的青年同志，青年运动通过某些组织变动成功地阻止了困难的严重发展。必须承认，共青团代表团在四中全会上不仅非常积极地反对立三路线，同时也认识到必须同正在进攻的右派作斗争。很说明问题的是，例如，在对待重新选举政治局和中央的建议上，右派集团提出了自己的名单，用各种蛊惑人心的办法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是，全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政治决议也一致通过了^③。中央和政治局进行了改组。李立三被逐出政治局。斯特

① 原文如此。应为莫斯科文（周恩来）。

②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见第 668 页注③）。

③ 指《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总任务的决议》（见《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问题的通报》，莫斯科 1931 年第 5—6 期（74—75）第 71—79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7—27 页）。

拉霍夫也被政治局除名，因为全会认为，斯特拉霍夫应对在他领导下党执行掩盖立三路线〔错误〕的政策和同共产国际玩弄腐朽的外交手腕的政策负责。其他许多同志，如前上海委员会书记罗迈^①同志也被开除出中央和政治局，罗迈本人承认了错误，并认为自己因给党造成了损失而有罪过。政治局是这样组成的：10名工人和5名非工人出身的人进入了政治局。被选入政治局的还有陈郁和徐锡根两同志。确实，工人小组领导人陈郁和徐锡根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表现得信心不足，但比较守规矩。斯特拉霍夫也发表了声明，公开承认自己应对三中全会和其后对立三路线实行的调和主义政策、对共产国际采取的无原则的外交政策负有责任^②。他是否真诚，将来再看。四中全会后，右派看到它已遭到失败，在四中全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便对党发动了公开的分裂主义的进攻，虽然迄今为止它一直是在“拥护共产国际，反对中央和政治局！”的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四中全会前右派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中表现得很克制。但现在它已开始实行完全公开的分裂主义的政策。例如，四中全会后，在有一名右派^③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内，这名同志拒绝了他一天前投票赞成的决议。徐锡根和陈郁又开始摇摆不定，他们成了企图把上海组织和工会抓到手的右派集团的工具。全会后一两天，海员工会〔共产党〕党团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陈郁同志就作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四中全会后几天还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有20名同志。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红色工会领导人的徐锡根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那里开展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这次会

① 李维汉。李维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② 指瞿秋白在中共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第121—127页）。

③ 可能是王克全。

议变成了精心策划的攻击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会议；他们发动了真正卑鄙的反党运动：散布关于党的六大，关于学校里的分歧等各种谣言。这完全是为了瓦解党而发动的运动，其中没有政治内容。只有关于改变中央和政治局的组成、关于派遣共产国际其他代表和关于召开党的非常代表会议的要求带有政治性质。到会的共产国际代表要求声称自己完全独立的派别无条件地承认它在这场斗争中所犯的全部错误。要理解这一点，就需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同志也犯了错误。

当然，我们不能像谴责李立三那样谴责这些同志。但他们试图完全不作自我批评。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想承认并且不知道，他们是右派手中的工具。共产国际代表的决议案在4票反对的情况下被否决，这时他们就离开了会场。一天后^①该派别的核心人物何孟雄和另外26名同志被捕。之后自然展开了新的反党活动：说什么逮捕行动是中央挑起的。对此或许需要补充说说地下工作状况。在上海（党）组织中以及在中央和工会中，反对派实行了有步骤地将部分党组织交到警察手中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周来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一些同志住所的事件。而反对派干脆占据了省委所在地。自然，不久警察就发现了踪迹。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公开进行活动，公开说共产国际代表在哪里，等等。毫无办法，只好同反对派分开。例如，有个同志来到政治局声称，你们可以决定你们想决定的，而我们将做我们想做的。这是在为分裂作准备。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我们的组织离开反对派，以便不把党交到警察手里。当然，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也为使工人组织脱离右派和^②……进行了斗争。刚好是在我动身时，陈郁宣布，他将不再同反对派合作。我

① 1931年1月17日。

②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们现在收到了远东局的许多电报^①……。所有工人领导人都站到了共产国际一边，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离开了反对派。一位知识分子代表——罗章龙被开除出党^②。但是，所有工人——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在看到把他们带到了何处，而他们不是右派也不想成为右派，并取得一定的经验和弄清同他们玩的把戏之后，就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这对党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工人比例不高的党内，失去任何一名工人都是特别痛苦的（在上海比例当然较大）。关于目前的状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几天前收到的最新电报表明，打算消除这种危机。不过同志们，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自 8 月以来的所有这些事件——起先是暴动政策、三中全会，然后是右派进攻、分裂企图——自然使党变得没有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城市里，既没有恢复同工人群众失去的联系，也没有扩大这种联系。

关于召开本应在 2 月 11 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问题，迄今为止在城市里还没有带来什么大的结果。有几个在企业里通过的决议。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不会在 2 月举行^③。政治局打算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但只是现在，在我们克服了最严重的危机之后才着手做这件事。

关于召开失业者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我们这里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结果。

同志们，我一开始就讲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期。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苏区和军队的问题，这些你们已经听得够多的了。我只是尝试评估一下过去的全面进攻

① 下面一句分辨不清。

②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1 年 1 月 27 日决定，罗章龙被中共中央除名并被开除出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64—68 页）。

③ 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1 年 11 月 7—20 日在（江西省）瑞金市附近的叶坪村举行。

和今后的展望。在结束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者压力下，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下开始调集几十个师来对付苏区。他们企图首先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这些士兵从北线战场来到这里。他们当然并不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里出现了分化他们的大好机会。在军事方面，在部分武器装备上，他们比我们优越。但全国人民站在我们一边。这不是空话。当这些军队进攻时，农民们跟我们的军队一起撤出农村。他们出现了供给上的困难。各种战报报道说，在苏区战斗前夕，他们那里笼罩着闻所未闻的恐慌情绪。然而战斗开始时他们却得以给我们造成一连串的重大失败。我们被赶出吉安，被逼到江西省的西南部，他们占领了我们长期控制的据点东固。实际上，一切看上去是这样，我们不得不重又退到广东省山区。这种可能性过去存在过，现在也许还存在。这里自然产生一个我们应当认真加以讨论的问题，即能否利用避免战斗的策略来防止消灭我们军队干部的问题。但是，同志们，我们在各地出现的这些摇摆和遭受的这些失败又被克服了。几周前我们的军队已经转入反攻，现在正驻扎在离吉安30—40里的地方，这就极大地加剧了〔敌人的〕其他军队的分化瓦解和恐惧。例如，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很大的危险的广州军迅速撤退到了广东省边界。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消息来源对头几次反击的结果所作的评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头几次反击的总的结果是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它再也不能在这一地区用过去的办法和兵力消灭我们了。尽管红军有种种不足和困难，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大和土地革命进行的深度之深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敌人）不可能用以前的办法来消灭我们。尽管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犯了重大错误，尽管我们不大善于例如把中农吸引到我们一边来。（我们有来自^①……

^①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的消息，据此消息说，中农原则上不能参军。)

对此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里我们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因为苏区的政策处在李立三政策的深重影响之下。不错，迄今为止攻占汉口和^①……的庞大计划已经酝酿成熟，但是，譬如在江西我们已有10、15、20个城市，这些城市曾经是白军手中的据点。当我们问从苏区来参加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为什么不夺取城市时，他们认为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马列宁主义的启示。不能让匪徒们整天呆在自己的家里啊！另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工人应该在城市里办些什么事情呀？如果我们占领城市，那他们就会跟我们走，他们都会拥护我们。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来解决的问题，是苏维埃问题，苏维埃活动不够的问题。与其说是农村苏维埃，倒不如说是如同^②……的地方苏维埃。不久前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③……西的信，该信表明，农民对红军很有好感，但对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极不信任。他们说：“红军好，而苏维埃政府不很好。”这多少是由苏维埃的一些错误造成的，形形色色的不良分子、不好的共产党员、富农党员、知识分子混进了苏维埃，因为优秀分子都参军了。例如，我们的党组织非常软弱，他们没有任何机关，没有任何政策。他们呆在那里无所事事，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常常成了富农、知识分子等手中的玩物。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如果农民群众不跟我们走，仅靠我们军队的力量是不可能打败国民党的。因此任何政治上的错误都对军队作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于各种倾向、关于大地主和富农、关于所有富农都该枪毙，等等，这里已经谈得够多的了。马季亚尔同志大概就这些问题也写得够多的了。在富农领导下农民还举行了几次反对我们的暴动，得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和反革命的组织的支 持。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在一次会

① ②③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议上农民杀死了40名苏维埃工作人员。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经常像对待富农甚至像对待大地主那样对待中农，而对富农却像对待中农一样。这当然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在一些地区还是可以看到把中农紧紧地同自己联系在一起的趋势。但在另外一些地区，由于我们的错误，中农摇摆不定，转到富农方面。对此还应补充一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党的集中领导，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方面没有取得真正重大的进步。（有人从座位上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成绩？）在军队问题上无疑是有进步的。虽然还不能说是一支正规的在军事方面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党组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点。也不想谈论敌人未能用以前的全面进攻把我们消灭，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有缺点和错误，尽管国民党军队曾相互攻击，而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来巩固自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阵地。这表明了运动的深度。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因为十分清楚，针对我们的这种攻势将继续下去，可能还会采用现代化的更为强有力的手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现在正在加紧设法取得贷款。向帝国主义者出卖中国工业最后的剩余部分的各种方案正在加紧策划。但是作为回应，帝国主义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如果你们消灭赤区，贷款是可以的。美帝国主义者还特别热心。然而帝国主义者不只是提出要求，而且还非常积极地干预[中国事务]，德国法西斯军官（其中50人在南京当教官）在这时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们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了消灭赤区的现代方法：要用50架轰炸机从空中消灭一个又一个村庄，因为它们不需要地面士兵。当然，我们应当准备对付更为密集的攻击。从另一方面来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自然要保留几支最重要的战斗部队准备对付北方。今天来谈论南北战争是3个月还是6个月后爆发的问题是多余的。不过，如果这场新的大规模军阀战争开始的时间推后6或8个月，那么这段时间会被用来以各种手段加强对苏区的进攻。由此我们应该

了解真正尽快克服党内困难的重要性，完全明确党的路线的重要性，以便真正在苏区和城市迅速开展动员工作，打退这些进攻。我想，现在，在中国党内开始消除这最后一个危机之后，党已经从这些讨论中，从自己失败的沉痛经验中吸取了这样一条教训，我们现在就得切实开始实施具体的决定。

同志们：现在来谈谈一些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对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制定土地法，而我们这里存在着分歧，这里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提纲，关于共产国际的六月提纲^①和关于土地问题的九月草案^②的问题。这里我们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口号。在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六月提纲中，我们总的和主要的口号是无偿没收所有大地主和将领们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交给贫苦农民。在许多苏区我们实际贯彻执行了这一口号。在贫农、佃农和农业工人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地区，我们对农民土地实行了平均分配。将农村的全部土地合在一起，然后在农民和农业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经验表明，这一口号如果实行，它就是消灭封建主义残余的最激进的办法。然而，是否把平分土地的口号作为全中国的主要口号加以采用，就像九月提纲中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虑，因为这一口号不包括中农，会引起以下危险：一旦把这个口号在中农势力很强的地区作为主要口号提出，它就可能使中农动摇并转到富农方面。因为一旦把这个引起中农担心的口号推向全中国，在分地时中农所分得的土地就会比他们迄今所拥有的要少，就存在我们把

① 原文如此。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文件于1930年7月29日通过。

② 原文如此。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苏区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于1930年10月13日通过（见第308号文件）。

中农推向富农一边的危险。如果考虑到恰恰是华中和华北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还很薄弱，那里没有像华南和华中一部分地区开展得那样强大的土地革命运动，而许多军队都是在那里来反对我们的，这就更加危险了。因此，我认为，宣布这一口号为全中国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是不适宜的，而只能根据每个省的具体条件采用平分土地的口号，以便使农民相信进行这种形式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这不涉及贫农、佃农占人口70—80%的地区，而只涉及有强大的中农阶层的地区。这里存在着中农离开我们，转到富农方面的危险。我们不能根据苏区的情况为全中国提出所有土地口号。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很快解决，因为制定土地方针很有必要，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混乱。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政策问题。我们的苏区很分散。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位于赣西南。迄今那里的情况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尝试怎么样呢？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地方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拥有的生产资料比革命后的俄国农民所拥有的还少。显然，我们没有向农民提供劳动工具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不算农民得到了土地，那么他们解脱了什么呢，解脱了纳税负担和军队开支。去年夏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江西。那里稻谷丰收。平时农民出口大米。但这个地区受到了封锁。而且，不纳税的农民当然有更多的稻谷。许多农民都积存了稻谷。大米价格是2—3元1担，而在上海同一时期1担值22元。工业品价格与谷物价格出现了惊人的“剪刀差”。有人说，用五盒火柴就可换回1公斤或者更多的粮食。商人利用这种局面来发财。他们通过敌人队伍进行运送粮食的冒险尝试。他们开始掠夺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尽管枪毙了最坏的高利贷者，也试图储备粮食并把它卖给红军，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些同志产生了试图建立海关的想法，以便借此阻止商人发财等。海关绝对没有任何作用。我们没有建立海关的机关人员，此外，由于征收关税，封锁只会

加强。在没有任何工业的地区，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只是一种治标的手段。在红军有钱的地方，可以为它储备，可以迫使苏维埃为自己储备。油、火柴、蜡烛无疑是通过走私运送的，价格当然极高。但是，哪个商人敢冒险通过匪帮和红色区域运送商品呢？这些商品会被^①……没收并低价出售。苏维埃政府没有能力安排工业品供应。在这个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限制出现大的弊端；打算不阻止自由贸易，以使用利润来促使人们运来商品。我们没有任何经济组织和任何国家组织，要在我们应该执行军事任务的地区成立经济组织。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完成军事任务上。

下一个问题是工业。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不占领已有工业萌芽的城市，而是放弃城市的政策。因此我们没有任何办工业的经验。在长沙，我们把工业留给了企业主，但他们都抵制。有一次，我们从^②……的一个小企业那里得到消息，说那里的企业主被迫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或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等。企业主关闭企业走了。但还没有关于工厂里工业领域经验的真正材料。

财政政策。我们有两家银行，一家在福建，另一家在赣西。这些苏维埃银行部分地发行了货币（好像数额有限）或者旧币加盖印章，成为苏维埃货币。有人说，农民收取这些钱，但是否这样我不知道。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发行自己的货币。现在有足够多的货币在流通。军队可以从城市里得到钱。只要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政府，还没有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存在这些银行变成每支军队都来争夺的一般中国银行的危险。

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贸易问题是机遇问题和军事问题。至今还未谈，也谈不上集中的财政政策、集中的经济政策和

①②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集中的军事政策。

我们听说过关于成立合作社的各种尝试，但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根本不存在广泛的合作化运动。

关于党的实际工作。最近两三个月来，实际工作非常少。党的建设。首先我们应该谈的是：在支部里没有党的生活。这既与苏区有关系，也与城市有关系。我现在谈的是整个党的建设。例如在上海（我有来自那里的十分可靠的材料），所有讨论和决定都在党的积极分子一级进行。我这里没有我自己的记录，否则我可以给你们列举一些说明基层支部真正党的生活很少的准确数字。原因在于党犯了许多错误。党支部至今不能正常表达自己对这些或那些问题的意见。在党的机关与基层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鸿沟，某种真空。当然，部分原因是存在复杂的秘密活动条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党的政策不正确，党没有充分认识到组织工作，特别是工厂里的组织工作的意义。如果再加上有很大一部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由工人组织工作经验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很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以及秘密工作状态的困难，那就可以想象到，这一切对于从组织上利用我们日益增大的政治影响是多么大的障碍。我们在苏区的组织：我们在最重要的部队里有党组织，部分是很好组建起来的党组织。我们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军团有党组织，这些组织在开展真正的党的工作。当然，还有错误，然而这是很好的开端。苏区其余的党组织多数是在农村建立的，常常保留有封建主义的残余，一个家庭里最年长的人入了党，全家人就跟他一起被认为是党员。从闽西某些地区以及湖南省的一个地区经常传来消息说，党组织里富农很多。但现在情况开始有好转。如果说还不是全部，那么至少部分党组织已开始得到加强。

苏区的群众组织。我们这里有非常广泛的“青年先锋队”群众运动。很难说出数字，但可以说，存在着广泛的积极支持军队并同高利贷者作斗争的红色青年的群众运动。我们有广泛的红色

先锋队运动。但是，在苏区我们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工会。农业工人的组织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一些地区外，至今还没有较好的产业工人组织。其次，还有在城市代表群众组织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

我们的工会。我已经说过，工会蒙受了很大损失。上海的工会会员人数从 1300—2000 缩减到了 600。在工会组织涣散时期过去后，现在又重新开始建立工会和恢复联系。不过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关于中国中央工会^①的问题。还谈不上中央工会，它实际上只是部分地实行集中的工作。只能说海员工会在实行明确的真正集中的工作，虽然还表现出一些弱点。但毕竟可以说，这里出现了建立中央工会的开端。但是，比如对铁路员工，如果我还这么说，那我就是在欺骗你们。不过，我们的铁路员工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在根据这一方针开展工作，从一个固定的中心点向各地派出宣传鼓动员和组织者。不过我们只是有了真正中央组织的幼芽。不仅还没有全中国的工会^②，而且也没有城市工会。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近两年来纺织工业和丝织工业的罢工，那就很少能发现上海有 10 家纺织厂同时举行罢工。一个厂举行罢工，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组织举行罢工。造船业以及部分铁路员工那里则是另一种情况，而纺织和丝织工业，以及煤炭工业却不是那样。我们的工会还不明白，为了采取真正集中的行动，需要组织和领导上海最重要企业的工人。这还是我们非常薄弱的一环。

关于运动问题。关于劳工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开展活动要么很不好，要么根本没有开展。这里部分原因是距离遥远。情况非常复杂。如开展召开国际失业者代表大会的活动。假如 1 月份从这里发出在 2 月召开国际失业者代表大会的指示，那么这项指

^① ② 原文如此。

示大概要在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上海，而其他地区多半要在4月份才能到达。当然，港口城市情况要简单一些。但开展活动、对其进行监督等等，由于距离遥远以及需要持续数月的行程而变得很复杂。

对问题的答复

有过中农对上述口号作出反应而转到富农方面的情况吗？

对此我可以对你们说明这样一点：由于我既不能带来材料，也不能带来记录，我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但我有几份来自苏区的材料，描述了中农的情绪。我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里、从什么地区送来的。有一则消息好像是来自闽西，而另一则来自湖南。这些材料给我们描述了中农类似的情绪即某种摇摆不定。除了有关贫农和农业工人（他们支持土地革命）立场的消息外，我们没有关于农村各农民阶层对进行土地革命的各种不同方式作出反应的详细报道。我们的中国同志至今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注意，更不要说观察研究了。这里我们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中国的政治局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曾问过苏区的同志。但他们也不清楚。不过，我们得出一种印象，这里存在着某种危险。

关于苏维埃机关的群众工作问题。同志们把这理解为青年、妇女等组织。

首先请不要误解。如果你们听到苏区这个词，你们不要想到苏维埃俄国，不要想到是个大的相互联系的地区。这里说的是5或6个^①……地区。其中最大的是赣西南。但这里我们也不能说是建立大规模群众组织的一个统一集中的组织。

党企图使用行政手段。禁止成立青年机构。这在一年半以前是特别令人可怕的。但我认为，这种倾向变弱了，不过在红色工

^①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会还很强。

右派对群众有没有影响？

我认为没有。在上海，他们无疑有过一点成绩。在某些区里，他们有同托派一起成立的支部。但这是在党内非常困难的时刻发生的。我并不认为（这没有夸大），右派在群众中有影响。依我看，他们只在某些大学和某些大学生中有影响。当然，他们可能对小资产阶级和学生阶层有某种影响。

[苏区]的中国中央局。已经派了一些同志去那里，但他们到达没有，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可以说也是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有一名同志^①已经到达。

中央和苏区的联系。这种联系非常困难。何况我们至今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线。直到现在，同志们去那里像发送材料一样还是英勇行为，大体只有40%能成功。刚刚在长江上发现一条载有几名中国军人同志的小船，他们全都被枪杀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红军是不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我们从闽西红军那里得到了很不好的消息。红军士兵开小差。中农一般不想参军，然而却试图强迫农民参军。相反，我们有消息说，主要军团多半实行志愿兵役征集制，并且军队拿走的东西都要付钱。

[四中]全会决议最重要的内容。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作介绍。决议试图弄清楚立三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关于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问题、反对[罗章龙]集团的斗争等问题，然后简要说明全面进攻问题，即所有具体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所有决议都送给了共产国际。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某些措施、关于国民党国民会议问题、关于国际妇女节问题、关于进攻苏区问题等的决

^① 项英

议^①。

上海以外的红色工会数量有多少？[中共]三中全会上宣布的数字是3—4万会员。当时说，上海有3000名会员。而过了两个月后说，上海只有400—600名会员。根本没有关于近两个月来的总数的消息。我认为，可以说有2.5—3万会员。

关于苏维埃货币的价值有什么消息？只知道有两家银行——福建银行和赣西南银行的消息。在蒋介石进攻时，银行都被捣毁了。我们有消息说，农民把钱拿走了，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因此没有出现货币贬值。当然，只发行了有限的货币。

关于筹备海员和铁路员工代表会议的问题。海员组织曾打算在1月召开代表会议。我们反对，因为没有进行适当的准备。代表会议移到6月。已开始准备材料。在香港召开了座谈会和筹备会议。向所有港口派去了同志，他们应在那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现在应该召开常委会^②扩大会议，以便作进一步的准备。我没有记住有关铁路员工工会问题的材料。红色工会国际的一位同志那里有这方面的材料。关于筹备工作的情况我不能谈什么具体的东西。

红色工会国际五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③已经公布。早在1月初，罗章龙就对我说过，决议已在印刷，过几天就可以出版。

① 除《关于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的决议》外，中共四中全会还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告中国工农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见《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期（总第74—75期），第80—8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49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中译文最先发表在《太平洋工人》杂志上（海参崴1930年第9—10期第54—62页）。红色工会国际五大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31年在上海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开展了哪些与五大有关的活动？我们已经同^①……联合会谈过，同时顺利制定了关于应提交五大讨论的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项业已开始的工作自然因发生一月事件而放慢了。

还在哪些城市有反对派？在^②……，那里的反对派有特别委员会，不听从领导，在^③……。但据最新消息，反对派的影响在那里也明显下降了。

我们解散了长江局^④，因为多数同志被杀害，局面已成这样，实际工作再也不能进行了。现在，工作应按另一种方式进行。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38，第 161—185 页。

德文打字稿，经过核对的速记记录，副本。

① ②③ 下面一词分辨不清。

④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于 1930 年 8 月 1 日。1930 年 12 月 17 日被撤消。

3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年2月20日于莫斯科

致政治委员会

1. 请在政治委员会例行会议上提出格哈德^①同志关于中共四中全会和中国局势^②的报告。

2. 批准附上的关于成立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问题给远东局的电报。

东方书记处 马季亚尔

[附件]^③

致远东局：

绝 密

答复你们第×和×^④号电。我们认为再拖延苏区中央局^⑤和苏维埃民政当局的建立是极端危险的，有碍于建立根据地和纪律严明的红军。请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建立有威望的中央局，

① Г. 埃斯勒。

② 见第372号文件。

③ 文件发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上，第233—234页，未注明日期。

④ 原文如此。未标明号码。文件没有找到。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还不知道中央局已于1931年1月15日成立。

责成它：（1）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3）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下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中央局监督下工作；（4）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下面成立工农检察院机构和在党委会（直至区党委）下面成立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的检察委员会，同混入的异己分子、怠工现象、官僚主义和分化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为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应避免让很多中央委员和高级指挥人员进入苏维埃政府。应由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其中包括若干非党人士）组成多数。请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可能地直接参与大会的举行。请研究加强苏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措施。

在这方面，请制止不选举城市工人和贫民代表苏维埃和把它们的职能同工会职能混淆起来的做法。

请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不承认帝国主义者向南京和军阀提供的贷款、主张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不可分割的声明。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13—1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3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定

1931年2月22日于上海

远东局的决定

本局在讨论了自己在中共三中全会^①上的立场问题后作出以下决定：

1. 认为，总的说来，本局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表现在它不仅没有拒绝中共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决议^②，特别是关于向 [忠发]^③同志报告的可耻决议，而且只限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对决议的基础进行修改，不对立三主义作彻底的斗争，没有在三中全会上提出关于两条路线，即李立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问题。

2. 认为，因此本局在全会后直至11月23日决议^④前犯了一系列错误，其根源在于三中全会上的不正确路线和对它的不正确评价。

3.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允许本局将本决议（除5、6两条外）通告党中央政治局。

① 见第346页注③。

② 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见《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期（总第74—75期），第5—30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74—303页）。

③ 指《关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见《中国科研所通报》第5—6期（总第74—75期），第31—3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04—306页）。

④ 见第331号文件。

4. 认为，除奥斯藤^①同志外，本局全体成员都已从 11 月 23 日决议起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奥斯藤同志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在 11 月 23 日决议后立即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寄去政治上不正确的、实际上不符合事实的声明^②。本局建议奥斯藤同志收回这一声明，并根据一致通过的本决议写出新的声明。

5. 本局断然拒绝奥斯藤同志因托姆和维利^③两同志今天在本局会议上的发言而指责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声明。这种不符合实际地指责他人搞派别活动是奥斯藤想把政治问题转到个人关系层面上的卑鄙企图，而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只能造成本局集体工作的不协调。

6. 对于奥斯藤同志请求允许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声明中援引托姆同志的最初决议草案^④，本局从不使本局成员相互关系紧张和不把政治问题同私人问题牵扯在一起的愿望出发，决定不予批准。但同时本局决定不禁止奥斯藤同志援引该决议草案，把它交由奥斯藤同志本人负责和酌情处置。

注 1，本局曾建议，如果奥斯藤撤消他对托姆和维利搞派别活动的毫无根据的指责，那么第 5 条可修改如下：“在局内部通报奥斯藤同志撤消他最初对托姆和维利搞派别活动的指责，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但奥斯藤同志拒绝收回这种指责，这就迫使本局对这一条采用上述措词。

注 2，第 1、2 条一致通过。第 3 条奥斯藤弃权。其余条款本局全体成员通过，奥斯藤同志一票反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66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H. A. 雷利斯基。

② 见第 338 号文件。

③ 分别是 A. Ю. 盖利斯和 Г. М. 别斯帕洛夫。

④ 文件没有找到。

3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的信

（摘录）

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同志们：

由于你们本应听取并显然已经听取了罗伯特^①同志的详细报告，我在这封信中就只讲一些情况，可对罗伯特同志的报告作个补充。先说说四中全会^②的情况。由于可以理解的理由，党不能满足于也不满足于三中全会^③的结果。但在紧接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时期，普遍认为，在所有党组织内出现了消极、失望等情绪。共产国际的信^④，抛开它的一些缺点（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领导已经消除了立三主义，主要是弄清了李立三的理论，对立三主义的实际结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没有提出相应的迫切任务，在土地方面造成了某种混乱等等），对它作了总的评价，在阐明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在活跃整个党内生活方面无疑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只是从收到这封信时起，党内才开始真正同立三主义作斗争。如果这不仅指上层，而且指整个党组织，并且首先是指上海

① Г. 埃斯勒。见第 372 号文件。

② 指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见第 543 页注③）。

③ 指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见第 346 页注③）。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见第 308 号文件注③）。

党组织，那么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旧的领导完全惘然若失，放弃了领导权，丧失了任何威信。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无一例外地在所有会议上，大家都不想听旧领导代表的意见，党员群众一致要求开除他们，如果说不是任何地方都开除出党，那么至少也得开除出中央。甚至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①也是这样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旧领导被逼得万般无奈，走投无路，无论如何它在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中和清算这个主义方面没有起到主动作用。旧领导人被惶惶不安的情绪所左右。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毋庸置疑的事，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一个问题，坚持要把他们逐出中央。不管怎样，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人在进行。第一派当时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戈卢别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②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工会〕总委员会的几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

两派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最初可以感觉到的只是下列几点：（1）戈卢别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对此，罗章龙派宣称，现在谁提出右的危险的问题，谁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义的斗争；（2）第一派

^① 指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1930年12月1日在上海举行。

^② 分别是：陈绍禹、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

把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与**转向实际**和**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所有任务联系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与前一种情况类似的论点，认为谈论实际任务无非是企图抹杀和放弃同立三主义的斗争；（3）第一派反对大喊大叫的、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对立三路线**采取**不正确的、派别的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方法**。而第二派正是这样做的，它要求立即撤消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为了全面评述第二派，还应补充一点，何孟雄在同奥斯藤^①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瓦日诺夫^②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③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实际上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斗争，而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因此，第一派把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旧领导的优秀部分）聚集和团结在自己周围，而第二派则把党内所有最坏分子，其中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到一起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会前的这种党内状况下，我们给自己提出了什么任务呢？这些任务是：（1）尽快召开全会，修改三中全会的决议，纠正党的政治路线；（2）认为业已开始活跃的党内生活是积极的，应把它引上正确轨道；（3）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4）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

① И. А. 雷利斯基。

② 郭妙根。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57号文件注⑦）。

工作岗位；(5) 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使他们脱离派别分子的影响，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关于后一项任务，即关于分化罗章龙派的必要性再说两句。何孟雄和罗章龙是陈独秀式的旧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这一派包括部分工人。其中有徐锡根、陈郁、余飞、王克全，他们都是中央委员，在 12 月底以前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过任何斗争。我们认为，这些同志想用支持罗章龙的大喊大叫的和蛊惑人心的口号来补偿自己迟迟不同立三主义作斗争的过失。我们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这些工人同志满怀同立三主义作斗争的真诚愿望，但是他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被罗章龙拉进了不是追求党的利益的派别。虽然他们不是党内优秀的工人分子，但失去他们毕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使他们脱离罗章龙的影响，同时还应把他们推上重要的领导岗位。

这就是我们与全会前的党内斗争有关的任务。而除了必须纠正党的政治路线外我们还向四中全会本身提出了什么任务呢？这些任务是：(1) 党做到无条件地忠实于共产国际，这也就是忠实于中国革命。要在党内创造这样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能够排除将来重演令人痛心的经历，在重要关头，当党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上不正确的道路，从而导致重大失败时，不仅可以避免失败，而且相反，能够恰当地利用革命高涨的条件增强我们的力量。(2) 粉碎和根除党内为任何反共产国际倾向造成适宜环境的宗派集团。我们知道了党内旧的派别，知道了斯特拉霍夫-李立三^①派别。我们看到了罗章龙派别的形成。应该利用四中全会来在党内造成正常的局面，尽可能永远结束这种腐蚀党的党内派别集团的可悲的实践活动。(3) 争取使全党转向实际。要使党组织摆脱某种沮丧状态，少说空话以便完成恢复被破坏的组织、坚持不懈地

^① 瞿秋白和李立三派别。

争取群众、动员全党打退军阀进攻^①等项任务。四中全会应当是一个转折点。（4）加强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尽管前一个时期机会主义暂时地局部地用“左的”词句来粉饰自己，但右的危险依然是党内的主要危险。（5）根据这些任务来组建党的领导，保证贯彻执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制定的各项任务。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将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罗章龙派的工人部分和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联合起来，使他们完全协调一致地工作。

我不再详细谈这个话题。他们现在拥有与四中全会有关的全部材料（包括我们有意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②），可以对它作出相应的评价。至于我们的意见，那么我们认为，四中全会基本上决定性地完成了摆在它面前的任务。我们局无论在四中全会前还是在全会期间也都较好地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我们遇到了党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所处的非常紧张、非常危急的局面，但我们好歹已经控制了局面。纠正了党的路线。实现了向实际的转折（当然这还不能说在完成实际任务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粉碎了派别活动（能否长久——等着瞧）。保留了（简直是挽救了）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让罗章龙派的工人部分站到了自己一边（在四中全会后的很短一段时间他们中一部分人又转向了罗章龙，这并不重要。现在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把党内的优秀分子推上了领导岗位。总而言之，结果就是这样。

但是，在对四中全会作出大体上肯定评价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缄口不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更应指出这一缺点。这里说的是三中全会。它为何不能令人满意和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你们十分清楚。直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还没有对三中全会的过程和结果作出正确的说明。主要文件的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② 指《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见第686页注③）。

内容我们也是很晚才知道。只是到 12 月初我们才了解政治决议^①。而关于向 [忠发] 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的决议^②（出自局的）文本，我们也只是在四中全会前两天才收到。这个决议是很糟糕的。它完全充满了为中央的活动和它的政治路线、为当时的党的领导作辩护的味道。的确，它指出了个别偶然性的错误，但同时又声称，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的奸细才会提出关于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共中央路线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据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原来是敢于说出这两条路线对立的共产国际本身。）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及时了解与三中全会有关的一切，这并非不是某些同志的过失。正因为这一点才有我们 11 月 25 日的补充决议案^③ 的错误。在这一决议案中，我们基本上认为三中全会是正确的，从而降低了补充决议的意义，抹杀了它的全部政治涵义，为把共产国际的路线与三中全会的错误路线等同起来提供了口实。我们应该承担这一责任，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自己未能及时走上正确的政治轨道，未能充分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易于转向正确的道路，转向无条件地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当然，由于这一切我们给右倾机会主义派别集团提供了额外的武器，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然而，我们的这一缺点无论有多大，也不应作出过分的估计。即便我们没有犯这个缺点（当然，我们本应并且可以不犯），那我们也还是不能避免党内右倾分裂主义派别的形成。因此，我说说这个派别。我们对这个反党派别的最初概念起先多半是凭感觉形成的，后来才得到具体实际事例的证实。现在已经无可争辩地查明，罗章龙早在全会以前就有意识地、精心地和深思熟虑地拼凑

① 指《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

② 指《关于政治局报告的决议》（见第 704 页注③）。

③ 见第 466 页注②。

了反党集团，采取了分裂党的方针。从涉及派别分子的一些声明中和根据现在发现的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1）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一周就将总工会印刷厂转移到了另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2）他把工会的资金留在他自己那里；（3）他在四中全会后立即编写和出版了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①；（4）在全会后第二天他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这个派别领导人的会议，罗章龙在会上作出了关于开始公开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我局的决定；（5）早在四中全会前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上海省委，等等。他是不是根据陈独秀的指示行事的呢？有可能。中央委员们说，有两名陈独秀分子^②跟罗章龙有联系。不过，除此以外，陈独秀1月下旬发表的告党员书^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这份呼吁书中，陈独秀百般赞扬罗章龙，支持罗章龙散布的似乎是中央把何孟雄出卖给了警察局的卑鄙谣言，随后陈独秀说，摆在罗章龙支持者面前的是两条路：或者是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派别”，或者是转到他陈独秀一边，而他当然相信，他们都会选择第二条路。但是他失算了。

现在可以认为，反对派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方面，我们并不那么拙劣地运用了灵活的手法，立即把他的所有比较重要的支持者都拉了回来，没有让罗章龙搞垮党。另一方面，他的反革命小册子和分裂活动虽然使我局的处境变得很困难，但同时也明显缓和了我们党内的斗争。在绝大多数基层支部表示支持四中全会，反对分裂主义者之后，上海的所谓派别性的省委便决定自行解散并“向党投降”。现在总工会党团的几乎全体工作人员和上海以前支持罗章龙的一些积极分子向中央递交了悔过书。我们收

① 见第633页注①。

② 何人不知。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回了罗章龙夺走的印刷厂。顺便还弄清楚了，印刷厂领导人^①之所以听从罗章龙的指挥，将印刷厂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因为罗章龙骗他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如果说罗章龙在上海已显得很孤立，那么在北方他还有一些支持者。虽然在那里我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还是应该认为，我们已经基本上制服了反对派，消除了分裂的危险。

党拥有的优秀分子现在已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这使人产生某种信心，党将来定能避免出现类似不久前所经历的那种严重震荡。不管怎么说，只是现在才有了卷起袖子真正干实际工作的可能性。当然，过去我们也没有忘记实际任务，并在非常残酷的党内斗争过程中千方百计试图尽我们的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无可争辩的是，现在在党的面前展现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不错，在党内斗争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我们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状况的真实而凄凉的情景。现在我就来谈这个问题。

关于工会工作。我只简要地提一下，因为你们将从列昂^②的信中得知详细情况。怎么能用一两句话来评价我们工会工作的状况呢？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尽管总的说来我们的活动条件是有利的，但却莫名其妙地、默默无闻地放弃了这项工作。大家知道，1929年和1930年初，共产党在工会工作中虽然缓慢地但却逐步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成绩不大，却是我们党的珍贵成果。从1930年6月起，一切都化成了泡影。李立三把工会领导机构同行动委员会合并到一起，然后又把它们分开，所有这些扰乱行为当然不能不造成非常糟糕的结果。我们的工会组织在此之前是虚弱的、不强健的，而在李立三的种种试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 C. A. 斯托利亚尔 1931 年 2 月 24 日给红色工会国际的信（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317，第 5—17 页；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00，第 48—59 页）。

验之后则变成了完全脱离群众、脱离工人运动的纯上层机关。这一点在四中全会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另一方面，如果说在6月底以前通过利用合法机会建立了某些站点，那么在6月以后这一切都被取消了，据说这是根据李立三的直接指示办的，李立三认为，这种工作只会阻碍他实现庞大的直接革命发动的计划。同时在黄色工会、工人行会、兄弟会等组织中也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关于红色工会的人数，我想我们简直是受骗了。例如有人说，上海有我们的会员几千名。稍后指出是2000名，而到12月告诉我们说，只有700名，但经核实（1月），同我们有联系的工人只有250人。诚然，近三周末上海的组织稍许增大了这一数字——现在有500名多一点，显然，这是沧海一粟。如果把苏区放在一边不算，那么除上海外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海员工会会员（据说有800名，但这也需要核实），在北方有数不多的矿工和铁路员工，就这些。如果不打算用什么东西来加以粉饰的话，情况就是这样。无须证明，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安排整个工会工作，我们将顽强而坚定地用一块一块的石头建造我们的工会堡垒，并尽量使之变得更坚固，以致将来任何李立三分子都无法将它摧毁。我们向党提出工会运动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以前我们的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所有决议都很好，但只是一纸空文），我们现在在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我们可以天天监督这项工作，不再容许“蒙骗”。在现在提出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我们暂不提出任何新任务。这些任务你们可从寄给你们的与2月7日和25日有关的政治局决议草案^①（政治局已通过，未作修改）中得知。当然，日历上的日期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意义。在这些日期以后，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仍然有效。现在来简要谈谈这些任务：（1）发展

^① 文件没有找到。1931年2月7日是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8周年；2月25日是国际失业者日。

苏区的工会工作。我们制定了关于这项工作的专门指示^①（你们将会获悉），并采取了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工会中心的措施（现任总工会书记罗 [登贤] 同志将于近日内前往那里）。（2）**加强红色工会**。我们不得不从上层开始做这项工作。组建了（以**斯皮里多诺夫**^②为首的）坚强的总工会党团和（以**少先队员**^③为首的）上海工会联合会。已经向那里派去了莫斯科人（**梅尔库洛夫**、**扎卡托夫**^④等）。同时采取了恢复和加强我们同企业的联系的措施。在上海，我们已经取得了小小的成绩。但这项工作当然还只是在我们自己人这里进行。（3）**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我们正在为这项工作分配和派遣专门的同志。在邮政工会，由于他们的积极有效的行动（顺便说一句，今天报道说，他们取得了每月 10 元的加薪），我们的 3 名共产党员和 9 名共青团员已开始做一些工作。在电车工人工会理事会不久前举行的会议上，我们的一名同志^⑤当选为理事（理事会总共 6 人）。在这里，水好像开始流动起来，但成果不大，现在的问题恰恰在这些小石头上。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无疑是有希望的，特别是国民党现在在开展**改组黄色工会的运动**。国民党采取了以下措施：1. 解散邮政工作人员、公用事业工作人员等的工会，禁止国营企业和市政企业工人组织起来；2. 撤消产业工会，成立区域性工会：在上海将成立 10 个区域性工会——各行业联合体；主要任务是不准群众集会，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工人利益；3. 将在企业里建立“**调解劳资关系**”的工人-企业主委员会。在许多黄色工会中已出现了强大的运动，尤其是在邮政工作人员和电车工人那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无疑将会发展起来并变得激烈起来。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张国焘。

③ 关向应。

④ 分别为：王云程、殷鑑。

⑤ 何人不详。

当然，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形势。我们不能反对改组黄色工会，以免造成我们维护黄色工会的印象。但是，我们应该反对国民党，因为它不仅捣毁红色工会，而且借口改组黄色工会实际上剥夺工人成立任何组织的权利。我们应该号召工人根据这一经验建立自己的阶级工会，等等。但同时我们当然不应拒绝让我们的党员参加区域性工会和企业性质的工厂委员会，以便揭露国民党，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4）**利用合法机会**。我们想让这类站点网覆盖全上海（我首先说上海，是因为我们想把上海各个方面的工作变成我们其他组织的样板）。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许多站点已经建立。近日内将设立 40 多个站点（食堂、茶馆、阅览室、运动场、夜校、妇女专业训练班，甚至在工人区建立了诊疗所，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位医生共产党员^①）。已经弄清楚，这一切需要的资金不多，没有遇到警察方面的任何严重障碍。我们已经提醒在这项工作中必须保守秘密，因为在这之前曾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既然这是合法的站点，那么凡是愿意知道的人可以知道，这个站点是我们党建立的。另一方面，我们指出最好利用我们失业的同志和被杀害或被逮捕同志的家属到这些站点工作，这样来合理地利用本应给予他们的物质援助。当然，我们将一周一周地扩大这些站点的数量，这将会在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方面给我们开创良好的条件，而另一方面，这也十分便于传播我们的机关刊物。（5）**出版总工会的大众机关刊物**。在这以前，总工会还没有出版过自己的机关刊物。现在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机关刊物已开始出版，起先是一周一次，已确定近期内将每日出版^②。（6）**失业者中的组织和工作**。失业者委员会已经成立，从上面了解到，已散发了有相应口号的传单。2月25日将怎么度过我们还不知

① 何人不知。

② 显然是指《工人报》——《红旗周报》的单页。

道，但是，考虑到我们普遍都很软弱，我们不能抱任何特别的希望。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奠定了在失业者中逐步开展工作的基础（此前根本没有做工作）。顺便说一句，我们不打算在南京路举行任何示威游行，我们只打算在工厂大门附近举行飞行集会和失业者最集中的地方举行简短的失业者飞行集会。（7）**罢工斗争和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要全力为我们的组织保留领导和组织罢工斗争的任务。但同时我们也要求党和工会的机构不要泛泛地谈论罢工战略，而要具体去领导每一个正在成熟和正在发展的斗争。根据寄给你们的上海省委的材料^①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指示已经在开始执行。关于工会运动大体就是这些。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特别的任务，我们只打算实施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现在全部问题在于，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实际中奠定我们在工业中心的群众工作的基础。我们清楚地知道，不这样做，就不能真正开展苏维埃运动，不能真正地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现在，随着两名太平洋书记处的同志^②的到来，我们将更容易监督和领导整个这项工作。

现在十分简略地谈一谈**共青团**。你们将收到我们年青人^③的材料和书信。我只想指出以下一点。起先共青团内形成了比党内还要复杂得多的局面。当时的共青团委员会（温 [裕成]、刘 [明佛] 和陆^④）比党的领导更少受到我们的影响。相反，该委员会在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0年12月23日决定派往上海工作的Ch. 克伦宾和M. 考尔。

③ Г. М. 别斯帕洛夫。见第369号文件以及别斯帕洛夫1931年2月23日给B. T. 切莫达诺夫的信（见全宗534，目录4，卷宗188，第5—18页）。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陆定一。

实际清除立三主义的问题上甚至局部地进行抵制，部分地对抗我们的指示。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十分坚决地进行小的“外科手术”，以便整顿局面。当然，我们是通过党的政治局做这件事的。结果，更新的共青团委员会（温 [裕成]、波戈列洛夫^①、顾 [作霖]）在党的四中全会上表现突出，现在开始齐心协力地干实事。近期将召开共青团全会^②。我们将在这次全会上巩固共青团现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动员全体团员完成迫切的实际任务。被派来的大学生最初在当时的委员会那里“不受欢迎”，现在走上了共青团的领导岗位。

关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我先提醒一下，这将是我的信中最令人不快的部分。问题如下。12月底，我们局打算认真讨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问题，我要求送来有关材料，以便事先了解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这些材料我们在1月份才收到。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按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人自己的话说，我们没有取得联系，几乎没有向被关押在监狱的同志提供任何帮助，而大家知道，仅仅在上海一地的各种监狱中我们的同志就有不下2000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只向全国35个家庭发放了补助金，等等。我们不得不敲起警钟，并向政治局提出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定期仔细检查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作的问题。委员会成立了，由于它做工作的结果，（1月底）已经弄清楚，在1930年得到的全部资金中，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用来救济蒙难者和我们被迫害的同志及其家属的不到10%，而90%以上被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上层机关人员吃掉了。还查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根本没有任何群众组织，过去它在这方面的所有报告都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实际上，既没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任何一个基层支

① 秦邦宪。

②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见第369号文件注②）。

部，也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成员。我们莫斯科的同志们提到的所有数字，经检查原来完全是伪造的。不仅如此，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机关工作人员还从事简直是欺诈性的商业活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团的一名成员携带他本应存入银行的 4000 美元逃跑了。总之，这是个最令人愤懑的祸根。尤其是，如果我们加以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人在我们所了解的某些场合，以没有钱为由拒绝为我们可以营救的同志（其中有 11 月的两名工人中央委员^①）支付为数不多的钱款，致使这些同志遭到枪杀。政治局因这件事曾受到我们好一顿责骂。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两名前“领导人”^②被开除出党，党团被解散，任命了新的领导人^③。对前“领导人”将在有遭受过监禁的同志和被杀害者家属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公审。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必须重新开始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这是在中国条件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和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将采取措施，立即向被捕者家属提供援助，等等。我们从过去的资金中挽回了 3.4 万墨西哥元。我们将在新来同志的帮助下开始展开必要的群众工作。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事件中吸取的不只是单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教训。这对我们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必须非常精心地监督各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今后不再出现在多年间一直欺骗领导机构的可能性。我们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进行了追查，并发现了恶性溃疡。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所有其他组织中进行追查并有步骤地进行挖掘。

苏维埃运动问题。过去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红军成功地打退了军阀的第一次进攻。根据最乐观的统计，红军队伍不足 10 万人。众所周知，它的部队是分散的，分布在较为广阔的地域内。进攻它的敌人的数量超过 20 万，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

①②③ 何人不详。

和集中统一的指挥等。但军阀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遭到了失败。的确，敌人在进攻开始时（12月）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击退了我们的部队，夺取了我们的大片地区，包括吉安乃至东固（我们的堡垒）。我们最初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敌人占有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苏区在土地、经济和组织政策方面犯了错误，导致群众不是在所有地方都给予我们足够的支持。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犯的错误部分地开始得到纠正。另一方面，政府军一些将领中（湖南人内部，湖南人与江西人之间）的内部矛盾、财政困难等开始表现出来。士兵群众同苏区接触时受到了农民运动的影响。总之，我们在上一封信^①中预见的都得到了证实。元月1日红军实现了转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彻底歼灭了政府军三个师（5师、25师和18师），抓获和处决了几名师长^②，重新占领了东固。18师几乎整个师转到红军方面。2月，红军包围并击退了南京的两个师，根据今天的消息判断，又发起了攻势，可能已经占领了吉安。红军的胜利，军阀的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感到非常吃惊。这些成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富有生命力和我们在中国事务中的策略有良好基础的最好证明。

现在我们处在军阀第二次进攻的前夕，敌人对这次进攻做了更为精心的准备，打算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我们。我们依然坚持我们在前一封信中提到的任务和指示。保卫吉安中心。建立“成片苏维埃化”的地区——不留下反动策源地。在对我们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但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我们以

① 见第339号文件。

② 只知道处决了张辉瓒。

前作出的不夺取大城市的指示^①。当时我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我们还弱小时，我们不宜发起重大战役，不宜从攻击大的中心城市开始，而最好是准备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不同敌人的主力进行交锋。现在形势已有所不同。敌人夺取了同我们进行决战的主动权。而如果我们能打退第二次进攻，那么大的中心城市的问题就会有点不一样。在取得这种有利结局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应预见到我军对大城市也发起进攻的必要性。当然，眼下能谈论的只是长沙和南昌。这是我们的战事顺利发展情况下的事。不过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第二次进攻对我们来说将是更加严重得多的考验，要求我们更多地动员人力和物力。

在加强苏维埃运动方面我们做了些什么，还打算做些什么：
(1) 为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局。其组成人员是：项 [英]、布林斯基^②、毛 [泽东]、科穆纳尔、朱德、罗 [登贤]（工会工作人员）、顾 [作霖]（共青团员）和两名当地人。莫斯克文^③ 将不迟于 3 月 10 日前往那里。(2) 在各个多少独立行动的军：1、7、10、12 军和 2 军团（贺龙）建立了中央局或中央代表机构。为此使用了梅塔洛夫、也许还有李维汉（他去莫斯科的问题可能要重新研究）、古德科夫^④ 等。(3) 为派遣尽可能多的核心积极分子到苏区去，我们在继续重新审议中央和核心积极分子的组成。(4) 最近一个月已从上海向苏区派去一批军事人员，共 63 人。我们在继续清理有军事经验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便把他们派往苏区。(5) 正在动员 1000 名上海工人去加强红军。详情你们可以从由我们制定的并由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我们针对军阀进攻所担负的任务

① 见第 291 号文件。

② 任弼时。

③ 周恩来。

④ 沈泽民。

的决议^①中得知。我们的考虑就是这样。被动员的一部分人直接派往苏区。而大部分要派往南昌和长沙地区，那里的军阀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我们的人应该打入军阀部队，然后带着武器和被说服的追随者一起转到红军方面。对我们来说，这是把无产者调到苏区的比较简便、廉价和适宜的途径。中央委员们说，首批100人的经验非常成功。显然，第二批100人将于最近10天内调去。这一切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将竭尽全力，以使我们的计划能圆满实现。（6）已经下达指示并采取措施组织士兵暴动和（对武器库、停机坪、铁路等的）破坏活动。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行动的结果，有三次士兵暴动。当然，我们将量力来继续破坏敌人的后方。（7）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同湖南、山东、河南的秘密社团和自发的农民斗争建立联系（据今天的政府消息说，几乎整个湖南省都在“匪徒”手中，同一些消息来源断定，他们有10万人）。（8）改善同苏区的联系。实际上同各个军还没有很正常的联系，但联系是有的。我们可以接到报告和转发指示。的确，直到最近这种信使联系还组织得很不好。现在设立了专门机构，由于党现在有了一些资金，将建立中间站点和固定站点，这将大大改进整个这项工作。而且，得到的5部无线电台现在正在运往最重要的地区，这将把它们同我们以及它们彼此之间联系起来。（9）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弄清，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未能在上海召开。因此，我们决定在苏区境内召开。我们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此事。我们从自己方面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并通过政治局提出了法律草案：（1）劳动法，（2）土地法，（3）经济政策

^①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第二次反围剿于1931年2月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委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43—152页）。

法，(4) 苏维埃建设法，(5) 军事法^①。请你们仔细地审查这些法案，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我党在苏区的行动纲领，我们通过这些法案提供了我们以前转交给苏维埃运动工作人员的所有指示的精华。我还要顺便在此表明我对马季亚尔的这样一种做法的困惑不解，他在最近的信中把我们上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② 归结为单纯的误解。马季亚尔显然忘记了在关于立三主义的信中和在土地法草案^③ 中谈到消灭农民所有制和普遍平分土地的必要性，谈到不进行这些工作就是右倾的最好证明等等。我们在上次的信中和在土地法草案中相当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得不在没有等到你们对第一封信的答复就拿出这个草案）。你们对所有这些法律草案是否有意见，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意见，请赶快通知我们。或许，在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公布这些法案之前我们还来得及吸收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目前已将这些草案交给党和工会组织讨论。关于调托姆和克莱因斯^④ 的问题我不说了，因为不久前已给你们发去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电报^⑤，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

“福摩萨”（台湾）。在上一封信中我们提到，我们打算挑选一名专门的同志，他在同我们联系时能帮助我们同台湾人取得联系并领导他们。这名同志^⑥ 已经选好。已经通过他开始工作了。在事先进行指导后，已经向台湾派去了3人^⑦。现在又挑选了另外3

① 见《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法律草案》，载《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第8/9期第191—205页；《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第422—439页。

② 见第362号文件。

③ 见第374页注②、第375页注①。

④ 分别为：A. Ю. 盖利斯和B. Л. 马雷舍夫。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⑦ 何人不知。

人（2名共青团员，1名工会工作人员）^①，他们将在本周动身。我们从已去的一个人那里收到了来信^②。现在台湾有25名党员（其中有5名工人，4名农民）。1月20日召开了党代表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撤换了旧的机会主义的消极领导。除工会和农会（已组织起来的总人数是1.9万）外，那里还有具有一定革命传统的所谓“文化协会”（会员900人，管委会里有两名共产党员^③），或许能将该协会变成群众性的反帝联盟。我们（从保密角度考虑以远东书记处名义）给台湾的同志写了一封政治性的长信^④。请像给你们寄去的其他材料那样给以审阅。无论如何，我们期待作为我们的工作成绩使台湾朋友们在某种程度上活跃起来[……]^⑤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领导人都坚持积极解决召开七大的问题。六大以来已经过去将近3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少事件。需要中国共产党自己对这些事件作出总结，深入思考全部经验（特别是像意义重大的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检查过去的策略，拟定新的策略。在不贬低共产国际领导的全部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容忍这样一种状况：党只是靠共产国际的指示过日子（常常是机械地采纳这些指示），而自己在思考经验和制定策略方面却很少表现出积极性。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滋生了立三路线之类的现象，而主动精神和自我创造性却具有变态的形式。应该以高度的集体负责精神和独立自主精神来培养教育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多半是由上面挑选出来的而且往往是匆忙挑选的。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不过应该精心准备并

①③ 何人不详。

②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下面删去了关于菲律宾、印度支那、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上海印度青年联盟的部分。

能保证有较强的代表性。请注意，代表大会实际上至少要在得到你们的批准之后过6个月才能召开。当然，如果那时条件不允许，则可以将开会日期往后拖延。代表大会肯定会使部分积极分子暂时脱离实际工作。但可以尽量把这些消极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况且它的积极成果足以补偿这些消极因素。正是实践会赢得胜利，因为将可以做到使我们的积极分子带着新鲜的充沛精力在全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党的任务。一个正在积极行动和进行斗争的党（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样的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召开党代会。请你们把对七大问题的最后意见尽快转告我们。

现在谈谈我局的工作。关于我局的工作你们既可以根据罗伯特同志的报告，也可以根据此信和寄去的所有材料来加以判断。不过，因为你们专门询问，我就简要地谈一谈。我局成员之间的工作已经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已在上一封信中提到。（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现在又在电报^①和来信^②中提及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认为工作分配得不当，那就请告诉我们。）正如我以前写过的那样，我们是按国家分配工作的，而在中国则是按工作部门分配的。我不具体写了，因为你们最好是从罗伯特同志的口头汇报中去了解。局的会议通常是每周定期举行。此外，几乎每周都举行非例行会议来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在四中全会期间差不多每天都开会。出席会议的有11人（除你们知道的人以外，还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一名工作人员^③，两名新的太平洋书记处人员和安里^④）。所有问题我们都是集体决定。自上一封信以来，目前我们没有重大分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362号文件。

③ J. 多尔森。

④ R. M. 鲁德尼克。

歧（不算对三中全会的评价）。除已经提到的信以外，我们还就军事问题、反帝同盟的工作（在同其领导人谈话之后）、上海组织的工作（党和共青团单独的工作）等写了一系列的信和指示^①。我们的会晤是这样安排的：每周我们同各政治局委员会晤四次，此外，共青团员会见自己的人，工会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同妇女运动领导人也会见过几次，给她们发出了关于三八节的书面指示^②。我局代表还定期（每周一次）同宣传部长^③和机关刊物编辑^④会晤。也同组织部长^⑤会晤。从我局派出的一名同志每周都同上海组织的领导人会晤（我们对该组织的工作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此外，我们的人还定期同军事工作人员和多数来自苏区的人会晤。经常同台湾人、日本人、朝鲜人、马来亚人以及从我局派出的有关人员会晤。多数谈话都有记录，你们将会收到。

现在谈谈罗伯特。他已不可能在这种复杂的警察条件下在上海呆下去，为了销声匿迹，他至少应该离开上海一段时间。起初我们设想把他送到天津或香港呆上一两个月。但局里一致决定，把他送到莫斯科去通报消息更为合适。同时还考虑到反对派领导人要去莫斯科和在莫斯科同这些人谈话时罗伯特可能提供的帮助。过了两周多的时间我们才得到你们的答复^⑥，没有等到答复我们就电告^⑦罗伯特同志，让他前往莫斯科。接到你们的答复后，我们

①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沈泽民。

④ 指的是哪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是《布尔塞维克》杂志还是《红旗日报》和《实话》报不清楚。

⑤ 赵容（康生）。

⑥⑦ 文件没有找到。

给罗伯特同志发了第二份电报^①，不过这份电报没有赶上，他已经走了。过一段时间（再过两三周）你们可以让罗伯特返回，但一定要带上一本好的新护照。让他能够稍许喘口气，这是他非常非常需要的。

关于斯特拉霍夫。四中全会后我就同他谈过话。谈了他后来写的声明^②（现寄给你们）。我提出让他搞政治工作的问题。他摇摆着手脚表示拒绝。他更乐意从事翻译，讲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现在他病了，将完全脱离工作两个月。我认为，以后可以利用他做些非独立的，但却是政治性的工作。

关于李立三。我们真感到有点惊奇，你们竟以这样一种排场欢迎他，让他在主席团作报告^③，让他俨然像党的领袖一样给四中全会发电报指示^④，等等。在此之前，这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电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认为，把他送到另一个国家是不合适的，他不懂语言，不能同当地的人联系。最好是让他去学习。这里无论如何在最近半年内，或许一年内将不可能利用他做重要的工作。

关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代表。他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我们同意打发他走。但要过一个月才能办这件事，第一，以便在现在进行的恢复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中多少利用他一下；第二，以便把邮件随他发出。请将留他一个月的事通知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认为派来新的代表（不过应是外国人和合适的工作人员）对于远东的工作仍然是必不可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瞿秋白1931年1月17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第128—133页）。

③ 见第344、345号文件。

④ 指李立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四中全会的电报（见《党的建设》，上海1931年第3期，第44—45页）。

少的。

关于威廉^①。罗章龙的小册子^②之事你们已经知道。我可以补充报告如下。这本小册子散发了许多份，并且落到了当局手中。后来我们弄清楚了，许多奸细，主要是过去的大学生从汉口和南京聚集到上海。其中（据中国同志说）阿拉金^③和瓦日诺夫^④过去的战友班科夫^⑤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不过，目前我们并未发现对威廉有任何直接威胁。因此，尽管全局的工作条件很差，我们仍然认为威廉继续留在这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关于材料。马季亚尔以他所特有的“天真”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问，我们是否需要某种某种材料。如果我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显然会使马季亚尔感到惊讶。说起来很可笑。这三个月来，我们既没有收到一份我们的杂志，也没有收到一份《真理报》。我们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中。我差不多在不停地写信，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开始收到较近的几期《国际新闻通讯》，在此之前我们不知为什么总要过将近一年时间才收到。当然，如果刊物不够用，那你们就应当利用一切机会并创造机会，使我们得到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所必需的“精神食粮”。不过现在我不得不过来谈另一个问题。

关于邮件。你们在一封短信^⑥中提到，因长期没有收到任何邮件而对我们感到失望。这很奇怪。不过这是嫁祸于人。谁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信使，我们又不能制造信使。难道你们就不该关心关心吗？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个时期就信使问题已发去三

① П. А. 米夫。

② 见第 633 页注①。

③ 李剑如。

④ 郭妙根。

⑤ 彭玉階。

⑥ 文件没有找到。

份电报^①，对于这些电报，竟然至今没有给我们答复。实际上事情就是这样。马克斯^②本应在 1 月 5 日来取邮件。他 13 日动身，而这几天收到禁止他来取邮件的电报^③。马克斯当时向我们保证说，10 天后从另一个城市来的人^④将到我们这里来取邮件。这件事也吹了。10 天后我们才得知，此人拒绝来这里，把问题交给莫斯科来解决。又过了两天得知罗伯特的妻子^⑤要来。我们曾希望她把邮件带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邮件给她。结果，没有把邮件交给她。我们国际联络部的人^⑥也没有下决心利用她来做这件事。后来又来了两名美国人^⑦，但他们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这件麻烦事就这么拖着，现在我们总算得到机会发出邮件了。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我认为，它会从技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信息不灵（由此我们自己受到的损失最大），应当承担责任的确实是那些确实在这件事情上有过错的人。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封（由于同样原因）涉及到我们在这急风暴雨的三个月期间的活动的信，绝对不可能是全面的和十分详细的。

关于工作人员。三个月前，你们曾征求我们对于派一名法国人到这里来进行反军阀工作的意见^⑧。我们作了肯定的答复。他的情况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你们能挑选一名合适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来做这项工作，那他们在这里是会非常非常有用的。现在谈谈专家问题。我们也对你们的征询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我们并不具

①③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④ 何人不详。

⑤ A. 埃斯勒。

⑥ R. M. 鲁德尼克。

⑦ 指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0 年 12 月 23 日决定被派往上海工作的 CH. 克伦宾和 M. 考尔。

体知道，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再次强调，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外国人（懂三种语言中的一种），有可靠的证件，他们才会有用。否则，他们只会像被送回的无线电报务员^①一样成为我们的累赘。下面谈谈关于技术工作人员。近4个月来我们收到两三份（确切几份我记不得）关于他动身的电报^②。但目前只有电报顺利地送到了。现在特别是随着太平洋书记处工作的开展，极需这样一个人。

再谈谈前反对派。在短信中已经提到派别斗争带来的失败。当然，派别斗争必然导致失败的增多。但还是应该指出，我们在最近一次派别斗争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就把我们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分开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上海，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的确，在被捕的何孟雄分子当中，有不少同志在处于自由时显然是会被我们争取过来的。但是，在预防他们的失败方面，我们是无力做些什么的。现在谈谈前反对派的几个领导人。我们已经电告^③，可能已没有必要派某人去莫斯科了。很清楚，我们宁愿把所有悔过的同志都留在这里，利用他们来彻底分化派别分子队伍，并以此来加强党。

不过，将来我们可能要派一些人去莫斯科。例如，徐锡根和王克全的问题就可能是这样，在四中全会上，我们曾有点轻率地把他们推举为政治局候选人，现在他们请求去学习。如果我们觉得到莫斯科学习是使这些同志回到积极的和最有益的党的工作岗位的最佳途径，那么（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们会积极解决他们去莫斯科的问题。

关于红军指挥人员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我只简单提一提，因

① 何人不详。

②③ 文件没有找到。

为你们可以从寄去的谈话记录^①中更详细地加以了解。2月份，江西省委代表团来到上海，通报了省委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据代表团说，毛泽东因怀疑省委委员是“AB团”^②（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于12月逮捕了他们。20军好像又把他們放了，并同他们一起到了另外一个地区，不再听从前委的命令。稍后第二个代表团来到上海，驳斥了第一个代表团的声明，支持说它是“AB团”成员的指控。要在上海弄清这些事情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我们向苏区中央局下达了有关的指示。显然，这些分歧即便发生过也已成为过去，因为毛[泽东]在1月取得的胜利是众所周知的，而20军也参加了2月对吉安的进攻。我们还是派了紧急信使带着有关指示去了所有这些部队。总的说来，红军首领中间出现分歧是完全可能的事，而只要当地有坚强的有威信的中央局（我们已经采取了派中央局的措施），就可以保证消除任何磨擦和分歧。

现在谈谈我局内部的分歧。我已提到，我们只是在对三中全会评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奥斯藤同志一直持特殊立场，拒绝承认我局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于是，11月22日他成了孤家寡人，写了你们知道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③。在讨论我们12月10日给政治局的信^④和我们的四中全会决议案（12月底和1月初）时，奥斯藤同志再次反对我们的提法，该提法指出了不只是三中全会决议的错误，而且还有11月25日补充决议的错误。关于我们2月22日会议的情况，你们将从寄去的决议^⑤中得知。我只指出，起初奥斯藤同志仍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拒绝收回他

① 见第368—371号文件。

② 见第517页注①。

③ 见第338号文件。

④ 见第343号文件。

⑤ 见第374号文件。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后来，他开始承认错误，但承认到何种程度，你们将从我们的决议和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新的信中看到。总之，这个问题从我局工作角度来说现在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这些分歧至今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协调，致使我局无法了解三中全会的全面而准确的情况。

受局委托 威廉

1931年2月22、23日

补充一些情况：

1. 何孟雄和另外22名同志已于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

2. 北京的所有支部已经表示支持四中全会和中央。在天津三个产业支部中有两个已经作出支持四中全会的决定^①。唐山市委和矿工支部已决定支持四中全会。罗章龙的代表被从奉天和香港赶了出来，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为了巩固在北方的地位，并推动他们做实际工作，斯皮里多诺夫^②于22日前往那里，并要在那里逗留10天。

3. 王克全交出了以前的所有派别活动地址和名单。他在写忏悔声明^③。陈郁揭露了罗章龙在全会前的全部派别活动。

4. 罗章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信。还没有见到文本^④。据中国同志说，他要求立即撤消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召开紧急代表大会。他在信中宣称，他是在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谁也没有权利开除他。罗章龙是作为临时中央的代表签了字。他还发表了他亲笔写的反对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的公开信^⑤，责骂他们转到中央一边。

5. 在上海已经开设了10个站点（5个阅览室，5个茶馆）。工

① ④⑤文件没有找到。

② 张国焘。

③ 见《红旗周报》，上海1931年第12期，第20—27页。

作在继续进行。其他城市也开始做同样的工作。准备派60名工人到苏区去。40名工人将直接去苏区，20名则派到军阀部队去。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1.5万墨西哥元的黄金。

威廉

1931年2月25日

请派米茨凯维奇、丘贡诺夫、那利曼诺夫^①以及所有你们能派出的人到这里来。这里极需人手。

以前忘了指出，我们已经写了关于中央机关情况的信^②。需要精简。当时在那里工作的有150人。现在60多人调到基层工作，留下了87名同志（许多是技术人员：通信联络、发行推销）。

奥斯藤注：我个人不同意信中的几点意见。但鉴于为时已晚，我将把答复通过邮件寄去。

奥斯藤^③

1931年2月28日

全宗514，目录1，卷宗654，第46—56页。

打字稿，原件，注为И. А. 雷利斯基所加，亲笔签字。

① 相应为：盛忠亮、周达文、俞秀松。

② 见第633页注①。

③ И. А. 雷利斯基。

376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和王稼祥谈话记录

1931年2月23日于上海

科穆纳尔^①：我有以下苏区工作计划：

立即着手在10天内出版一期党的机关刊物；为党支部书记创办党校；发展广泛的党的教育网。但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来在那里开展这项工作。你们应该向政治局施加压力，以便尽快派人去那里。必须在那里开展大规模的扩充党的教育网的工作。我一个人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你们也应向上海的组织施加压力，以便让他们给我们寄来文献资料和书籍。那里没有任何这类东西。来上海的同志说，他们很长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一张报纸、一本图书了。

你们应该帮助我们建立起上海同其他^②苏区的联系。

奥斯藤^③。我认为，中央〔苏〕区中央局首先应该着手开展群众工作。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我们的同志很长时期没有同中央取得联系了，也不了解我们的方针。在关于土地分配以及贸易政策方面，在劳动立法、对农业工人、苦力等的态度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党同群众的关系完全是事务性的。在那里党就是政权，而群众只是执行党的决议。你们应该从头做起。您作为宣传部长

① 王稼祥。

② 原文如此。

③ И. А. 雷利斯基。

应该设法开展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首先，你们必须设法创办群众性的机关刊物，如果已经有这样的刊物，那就应该改进它的工作，如果还没有，则应立即着手创办。这种机关报应该成为真正的大众报纸。它应该把党以及苏维埃政权同群众联系起来。这种报纸应使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大众化，群众将通过这份报纸参与机关的工作。应该通过这份报纸阐述和说明土地分配、同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工人、农民、苦力、农业工人和妇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文章应该用非常朴实的语言来写。你们应该到每个苦力那里去，竭力使他们参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你们应该通过报纸向每个苦力、最落后的农民、农业工人和苦力^①说明，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你们应该研究：贫农在何种程度上组织起来了，有没有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和苦力，是否存在工会，是怎样把人选进当地苏维埃机关的，这些苏维埃里面富人和旧官吏多不多，并要着手清洗所有的苏维埃机关，号召广大群众参与这项工作。

同时，中央苏区的中央局应该非常仔细地研究党组织的状况。据现有消息说，列入（或纳入）党内是整村、整个红军支队大规模进行的。我认为，[你们应该]通俗地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应该终止这种做法。但是你们不应从开除所有目前还在党内的党员来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你们也不应从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开始。首先要研究党的机关和在机关工作的党员。应由中央局或最好由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来决定，谁不愧为真正的党员。你们要说明党员的义务。在稳定的苏区应该有类似预备党员的安排和介绍某某人入党的介绍人等。

非常有必要出版党报，应该通过党报解决与土地分配、[苏维埃]政权、工会等有关的具体问题。党员应该在党校接受教育，也

^① 原文如此。

应在群众工作中接受教育。你们应该组织短期训练班，举行座谈会、研讨会等。

应该对红军的工作和建立由红军战士组成的坚强的党支部给予极大的关注。你们应该为他们出版报纸、标语等。

你们应该对共青团的工作尽可能地加以支持，给青年提供资金、房子、纸张等。你们应该派你们最优秀的人员去从事建立工人工会、苦力工会、农业工人工会和贫农委员会的工作，去从事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最后，你们还面临着筹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

关于你们在苏区的工作，我能对你们和科穆纳尔说的大体上就这些。请把那里的情况非常详细地写给我们，我们设法帮助你们。

古德科夫^①：伊思美洛夫^②在这里，他已着手接替科穆纳尔的工作。现在他领导着我们的党校。值2月25日^③之际，我们想出版《红旗日报》^④专号。三八节也一样。《宣传员》^⑤第1期内容如下：同右派作斗争的提纲。国际失业者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第2号通告^⑥的方法的文章。党〔中央〕关于反对召开“国民会议”的提纲。^⑦

3月8日，《红旗日报》将出版3000份。在上海发行700份，香港发行1000份。报刊发行机构的工作很不力。

奥布霍夫^⑧没有在宣传部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应该举办速记训练班，这可以使我们传递信息更好更快。

① 沈泽民。

② 张闻天。

③ 国际失业者日。

④ 见第312页注⑤。

⑤ 见第643页注①。

⑥⑦ 文件没有找到。

⑧ 竺廷璋。

奥斯藤。我需要会见报刊发行部主任^①。你们不要举办速记训练班，因为上海已有几百个。在那里学习只花 5 到 10 墨西哥元。你们应该派我们的几名同志到这些训练班去学习，没有人知道这些同志是共产党员。这样会少花钱，又没有任何风险。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23—23a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李子英。

3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124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2 月 28 日于上海

听取：10.（1577）——罗伯特^①同志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决定：10.——委托东方地区书记处根据所交换的意见起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稿。

将电报提交下次政治书记处会议批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92，第 9—1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Г. 埃斯勒。

378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1年2月28日^① 于上海

亲爱的老头子^②：

我想向你报告以下情况：我们准备很久并且希望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加以实现的公务旅行^③（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给你写过信）未能成行。我曾对你说过，这种旅行有一定风险，但毕竟希望能成功。

没有等到您对我们询问的答复，我们征得这里的分部^④的同意，决定于11月28日乘日本轮船动身前往西南部，再从那里继续前行，以便在护送我们的“向导”的帮助下到达预定的地点。在准备工作就序后，我们旅行的问题再次提到本地公司^⑤主要领导人会议上进行了审议，旅行得到了批准。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通知我们，并且得到了证实。我个人认为（我同我们当地的朋友和这里分部的领导一起把所有问题都进行了仔细考虑和深入研究），如果确有实现我们公务旅行的可能性，那只有通过我们拟定的途径。另一方面，预定有本地分部的两名中央领导机构成员^⑥同我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Я. К. 别尔津。

③ 指前往中国苏区。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⑤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

⑥ 指王稼祥和任弼时。

们一起前往（在同一组）。我们启程的再次拖延会耽误他们的出发时间，最后，最主要的是，情况可能变化以及当地护送我们的人员可能将旅行完全撤消，因此，我们处赞同中央的决定。当然，我们并不怀疑，这件事有一定风险。

在轮船开动之前，我们十分惊奇，有 10 到 15 名我们的日本竞争对手陪伴我们。其中一位自称是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同船长一起——表面上都对我们非常友好。他们详细询问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护送我们的朋友是什么人，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将来打算干什么，等等。在得到我们适当的答复后，他们接过了由我们的朋友填写的我们的履历表，给我们买了票，并给我们看了我们所代表的那个社团的秘书^①在一份履历表上写的一行字：他根本不认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我们当然试图千方百计证明，事情不是这样，这是误会，等等，我们抗议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但船长拒绝运送我们，命令开船。我们的朋友同时充当我们的侍从，他们提走了我们的行李，我们转到一艘小汽艇上，兜了几圈之后就回到了家里。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我们很清楚。船长怕碰上土匪，他们询问了我们的机构（我们是以它的名义去的），得到了否定的答复。我们预料到了可能有人要查询，并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我们估计，在我们离开以后，会有人发电报查询，为此我们也准备了这个机构。但我们没有料到，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如此狡猾，他们当即就询问了我们的机构。如果查询碰上老板，那就好了（动身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同他在一起呆了一个晚上，喝了“两杯”酒），但查询是在清晨进行的，不了解情况的秘书不可能作别的答复。

可能，查询机构还有别的原因（不只是由于害怕土匪），但我

^① 机构名称和秘书身分不详。

并不认为，这里有挑衅行为。遗憾的是，对于这次旅行知道的人很多，很可能我们的朋友不够谨慎。或许，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过分了，因为我们事先就得知，我们的朋友不够谨慎，保守公务秘密不够认真。我亲眼看到在船上有我们这个单位的5个人，他们到这里来是随便看看热闹。

还有第三种说法：在出发前日本人就了解了我和我同伴^①的情况。我们动身之前两周，有24名日本人住在与我们相邻的房子里；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弄清楚，但可以推测，在这么大一帮日本人中可能有一些密探，我们作为邻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们的确没有发现，他们对我们感兴趣，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曾感兴趣。在我们看来，后一种情况很可能是我们这次旅行告吹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已经给我们买了船票，况且我们并没有写明个人的地址，而只有机构的地址。这一切中最可恶的是，不仅未能前往，而且我们的靴子^②也给弄脏了，我们得呆在这里无靴子可穿。暂时我们可以躲在家里，但总不能没有靴子呆得太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考虑公务旅行，而且在当地也可能招来很大的麻烦事。

我试图安排新的旅行，但我不抱幻想，在目前情况下这不会有大的风险和困难。我同伴的情况很不妙：他说英语带很重的俄语口音，而且说得很蹩脚（他学语言进展很慢）。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进行这种旅行，同我一起去也很难，因为我们操不同的语言。我们还要在这里的局里讨论旅行的问题，我将把结果专门向您通报。

如果您能给我们寄来新的靴子，那就请寄来适合于记者身份或旅游者的，而给我的朋友则请寄加拿大的或美国的。

① B. Л. 马雷舍夫。

② 原文如此。意思为护照。

关于这次旅行我们简直很不走运。当然，我还没有完全失望（这毕竟不是儿戏——至今没有执行您下达的任务！），我将寻找各种实施的途径。

请尽快寄来新靴子的样品，因为没有希望在这里得到。我已就此事同 P 博士^①谈过，他答应向胖博士^②施加压力，但没有希望得到任何东西。

致衷心的问候！

弗赖利希^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58—6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是 P. 佐尔格。

② 何人不详。

③ A. Ю. 盖利斯。

379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的信

(摘录)

1931 年 3 月 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听了罗伯特^①的报告。我们也在党的机关报上看到了 [中共] 四中全会的决议。^②眼下还只有中文版本。政治委员会也听取了罗伯特的报告^③。我们会用电报把决定告诉你们，因此，现在我就不就此写任何东西了。在讨论时特别强调，苏区绝对必须拥有有权威的、真正内行的中央局^④。不仅是纸面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没有这一点，工作就不能开展。对于红军领导来说，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局应该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⑤。在代表大会前可以而且需要召开党代表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最后选出苏维埃政府。将通过电报^⑥通知你们，必须建立什么样的机构作为临时政府，以便在成立苏维埃政府时已经有某种政府机构。为了同苏区滥用职权的现象作斗争，在党的系统内

① Γ. 埃斯勒。见第 372 号文件。

② 见：《实话》，1931 年 1 月 24 日第 7 期。

③ 见第 377 号文件。

④ 见第 702 页注^⑤。

⑤ 见第 689 页注^③。

⑥ 文件没有找到。

建立检察委员会，在苏维埃系统内建立工农检察院是适宜的。你们将从电报中得到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能在新政治局的帮助下贯彻执行这一指示。迄今为止，不幸就在于，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指示没有得到执行 [……]①

3. 大概在3月底将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②。将由沃罗夫斯基③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库西宁作副报告。据各种情况判断，将提出两项决议。一项是关于苏区的土地政策，而另一项是关于建立苏维埃和关于经济政策。可能还会提出一项关于立三主义、关于对立三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和关于右倾危险的简短决议 [……]

5. 能否得到有关满洲朝鲜人状况的消息？

6. 对于那里需要的外国同志，正在采取措施。

7. 被邀请的同志将尽快到达目的地。

8. 再问一次：同苏区的联系情况怎么样？

9. 我们在土地提纲④中考虑到了你们关于中农的意见。我们没有收到中国同志关于银行的意见。

10. 对于罗伯特的报告，就在黄色工会中做工作的可能性问题发生了争论。罗伯特把事情说成这样：黄色工会似乎没有任何基层组织，不召开任何会议，而“群众工作”只有在爆发罢工或其他抗议活动时才进行。这个问题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现在黄色工会在改组。我们对这些工会在改组后将如何起作用还没有明确的概念。请你们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⑤和政治局一起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告诉我们：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① 以下删去了有关朝鲜、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和日本的部分。

② 见第358号文件。

③ 黄平。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C. J. 斯托利亚尔。

依你们看，我们对改组后的黄色工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19 页及背面。

德文打字稿，副本。

380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①的信

1931年3月1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敬爱的同志们：

关于远东局1931年2月22日的决议^②，我谨报告如下：

1. 我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第1、2条，并且完完全全同意。
2. 对第3条我投了弃权票，因为它毫无内容。
3. 我投票反对决议的第4条，因为我认为：

（1）远东局（无论是除奥斯藤^③外还是包括奥斯藤在内）并没有通过1930年11月23日的决议^④而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停留在自己的错误立场上。11月23日决议的第2条宣称：“本局指出，虽然在它给中共三中全会的建议中没有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那样以政治上尖锐的形式将立三路线说成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相矛盾的路线，但本局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恰恰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论断，它被远东局1931年2月22日决议的第1条所废除，那里谈到，

① 文件上有Л. И. 马季亚尔的批注：送政治委员会。早一些交[东方书记处]委员会。……Л. М.

② 见第374号文件。

③ И. А. 雷利斯基。

④ 见第331号文件。

“……^①在三中全会上反对立三主义时，远东局没有提出两条路线——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问题。”

我不明白，这里怎么可以得出，“我局全体成员‘除奥斯藤同志外’通过 11 月 23 日的决议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远东局（无论包括不包括奥斯藤）承认错误是在很好地领会共产国际执委会 9 月 29 日^②的来信和在收到随后的电报之后开始的，而彻底承认则是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李[立三]同志的报告^③的讨论记录之后。

为了弄清真相，我补充如下，远东局 1930 年 11 月 23 日决议的所有其他条款，包括第 7 条是一致通过的，包括我、奥斯藤在内。第 7 条说，“本局指出，它没有采取一切措施使中国同志真正接受对中央全会政治决议所作的修正，也没有及时审查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

(2) 我未能投票赞成决议的第 4 条还因为其中谈到：“奥斯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寄去了政治上不正确、实际上不符合事实的声明。”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一封信是在 1930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发出的。^④我们这里没有留下这封信的副本。据我记忆，其中谈到我肯定了以下内容：“三中全会前在同政治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我们研究了以下提法：在从中共六大以来的时期里，中共中央的路线在 1930 年 6 月以前总的说来是正确的，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但是在 6 月，李[立三]同志使党离开了这条正确路线，把它引上了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李[立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起草关于立三路线的信的日期（见第 375 页注①。）

③ 见第 616 页注⑥。

④ 见第 338 号文件。

三]同志的错误具有更加危险的性质，因为李[立三]同志及其政治局的支持者没有遵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不仅如此，李[立三]同志还通过在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反对共产国际，把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对立起来。”^①接下去我论证说，如果中国同志把这种表述写进三中全会决议，那么我在三中全会上执行的路线便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的。

今天对我来说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我所提出的并且当时得到远东局肯定的这种表述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我的政治错误。但是这里“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我则不能理解，既然我不理解，那我就不会投票支持，因为我认为，共产国际需要的不仅是投票表决的工作人员，而且是理解为什么投票的人。如果我再读一读我1930年11月或12月的信，如果我发现其中有什么不符合实际，那么我当然会收回这种错误。

4. 我之所以投票反对远东局2月22日决议的第5条，是因为：

(1) 我使用“派别活动”一词是对托姆和维利两同志^②说“奥斯藤欺骗共产国际”的话作出的反应。我使用这个词是不对的，甚至可以把这看作是闹无原则的纠纷。或许，如果作为我们会议主席的威廉同志^③要求同志们守规矩，那我也不会这样不讲政治地作出反应。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2月25日的远东局会议上，当通过注明日期为2月22日的决议时，我声明，如果作为我们主席的威廉同志要求托姆和维利两同志因他们使用不恰当的词句而要守规矩的话，那我就打算收回“派别活动”这个词。威廉同志不仅没有注意我说的话，而且还尖刻地说：“我们不是孩子——收起指责吧”。他还热情地支持决议的这一条，又以自己的名义加上

① 见第265号文件。

② 分别是A. Ю. 盖利斯和Г. М. 别斯帕洛夫。

③ П. А. 米夫。

一句话，这句话说：“不符合实际地指责搞派别活动，这是**奥斯藤**同志要把政治问题转到个人关系层面上的卑鄙企图，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只能造成局集体工作的不协调。”这是怎么提出问题的？“卑鄙企图”，“个人关系问题”，怎么我同**维利**或**托姆**同志谈论房子面积、职务提升了吗？这是个人之间的事吗？问题成了政治性的。我究竟是不是骗子，这个问题需要**威廉**同志从这一层面上来解决，而不是选择“卑鄙企图”、“个人关系”这类尖刻的词语。“派别活动”这个词我是使用不当，但如果**威廉**同志不那么匆忙，不那样强调那些说法^①，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平平常常地过去了。

5. 我对远东局1931年2月22日决议第6条很不满意，因为这一条款没有明确允许（但也没有拒绝）我有权援引**托姆**同志的决议初稿。问题不在于“不使局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紧张和把政治问题同个人问题扯在一起”。我想把这个草案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可能**威廉**同志和我一样，相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会支持我要跟**托姆**同志算私账的“卑鄙企图”。**托姆**同志的决议初稿具有纯政治性质。**托姆**同志在这份草稿中重提以前我们关于我局的作用和工作、关于“远东局是美国的了望哨”、关于保密等问题发生的分歧。我个人并不认为**托姆**同志的这些话有什么重大意义，但共产国际还是能够更好地搞清楚这件事的。

最后，我再次重申，我在中共三中全会上的立场是错误的，不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决定，无论是具体现实问题上的还是一般政治问题上的，都是正确的，我将切实贯彻执行，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凭良心。

致同志式的敬礼！

奥斯藤

全宗514，目录1，卷宗654，第64—65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

381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张闻天
和赵容谈话记录

1931年3月2日于上海

秘密

与古德科夫、伊思美洛夫和中央
组织部部长^①的谈话

古德科夫：《布尔塞维克》^② [杂志] 还没有出版。我们出版《布尔塞维克》有很大困难。我们没有人能给杂志写文章。印刷厂主因篇幅大不愿意印。我们还不能说，这个机关刊物什么时候开始出版。

伊思美洛夫：《红旗》报^③ 每天出版。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将它的版面扩大。有几个省的消息说，工人们很喜欢我们的报纸，他们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但也有其他地方的人向我们报告说，由于警察迫害，工人们害怕读这种报纸，要求我们改变报纸的名称。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积极加以解决。我们决定把这份报纸定名为《群众日报》^④，停止出版《红旗》报。我们在上次会晤时谈到的两期《宣传员》^⑤ 还没有出版。没有人写稿，没有合适的

① 分别是沈泽民、张闻天、赵容。

② 《布尔塞维克》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7年10月24日至1932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

③ 见第312页注⑤。

④ 1931年在上海出版。

⑤ 见第643页注①。

人力。

奥斯藤：^①显然，如果你想以这样一种形式——约 60 页的大本子——出版《布尔塞维克》，那你们是会有很大困难的。我认为，你们关于《红旗》报改名的建议应该是可行的。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群众日报》避开警察，警察不应知道这是我们的报纸。你们不应在文章中使用“我们共产党人”或“我们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这类词语，要使用更普通的语言。很清楚，我们的政治方针和我们的口号应该全面贯彻执行，不能打折扣。方针和口号应当是明确的。《红旗》作为党报应该继续出版。这份报纸有自己的传统，它为自己赢得了党的战斗机关报的声誉，它应仍然是党的机关报。《红旗》^②应该尽可能每周出一次，假如不可能，也应该两周出一次。该报应该成为指导性的和纯粹党的机关报。

伊思美洛夫：那我们应该撤消《实话》报^③。

奥斯藤：没有这个必要。《实话》报应该出版。正如您说的，没有可能出版《布尔塞维克》杂志。因此，应该设法做以下的事情：第一，为广大群众出版《群众日报》。我们试一试每天出版。这份报纸完全不涉及党内生活，所有这些问题将在《红旗》报上论述。我们要设法把《红旗》报提到更高水平，把它变成党员和进步的非党积极分子的指导性刊物。我们应该尝试两周出一次或一月出一次《实话》报。《布尔塞维克》杂志则 3 个月出版一次或根据具体情况间隔更长些。你们可以在《实话》报上写理论题材的文章，例如：《目前时期（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可以同

① И. А. 雷利斯基。

② 从 1931 年 3 月 9 日起开始在上海出版《红旗周报》。一直出版到 1933 年 11 月。

③ 见第 407 页注②。

托派和改组派、同国民党进行理论争辩；阐述同党的路线和政策有关的一些问题。《布尔塞维克》杂志在理论方面可以站在更高的水平上：发表关于党的纲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关于苏联发展的成就、关于国际革命运动等的文章。但我要补充一句，关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关于苏联，你们应该在你们所有的报刊上，特别是在你们半公开的群众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伊思美洛夫：我们要讨论一下所有这些问题。

奥斯藤：我将在远东局会议上谈所有这些问题，也许会有新的建议或更具体的建议。你们应该深入考虑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在下次会晤时我们将作出最后决定。最后，我要再说一遍：请给我们送来你们报纸上文章的译文。我们至今还没有收到过任何东西。如果不可能全部翻译，那就请作简短摘要寄给我们。你们编辑部有几位同志懂外文，你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中央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已经成立。有4名同志在该部工作。共青团和工会的代表参加会议。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做了以下工作：改进保密方法；为三八节活动做组织准备；参加江西省委建立合法组织的工作；调查研究党的档案并销毁一切不需要的材料。然后提出了苏区中央局的结构问题。苏区这些局究竟是从哪里接受指示？是接受上海的政治局的指示还是由中央（苏）区中央局来领导苏区的所有这些局？还讨论了海员工作委员会的问题。

奥斯藤：什么是海员工作委员会？

组织部部长：海员们总是在航行，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地点，在他们中间的工作不可能由某些区委或省委来进行；为了这一特殊目的，在省委下设立了海员工作委员会。

奥斯藤：这个委员会是考虑作为区委还是作为一般党委设立的？你们将如何在经常在同一地点工作的那些海员（码头和修配厂的运输工人）中进行工作？

组织部部长：这个问题我们还不清楚。我们不能解决海员中的工作组织问题。

奥斯藤：至于苏区的中央局，我们决定在每个苏区都建立这样的局。毫无疑问，这些局将在上海政治局的领导下工作，它们将从政治局得到指示。但是，认为除政治局以外谁也不能“干预”或解决某些问题，那便是官僚主义的想法。例如，在军事问题上中央苏区的中央局将起主要作用。这里将集中最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和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显然，这些同志将形成最负责任的领导。假如在贺龙军团所设的局接到中央局的某项指示，那么该局不应公开表示反对，而一定要设法具体地解决问题。此外，苏区所有的局都应该同上海的政治局及其他所有的局建立密切联系。当这些联系中断，而同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联系还存在时，那么显然中央（苏）区的中央局要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

至于海员工作委员会，我现在不能就海员中的工作给你们作出明确的答复。但我相信，你们是不对的。在你们看来，必须在一些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等建立这样的委员会。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在有一名同志以上的每艘轮船上都应建立支部，而支部要选出书记。这个支部编入该船所登记注册的港口城市的党组织。支部书记应该同轮船停留较长时间（几天）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建立联系。地方党组织向轮船支部提供书报和信息，并从支部得到船上情况的报告等。最好是只同支部书记保持联系，而不在轮船只停留几天的城市里召开支部大会，因为这些支部大会是要经常召开的。有些城市的联系可以通过经常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运输工人和其他码头工人）来建立。如果你们以这种方式工作，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建立专门的海员工作委员会。那时海员支部就可以成为某个党委的一部分。你们这里委员会太多了，此外，特别委员会也太多。例如，鄂北和鄂南委员会向鄂东南特委寄信。南满和北满的委员会则向西北委员会寄信。应该结束这种状况。建

立担负这种任务的这类不确定的委员会只会破坏党组织的结构。我们党的〔组织〕结构早已制定，你们只应该维护这种结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省委、市里的区委、民族区域组织；如果你们在村里有几个支部，你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乡村委员会。在每个比较稳定的苏区建立包括整个苏区的委员会。然后，支部同它们的委员会或局或者根据警察监视情况只同支部书记联系。就这些。

你们应该深入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下次会晤时我们再谈，不过要更具体些。下次会议将在下周举行，吸收领导党的书报发行工作的同志^①参加。

奥斯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30—30a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李子英。

3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125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3 月 3 日于莫斯科

听取：9. (1589) —— 中国问题。(见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24 号记录。)^①

决定：9. —— 采纳东方地区书记处考虑到讨论时建议作出的变动(包括关于中共党代会的改期问题)所提出的电报稿。(电报稿到国际联络部机要局查阅)^②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93，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77 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关于党代会改期的理由，见第 383 号文件。

3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1年3月6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上海远东局

亲爱的同志们：

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你们，该委员会反对现在召开党的七大^①。我们想在这里以完全中立的态度说明政治委员会所遵循的理由。

不言而喻，召开党代会有许多理由。1928年以后发生的新事件：苏维埃运动、红军、革命新阶段、很重要的党内事务、立三主义、[中共]三中全会、[中共]四中全会、右派反对党的斗争、党的新的领导班子——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讨论。党代会能给予今后的工作以新的推动力。

但是，反对召开党代会的原因更为重要。运动正经历非常重要的时期。存在着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和干涉、与必须开展群众工作有关的某些任务、工会运动问题等等。任务是明确的，路线是正确的，但迄今为止，在这些任务中我们能够在苏区实现的却很少，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的发展速度未必能令我们满意。现在所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建立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国统区的群众斗争等方面做群众工作。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还

^① 见第382号文件。

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筹备和举行党代会则意味着党的优秀力量将在几个月内放下这些任务。

有三种可能：

1. 假如党代会在国统区召开，风险极大。任何认真的讨论都不可能进行。我们会使党的优秀人物冒风险，而在政治教育方面却得益很少。这样的代表大会将使优秀力量离开工作3、4个月，而苏区、红军等将会显得很软弱。

2. 如果代表大会在苏区召开，那么我们知道，同它们的联系是多么困难。我们的代表团能否到达那里，没有任何保证。交通联络如此困难，到那里往返一次要花几个月时间。还要加上代表大会前后的讨论时间。

3. 假如代表大会在中国境外召开。这也要花费3、4个月时间。苏区和红军会显得很软弱。党的优秀人物将脱离群众工作。

4. 在目前的社会构成、目前的苏区形势和目前的领导状况下，党内的新情况会带来一系列分裂危险。

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改变呢？我们希望有改变。改善同苏区的联系，这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加强红军、建立根据地、把苏区连成片并在那里成立群众组织、发展国统区的群众运动，做好这些工作后，我们才有可能改善党的社会构成，提高领导的威信，等等。

在中国，由于党内争论我们丧失了宝贵的时光。而时间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转折阶段只有在开展严肃的内部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贯彻自己的路线，这不是我党有力量的表现，而是它软弱的标志。在重大转折关头党已几次变成了争论俱乐部。现在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做踏踏实实的具体工作。

这些理由促使政治委员会建议你们暂时放弃召开党代会的打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67—68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384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 《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就》

1931年3月11日于莫斯科

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准备的 《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就》的书面报告

1. 中国部分地区的革命高潮已经发展到采取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蒋介石围剿的失败是人民起义力量强大和新的革命高潮稳定的证据。

2. 人民政权已经在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内由宣传鼓动口号变成现实。以苏维埃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在存在着和发展着，尽管国民党、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施展种种反革命伎俩，企图把革命高潮引向国民党刽子手的“合法”轨道，引向反革命的“全权国民会议”这个极其肮脏的场所。

3. 加强正规的工农红军“定能保证革命运动的迅猛高涨”^①。

还没有总的革命形势，但在中国南方又是：“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5页）。

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①。

6. ^② 多年来，革命高潮主要是通过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的道路而日渐成熟的。全国农民斗争的发展很不平衡（从地域上以及各地运动的深度和觉悟程度上说），在南方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彻底消灭封建的地主所有制，同时在克服富农的反抗，走上了有利于贫农和中农重新分配所有土地的道路。

7. 在苏维埃根据地的一些地区，在实际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各个领域开展了基层的革命创造活动——这是运动取得进一步成就的主要源泉。

8. 最重要的情况是（作为结论）：在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在日益得到加强；不仅如此，无产阶级领导权还以国家的形式即通过苏维埃和红军固定下来。这种领导权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苏区唯一的执政党、整个革命运动的领袖和领导者来实现的。

9. 只有通过两条战线的不懈斗争党才能取得成功。党已将右倾变节者（陈独秀集团）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并在四中全会上将半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对他们搞调和主义的人（李立三——瞿秋白）调离了领导岗位，粉碎了何孟雄右倾集团，从而保证了走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10. 新入党的党员人数增加。（从13万增加到20万。）

然而，这样表述的清一色成绩不能说明多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可能造成“轻敌自负”的看法。 库丘莫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657，第113—114页。

打字稿，原件，第10条为手写，亲笔签字。

^① 见《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4年第8卷第363页（中文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87页。）

^② 第6、7、8、9条是用笔修改的。原来是第4、5、6、7条，显然作者打算增补或者已经做了增补，但增补部分没有找到。

385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 《中国革命运动的薄弱方面》

1931年3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准备的 《中国革命运动的薄弱方面》的书面报告

1. 从1930年夏季中期开始，正值李立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在中共领导中加强之际，一些大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罢工运动的发展受阻，我们在罢工斗争中的影响和领导作用削弱了。尽管无产阶级的战斗情绪在高涨，但工人阶级在红色工会的组织性却很不强，也不稳定。党员和产业工人的比例^①在党普遍得到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却下降了。

因此，对苏区运动的组织和其规模与城市工人运动之间的不相适应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首先由于党本身的错误而更加加剧了。

2. 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剥削者上层，在投降帝国主义之后成了反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自己的斗争吸引广大城市贫民阶层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城市反帝运动的先锋、领导者和主要战斗力量。然而，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和党对罢工运动领导的削弱并没有提供在城市开展反帝运动的可能性，而城市里的反帝运动本来可以给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苏维埃的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产业工人党员的比例。

斗争以巨大的支持。

3. 农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远不是平衡的。北方比南方落后。即使在南方，许多地区的斗争也进行得不够彻底：在很多地方直到最近土地仍然在小地主和“开明”士绅手里，平分土地只有利于富农，而损害贫农和中农、雇农和苦力的利益。甚至在苏维埃运动高度发展的地区，黎民百姓对地主豪绅惩治不够和富农有相当大的影响，都会一方面束缚基层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便于敌人在苏区组织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AB团”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①。

4. 工农军队的力量和群众性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加上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相比还不足以进行“国内战争中的大会战”（列宁语）^②，还不足以控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关键地区。

尽管工农红军已发展壮大，并同蒋介石的围剿军进行了成功的战斗，但它还没有变成一支由农民组成、以坚强的工人共产党领导骨干为首的真正的正规军。它分散，它的游击习气有时甚至是军阀倾向还很严重。红军有时试图由自己来取代言官苏维埃政权。领导的集中统一性和指挥人员的纪律性很不够。党对军队的领导还远远不能胜任。

5.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止一次地作出指示，但至今还没有成立一个有威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苏区都有很大的障碍。基层苏维埃政权常常被富农所篡夺，城市里的工人苏维埃（在苏区）没有建立，人民群众的工农苏维埃常常被一些官僚主义机构所委任的上层机构取代。苏维埃机构内的无产阶级影响和无产阶级成分是

^① 见第517注①。

^② 引文出处不详。

很不够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7，第 110—112 页。

用笔修改过的打字稿，原件。

38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128号记录

摘录

1931年3月18日于莫斯科

听取：5. (1629). —— 东方地区书记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准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①。

决定：5. ——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根据交换的意见修改决议案。责成库西宁同志在将决议案提交主席团之前审查决议修改稿。建议主席团不要讨论决议，而将它交给全会中国委员会，并散发给全会代表。

听取：14. (1638). —— 中国问题。

决定：14. —— 见特别文件。

[附件]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14. (1638). —— 中国问题。

决定：14. —— 尽快答复远东局关于远东局成员中谁应前往中国苏区的询问^②。答复可以口头协商，不召开会议。期限两天。责成库西宁同志准备答复的意见。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96，第25—33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96，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3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 富田事变的决定

1931 年 3 月 18 日于上海

加急

远东局的决定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①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 红 20 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 12 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②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③、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④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 军）受到“AB 团分子”^⑤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① 见第 368—371、375 号文件。

② 见第 517 页注①。

③ 指中共赣西南特委。

④ 陈刚。

⑤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成员。

2.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①的工作以及在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点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完全从肉体上消灭富农”的口号是不对的和有害的。乡村组

^① 关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成立时间材料没有找到。

织起来的贫农群众应当同富农进行斗争。采用上述口号中所说的那种方式来从上面消灭富农，取代贫农有组织的斗争，这种方法会使中农同我们疏远并会使反动派得到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建立乡村贫农团和农业工人工会，并在将要这样做的地区同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开展群众性的斗争。

3. 逃跑的永阳省委作为这次反革命活动的领导者应该立即解散，其活动应该停止。对它不听从这种要求的行为必须用毫不留情的符合革命利益的斗争进行回击。

4. 现在的20军领导应该使全军返回红军并绝对执行总部的一切命令。不履行这一[要求]将会引起同该军的残酷武装斗争。

同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20军重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允许我们的其他军事部队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时它要为制止我们军事组织的分裂和分离承担全部责任。

5. 在召开省组织的党代表会议之前，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应委托该省委立即召开前委领导下的党代表会议。

6. 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各苏区的党组织，尤其是红军的党组织应该特别重视同蒋介石密探的斗争，蒋介石把这些密探派到红军和苏区来从事分化军队的工作，组织破坏活动，以期从内部化分瓦解我们的军队。这是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采取的新策略，他利用这种策略作为同我们进行公开战争的补充。

除了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斗争外，党组织和红军指挥部应不断审查部队的人员组成以及转到我方的白军的一些独立队伍和士兵，以使敌人不能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的密探派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并在红军和苏区内部组织暴动和破坏活动。

作为一条普遍原则，我们应该更换转到我方的整个政府军部队的全部指挥人员，并把把这些部队编入我们最好的经过考验的骨

干部队，从而保证对它们的教育。

同时，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 AB 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

7. 20 军暴动的惨痛经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并不是军队中的所有党组织都领会了中央和全党赋予它们的使命和职责。必须再次强调指出，军队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红军部队的革命纪律和战斗力，并千方百计使之得到加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个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执行由上级机关任命的指挥员和政委的命令（当然，公开的反革命命令除外）。不执行命令、批评作战命令和计划、批评最高指挥员的策略是绝对不允许的。

政委、政治工作人员和指挥员——团长和团以上指挥员——不仅有权不理睬削弱红军纪律和战斗力的个别部队党组织的决定，而且还有权解散这样的支部队，即便无权在党内恢复其某些成员的党员资格。

公开批评（在会议上、用公开信等）红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是不允许的，即使在红军以外的党组织（即在非军事党组织）内也不允许。

所有这些指令是旨在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便于它执行革命任务。然而，这些指令无论如何不应导致取消红军组织中的党内生活，相反，它们应该加强党的生活，以使党组织执行其基本任务以及党的最高机关的指示，特别是与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现在的工农红军有关的指示。

另一方面，十二月事变表明，受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引诱和欺骗的 20 军部分党员认为，他们所发现的党内分歧可以通过分裂军队来加以解决，所以走上了使 20 军脱离红军部队并同苏维埃机构

和其他红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

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该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部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8. 在现阶段（去年底和今年初）红军指挥部在苏维埃境内组织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策略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白区发起强有力的攻势，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在每个具体地区我们都应视情况行事，并根据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最新指示^①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

9. 中央发给江西的关于十二月事变问题的指示应该本着这一决议^②的精神加以补充。新指示的副本应分发给其他各苏区和军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6，第 90—92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③。

① 可能指中共中央 1931 年 3 月 2 日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53—161 页）。

② 1931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203—209 页）。

③ 文件的俄文原件在 1931 年 6 月中旬被上海警察抢走。

388

张闻天给雷利斯基的信

1931年3月20日于上海

致奥斯藤^①同志

由于我对工人运动的估计不同于戈卢别夫^②同志，我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我说，上海工人运动放慢了发展速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能闭眼不看它还带有分散的、自发的、而主要是经济的性质^③。它正在经历由防御向反攻过渡的时期。而在戈卢别夫同志看来，工人运动正由反攻走向进攻。显然，他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情况。

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对此又争论了起来。我高兴的是我取胜了。我恳请您发表意见。

我们在《群众日报》^④上发表了下列文章。

- (1)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3月11日）。
- (2) 南京政府在做什么？（3月12日）。
- (3) 准备巴黎公社和上海起义^⑤周年日。（3月13日）。
- (4) 工会反对南京政府工会法和工厂法的号召^⑥（3月14日）。

① И. А. 雷利斯基。

② 陈绍禹。

③ 原文如此。

④ 1931年在上海出版。

⑤ 原文如此。指1927年3月21—22日上海工人起义。

⑥ 原文如此。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反对工会法、工厂法以及黄色工会对工人自己建立的工会的破坏活动》。

(5) 红军在京汉铁路上的胜利^①。

(6) 反对国民会议^②。

(7) 蒋胡冲突的意义^③。

(8) 海员与红军。

(9) 改组派与国民会议，等等。

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实话》报^④。下次再谈，好吗？

伊思美洛夫^⑤

3月20日

又及。受政治局委托，我将写一篇《论时局》的文章。我将在近日内把文章给您寄去。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8，第 8—9 页。

俄文亲笔签字。

① 指中国红军第 1 军于 1931 年 3 月上旬在京汉铁路地区歼灭参与围剿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队。

② 见第 513 页注③。

③ 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就中华民国临时宪法草案发生意见分歧，于 1931 年 2 月 28 日离开立法院院长的职位。1931 年 3 月初报刊上出现了他被捕的消息，但是国民党当局宣称，胡汉民在休养和治疗。

④ 见第 407 页注②。

⑤ 张闻天。后面的中共中央委员几个字不是作者手笔。

389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 向忠发谈话记录

1931年3月27日于上海

与莫斯克文、斯皮里多诺夫^①和
向忠发同志的谈话

关于卡卢金^②

根据现有资料，原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该校支部局委员孔白^③是卡卢金的同事，他曾因在南昌起义时表现不好被开除出支部局。他们不记得此人的真实姓名，他脸上有麻点^④。据已有的消息说，他是卡卢金最亲密的朋友。他被卡卢金派到警察局去取钱，并且带去了材料。1930年1月被警察逮捕，警察要他提供中央委员的名单和他们的住址，但他未能提供。警察狠狠拷打他，这是他没有料到的。此后他一直同党保持着联系。在……^⑤后，他没有再见到卡卢金，他们也未能找到他。

孔白是去年9月从梅尔泽堡^⑥返回的。他被派往第1军。他说因无法继续前行就从汉口回来了。后来他在上海省委军事部工

① 分别为周恩来、张国焘。

② 黄弟洪。

③ 原文如此，音译，何人不详。

④ 也以外号麻子出名（见第392号文件）。

⑤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都是原有的。

⑥ 莫斯科。

作。卡卢金的另外三个朋友^①处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他们全都是他的朋友。一人是军事工作人员。另一人被派往满洲，而第三人被派往天津。我们在设法查明，他们是不是叛徒。卡卢金的两个朋友^②已被送往苏区。

关于彭德怀和黄公略

问题已在政治局研究过。我们认为这是明显的挑拨离间。彭[德怀]和黄[公略]在(湖南省)湘潭长大，他们的家人还住在那里。可能是：何键逮捕了这两位同志的家人，以便向他们施加压力，现在他还放出谣言，似乎是这些同志自己把家人送往长沙的。

奥斯藤^③。这两位同志现在是否知道这是挑拨？

答：当然知道。中国报纸报道了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上面谈到彭[德怀]和黄[公略]叛变。

来自闽西的消息

护送布雷利斯基^④和科穆纳尔^⑤的信使^⑥已经返回。他们俩是 3 月 15 日到达闽西的。到那里是很容易的。在上海和汕头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从汕头到大埔的途中遇到的人不多，但还是有人。那里有很多传教士。在乡村有不少基督教教堂。传教士来来往往几乎没有阻碍。从大埔坐船到了下一个村庄，那里有我们的同志。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等待一位外国同志^⑦，他们安排人在 3 月 23 日或 24 日去接这位同志。但是，挑着担子把物品运往那里非常艰难。小商贩很愿意把火柴、食盐和煤油从白区运往我区，因为这些商品在苏区价格昂贵。不过军阀们禁止这样做。因此他们

①② 何人不详。

③ И. А. 雷利斯基。

④ 原文如此。应为布林斯基，即任弼时。

⑤ 王稼祥。

⑥⑦ 何人不详。

对所有货物都检查得很仔细。很难将无线电设备运到那里。机器包装成12包，每包都需要两名苦力运送。不可能逃避对物品的检查，这意味着将它没收。

我们从12军得到了很不好的消息。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没有寄来书面报告，但信使讲了以下情况：

1. 以傅伯翠为首的主力已经脱离12军。傅伯翠是福建的农民领袖，地主的儿子。他现在正在我区招募部队同我们作斗争。[他拥有]约400条步枪。由于在农业和经济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傅伯翠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得到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的极好机会。他们拼凑了所谓的“新共产党”。工作常常是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苏维埃政权！”、“打倒共产党首领！”、“反对红军！”、“农民协会万岁！”、“自由贸易万岁！”、“第二国际万岁！”

2. 反对我们的第一次暴动是在广州起义周年日之际^①在傅伯翠的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又发生过另外几次骚乱。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到达当地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次暴动。五名武装人员出现在我们的司令部。司令部工作人员感到害怕逃跑了。傅伯翠的人夺走了10条枪，解除了警卫的武装，还拿走了钱和食品。他们寻找党的书记和司令部长官^②，打算把他们杀死。傅伯翠的另一些人在墙上写了标语。布雷利斯基看到一个人在墙上写“第二国际万岁！”，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那人说弄错了，于是他就写了“第三国际”。在乡村贫农中作口头宣传时，傅伯翠的人使用了这样的口号：“你们为苏维埃政权奋斗了三年。现在你们没吃没穿。这是给你们的钱，拿去吧，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他们把钱散发给穷人。显然，这些钱是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

① 1930年12月11日。

② 何人不详。

3. 虽然这个地区的政权表面上在我们手里，但实际上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很小。不仅党的工作，而且全军的工作在那里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在那里只有700条枪。我们没有在那里进行任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苏维埃政权很脆弱。我们的同志找到了傅伯翠组织的名单。逮捕了约100人。我们军队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同傅伯翠搞在一起。整个[苏]区的共青团委员会，除书记^①外，全都同傅伯翠串通一气。在审问时他们什么也不说。傅伯翠还散布谣言说，似乎我们的整个党组织都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根据获得的消息，那里有另一个[苏]区委员会，书记就是傅伯翠。他的省组织位于厦门河附近的英卡河^②，据傅伯翠说，这个组织具有全国性质。我们没有收到关于这个组织的任何材料。可以说，就其工作方法而言，这个组织很让人想起江西省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③。

4. 可以认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同志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试图给傅伯翠施加压力。甚至是现在，当他在杀害我们的同志的时候，那里的同志还在给他写信，请求他返回到我们这里来。

敌人竭尽全力要使红军和共产党在群众的眼里威信扫地。敌人力量很强，可以占领整个闽西地区。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占领了斯韦金^④市，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并在[苏区]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中央(苏)区的力量过分忙于自己的事，不能提供帮助。政治局认为，从闽西派人到中央(苏)区是很容易的，已派许多人到那里去了。

① 陈荣。

② 原文如此，音译。

③ 见第517页注①。

④ 原文如此，音译。

他们计划也经这条路线把外国同志派往中央（苏）区。但是，现在没有经闽西前往中央（苏）区的道路。除科穆纳尔和布雷利斯基外，还有 20 名同志在等待前往毛 [泽东] 和朱 [德] [活动区] 的机会。

贺昌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他给闽西的同志寄去一封信。我们在闽西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消灭敌人的力量。他们甚至不打算这么做。他们正在山区寻找通道，但眼下还没有结果。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问：你们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应该立即派一名同志带着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前往那里。那里有足够的工人来进行政治工作；以前派去的所有同志应该在那里留一个时期。我们应该派一名军队的同志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应该避免对敌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纠正我们的 [政治] 路线上。应该探索在农民中工作的正确方法和策略，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组织和武装农民，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力量。要对我们的贸易策略作出修改。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正确的措施。这个问题还没有在政治局进行讨论。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意见。

奥斯藤：我们将在我们 [远东] 局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下次会晤时我们再谈。

莫斯克文：也许，同志们有点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过，那里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不能加强我们的力量，把闽西的政权控制在我们手里，那么我们将失去一个非常牢固的根据地，而敌人将有可能改进自己的手法来对付我们的中央（苏）区。考虑到闽西的局势，莫斯克文决定改变自己的路线，他将取道湘西南前往茶陵。那里有叛乱的 20 军。他希望在在该军工作一段时间，使它的优秀部队回到红军队伍后，就

去朱 [德] 和毛 [泽东] 那里。从上海到茶陵需要 10 天，然后到朱 [德] 和毛 [泽东] 那里还要 10 天，总共需要 20 天。

来自第 7 军的消息

有一位同志^①从该军经广东来到这里。详细报告还没有收到，但我们知道，1930 年 9 月第 7 军已有 5000 人，3000 条枪。该军决定同朱 [德] 和毛 [泽东] 会合。因此它从广西到了湘西南。

他们从湖南南部返回广西，后来他们又去了粤西北，然后到达粤北。这位同志离开该军时，它还在广西西南部。他们行军 2000 多英里。在途中该军没有在工农中间进行任何工作。它只有一项任务——同毛 [泽东] 和朱德会合。它不止一次地同敌人作战，但都遭到了失败。现在该军只有 1000 人、700 条枪。

所有材料将寄给远东局。

收到了前往贺龙部队的梅塔洛夫^②的来信，信中说，他将晚到 5 天（因乘船困难）。今天他应到达贺龙那里。

关于古德科夫^③：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去第 1 军的古德科夫及其一行的来信。从第 10 军（赣东北）获悉，罗章龙成功地在那里建立了联系，并已开始工作。

不久前前往第 10 军的政治委员^④被怀疑是罗章龙的支持者。

远东局关于第 20 军的决定^⑤。今天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同意。他们将就建立 [相互] 信任 and 同罗章龙作斗争的必要性问题作一些补充。这个决议^⑥将以政治局的名义发给红军各部。

① 邓小平。

② 夏曦。

③ 沈泽民。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 387 号文件。

⑥ 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第 769 页注②）。

斯皮里多诺夫前往第1军。莫斯科文对这次出行有些疑虑。他认为，这会大大削弱政治局的工作。我否决了对斯皮里多诺夫出行的各种反对意见。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已将行程作了精心安排。专门地点也作了安排。找到了一艘很好的轮船。在汉口，同志们将决定是否继续前行。同斯皮里多诺夫一起去的有共青团书记^①。

斯皮里多诺夫要求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第1军活动地区军事行动策略问题。关于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那里有强大的农民运动，但它并不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不了解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那里有许多“红枪”队。我们应该对它们采取什么策略呢？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工作经验十分贫乏。在中央（苏）区，我们只需同一个军阀集团作战，而在第1军活动地区有几个军事集团。不错，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更灵活些。同我们作战的地形条件对敌人有利。一方面有铁路^②，另一方面有河流^③，两者使敌人可以调运士兵和武器装备。我们有20名同志在京汉铁路干线工作。其中一名是游击队领导人^④。我们请你们（远东局）的军事工作同志提出关于军事策略和灵活应变方面的建议。我们也需要关于如何建立联系和对待土匪部队的政策的指示。那里土匪很多。我们有两种看法。莫斯科文、斯皮里多诺夫和向忠发同志认为，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让土匪部队以红军名义行动，并利用我们的口号。

古德科夫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同土匪建立政治和组织联系是不能允许的。这个问题应该由远东局来决定。

① 温裕成。

② 指京汉铁路。

③ 指长江。

④ 何人不详。

关于对待农民的策略。在第1军活动地区，我们有相当发展的农民运动。那里有许多农民协会。例如在安徽省西部，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农民协会。通过这个协会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该协会领导人有想成立另一个政党的倾向^①。我们需要非常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

最后，关于党务工作人员和干部的问题。我们不了解在1军工作的人。

迄今为止那里党的工作还很薄弱。我们需要加强组织工作和派很多同志到那里去。

我们起草了关于第1军活动地区工作的决议案^②。首先应该改变和改进工作。政治任务和群众工作的方法是明确的。共产国际文件中有相应的指示。远东局的同志们多次同你们谈过这些问题。我们根据以前的文件为你们准备了详细指示。这只是草案（念），但你们从中可以找到对许多军事问题的答案。这个文件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你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就地解决。

你们应该为第1军的工作培训人员，并尽快把他们派到那里去。该文件中已经指出那里需要哪种人。

莫斯克文：已经作出决定，在……IV^③……前，27名负责同志将前往苏区做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到第1军。

斯皮里多诺夫看了远东局关于第1军工作的决议案后，认为这个决议案是正确的，但他请求安排同军队同志^④的专门会晤。

① 原文如此。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指4月。

④ A. Ю. 盖利斯。

奥斯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39—41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①。

^① 文件副本已发表（见《中华民族》，上海 1931 年 9 月 9 日第 13 期第 2 卷第 428—430 页）。

3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摘录

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同志们：

先谈一谈中国总的形势。我将谈得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你们拥有大量的材料并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很好的整理。我来谈谈这一话题，只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理解中国目前事变的起因，这些事变基本上是在积极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我们党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我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安抚和领导参与运动的广大群众，有时我们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犯有不可思议的错误，但无论如何，解放运动和苏维埃运动总的说来是在沿着上升的线路发展着，土地革命也在逐步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这当然是由国内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在现时统治制度条件下群众的处境没有出路造成的，这种局面必然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为了评估总的形势，我想援引一下敌对阵营中的两个代表人

^① 信的片断发表在 П. А. 米夫：《中国的革命危机》（《真理报》1931 年 5 月 31 日）和《中国的国内战和为苏维埃而斗争》（《布尔塞维克》，莫斯科 1931 年第 13 期，第 67—79 页）的文章中。又见 П. А. 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 1932 年版，第 268—289 页。

物的话。一个代表帝国主义集团，另一个代表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反对派集团。汇丰银行[董事会]董事长普拉梅是这样来评估1930年的事态发展的，他说：“我几乎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过去的一年不仅在远东，而且在全世界都是银行业极其困难的一年。我们在香港和中国不仅遇到了银价灾难性的暴跌，而且遇到了由经济或政治原因引起的巨大困难。”^①接着在谈到长江流域的情况时，普拉梅指出，这个地区的贸易“展现出了非常糟糕的记录”。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他最近的年度报告中对1930年所作的评估与普拉梅对中国形势总的评估是相一致的，宋子文说：“在所总结的这个时期，中国同其他各国一样深受世界经济萧条之苦。对中国来说，萧条表现得更为尖锐，因为国家的银元汇率跌到了空前低的水平，进口贸易低迷，同时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此外，政府进行了艰难的内战，这是自它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战争。”^②然而，无论普拉梅和宋子文的说法如何令人信服和严正，它们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表达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及其衰落的真正可怕的实际情景。

实际上，今日中国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

今日中国是一个正经历着全面的、规模异常之大并且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国家。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本国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侵略日益加紧的情况下正在把自己的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出让给外国资本巨头。这是一个现在正在前所未有的饥荒困境中喘息的国家。这是一个充当资本主义矛盾和军阀集团相互角逐的广阔

^① 引自J. 普拉梅于1931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的汇丰银行(香港上海银行)股东年会上的报告。报告全文没有找到。报告转述于《香港银行行长谈远东商业形势》一文，载《中国周报》，上海1931年3月7日第1期第56卷，第505页。

^② 引自宋子文1931年3月1日关于国家财政状况的书面报告(见《中国财政，宋子文先生的第二个年度报告》，载《英国商会杂志》，上海1931年第4期第16卷，第86—91页)。

场所的国家，军阀集团正在榨干民族经济的最后一点精髓，吮吸劳动群众的最后几滴血汗。

1. 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数字。我们先拿外贸来说。大家知道，1930 年的关税收入是 1.8 亿两，比 1928 年多 2800 万两。单从表面上看，如果同 1929 年相比，看上去似乎增加了 18%。但这根本不能作为外贸周转额增长的证据。例如，根据我们上面援引过的普拉梅的权威说法，银价一年内平均下跌了 40%，黄金的关税收入去年同 1929 年相比减少了 12%。其次，如果说关税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实际的贸易额，那就必须考虑到关税的提高，这种关税是 1930 年确定的，它在不扩大对外贸易额的情况下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就应当承认，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同去年相比下降了 33%，而且可能是整整 40%。我且不说中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它本身就是该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和工业危机的令人震惊的标志。

2. 下面谈一谈中国工业转到外国资本家手中的问题。我不想谈大家熟悉的东西，不谈外国资本完全排挤中国卷烟厂的情况，这些卷烟厂不是缩小了，就是完全关闭了。火柴厂和其他企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只拿关于纺织工业的最新报告来说，在纺织工业中中国资本过去拥有非常巩固的阵地，直到最近纺织工业总的说来还处在某种发展之中。1930 年我们在这种工业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中国经济杂志》^① 1930 年 10 月号上看到了关于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在上海棉纺工业中的规模的以下信息。当时中国资本合 3723 万墨西哥元，而外国资本家投入这一工业部门的资本为 152350800 墨西哥元^②，也就是说，约占全部流动资本的

^① 月刊。1927—1937 年在上海出版。

^② 见马克斯韦尔·S·斯图尔特和方富安（音）：《中国工业与劳工统计研究》一文，载《中国经济杂志》，上海 1930 年第 4 期第 7 卷，第 1095 页。

80%。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现在中国资本还占有整个棉纺工业的大约50%。

1931年，中国工业转到外国资本家手中的过程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我援引下面三个例子。2月，“申新”棉纺厂以500万银两卖给了外国人，该厂有纱锭69000个，约1000台机床和270多亩地。1931年3月，日本人——“共达”（音）棉纺厂^①厂主用340万银两买下了“厚生”棉纺厂，该厂也有6—7万纱锭，约1000台机床。最后，中国人还失去了“纬通”棉纺厂，其资本为120万元，并拥有26000纱锭。以前属于中国人的这三个最大的纺织厂落入了外国人之手。换算成元，这些资本约合1270万墨西哥元。这就是说，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占有投入纺织工业的总资本已不是80%，而是87%。中国企业主的抱怨从中国四面八方传来，他们经受不起外国人的竞争，不能抵御全面危机。在北京，特别是在中国新年（2月17—25日）之后，中国商行的破产简直具有大规模的性质。其他城市的情况一点也不好。而外国公司却有不少收入。像香港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译者）和英美烟草公司这类鲨鱼是不可能抱怨1930年的。前者收益为20726730港元，后者1930年的收入为600多万英镑，这相当于6000万金卢布^②或12500万墨西哥元。

3. 关于中国的交通运输状况，特别是中国铁路的状况，无需多谈。只要援引一下南京政府交通部长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够了。孙科在铁路会议^③上谈到铁路状况及其几乎完全被毁坏的局

① 原文如此，应为“大康”。

② 在米夫的《中国的革命危机》一文中约为6500万金卢布（见П. А. 米夫：《中国革命》，第270页）。

③ 指中华全国铁路运输问题会议，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举行。详见《南京举行的全国铁路运输会议》，载《密勒氏评论报》上海1931年3月14日，第2期第56卷，第46页。

面时讲了下面一段话：“现在各条铁路都处在破产边缘，它们的总债务达10亿多美元的巨大数额。据沪宁铁路管理局报告，今年该局不得不拿出近300万美元来清偿贷款，还需要几百万美元购买新车辆。沪宁铁路的货运车厢数字也从4000辆减少到了1000辆。”^①铁路的这种毁坏状况首先是由军阀的行动造成的，他们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利用和毁灭国家的一切资源。我举一则典型报道为例。从3月2日发自南京的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光石友三将军一人就控制了17辆机车^②，47节客车车厢和393节货运车厢，这些机车和车厢原来都是属于京汉铁路的。

4. 财政危机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崩溃的总的情景。军阀集团侵吞大量钱财，将其耗费在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上。据《远东评论》^③2月号上一篇社论的一位相当权威的作者计算，仅南京66个师和9个旅一个月的开支就有3000万元，或一年约5亿元。接着作者指出所有军阀的师总共有280个，据他统计，费用大约是20亿元。据这位作者了解，全中国总共有500万军人，为养活这些人每年要花费约30亿墨西哥元[为支付靠国家养活的这500万人的费用，中国每年要拿出约7亿元的黄金或30亿元的白银]。除这个破坏性因素之外，还应加上一个与银价惊人暴跌有关的因素。1930年，银价从每两21.625便士下降到14.5便士。在香港上海银行[董事会]主席年度报告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对于中国元可能跌到何等低的程度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回答。”银币的这种下跌会彻底破坏国家的经济，使相对正常的内外贸易条件不复

^① 见《中国铁路处于破产边缘，面临严重问题。孙科先生如是说》，载《中国画报》，天津1931年3月14日第553期第11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辆机车（见《石将军强占京汉铁路车辆》，载《中国周报》，上海1931年3月7日第1期第56卷，第501页）。

^③ 月刊。1904—1941年在上海出版。见乔治·布朗森·雷：《共产主义、遣散与贷款》，载《远东评论》，上海1931年2月第2期第27卷，第69—71、106页。

存在,使基本居民群众的处境明显恶化,使中国对外国列强的债务自动增加,如此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南京政府不仅不能摆脱长期财政危机的局面,而且越来越深地陷入这种危机的陷阱之中。孙科不久前刚宣布,南京政府的[预算]赤字为14300万元。显然,这一赤字近期内不仅不会减少,相反,一方面由于军费开支,另一方面由于必须清偿外债而增加。绝大部分外债的偿付期是今年和明年。南京借新债的希望没有实现(指大国的新贷款)。因此,《远东评论》上提出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在这份杂志上读到:“两年前,美国总统[胡佛]接见一位美国人,此人希望得到总统对在中国修建新铁路的计划的支 持。在了解了这项计划之后,总统说:‘我想帮助中国,但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新政府在遣散军队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作者继续写道,3月份,军阀部队有150万到200万人,而现在根据蒋介石同张学良会晤时发布的消息,军阀部队达300万人。美国资本家看到这种情况后,都不想提供大笔借款。“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拥有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十分准确的数据材料并有很敏锐的分析头脑的‘白宫人’,未必会问:‘中国政府在遣散部队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300万人拿着武器,还有200万掠夺居民的土匪,这些人能毁掉任何一个国家,乃至使世界的其余部分同他们一起毁灭。”^①

5. 现在简要谈一谈饥荒。首先,我要援引一下普里茨·罗伯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此人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呆了38年。在不久前所作的报告^②中,罗伯特指出,根据中国近7年——从1923至1930年——来的统计,有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400万死于饥荒。这些数字大概没有夸大。(例如,根据不久前公布的中

^① 见《远东评论》,上海1931年第2期,第71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国饥民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①，仅甘肃省就因可怕的饥荒死了400万人)。在邻近的陕西省，情况一点也不好。南京的一位领导人于右任不久前从那里视察回来。在谈及自己的视察印象和描绘陕西人民的极度痛苦的情景时，于右任首先强调，由于饥荒，该省在这两年内死了200多万人。由于饥荒，奴隶制现象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据于右任了解，在陕西省，仅仅一年内就有40万人被出卖当奴隶，同时地方军阀不仅使这种状况合法化，而且还把它作为自己收入的来源之一，在每宗这样的交易中收取5元钱。3月14日，中国报纸上出现一则报道，说陕西现在有558万人在挨饿，若不立即援助，他们可能会死去。但是，饥荒不只是在两个省肆虐。现在也蔓延到其他省份：河南、安徽、江西等。显然，为援助饥民拨出的1000万^②无论如何不可能缓解局势。这场饥荒是由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连绵不断的战争、土壤改良制度的破坏、军阀的掠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引起的，它将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随着饥荒范围的扩大，其可怕的后果也会增大。

我不谈银价下跌，不谈生活水平下降一半等情况。不谈这些，说明革命积极性高涨的原因的群众悲惨处境也是清楚的。

6. 现在来简要谈一谈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我不认为，现在有谁会对南京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和由南京来缓解危机或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抱什么幻想。如果四省的苏维埃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如果北方的军阀拿起武器反对蒋介石集团，如果四川军阀又互相开始争斗，并且其中一部分转向甘肃，如果云南发生政变，地方军阀之间开始相互角逐，如果广东与江西之间刚刚停息的战争又重新爆发，如果甚至西藏军阀也采取行动反对四川，那么中国的统一就是好瞧的了。何况，南京政府上层的情况也相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货币单位没有指明。

当不妙：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分裂，后者被捕^①，由于最近的逮捕事件，地方军阀中出现骚动。眼下还很难预见这次分裂的全部后果。但这种后果无疑会是十分严重的，会大大削弱南京政府的力量。至于经济政策，南京也不能因实行一些较重要的措施而夸口。不错，他废除了厘金^②，用特别税取而代之。但实行这项措施并不是为了改善国内商品流转条件和加强本国资本的地位。它所追求的是别的目的。废除厘金本应使地方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被取消，而实行特别税本应集中地将所有这些收入同时归入南京政府的国库。无需证明，经济发展的利益只能因此而受到损害，何况地方暴吏利用自己完全不受控制的局面，不愿意为了南京的利益而放弃这个收入来源。的确，南京还有不少另外的计划。每天都可以读到一些东西，一会儿是满足丝绸工业所需的600万贷款的建议，一会儿是为建立五家国营工厂提供1500万贷款，一会儿是用于改善船运交通条件的新贷款计划，一会儿是用于水利灌溉系统的贷款，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说给不知情的人听的，是给贫苦人民编造的神话故事。所有这些废话都不能掩盖日益增大和不断加深的危机。抱着同样目的，为了打退革命浪潮和散布幻想，南京政府在喧嚷要取消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他们颁布工会法^③，然后又亲自阻止其贯彻执行，他们宣扬召开所谓的国民会议，这是军阀政客们的一个可卑的发明。南京正处在彻底破产的边缘。他们借助军阀利用一切……^④，并对它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出现自己不可避免的被推翻的命运。然而，这种阻碍作用越往后越微弱。这在日益壮大的群众运动中可以找到最好的证据。

① 见第771页注④。

② 见第500页注①。

③ 1929年公布的工会法计划于1930年12月1日生效，但在企业主的压力下，先是改至1931年2月1日，后又推迟到1931年8月1日。

④ 原文空白。按意思为：手段。

6^①. 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11 月在上海有 2.5 万人罢工，12 月有 3.3 万人^②。我们没有今年 1、2、3 月的任何综合信息。只有这一时期比较完整的罢工清单，但遗憾的是，并不总是指出到底有多少工人参加了这些罢工。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1) 工人运动在发展，2 月份尤为明显，当时仅仅在上海一地就有不下 5 万工人参加罢工；(2) 尽管罢工形式各种各样，但反攻性质的罢工占优势，其数量在不断增加；(3) 绝大多数罢工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也经常同时提出一些政治性的要求，特别是 (2 月) 劳动者的新年斗争，虽然不是直接地，但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国民党在这时禁止并严密监视罢工；(4) 在多数情况下，罢工即使不是以工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那也还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而告终 (给邮政工作人员加薪 10 元，给有轨电车厂工人加薪 8 元，给码头工人、烟草工业工人等也加了薪)。多数是自发性的罢工。如果说我描述的是罢工运动及其发展的表面情况，那我不想让人把这看作是党的力量的标志和它工作的成果。不，我只是以此来强调说明我们党的软弱，提出它的组织活动的客观可能性和有利前景。

7. 我不谈失业和士兵暴动问题 (这些问题在专门信件^③ 中已作说明)，我要谈一谈苏维埃运动的问题。在上一封信^④ 中，我提到第一次全面进攻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结局。据何应钦 (陆军部长) 统计，南京部队这一时期在江西省同红军的斗争中遭到了以下损失：死 2 万人，伤 2 万人，转到红军方面的士兵大概也是这么多人，他们部分地弥补了红军队伍的有生力量在交战时受到的

① 原文如此。

② 在 П. А. 米夫的《中国的革命危机》一文中谈到 1930 年 10 月有 2.55 万罢工者，11 月有 3.3 万罢工者 (见 П. А. 米夫：《中国革命》，第 271 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 375 号文件。

损失。这第一次进攻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无可争辩的是，我们丧失了部分地区，但是由于红军的加强和我们的主要苏维埃根据地的巩固，我们却成长壮大了，这也是不容争辩的。如果考虑到我们不仅不得不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而且同时还要同内部的反革命作斗争，反对那些企图从内部来腐蚀和消灭我们的改组派和其他分子的话，那么这些事件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现在我们拥有什么呢？有三个自己的根据地：（1）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2）贺龙的湘西北、鄂西南地区；（3）近来已变成一支强大力量的（在鄂豫皖交界处的）第1军地区。此外，我们在湘南（第7军）、闽西（第12军）、赣东北（第10军）、赣南等地还有约12个小苏区。现在有哪些敌军部队在调来对付我们呢？对付朱〔德〕—毛〔泽东〕的有南京政府调来的20万部队，对付贺龙的有不下6—7万人的军阀士兵，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第1军的有政府军。很难说，有哪些部队调来对付我们的其他军。在第一次进攻时敌人使用了空军和电线^①。现在使用了毒气弹。南京已拨出150万元来收买红军的一些指挥官。此外，南京还企图要弄农民群众，许诺把从苏维埃政府那里得到的全部土地都留给他们。显然，南京正使用诡计、技术装备和大量有生力量等一切手段来摧毁苏维埃运动。但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苏维埃运动仍在发展和加强。

而且这是在尽管有错误、有对我们路线的曲解，有苏维埃运动的种种弱点和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是不少的。有时你看一些材料会觉得奇怪，实际情况远远胜过任何想象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是猜不到的。我举出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的一些例子，我是根据最近的材料这样做的。首先是关于富农的危险。在闽西，我们的组织允许在苏维埃内自由建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电网——译者。

立富农派别。来自湘西的报告说，那里2/3的政府机构成员是富农。在另一个地方，“青年先锋队”向富农的挑衅屈服，要求他们毁掉祖坟。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犯类似的错误，我们在同富农的斗争中使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例如，我们在1军的报告^①中可以看到：“我们同富农和中农作斗争时，认为即使农民手中剩余产品不多，那也表明他是富农。结果，农民不想拥有足够数量的产品，不敢耕种比满足他们直接需求所必需的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在中央（苏）区，朱德和毛泽东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的口号，并且用一些行政命令口号取代组织对乡村贫农的组织工作和对同富农的群众性斗争的领导工作，这些口号只能吓唬农民群众并使他们疏远我们。所谓的改组派问题就与此有关。从所有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危险。他们组织得很好，在苏区内部拥有以剥削分子为代表的坚实基础，得到外部反动派的支持，相当精明地玩弄手腕，不惜利用所谓“左的”口号，不仅渗入到苏维埃机构，而且还渗入到工会和党的机构，从有关报道中可以得出结论，改组派在1军的所有领导机构中都有自己的派别，在湘鄂西也一样，他们在中央（苏）区有自己的基地，他们是第1军分裂的教唆者和发起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鄂西，允许建立所谓的“新共产党”，并让它在学校（苏维埃学校）公开进行活动和宣传。此外，凡是在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地方，这种斗争进行得并不总是正确。我想援引一个事例，当湘鄂西部地区秘密处决2/3的改组派首领时，引起了群众的疑惑，因为他们对改组派一无所知，不理解这些措施的性质。还因为有以下情况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据了解，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这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在我们的苏区还

^① 在米夫的《中国的内战与为苏维埃而斗争》一文中说的是4军（见П. А. 米夫《中国革命》第287页）。

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有我们党的机关的秘密部分当然是有益的,一旦我们的红军被迫撤退,这一部分可以继续工作。但我应当补充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我们的党组织可以在相当广阔的苏区境内秘密存在的想法。

接下来谈一谈在实践中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要实行土地普遍平均分配。但在某些地区是通过上面命令强制实行的,没有作相应的准备,没有考虑农民群众的情绪。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相反,土地是根据富农的倡议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闽西流行的口号是很说明问题的,这一口号是:“抽多补少,但不抽肥补瘦。”这个口号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土地是根据数量进行分配,而不考虑其质量。另一方面,不抽“好的”富农、大地主和绅士的土地来补给“坏的”贫农或农业工人。在第1军地区平均分配土地时,所有人都有份,连原有的地主也有份,只是不分给农业工人。后来这个错误纠正了,也给农业工人分了地,虽然当时颁布了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的法令。在这个地区,还给红军战士分了地,但是当红军战士在军队服役时禁止使用雇工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成了荒地。此外,该地区在立三路线影响下还规定每个村都必须建立国营农场。是的,后来这些农场都撤消了,土地分给了农民。

现在谈一谈苏区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政策。除原有情况,我还可以补充哪些新的情况和必须注意什么呢?有以下情况:在湘西赤河和衡口(音)^①,地方组织举行了工人罢工。该地区特委(最高党委)匆匆忙忙来纠正这一“错误”。它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地方组织组织罢工的做法,并说服它,“在苏区绝对不允许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在关于1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那里有军械厂和服装厂。但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没有组成阶级工会,没有参与政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河口。

府和苏维埃的工作。”其次，在成立了工会的地方，多数工会又出现了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混在其中的情况。至于农业工人工会以及乡村贫农团，我们了解到某些地区形成了这类组织的萌芽，不过对于它们的工作，也跟它们的活动结果一样我们一无所知。

现在谈谈贸易。普遍都在议论停滞以至日益加剧的危机。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与客观形势有关，而另一方面，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我举湘西和鄂西为例，那里没收了所有的商品，甚至包括农民个人的衣服。结果谁也不想，谁也不敢经商。

在第1军地区内有同样的抱怨，还有自由货币资金的不足，农民把钱隐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把他们看成富农。我可以继续列举这类事例。但我担心，你们会对我们的苏维埃实践产生片面的和悲观的看法。实际上，我们有不少非常英雄主义的、理智地考虑到劳动群众情绪的、给整个旧的半封建社会关系体系以最深刻的革命震荡的例子。但如果我谈论这些或多或少流行的病症，那我就提请注意以下一点：在许多地区，“[苏维埃]运动只需要扩大，而不需要深入”的口号仍然很流行，在实践中扩大苏区的这一口号意味着唯一的任务是放弃实现土地革命的重大使命。同时农民的局限性也表现得很明显：地方主义、不想在村周围以外的地方继续进行斗争、有一旦取得局部胜利就要结束斗争的错误的和危险的情绪和观念、党组织消极被动，它本身就受到了这类情绪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们同国民党军阀的胜利斗争，而且对于能否把这一斗争提高到更高的反帝战争的高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做不到这一点，苏维埃运动自然不可能取得胜利。所有这些缺点必然会在红军队伍中反映出来。在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好和在苏维埃政策方面犯过较多错误的那些地区，建立坚强红军的任务自然变得难以实现。相反，在那里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力量的削弱。例如，去年秋天14军解散了。10月，12军有2000

名红军战士开小差，而11月又有800人开小差。实际上，20军事件^①也可以用这些原因（上面列举的缺点）来作说明。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相应的教训。这一点你们可以从专门的信件中了解到，信件副本^②将送给你们。我们也考虑了你们关于工农检察院和检察委员会的正确指示。至于军队中的党组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党组织，而在于20军的党组织（那里有不少好同志）允许改组派分子来迷惑他们，并且在解决党内（由改组派煽动起来的）分歧时走上了同其他部队进行武装（实际上是反革命）斗争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也指出来了。

7^③。如果同中央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有坚强的有威信的中心局，那么所有这些缺点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先谈谈联系。我们有信使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在不断改善。只是很难找到可靠的、适当地条件的人。通常有50%的信使落入敌人手中，这对工作是很大的损失。不总是能轻易地找到替代者，因为除了可靠性之外，他们还懂当地的语言，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并同当地居民没有区别。

关于无线电设备。第1军有一台收报机。已给贺龙、朱[德]一毛[泽东]活动地区及其他地区送去了收报机。现在干部问题十分尖锐。无线电收发报员不够。这里没有可能进行速成培训。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垮了。第二所在培训，但学员至少要过两个月才能毕业。必须尽可能给它以帮助。

关于中央局。我们随上次邮件给你们寄去了成员名单^④。我们这里有不少困难。例如，项英10月就走了，12月他已在第12军

① 指富田事变。

② 可能指第387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

④ 见第375号文件。

地区，直到现在，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可以推测他在中央（苏）区（眼下还没有直接证据）。布林斯基、科穆纳尔^①和共青团的同志^②也已动身前往那里。莫斯科文^③也应前往那里，但因路线不完全适合耽误了。他动身的时间最后定在4月初。梅塔洛夫^④已前往贺龙那里，李维汉也将被派往那里。古德科夫^⑤已前往第1军，斯皮里多诺夫^⑥将（根据我们的决定）于1日或2日前往那里。

关于我们在苏区的代表。尽管现在很难派我们的代表去那里，但是需要这么办，不是派一名，而是要派三名代表到三个最重要的地区。中央（苏）区不应有任何疑问。至于第1军，那里有同样有利的前景，那里非常需要有我们的一名代表，因为与中央（苏）区（朱〔德〕—毛〔泽东〕那里）不同，那里没有像朱〔德〕—毛〔泽东〕那里那样坚强的干部，那样坚实的基础。贺龙那里的情况也一样。但同时必须考虑到下面一点。苏区彼此没有联系，大概这种联系还不会很快建立起来。对它们各区来说，联络中心仍然是上海。上海一如既往仍然是指导和协调它们行动的中心。这就是说，在上海我们应当有足够坚强的局，特别是在我们不得不大大削减此间中央的组成人员，把大部分中央工作人员派往苏区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决定我们在苏区的代表问题时你们应该作通盘考虑。

现在谈谈动员1000产业工人参加红军的问题。这项工作我们在逐步进行，不只是在上海，而且在香港、天津、厦门、北京等中心城市都已开始进行。起初我们的党组织走的是一条阻力最小

① 分别为：任弼时、王稼祥。

② 其中有顾作霖。

③ 周恩来。

④ 夏曦。

⑤ 沈泽民。

⑥ 张国焘。

的路，开展的这项运动不是那么有群众性。我们不应对以下情况不闻不问：工厂至今还没有建立保卫苏维埃运动的委员会，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企业通过支援红军的决议，至今还没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铁路员工或海员拒绝运送敌人用于同红军作战的部队或武器弹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成绩还不很大。例如，在一些工厂，工人们开始募捐支援红军。每个人拿出两个铜板，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数额，而是这项运动的群众性。在一个区的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支援苏维埃运动的决议，等等。事情已由停滞状态取得了进展。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大大扩大这一运动，特别是可以结合为广泛宣传为苏维埃代表大会^①起草的法案而采取的措施来进行。

我不谈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不谈颠覆破坏活动，不谈在各种秘密的半神秘社团中的工作。所有这些在专门的信件^②中都已作了说明。

现在谈谈党。我们无疑已实现了向实际工作的转变。在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上党已认真开始执行具体的任务。当然，我们应该克服某种公式化的作风，消除对必须把耐心细致的日常工作同解决国家的重要任务结合起来的不理解。

无论如何，这种转变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是明显的，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转变的某些实际成果。大家知道，这方面的巨大障碍是右倾分裂集团。它以不亚于立三路线时产生的并发症威胁着党。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提到，党在较短的时期内消除了这种危险。现在罗章龙的支持者将自己力量都集中在〔上海〕沪东区。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不再起任何作用。至于沪东区，他们起初利用自己原有的联系保留了三个支部。近几天才把他们从那里赶走。现

^① 见第 723 页注^①。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在他们没有一个支部，只是在两三个支部内有个别几名成员。你们将收到罗章龙最新“创作”的译文，以及他给共产国际的信^①。这是一份极其傲慢的、虚伪的、同时又是相当蛊惑人心的文件。毫无疑问，罗章龙打算以此蒙骗共产国际。可以推测，他试图借助他广泛散发的文件来欺骗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并博得他们的欢心。

关于罗章龙不谈了，我来谈谈党本身。在上一封信中我谈了摆在党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现在作为对此的补充，我们提出一系列新任务：（1）恢复和加强现有的地方组织。（2）逐步发展壮大党。日益发展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对党员的巨大需要，而国民党政权也在一天天地分散我们的队伍。不进行认真吸收新党员的工作，我们就不能胜任运动。我们专门为上海组织制定了关于开展相应的群众性运动和包括个别吸收的指示^②。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看到了我们的指示，那就太好了。（3）开展反帝斗争。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落后。我们准备在5月结合五一节和五卅运动^③实现这一工作的某种转变。（4）改进书面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就这个问题拟定了专门的决议^④，你们将从随这次邮件寄去的材料中了解到这一点。

现在很简要地谈一谈工会工作。我们应当指出在一些企业中建立工会小组方面的成绩。在上海，这些小组大约拥有1000名工人。在兵工厂、在码头工人、电话员（修理工人）中、在纺织厂等建立了我们的小组。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但还是有进展。在上海，现在我们有23个^⑤合法站点（2家茶馆、1家诊所、4所学校、10个街头商摊、2家餐馆、2个工人宿舍）。这还不算专门为妇女建立的站点。现在我们面临着理智地利用这些站点并增加其数量

① ②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枪杀举行反帝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工人6周年。

⑤ 原文如此。

的任务。关于罢工斗争。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正在为参加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做认真的尝试。这里我们也取得了局部的成果。在我们的领导下成功地组织了码头工人的罢工^①。参加罢工的只有100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罢工以后，其他船坞的工人开始同我们的工会会员汇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指望得到对他们的领导和帮助。现在我们正在同丝绸工业建立联系，我们打算在那里利用特别有利的形势组织和举行大的罢工斗争。

关于共青团。这段时间召开了中国共青团四中全会^②。关于这一点，你们将从寄去的材料^③中更详细地了解到。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组织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与两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发展苏维埃运动问题和领导劳动青年的经济斗争问题有关。在共青团的实际工作中也会出现转变。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发挥青年团积蓄的力量[……]^④

关于局的工作。我们对局的工作做了补充改进。关于这些改进，如同工作本身一样，你们将从所附的材料^⑤中了解到。可能在近期内，我们不得不限制会议的次数以及具有通报和指示性质的谈话次数，当然，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量。我们的工作会一天天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人了解我们的情况，显然，如果今天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处在首位，那就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在警察监视

① 罢工在1931年3月初举行。详见《码头工人的要求》，载《上海曙光》上海1931年3月4日。

② 见第668页注③。

③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记录和Г.М. 别斯帕洛夫的未注明日期的报告（见全宗533，目录10，卷宗1829，第1—56页；目录4，卷宗188，第64—77页）。

④ 以下删去了有关日本、台湾、朝鲜、新加坡、锡兰、印尼、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部分。

⑤ 看来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1931年3月3日和10日通过的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决定。

条件下的工作。

受远东局委托 威廉^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66—79 页。

德文和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П. А. 米夫。

3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1年3月30日于上海

绝密

你们关于要更谨慎地安排工作的建议不能保证盖利斯（军事工作人员）^②和米夫（前东方书记处副主任）^③不被逮捕。我们面临出现新的叛变的危险。盖利斯和米夫继续逗留是非常危险的。请允许让他们动身，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动身日期不应晚于4月20日。如若你们同意他们动身，请注意，这里只剩下远东局两名成员了^④。必须赶紧派来接替者。请速电告。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6，第11页。

打字稿，副本。

① 1931年4月2日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该电报副本时，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写道：“送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31年3月30日的报告。能否下达盖利斯和米夫可以动身的指示？我认为，应该同意动身。皮亚特尼茨基”（见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6，第10页）。

②③ 看来括号内的内容是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加上去的。

④ 指И. А. 雷利斯基和ch. 克伦宾。

392

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 张国焘谈话记录

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

秘密

托姆^①同莫斯克文^②、向忠发
和斯皮里多诺夫^③同志的谈话

1. 丝绸工业几千名工人于4月1日举行了罢工。4月2日有1.6万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物价上涨补贴。因为自己信息不够灵通，莫斯克文不能详细通报罢工的情况。奇怪的是，戈卢别夫^④4月1日还不知道罢工的事（4月1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戈卢别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丝绸工业的情况他只字未提）。莫斯克文对我们在准备罢工中的作用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认为这次罢工是自发的。关于罢工委员会（委员会是否已经成立）和我们对罢工者影响的程度他也不能通报什么。他报告了政治局给宣传部、省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下达的关于组织、准备和开展罢工的指示。印制了传单。我们建议立即动员党、团和工会组织积极支持罢工，选举罢工委员会，尽一切可能召开罢工者代表会议，等等。参加会议的应该有就业工人代表，应该

① A. Ю. 盖利斯。

② 周恩来。

③ 张国焘。

④ 陈绍禹。

尽量使丝绸工业的全体工人关心这次罢工，以便使罢工规模扩大，还应该设法发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声援罢工（上海约有5万丝绸业工人）。

2.4月3日向[忠发]将就此问题向奥斯藤^①作了通报。我得出一个印象：省委、甚至中央都没有准备这次罢工，尽管就丝绸工业状况同他们进行过多次谈话，但罢工还是像雪崩一样突然发生了。斯皮里多诺夫已于……Ⅳ^②……动身。如果一切顺利，他……（10天以后）将到达1军。我们就该地区局（中央局）的任务问题同他谈过话，我们重申了我们在军事和政治组织问题上的建议。同志们与他们取得了一致。斯皮里多诺夫说，（莫斯科文领导的）军事部决定派第1军去占领并坚守京汉铁路地区。我不得不向莫斯科文论证下达这样的任务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建议不排除组织对铁路的袭击的可能性。在有利的军事态势下，我们的部队应该采取这种战术来削弱敌人，并给游击活动以力所能及的支援。以夺取粮食和武器弹药或瓦解敌军为目的的这种对铁路的袭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好处。但主要的任务是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乐山、广州^③、皖西南和鄂东北，消灭那里的敌人，建立巩固的政府，加强我们的部队，正确地分配土地，清洗党组织，在邻近地区发展强大的游击运动，以便使敌人难以同我们进行斗争（对斗争和工作要做好安排，不让敌人包围我们，保证敌后游击运动）。

兹决定：

（1）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为：主席：斯皮里多诺夫、总指挥：现1军军长^④、副主席：现党的书记^⑤、委员：现

① H. A. 雷利斯基。

② 指4月。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都是原有的。

③ 原文如此。

④ 许继慎。

⑤ 曾中生。

政治委员^①、和经局审批的另外1—2名同志。总指挥目前执行第1军军长的职务。

(2) 基罗夫(曾在托尔马乔夫军校学习过^②)任政治部领导人。日内启程。

(3) 刘伯承在结束野战条例的翻译和制定纪律奖惩条例之后将作为军校领导人前往那里。

(4) 立即物色参谋长人选(在上海我们没有合适的军队同志)。

(5) 为了开展和领导铁路以西的游击活动，我们将在信阳成立隶属于中央局的三人小组。开展信阳西北的农民运动的前景是很好的(大片地区在闹饥荒)。现在那里的运动十分强劲。

(6) 中央局书记：斯皮里多诺夫，副书记：古德科夫^③。该局将由11名同志组成(不是以前向我们通报的那9人)。

(7) 为了在安徽、河南(铁路以西)组织游击活动，建立地方苏维埃，经局审批成立像信阳那样的三人小组。

(8) 政府的组成由局决定。

我谈了红军夺取城市的策略问题、组建和集结部队及使用炮兵和机枪问题、扣押人质问题、组织农民赤卫队、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等问题。

该地区缺乏大米。斯皮里多诺夫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答：城市里有足够数量的大米，农民也有，让他们借大米给红军。在上述地区夺取城市、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分地)、纠正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给小地主分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有农民参加的真

① 余笃三。

② 李特曾就读于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③ 沈泽民。

正的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利于得到大米。鉴于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对大米需求的日益增加，我们的任务是尽快提出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和采取与此有关的其他措施的问题，加强我们的力量和扩大苏区。大米问题是我们党和红军在农民中的政治和组织影响问题。钱的问题也是一样（农民不愿意让旧式货币流通）。斯皮里多诺夫表示同意。

关于岳维峻：不要毫无根据地死他。我们应该利用他的被俘人员。对其他将领也一样。

委托局和斯皮里多诺夫本人以局的名义定期向上海作出通报（按照我们制定的表格）。斯皮里多诺夫请求同基罗夫详细谈谈军事问题，并派更多的人来。已经答应了他的这些要求。

目前派人的情况如下：上海派8名党的工作人员、6名军人同志，其中一名炮兵专家、一名飞行员（从莫斯科回来的）、2名农村工作人员、2名从事妇女工作的妇女、3名政治委员、3名青年、5名医务工作人员（护士等），还有几人应由汉口派出；满洲和直隶应各派20人。所有上海的人日内就派出。（医务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已动身前往）。教员我们没有找到。在上述人员中也没有工会工作人员（杰克^①提请注意这一点）。

非常详细地谈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政府和局的职能和相互关系问题。由于莫斯科文对这些问题分辨不清，这种谈话尤为必要。经讨论后我们认为，至少斯皮里多诺夫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在莫斯科文动身前，我还要再一次同他谈谈这个问题。

我已将我们对于农民组织和所谓土匪组织工作的意见告诉了斯皮里多诺夫。

斯皮里多诺夫请求把我们关于该苏区和红军的总任务的书面

^① C. JI. 斯托里亚尔。

指示连同关于军队特科、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空中和化学防卫的指示一起转交基罗夫。他将带来所有这些文件。我们答应了。

3. 在第 12 军，我们的处境变坏了。我们丧失了永定和考市^①两市。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城市。我们已被敌人紧紧包围。大埔与第 12 军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决定立即向那里发去简短的指示信^②，（不经永定市，而经乡村）恢复联系，同时发出关于党组织工作的简短指示^③，向他们派去第 12 军的 700 名士兵。20 名同志目前还都留在原地，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一有可能，政委和无线电报务员应该前往江西。布林斯基^④根据那里的情况再等一等。到时 20 名同志中的一些人将前往江西。目前第 12 军的任务是：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对军阀进行防卫斗争，增加我们的力量（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斗争，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对党组织进行清洗，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信使^⑤在这里，他将立即前往那里。

4. 关于新苏区的问题：决定成立以下地区的党组织（某种类型的局）：在鄂赣豫边界地区领导农民运动：

（1）抚州、义宁、武宁（全都在赣西北），新沟咀、咸宁、通城（全都在鄂西南）和豫东北。这里有很强大的游击运动，在这里驻扎着第 16 军（2000 多人，第 7 师和第 9 师，各由两个团组成）和两个 [独立] 团（一个团在鄂赣边界，另一个在湘东北），每个独立团约有 700 人。这里有几个地区分配了土地。信使现在已从那里来到这里，他与两名同志为党委工作而来，日内就带着材料返回。该地区位于赣南和赣中苏区、第 1 军和贺龙地区之间。

① 原文如此。音译，可能是坎市。

②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任弼时。

⑤ 何人不知。可能是孔白。

这就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将责成该局成立苏维埃政府，组建新的部队（同时加强现有的部队）。

(2) 在复县^①、衡州府^②、河口^③、株州^④（全都在湘西）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书记^⑤走了）将由上海来的两名同志来加强，并将委托他们领导豫东的游击运动和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三人（书记^⑥和另两名同志）都在上海等信使的消息，一旦收到汉口关于信使抵达的消息，他们就出发。这里的运动跟赣北和鄂东南一样强劲。

(3) 在赣东南（赣江以西）现在有 20 军和 7 军。这里游击运动也很活跃。7 军约有 2000 人（不是像以前所说的 1000 人），20 军大约也有这么多人。这里也在组建党的领导机构。从上海派来一名同志，其余的将在本地（从 20 军和 7 军中）物色。这里的任务也跟上述两个地区一样。莫斯克文应在到达时建立起领导机构，一旦有必要，7 军和 20 军将在组织上合并，组成强大的战斗单位。

(4) 鲁南的兖州府和青州府地区（游击运动很强大）将由江苏省委通过徐州府党组织领导。在苏北——徐州、海州和邳州——我们有比较坚强的党组织，它们将能对运动产生影响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加以组织。已给省委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5) 对闽北和浙南地区正在进行考察（不久前 2000 名“土匪”袭击了福鼎等市，去年秋天我们的 13 军还在这里，后来被赶走了）。正在派两名同志去弄清工作条件和路线。此外，我们在上海还有同情做这项工作的同志，他很熟悉这里的人。

在恢复路线、得到派往那里的人的消息之后，还将从上海派去人员。

①②③④ 原文如此，音译。

⑤⑥ 何人不详。可能是孔白。

(6) 在上海以北 70 里的青浦（据报纸消息，有“赤匪活动”），将从上海派一名同志去了解当地情况，如果条件适宜，将在那里开展相应的工作。

(7) 根据我们对河南农民运动的建议^①，政治局决定委托河南省委在河南府^② 组建该区党的领导机构并领导运动（那里农民运动很强大），而郑州—开封地区由开封（省委）直接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编写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有我们的（土地、红军、苏维埃政府等）口号和要求。这本小册子将在农民中散发。为了同一目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准备出版所有法案。

5. 我们谈了 3 月 11 日给贺龙军团的指示^③。这项指示是正确的。为了加强自己的军队，建立巩固的后方，贺龙必须从长乐—鹤峰州东进，以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并与洞庭湖以北和西北的游击运动联合起来。梅塔洛夫^④ 接受了同样的委托。我们没有谈加强中央局的问题。这件事得由奥斯藤同向 [忠发] 谈。

6. 除指定派往第 1 军和第 10 军的以外，军人都已从上海出发。最后一批也将在日内动身。由于缺少教官，不要开办专门的军事学校。（莫斯科文建议，即将开办的党校的一半参加者应由去苏区的同志组成，同他们研究军事问题并增加研讨这个问题的课时数量。）我赞成这一建议。

7. 派工人去苏区的事情办得很不好。（除香港和广东去年底派出的约 50 名工人外）目前谁也没有动身前往。一些人拿到了去汉口的票和各 5 元钱，另一些人向党提出了许多条件，如由党给他们支付债务、保证家属的生活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清代河南曾设河南府，府治在洛阳，后习惯称洛阳为河南府。

③ 文件注明的日期是 1931 年 3 月 10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167—185 页）。

④ 夏曦。

莫斯克文认为，由于省委缺少联系（技术性的），它不应独立派遣工人。除了我们现有的途径外，不应通过别的途径派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达不了目的地。我们将经过这些中心派出负责同志并寄送材料。由于经费和信使不够，我们不可能专为工人开辟新的路线。我们应该物色可靠的工人，对他们进行短暂的政治培训，经现有的联络中心派他们去。至于1军，省委自己可以通过安徽派人。

给广州下达了两个月内给江西派50名工人的任务。

8. 收报机已从汉口发出。日内我们就派去无线电报务员^①和工程师^②。两个人已经有了，我们已经物色到了（几天前无线电工程师对我说，现在我们还没有为贺龙找到人）。无线电学校学员近日内将在南京开始学习。部分被关押者大概会获释。我们将利用他们继续进行学习。现在不可能通过福建给中央（苏）区运送收报机。我们没有其他途径。我已把同……的联系告诉莫斯克文。我们从未同这些无线电报务员建立过联系。4月3日克莱因斯^③将同无线电工程师谈谈。我们还将进行测试。

9. 关于[卡卢]金^④，也许他今天能碰见“麻子”^⑤。我们找到了他的亲属。他认识来自梅尔泽堡^⑥的托姆。他在这里没有见到过托姆。关于卡卢金的其他同事没有什么新情况。

10. 我们谈了共青团中央局的决议（关于破坏活动的决议^⑦）。我提请他们注意，关于有必要在敌军中做工作等决议谁也不需要。青年团没有在军队中做过具体工作。莫斯克文说，他知道这个决

①② 何人不详。

③ B. Л. 马雷舍夫。

④ 黄弟洪。

⑤ 何人不详。可能是孔白。

⑥ 莫斯科。

⑦ 文件没有找到。

议，他对这种老生常谈的事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青年从未做过军事工作，如果强迫他们去做，即使他们准备做，但也不会做好。

关于中央和省委军事部的破坏活动，莫斯克文没能提供具体数据资料。他说，政治局的决议正在根据我们的建议实施。但至今他们还未能为永州、宜昌和九江物色到合适的工作人员。工人已被派到军队中去了。

关于这项工作将进行专门的交谈。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51—5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393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的信

1931年4月5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政治委员会委员
副本送远东局
副本送东方书记处成员

注意到附上的远东局的非常重要的信^①，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 在威廉^②同志受远东局委托起草的远东局的信中，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③的信和东方书记处作为资料寄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案^④给予了评价和批评。我承认远东局有权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远东局硬说似乎这封信造成了土地问题的混乱，这是毫无根据的。硬说似乎不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中就是在东方书记处决议案中建议消灭农民所有制，这简直是诬蔑。远东局成员，特别是威廉同志很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而且也很了解东方

① 见第375号文件。

② П. А. 米夫。

③ 见第375页注①。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苏区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提纲》，两者都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于1930年10月13日批准（见第374页注②）。

书记处所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远东局在作了适当的说明之后，还坚持自己的见解，这只能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和东方部决议案的毫无根据的诬蔑。

(2) 远东局指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没有作具体指示，这也是不妥的。远东局成员，特别是威廉同志十分清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作了具体指示。没有任何必要在专门评论李立三错误的信中重复这些指示。

(3) 远东局认为给李立三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机会^①是很奇怪的。我认为远东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种指责是不合时宜的。李立三同志是被召唤来的，因此，给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全会承认自己错误的机会是很自然的。在共产国际中人人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远东局将来也可以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领导权授予政治委员会。

(4)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注意，在远东局信中提到的土地法案^②（基本上是从东方书记处决议案中抄录过来的^③）中，有两个提法可能助长在土地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依我看来，把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提法写进土地法是不对的。在苏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发生非常危险的右的曲解。而把没收富农〔土地〕的提法写进土地法也同样是不对的，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出现左的曲解。

(5) 在远东局的信中有许多不是工作上的意见，其中也有一些针对我的不是工作上的和不合时宜的意见。由于这些意见既没有工作内容也没有政治内容，我就不作答复了。

① 见第344、345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远东局只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过一个土地法案（见《中国问题》，莫斯科1931年第8—9期，第190—193页；《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第422—425页）。

③ 原文如此。

马季亚尔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7，第 115—11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3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30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4 月 5 日于莫斯科

听取：6. (1655) . —— 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国工会状况的通报。

决定：6. —— 备案待查。

[附件]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3. (1652) . —— 关于远东局的组成。

决定：3. —— 不反对远东局两名同志^① 返回。关于远东局的组成问题在下次会议上审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98，第 1、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 П. А. 米夫和 А. Ю. 盖利斯。见第 391 号文件。

395

雷里斯基同向忠发和陈绍禹 谈话记录

1931年4月7日于上海

秘密

向[忠发]和戈卢别夫^①的谈话

向[忠发]：4月5日星期日，中央交通局局长^②同志被捕。他是在进入工会大楼^③时被捕的。他随身带有：满洲监狱里的同志们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信、省委的信（内容还不清楚）、中央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信、1000墨西哥元、安徽省委的地址和中央工作人员领取工资的签名条。在他被捕后，警察还在楼里呆了一段时间，又扣押了来这里弄清各种问题的另外7名同志。这样被捕的有：全总负责同[工会]积极分子进行联系的同志、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保持联系的同志、中央交通局负责在失业者中间做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女党员。第一位同志是由于挑衅行为而被捕的。

奥斯藤^④问这种挑衅行为是什么，向[忠发]对此只能回答说，他们从……^⑤得到报告说，这是挑衅行为。

向[忠发]说，这位同志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

① 陈绍禹。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所在地。

④ H. A. 雷里斯基。

⑤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都是原有的。

深得信任。他曾是向〔忠发〕的私人秘书，并于1927年同他一道前往梅尔泽堡^①。他知道在几个机构工作的31名同志的地址，22名中央机关同志的地址、3名省委的同志、4名全总的同志和两名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同志的地址。

由于这些逮捕事件，我们决定改变（被捕者知道的）我们的所有住处。向省委事务部（书记处）主任^②下达了改变住址的指示。为了执行这项指示，他在旅馆召开了有知道同各地区的联系的同志、同省委委员保持联系的同志、负责同上海联系的工作人员和省委书记处领导人的兄弟参加的会议。同志们争论起来，吵吵嚷嚷，有人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并且引来了警察。

奥斯藤：如何解释，当有人被捕时，你们闹得如此张惶失措？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你们委任了你们并不信任的未经考察的和不可靠的同志担任重要工作。

向〔忠发〕：这第一位同志知道很多情况，可是他很软弱，而警察局里拷打得很厉害。因此，我们应当非常小心。

奥〔斯藤〕：你们应该学会如何组建同中央进行联络的机关。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负责联络的同志？这样的同志你们有多少？中央的同志为什么要在收钱时签名？你们拿这些签名条做什么？你们应该立即撤消交通局局长这一职务。不要给他们任何称号，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配秘书，这样一来必然使机关臃肿。取消收钱时签名的做法。党的经费应该这样使用，钱要按比例用在党的一切需要上。中央机关应该像多次给你们说过的那样来组建。这样做会更节省更安全。

向〔忠发〕：我们曾试图执行你们关于精简党的机构的指示，但至今没有结果。由于秘密状态造成联络机构臃肿，要做到这一

① 莫斯科。

② 何人详。

点很难。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我们将让您了解中央的联络机构图。

奥〔斯藤〕：我认为，你们应该精简自己的机构，其中的150人至少要减少75%。全部问题在于正确使用同志和恰当地分配工作。

向〔忠发〕：冯〔玉祥〕派了两名代表来同我们谈判，其中一人是我们过去的同志^①。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有何目的。莫斯克文^②今天将同我们过去的这位同志谈话。我们只知道冯〔玉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援助。他想经苏联去柏林。前国民军2师师长滕培绍^③现住上海，他也试图同我们建立联系。唐登^④师2团一名军官也在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想知道远东局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奥〔斯藤〕：请尽快把莫斯克文同冯〔玉祥〕的代表谈判的情况以及你们提到的其他人的目的告诉我们，那时我们才能向你们谈自己的看法。今天我要向你们提起我们的信^⑤的事，其中提到敌人加强了从内部对我们红军的破坏和瓦解活动。请特别小心谨慎。十分奇怪的是，敌人的所有这些代表都在同一时间要同我们取得联系。关于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不要达成任何协议和作出任何许诺！如果可能，要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但不要忘记，他们对我们来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盟友。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只是由于自己集团内部的冲突也许准备为我们效力。我们得到你们的通报后，再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Z向〔忠发〕：我们还得到消

① 何人不详。

② 周恩来。

③④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音译。

⑤ 文件没有找到。

息说，一些同志在同在京汉铁路附近被我军俘虏的左贺志^①将军的师的军官进行谈判；谈判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的。同志们要求为释放这名将军付 10 万墨西哥元。

奥斯藤：请给 1 军的同志们写信，让他们务必特别小心。他们应仔细看好这位将军，不要让他跑了。他们也不要杀掉他，这没有什么用。应该把他作为人质扣押起来。

向 [忠发]：我们已任命上海纺织工人佟秘松^②同志为河南 [省] 委书记。不久前他才被释放出狱，他整整坐了一年牢。这是一位很可靠的同志。

奥斯藤：被捕前他干过什么？他是什么时候获释的？他休息了没有？他是否有足够的政治素养？

向 [忠发] 和戈 [卢别夫]：他曾任支部书记。是在中国春节时获释的，但他还没有休假。他毕业于党务工作人员的短期训练班。

奥斯藤：在派他去工作之前，应该给他短期休假。这方面的费用应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我们帮助这位同志恢复健康要比以后 [为他治病] 花钱好。

关于近来罢工情况的通报

近来纺织工人的罢工带有自发性，参加这次罢工的有 24 家丝织厂的工人^③。当时我们只同四家工厂以及在那里工作的女工建立了联系。共青团员只同两名女工保持了联系。在女工举行罢工的一家丝织厂里，有由 12 名女工组成的姐妹社。我们还有一所为纺织工人公开开办的学校。在上述 7 名女工中有 4 人是党员。但她们都很软弱。他们没有执行区委的指示，没有出席被邀请参加

①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音译。

③ 罢工于 1931 年 4 月 1—3 日在上海举行。

的会议。以前党发给每个出席党的会议的工人1元钱。现在不再这样做了,因此纺织女工拒绝参加。在罢工时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做。罢工是自发的,持续时间很短,有几家工厂最多持续了3天。在一个企业里,罢工被国民党制止,其他厂的女工也自动复工。罢工者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有在一家800人的工厂,工人们得以提高了50%的工资。我们认为,罢工很快会再次发生,我们正在为此作准备。

奥斯藤: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预告罢工运动将会发生,特别是丝纺工业和丝织工业的罢工运动。你们自己没有一次谈起过此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多次指出过必须采取准备措施,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党善于在丝厂建立联系和开创基地,哪怕是脆弱的、不牢固的基地。但是罢工表明,我们在那里的阵地跟一月份的一样脆弱。

戈卢别夫:我们在组织方面是有成绩的,虽然不是丝厂。在英国电机厂我们有了由两名同志组成的新的支部;我们有一名同志在轮船公司工作。我们派了20名同志去各种工厂工作。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抵消右派的宣传,这些右派对工人说:“你们不要相信中央的职业宣传者和组织者。他们号召你们罢工并成立工会,你们听信了他们,然后他们就隐蔽起来,而你们则要遭受苦难:被处决或被关进监狱。”

一些工人乐意听信这类言论。因此,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同志到工人中间去,同他们一起劳动。但同志们不想在企业工作。迄今为止被派到工厂的同志都是在某个方面犯过错误的,现在当你派人去生产单位时,他也会把这看成是惩罚,并问:“我犯了什么错误?”

我们在电话公司职员中进行了成功的工作,我们在那里成立了三个有20名成员的红色工会基层支部。轮船公司的搬运工组成了十个工会小组,共有会员70人。

我们在[国际]租界有轨电车工人中的工作也进行得很好。我

们已着手成立兄弟会，举行各部门（车间）代表会议。我们影响的增大有下列事实为证：有轨电车工人金费泰^①同志日内将会出狱。工人为欢迎他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他们还为他和他的家属募集了资金，并要求公司行政管理部门接受他回到工作岗位。为了增加这种要求的分量，他们打算在金获释的那一天宣布罢工一天。

奥斯藤：这一切都很好，但有意思的是，是谁这么做的，只是我们的支部还是工人自己？

戈 [卢别夫]：不是支部，而是工人自己。我们还将扩大这一运动。我们想改组欢迎金的委员会^②，把它变成五一委员会。现在我们在筹备维护工人经济要求的运动。有轨电车公司管理处将在近日内提高票价。每次提高票价，工人就要求增加工资。最近一次增加工资是在中国春节之际。为避免造成似乎工人要求提薪太频繁的印象，我们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1）降低房租；（2）在上海全境免费乘坐有轨电车；（3）全年提供相应的特制服装；（4）取消罚金；（5）给在有轨电车上干满一年的工人一次性发放一个月工资（基本工资以外），给干满两年的发放两个月工资，等等。这些要求是与反对提高有轨电车运费的运动相联系的，运费提价将是加在工人阶级肩上的新负担。我们打算通过互助会和反帝同盟来组织反对提高运费的活动，并希望成立合法委员会。

奥斯藤：这一次可别像你们在丝厂工人罢工时那样忘记中国的苏区。伊思美洛夫^③对我说，在为罢工工人印制的任何一张传单上都只字未提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你们曾对我说过要动员 1000 名工人参加红军。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没有用。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音译。

② 文件缺最后一页。结尾部分是根据 1931 年 6 月中被上海警察抢走的文件副本补上的（见《中华民族》，上海 1931 年 9 月 9 日第 13 期第 2 卷，第 430—432 页）。

③ 张闻天。

戈 [卢别夫] 和向 [忠发]：没有进行任何动员。没有一个工厂派代表去红军那里。这像是招募工人，但进行得并不令人满意。招募来的是些骗子。他们中有四人拿了旅差费，但没有去苏区，而是骗走了钱就躲起来了。

奥斯藤：你们应该查明，这是些什么人，又是谁推荐他们来的。我们不能允许像招募人员参加红军这样重要的工作遭到破坏，并且使我们受骗。应该非常仔细地考查这项工作和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要给支部下达新的指示，但工作任务应当完成。这是党能不能给红军和苏区以支持的问题。我们将根据这项工作的结果来评价上海和其他组织的整个活动。

奥斯藤：你们考虑对布勃诺娃^①和克柳耶夫^②采取什么措施？

答：他们正要动身去苏区。

[奥斯藤]：他们花了6周时间等待去苏区的机会，这很不好。你们应该在这里利用这些同志，给他们提供工作，但是这种工作他们应可随时放下并即刻启程前往目的地。

你们应该写一份关于你们筹备五一节的简短报告。我已就这个问题同斯拉温^③和伊思美洛夫谈过了。我们提出了许多任务并把它们具体化了。这些任务执行得如何，请通知我们。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63—64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庄东晓。

② 潘家宸。

③ 李竹声。

39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1 年 4 月 13 日^① 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考虑到我关于修改我们 2 月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的若干条款的建议已被远东局拒绝^②，我想报告以下情况：

1. 关于工会工作问题，信中说，我们“为了揭露国民党和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不应拒绝让我们的工会会员参加周围的工会组织以及就其性质而言正在变成企业主组织的生产委员会”。

我局十分正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要的花招，给中国人提出了如何鼓励工人同这些花招作斗争的正确建议，然而我局未能把这条正确的路线合乎逻辑地贯彻到底。

毫无疑问，周围工会的领导机构同企业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一样，是由国民党委任的。工人未参与此事，因此我们党应该号召抵制这种情况，并以“红色工会”和由工人自己选出的生产委员会来对抗这种工会，不用等待企业主的任何许可。

如果国民党有时——这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工人的压力下还是不得不在个别企业进行选举，那么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同情者，以及红色工会会员应该在选举前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和企业主的政策。而一旦我们的同志或我们的同情者或

① 收信日期。

② 见第 375 号文件。

红色工会会员当选，那他们当然应该接受这种职务，但要〔发表〕明确的声明。当然不排除由党委托自己的某些党员来参加国民党成立的工会，但不应该是一些很有名的共产党员。不应为此目的利用那些在群众中已很有名的党员或红色工会会员。

2. 关于中共七大问题。

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党处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它应该进斗争、打退〔敌人〕两次全面进攻，在这个时候，为七大作任何准备都是不可能的。这会使党的大部分积极分子脱离实际工作，更加削弱党本来就很薄弱的动员力量。

因此，我不能同意认为党代会应在最近6个月内做好准备的意见，虽然召开党代会的理由听起来颇有说服力。

3. 关于威廉^①的问题。

我同意局里的看法，威廉留在这里是可能的和绝对必要的。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该向全局以及威廉下达指示，威廉由于自己的特殊地位，不应同任何一名中国同志会晤，当然谈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情况除外。

迄今为止，威廉有些滥用同中国人的会晤，他经常去进行本可以由局里其他成员进行而不会损害工作的会见。我们的过错是，使罗章龙得以在其有名的书^②中使用了你们非常熟悉的名字^③，他从这样一些人那里得到了信息，这些人在有徐锡根、陈郁、王克全、布雷利斯基^④和莫斯科文^⑤参加的会议上，以及有余飞参加的另一次会议上见到过这位同志。在我们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可能会走露消息，而不知道是怎样和为什么会走露的，因此，唯一的保

①③ И. А. 米夫。

② 见第633页注①。

④ 原文如此。应为布林斯基——任弼时。

⑤ 周恩来。

证是只出席有限数量的会议。威廉被捕对他本人和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无需向你们说明的。

4. 关于局里的意见分歧。

关于这一点在远东局的信中已两次谈到。这里说的是我在三中全会期间和全会后的立场。你们在收到远东局的这封信时，还会收到远东局2月22日的决议和我关于这一决议的信件^①。我觉得问题已提得很清楚了。

我同意远东局在给你们的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即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当然是如果这一方或那一方都不倾向于把这个问题扩大的话。

除了这些业已消除的意见分歧外，我同远东局在会议的武装保卫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近来所有被捕的同志都被杀害了或被判处死刑。被发现携带文件的同志很少被判监禁，这一点人们已经遗忘了。这种情况迫使中国人（通过托姆^②）向我局提出了武装保卫的问题。我们局（除我以外）都同意这样做。这种保卫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还很难说，但结果如何可以很容易设想。过去我们有过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1929年在波兰，当时波兰党在多姆斯基领导下借助武器进行自卫，防止被捕。如果说不该拿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同像波兰这样的“鸡窝”相比较，那么仍然可以说，这对党将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党的会议只能〔通过〕精心准备、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布置“纠察人员”来进行保卫，而布置纠察人员可以及时提醒至少是部分出席者躲藏起来，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销毁材料。武装保卫只会使同志们离开会场的机会复杂化。一方面，它将增加出席者的直接危险，而另一方面，可能助长党内的恐怖倾向。

^① 见第374、380号文件。

^② A. Ю. 盖利斯。

我还建议对信的第一点对你们接待李立三的问题、对四中全会问题和对罗伯特^①问题作出修改，但这些修改不是实质性的，因此我就不详细谈了。

致最美好的祝愿！

奥斯藤^②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92—95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② И. А. 雷利斯基。

3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第35号记录

(摘录)

1931年4月14—15日于莫斯科

听取：1. (89) .——**中国问题**。(关于中国形势与中共任务的决议案。) 报告人：黄平和马季亚尔。

决定：1. ——决议作为基础一致通过。将其交给由库西宁(负责人)、台尔曼、黄平、马季亚尔、牛曼、巴尔贝、布兰德勒、阿诺特、费奥多罗夫(金)、瓦西里耶夫、皮亚特尼茨基、库丘莫夫(秘书)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决议最后稿通过在莫斯科的主席团委员进行飞行表决加以批准。

[共产国际]各支部都应了解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责成政治委员会收集材料。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第1—2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398

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
中国问题会议^①上的讲话

1931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于1931年4月14—15日在W.皮克的主持下召开,目的是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作为会议材料散发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145,第1—9页)和一系列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文件:《[中国]土地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说明书(同上,第56—66页)、《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提纲》(同上,第71—82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草案》(同上,第98—107页)。在会议第一天即1931年4月14日,黄平作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他阐述了决议案本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7月)精神所持的基本论点,以及关于中共在苏区的地位、关于红军的行动等一些数据资料,这些资料重复了远东局工作人员的报告(见第372、375号文件)(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第7—67页)中所包括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A. H. 马季亚尔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的副报告(同上,第130—172页),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苏区党的建设和土地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说明平分土地口号的内容上。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1931年5月16日会议(见第403号文件)上重复了自己讲话的主要论点。此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4月14日会议上发言的有:郭绍棠(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第173—185页)、G. 牛曼(同上,第186—205页)、王伦(同上,第206—207页)。4月15日发言的有E. 台尔曼(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144a,第1—15页)、B. H. 库丘莫夫(同上,第38—52页)、C. C. 费奥多罗夫(同上,第59—63页)、E. 布兰德勒(同上,第64—73页)、B. 科拉罗夫(同上,第84—88页)、刘湘(刘少奇)(同上,第94—103页)、K. E. 约翰逊(同上,第104—113页)、李立三(同上,第115—126页)、O. B. 库西宁(同上,第127—151页)、B. A. 瓦西里耶夫(同上,第152—163页)、A. 巴尔贝(同上,第164—173页)、P. 阿诺特(同上,第174—179页);A. H. 马季亚尔(同上,第181—196页)和黄平(同上,第197—203页)作了总结讲话。鉴于速记记录篇幅很大,本汇编编者只收入了O. B. 库西宁的讲话,其中反映了会议期间所涉及的某些基本问题。

库西宁同志说：

讲话相当详细，某些问题在讨论时作了很好的说明，特别是在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时可能需要给予主要注意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这在德国同志的一些发言中作了极好的说明。我这方面不打算在这里作任何重复，这或许已经不用说了。我只想提请你们注意大体上更加详细地分析研究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真正新的教训。而这方面可能是迄今为止阐述得很不好的。对我们来说，在这里设法弄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恰恰是重要的。当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有其特殊性。像在俄国一样，正如列宁1917年就此所说的，这种革命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而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它自然也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何况是在中国。但要理解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并不那么容易。

布兰德勒同志说，现在我们应该学习说中国话^①。这确实是必要的。但这并非轻而易举。你们知道，在汉语中很多东西取决于音调。一个“季”可以用16种不同的方法发音。而每一次它都表示一个不同的东西。我们的各种政治概念也是一样。当用中文说“共产党”时，它所表示的意思与欧洲的完全不一样。每一次，当这里有人说（而关于这一点已经说了多年），中国党内工人只占5—6%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会感到惊奇。他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而这样的事实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中国的红军是跟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苏维埃也是完全不同的。富农也是另一种样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跟其他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我们在那里有苏区。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那里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那里的情形也跟欧洲标准所应有的完全不

^① 在E·布兰德勒的讲话中，指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

同。革命的发展是怎样和以一种什么样的顺序进行的呢？先是组成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然后在无产阶级内部成立共产主义先锋队，先是有一些个别的共产党员，然后是共产党，后来才有群众性的共产党，才开始成立工会。先锋队在农村开始工作，它与贫农建立联系。然后出现革命形势。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在这种夺权斗争之后——如果一切顺利，就转向建立苏维埃和组建红军。

但是，在中国我们见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顺序。先是个别共产党人组建红军支队，而这些支队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建立苏维埃的基础，后来开始——只是今天才开始——建立党的中心；然后着手组织贫农，最后才解决最重要的任务——发展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

牛曼同志注意到，如果我们孤立地去研究苏区和苏区内的运动，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只有依据中国革命第一浪潮^①的经验，才能把这种发展提到更高的阶段，他这样说是对的。无论如何，如果设想一下中国革命在苏区的这种发展，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如果革命将以共产党人为首、以红军为首、甚至带有苏维埃的萌芽，那么这种发展就意味着革命速度的加快。

苏维埃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么说来，一切看起来都跟我们最年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一样：这仿佛是奇迹。他甚至说这是魔法^②。让我们试试来揭示这一奇迹吧。这并不是奇迹，也并不是魔法，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沙文主义者在谈到具

^① G. 牛曼指出，只能把当前中国事态的发展理解为1925—1927年革命斗争的继续，并要特别强调1927年12月在苏维埃口号下举行的广州起义在这方面的意义。

^② 在会议最年长的参加者A. C. 马尔丁诺夫的简短讲话中，把红军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按欧洲标准看所起的异乎寻常的作用说成是“奇迹”和“魔法”。

有明显重大意义的红军时所说的，这似乎只是一些匪徒。不，红军恰恰是某种别的东西。这里已经有人指出，当红军占领长沙^①和另外两个城市时，它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但它并没有直接在那里组建。这种机会被错过了，在那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情况。这是否偶然呢？不。依我看来，红军的意义不仅在于，那里有固定的反革命阵线，而在于，即便那里没有这种反革命阵线，我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红军也具有与俄国革命或一般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军队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和相当重大的意义。我要作下面的对比：列宁在1917年（当时他还在瑞士并得到了关于二月革命的首批消息）寄给这里的信中提出的第一个具体建议是什么呢？建立无产阶级民兵^②！这是他特别强调的。正如他所说的，这种无产阶级民兵应当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和警察或国家制度与国家管理最重要的基本机构的职能合并于一身。考虑到资产阶级企图重新恢复警察，他希望这样做。这一构想在俄国革命中没有完全实现。但这并不是说，某种类似的东西不可能在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实现。我们知道，这在俄国是怎样发生的。过了一个时期建立了红军，除红军外还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安局、民警、苏维埃等。根据列宁最初的建议，无产阶级民兵所应成为的东西后来是由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机构来体现的。如果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提出苏区政权的问题，那么我认为，把它称为红军政权比苏维埃政权显然更正确一些。当然，苏维埃将会发展起来，现在就把政权叫作苏维埃政权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在现在就确定政权的基础，那我们就应该说，基础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基

① 指红军部队在1930年7月底占领长沙市。

② 指列宁的文章《远方来信、第三封来信、关于无产阶级民兵》，《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33—45页。

础是共产党、工会，然后是苏维埃，红军只是第四位。确立无产阶级国家领导权——这是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中国的条件下大概是最艰难的任务。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方式进行的。在中国出现了列宁在同加米涅夫的论战中称为纯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情况。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如若不是以共产党人为首，共产党人不作为这种专政的唯一领袖的形式存在，还能以怎样更加纯粹的形式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前进呢？除了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实现这一任务取决于什么呢？我想说，第一，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准备程度，第二，取决于它与贫苦农民联盟的牢固性。无论是第一项还是第二项任务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缺乏广泛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这不是小缺点，我认为，对这种缺点估计不足是左的错误。依我看来，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谈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不对的：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在没有广泛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苏维埃制度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在苏维埃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或者至少将为真正广泛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创造前提条件。由此就产生了列宁特别指出的任务：共产党人的工作，在苏维埃内部的革命工作。没有在苏维埃内部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解释工作，就不可能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苏区业已形成的这种局面下，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统一的苏维埃管理制度的任务乃是长期的和非常严肃的任务。马季亚尔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到，这里说的是5000年来没有任何管理的地区^①。我不知道，

^① 在 A. II. 马季亚尔的讲话中谈到传统的中国农村政权结构的不定形性，谈到苏维埃根据地是建立在长期没有中央政权严密控制的地区。

5000年前那里有什么。但如果那里在广阔地区内不存在任何管理是确实的话，那么我们的苏维埃就应该建立起管理制度来。不应设想这项任务是非常容易的。由于苏维埃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红军作为最重要的政权机构之一，可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重要政权机构，其作用将上升到首位。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和农民的专政，即两个阶级的专政。但当我们说红军应该成为两个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时，那么这就是说，红军就其成分而言，而不是就其领导而言是两个阶级的专政。就其领导而言，红军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否则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继续推进和转变革命的使命。由此产生了为红军培养无产阶级干部的重要任务。如果我们不特别突出这项任务，我们就会滑向机会主义道路。革命的性质在于，这是两个阶级的革命。它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政权的存在上；第二，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政策的明确方向上。至于政权的存在，那么两个阶级专政的性质恰恰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很脆弱。首先是这种无产阶级影响在某些地区很脆弱。两个阶级专政的性质如何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政策中表现出来呢？即便共产党人站在运动前头，客观情况也会迫使他们在这一时期执行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同的政策。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待贫农和中农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是对待富农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阶段上，我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农是不可避免的。中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得到加强。它甚至在数量上也将得到发展。在俄国革命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前，农村的中心人物还是贫农。但十月革命后过了一段时期，列宁确认，中心人物已经是中农。这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某种类似的东西也一定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出现。中农将由新的阶层来补充。来自红军的

王伦同志昨天说，我们平分土地的纲领对他们来说包含有何等重大的难题，因为部分农业工人将补充到中农队伍里来^①。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应当给农业工人土地。应当给少地的人土地。也要给红军战士土地。此外，中农将得到比在半封建制度条件下曾经有过的多得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这将使中农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产生新富农的某些倾向，甚至是很明显的倾向。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很大一部分现在的富农可能会消失。这是不能排除的。不过，中农队伍中出现新富农的倾向也是不能排除的。我们的政策将是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经常不断地同内部，而首先是农民内部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作斗争。你们应该记住——而在决议中我们显然也应该强调——这种平分土地的革命措施并不是我们的要求。列宁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强调，这是农民的要求，是贫农和中农的要求。他们通过这种要求追求什么目的呢？正如列宁说的，他们想要一种理想的资本主义，而我们不得不向农民作这样的让步。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由此产生的危险。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共产党手里自然要掌握同这种倾向作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它将拥有经济阵地，拥有没收来的企业、帝国主义者的企业以及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企业，它自己手里还将拥有水利灌溉系统，它将为贫农的利益，部分地也为中农的利益，但反对新富农的利益而实行一定的税收政策。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将有可能往后也执行正确的政策，但它应该清楚地想象到这种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克服资本主义倾向，首先是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而另一方面是采取措施来无条件地保护同中农的联盟，即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当然，没有实施这种农民政策的绝对保证。你们记得

^① 在王伦的讲话中谈到，在安徽省的一些红军活动地区由于土地不够，出现了红军战士和无地雇农分地的困难。

列宁1918年的著述。在第一次十月革命时期^①，我们一直依靠农民。但是，正是贫苦农民阶层的不开化、落后和愚昧无知促使他们起初在苏维埃内，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领导权交到了富农、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在苏区是否发生了某种类似的情况呢？要多少有多少！弱点恰恰就在这里。不是在所有的苏维埃内都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而贫苦农民又不很开化，他们仍然处在原来的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的职员等的影响之下。我们在这里听到许多证明我们犯了错误的例子。加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是自觉的政策。但这里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客观条件。当然，牛曼同志说得对，我们在中国不应该实行像在苏联所说的“没收富农财产”那种意义上的政策^②。（牛曼同志：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然而，我们的农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了与中农结盟的政策外，是采取旨在反对富农利益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的政策，是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因此，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天起，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两种倾向之间就开始不断进行斗争。我不想用引文来折磨你们，不过列宁的一段引文我还是应该给你们念一念，因为它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是他在1918年写的：“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

^① 原文如此。看来，O. B. 库西宁是指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政策的初期，即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夏天（在成立贫农委员会和开始同富农斗争之前）。

^② 在G. 牛曼的讲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农村政策应该是限制，但不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

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即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①

如果这是列宁在1918年刚好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时期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步经验写的，那么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由于关系更加落后，我们更应该强调这一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在理论上一般说来还很少深入研究。但是，我们恰恰应该避免这种抽象的理论研究。这里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必须注意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三种可能性。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政权将得到恢复，或者在曾有封建政权的地方将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但也可能像中国人向我们表明的那样，建立起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当然，第二种情况——两个政权并存——只能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持续长久。第一种情况，即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会打断

^① 见B. H.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306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但这当然不是说，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成熟的过程将被完全打断。而在现在我们在中国见到的第三种可能的情况下，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依我看来，我们应该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执行某种政策来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仅此而已。这是否可能是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执行的无产阶级政策呢？不，决不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政策已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这已经不是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这些任务是什么呢？打碎帝国主义枷锁、推翻封建制度、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发展和加强在经济上和数量上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然后满足个体农民必要的经济要求，即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管理、成立苏维埃、组建并加强红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些任务如果还没有彻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顺便去解决。但是主要任务将不一样。不只是在工业领域，而且在农业领域消灭资本主义；实现集体化、把农民吸引到集体经济中来、撤消夺取领导权的口号。领导权应该在夺取政权时就争取到了。口号应该是加强和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最终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都这样来谈论这些基本的革命任务，那么这自然是严重的简单化。那我们就不可能把一个阶段同另一个阶段区别开来。而这些原则性的区别是需要加以考虑的。

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右的和左的危险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左的危险是在执行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时对客观条件的困难估计不足。是对问题的提出采取主观主义态度，是对工人所处的客观困难和客观条件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基础的重要条件的忽视。

右的危险也在于对主观因素，特别是对共产党积极加速转变进程、根据客观条件克服这一进程的困难的作用估计不足。这就会恰恰在转变的速度问题上导致错误的客观主义和尾巴主义。出现要把整个转变进程推迟的想法。认为这是以后的事，这不是今天关系到我们的问题，这是将来的事。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实行的是为农民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的农民政策。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不是把问题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当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下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来提出的。两种倾向多半都只满足于作出评价。“左”倾分子这样估计形势，似乎转变的形势已经成熟，好像这个任务是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小事，而且完全可以越过这种转变。而右倾分子则根本不想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实际上两者都否认客观的转变过程，否认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的任务。当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间不存在万里长城——这一点必须强调。在共产党人处于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从第一天起他们的任务就是采取措施，尽快地促进革命的转变，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方面转变。（马丁诺夫同志插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前就应该有这样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着手建立共产党，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但我这里说的是在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时期摆在我们领导同志面前的任务，这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前提条件的任务，一方面是通过消灭陈旧的社会建制和社会障碍，而第二方面是通过创造新的前提来实现的。这两个组成部分自然是彼此紧密联系的。但是，当这些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即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时，这种转变表现在哪里呢？那时转变已准备好了，转变就可以或者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或者——如果政权在我们手里——通过把我们的政策转入新的轨道，转入无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来实现。我这里表达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没有机会同其他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想稍

许尖锐地提请注意，让同志们能在这里说出另一些意见，因为必须领会这个问题的意义，而我们大家都可能很容易在这里犯错误。

在阐明这个问题上起过突出作用的德国同志，在全会上提出了例如关于中国决议的建议^①。稍后，我同台尔曼和牛曼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一致意见，认为不能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将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直接取决于共产党能否在苏维埃运动的斗争中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真正领导权。换句话说，现在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谈论并且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如此紧密地同共产党的能力联系起来，而最好是同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一点置于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当然，如果共产党没有能力，事情不会成功，但是共产党不可能任意地主观地来做这件事。我完全不是想说，德国同志那里出现了某种倾向。你们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这是匆忙之中写成的，而德国同志自己也强调，可以提出修正。例如，牛曼同志在全会的发言中就说，我们在苏区的任务现在就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苏维埃革命的斗争^②。我认为，这一点必须接受；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夺取了政权或者领导着政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即进行争取转变的斗争，并且考虑到这一斗争的所有困难。

最后只谈两点意见。虽然我在这里就革命转变问题说了很多，然而我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但这一方面已经由其他同志在讨论过程中指出来了，这就是，革命转变实际过程的最重要方面看来在于把革命从现在的苏区至少扩展到中国的主要

① 指《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

② 指 G. 牛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上的讲话（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第 1 卷，《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危机》，第 487—489 页）。

地区，扩展到无产阶级工业中心。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涉及的地区还没有扩展得如此广阔，以至苏维埃运动一方面还没有直接到达无产阶级中心，而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要——还没有同苏联的无产阶级建立联系，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仍旧是非常弱小的。我没有必要再来详细谈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其他同志已经谈过了。我只是强调一点：正因为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这就出现了苏区和非苏区的苏维埃运动和革命的工人运动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相互联系。

在苏区新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最重要的话应该是什么呢？第一句应该是使全体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第二句应该是使广大农民阶层摆脱封建主义枷锁！这些话应该摆在政府纲领的显著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发动非苏区的劳动群众应该是主要目的。尽管苏区的劳动者已经摆脱了封建主义枷锁，但毕竟需要把这种解放和反帝斗争都提到首位，目的正是为了发动非苏区的农民。

第二点意见：中国是一个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存在着革命危机，甚至存在着深刻的革命危机的国家。这在实践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非苏区应该采取革命方针，它的意义当然与我们例如在欧洲国家采取的革命方针有所不同。由此得出我们现在就应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应该向共产国际及各支部在支持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一样。台尔曼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在非苏区基本任务是支持苏维埃革命，如果在那里采取全国革命的方针，那么这绝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十分周密地考虑中国这些地区的客观形势，不应十分严谨地利用符合客观条件的斗争方法。

这只能是群众运动。有时只是罢工、经济运动、失业者的运动等。但是，所有这些运动应该是为了直接发动群众开展全中国范围内的斗争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党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也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党现在已经摆脱了危机，这场危机一方面是由于李立三同志和其他同志犯了左倾错误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右派以绝对不能容许的方式为了自己派别的利益利用党内危机造成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全会上谈过。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十分严厉地批评像李立三这样的同志，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说，他也十分坦诚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当我们把我们犯错误的同志——我知道不犯错误的同志是很少的——评价为革命者、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时，什么是这种评价中的决定性因素呢？是他们对阶级敌人的态度，他们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第四，他们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右派在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上犯了最大的罪过。在这个问题上李立三同志没有犯那么严重的罪过。他因为有进行斗争的革命意志而高兴。他的过错在于他的政策导致了无产阶级脱离群众。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上也有过动摇。这是危险的方面。你们知道，在共产国际内曾经出现过十分危险的偏向，导致了背叛行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因素。至于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李立三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我认为，这是应该考虑到的。曾经站在右翼反对派一边的部分同志也公开地、无条件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了，而部分人有这样的特点，需要把它搞清楚——这就是东方人的外交手腕。（有人从座位上插话：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作出果断的决定！）依我看来，这是需要考虑的。

不过，在谈论我们犯错误的同志时，不允许对这些同志立即使用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词。我想让你们对下面这一点作好思想准备：马季亚尔同志有可能在这里给你们讲一讲托洛茨基最近给

自己的中国信徒们的一封公开信^①，此信是今天顺风给我们吹来的，它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首先是因为它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表明他同右倾叛徒勾结在一起。我不更详细地谈论这一点。但是，像今天这些托派破产者，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人们还没有遇见过。(牛曼同志从座位上插话：托派分子在其他国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破产！)

如果我不得不只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我看来，什么必须认为是中国的主要任务的话，那我会说，无论是在苏区还是非苏区，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革命运动。所有其他任务，无论是这方面的还是那方面的，都应从属于这个主要任务。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44a，第 127—151 页。

德文打字稿，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① 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判断，A. H. 马季亚尔在总结讲话中提到了托洛茨基《给中国左翼反对派(普林吉城，1931年1月8日)》的信，载《反对派通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巴黎1931年第19期，第27—30页。

3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信

1931 年 4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政治委员会

敬爱的同志们：

东方书记处认为在中华民国的新疆和甘肃两省提出开展革命工作和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组建人民革命党的问题是适时的，这是出于以下考虑：

这两省是拥有异族居民、由中国政府用通常的殖民掠夺和剥削手法进行管理的典型的殖民地。它们的多民族的构成和民族间敌意的存在便于中国人对这些省份的剥削和压迫，也是中国殖民当局稳固和强有力的条件，而这种民族间的敌意是受封建主义上层左右和支持的，他们利用了封建部族间现存的对抗状况，这种民族间的敌意也是由中国人人为地煽动起来的。

同时，新疆的特殊位置给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打上了烙印，并为燃料的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应当说，苏联占了新疆出口的 90%，进口的 80%。

极其残酷的封建和殖民剥削使该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危机。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经常出现粮食和燃料困难^①，特别是使劳动

^① 燃料困难是由于主要燃料是煤（文件原注）。

者受到打击，农民的状况不断恶化。

税收日益增多。近两年来赋税增加了1—2倍。在许多农村，赋税数额超过收入数额。不交税就遭致财产、建筑物和土地的被剥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实物贡赋，它们耗费15—20%的劳动时间，给农民的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

除了国家贡赋外，还存在各种封建和寺院的苛捐杂税。许多地方还保留了反映农奴制关系〔可汗、村老、白克（地主）等〕的劳役。

高利贷像密集的蛛网束缚着农民。兑换商和当铺把农民死死地禁锢在无法偿还的苛刻债务中，把他们推向贫困和一无所有的境地。债务奴役极为盛行。存在着公开的人口交易——将儿童和有劳动能力的少年在一个时期内或永远卖给地主、封建主、企业主及其他剥削分子。

对分制，即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使农民陷入饥饿和贫困。也触及到封建上层人士的危机致使他们靠更加疯狂地掠夺农民、无止境地增加实物和货币捐税来寻找出路。

同时，也产生了纯粹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富农的发展和加强上。富农购买破产封建主和赤贫化农民的土地，利用雇农的雇佣劳动和对分制佃农（破产的小农）的劳动来扩大生产规模。富农将农业生产与其他剥削活动形式结合在一起，其特点是十分贪婪。也可以看到大型资本主义式的种植业的发展，而在这种情况下，在封建主位置上或在他们身边出现了大商人、中国官吏和发了财的富农。

大量的农民贫困化或处于赤贫的边缘。无地的农民群众必然会饿死或者补充到城市流氓无产者队伍中来。

由于甘肃歉收造成的多年饥荒和新疆至今没有停止的局部饥荒给农民的生活状况带来了沉重打击。

现在在一些无组织的暴动中寻求出路的自发农民运动在发

展，这种暴动遭到极其残忍的恐怖性的镇压。封建—教权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运动和农民的不满，他们经常领导这一运动并将其引上封建反动势力的轨道，用来向中国人施加压力。这就便于他们靠农民、靠扩大自己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权利来创造同中国当局相勾结的条件。

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由1927和1929年两次起义浪潮^①所激起的甘肃回民运动，这次运动由于封建首领的叛变而被击败，这些封建首领找到了同国民党政府和为中国讨伐者开辟道路的人串通一气的途径。这次叛变付出了数万农民牺牲的代价。

新疆的农民运动是同甘肃的土地运动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甘肃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新疆的形势有直接的影响，激励和鼓舞了农民群众，引起了最为激烈的动荡，这种动荡越往后，中国当局将越难以对付。运动的成功只有它在甘肃和新疆同时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证，而一个省的孤立运动是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功并得到巩固的，这一点已为以前的整个历史阶段所证明。

同时，新疆近来成了英国人在中国当局积极协助下从事干涉活动的目标。我们的对手在加紧研究如何把新疆变成未来干涉时的反苏活动基地，同时为建立基层组织打下基础，而这些组织在武装干涉时期必然会发展成为在费尔干纳、谢米列奇耶和基米巴拉金斯克州进行游击活动的别动队，并为切断贸易联系、使新疆的原料基地脱离苏联准备条件。只有在城乡劳动群众中间开展革命工作才能抵抗这种干涉活动。

农民不满情绪的自发的没有组织的爆发表现为采取小规模

^① 详见：马强：《甘肃的回民运动》，载《中国问题》，莫斯科1929年第1期第380—402页；B. 维什尼亚科娃：《中国1929年的农民运动》，载《中国问题》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78—180页。

和很小规模的行动，往往导致血腥的镇压、革命的积极分子从肉体上被消灭和成千上万人的牺牲。运动不统一、存在民族对抗以及无组织性和分散性，一方面会削弱运动的力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也便于汉人将其按部分和地区各个击破，使运动不能向群众性和统一性方面发展，而这又会导致革命形势的削弱以及封建反动派和中国反革命派的胜利。同时，缺乏革命党和对运动的有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在新疆，常常会使无政府恐怖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把运动引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东方书记处认为，现在就着手在中国和蒙古兄弟党的帮助下在甘肃和新疆的农民和城市劳动者中间开展革命工作无疑是必要的和适当的，首先是建立革命组织，使它能**把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领导运动，使运动沿着同一切封建和殖民压迫者进行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发展**，建立群众性的人民革命党，从组织上给以加强，制止漫无目的的和削弱运动的冒险主义。

东方书记处充分估计到，在现阶段不是立即组织起义，而是在组织上形成运动，保证它的群众性和统一性。这当然不是说，近期内根本不能提出全面起义的问题，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能够调动新的革命后备力量，使大批革命群众投入战斗，帮助中国革命。

在新疆，除了内部政治性质的因素外，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到国际政治因素，特别是新疆在英苏关系中所占的地位。

在甘肃，由于那里存在着广泛的游击活动，党必须领导这一运动，扩大和加强这一运动，使矛盾和冲突更加激烈，把它引向不仅同中国的压迫作斗争，而且同本地的封建剥削者上层作斗争，使它同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正在组建的党可以围绕下列口号来动员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摆脱殖民压迫，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统一各族劳动者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交给农民，取消

苛捐杂税和实物贡赋，取消债务奴役，废除卖身债务和契约，没收封建主和投机商的余粮向居民提供广泛的粮食援助，提高雇工和工人的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组织城市雇佣工人工会。

东方书记处认为必须立即着手成立回族和维吾尔族人民革命党，并委托兄弟党在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中间开展革命工作。

首先应该在乌鲁木齐地区成立回族委员会，在喀什或伊犁地区成立维吾尔族委员会。为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并把人民革命党变成群众性的组织，这两个委员会必须立即着手发展基层网——城乡党的基层支部。在建立党组织时，注意到毫无法纪的状况，必须严格保守机密，在初期只吸收工农积极分子中经过考验的、忠诚的、充满革命热情并准备献出生命的同志参加基层支部。动员和培养当地革命的工农积极分子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革命党在这最初阶段的最重要的任务。

鉴于这些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在劳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和使运动具有群众性，人民革命党在初期的活动应该是既在工农劳动群众中，也在小资产阶级中做宣传鼓动工作，使之沿着争取民族独立、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作斗争、反对捐税和贡赋等方面发展。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决不应带有一般的抽象性质，它应该针对当地具体的压迫和剥削情况，反对具体的邪恶载体，应该包括直接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由个别到一般。

宣传各民族劳动者利益的共同性，宣传同其他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必须组织反对民族对抗和内讧的斗争，向劳动者说明封建主和中国行政当局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他们的利害关系，揭露封建上层挑起各民族劳动者之间的冲突的背叛行为和活动。

党还必须组织群众性的抗议、游行示威、罢工，提出群众性的要求，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农民和雇农群众吸引到这些运动中来，动员最广泛的劳动者阶层，在争取实现劳动者最迫切的要求

和利益的斗争中提高战斗精神和战斗热情，从而使他们对未来的革命战斗做好准备。

萨发罗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7，第 131—13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4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38号记录
(摘录)

1931年5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10. (1746) . —— 中国问题。

决定：10. —— (1) 允许中共中央派莫斯科文^①同志去苏区，期限为6—12个月。(但先应就这一点征求皮亚特尼茨基^②同志的意见。)

(2) 允许中共中央送斯特拉霍夫^③同志去莫斯科治病。

(3) 允许派陈郁同志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接受短期培训。

(4) 认为有必要派三名外国军政教官去苏区，一名教官去上海。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库西宁

全宗495，目录4，卷宗105，第4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周恩来。

② 见第404号文件。

③ 瞿秋白。

401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 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 《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报告 (摘录)

1931年5月7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① 如果要给中国的情况作一个总的评价，那么大体上可以这样来表述：南京政府正在走向彻底崩溃，陷入全面的政治危机，其必然结果将是南京政府被推翻。很自然，南京政府正在启动它所控制的一切制动器，以保住自己的位置，但这些制动器已越来越不为南京政府效劳。这一情况应该由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和关于该国革命斗争发展的有关资料来加以补充。对于南部和中部省份及苏维埃运动兴起的省份的工人运动，以及对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影响中心的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需要作稍许不同的评述。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有 10 多万工人就业的大工业中心，在江西北部和其他一系列像大冶这样的中国条件下的大工业中心，我们面对的是高度发展的工人运动，这一运动无论如何不比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落后，并且起着农民群众领导者和组织者

① 由于文件篇幅太长，发表时删去了文件的第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形势。报告的某些片断载入 П. А. 米夫 1931 年 5 月 31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国的革命危机》一文。亦见 П. А. 米夫《中国革命》，第 268—275 页。

的作用。最后，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工人参加苏维埃运动，但那里的工人是小企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农村苦力等，这对中国这些省份来说是很典型的。

我们在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这类工业中心看到的是另一种情景。那里的工人运动无疑在发展壮大，但工人运动的水平赶不上苏维埃运动兴起的那些省份的农民苏维埃运动的水平。在许多地区，我们没有看到争取政权的工人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运动落后了。它落后于苏维埃省份或苏维埃化的省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现在来谈一谈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

拿上海来说。去年10月那里有28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2.55万人。在这28次罢工中有15次以工人的胜利告终，7次以工人的失败结束，6次以妥协结束。一多半罢工是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一少半是以他们的失败告结束。11月有43起劳资纠纷。其中22起发展成为罢工斗争。参与这些纠纷的工人有3.3万，而其中有2.09万人参加了罢工。有13次罢工是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工人斗争胜利的比例稍大一些，但人数略有下降：10月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2.5万，而11月只有2万。

去年11月唐山矿工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7000人。这次罢工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以工人的胜利告终。11月的数字驳斥了李立三说工人不愿罢工的理论。如果说光是在上海一地没有一个月罢工者的数字是少于2.5万人的，那么这些数字就十分雄辩地驳斥了工人不愿罢工的理论。12月我们看到上海有46家企业的劳资之间发生纠纷，其中有一半甚至达到了罢工的程度。参加罢工的工人有46551人。一般地参与这一斗争的有4865人^①，但是，正如上面所说，参加罢工的工人是46551人。1月份

^① 原文如此。

上海发生了一系列大罢工。例如，又有 8000 名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在 11 月就在一个车间里开始了。它持续了一个半月，因为无以结束，于是其他工人作出决定在这个企业实行总罢工，以支持这个车间的罢工工人。在 8000 名工人罢工之后，企业主作出让步，罢工取得了胜利。顺便说一句，在这些要求当中，这 8000 名工人提出了工会自由的要求。在……^① 公司^② 和其他许多企业出现了 2000 名工人的罢工。这远不是 1 月份罢工的全面统计。在 2 月 17—25 日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春节活动有关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受到国民党的禁止。国民党在今年采取了诸如下令实行欧洲新年之类的措施，断然禁止庆祝中国春节。这首先是针对中国工人的，他们在这期间曾有几天放假的日子。这一措施首先打击了工人。但尽管有这种断然的禁令，尽管有上海警察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春节之际，上海还是有大约 6—6.5 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在 4 月的最初几天，在发生的最大几次罢工中，应该指出的是丝织工人的大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丝织工人有 2.5 万人，而丝织工人在 5 个月内举行了 4 次罢工。我们在上海看到了丝织工人接近于全面罢工的情景，如果说还不是总罢工的话。当他们在 1 月份举行罢工时，他们遭到了失败。资本家借口经济不景气把工资降低了 15%。3 月，丝织工人又开始明显活跃起来，这是由于根据中国的习俗，这个时期刚好与丝半成品加工的时期相吻合，总是经常有工人运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企业主所关心的是加快工作进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比较容易作出让步。如果工人要想得到让步，那这正好是对工人有利的时刻。

……但是，因为去年年底、秋天和冬天，工人的工资都减少了，又因为不仅由于工资减少了，而且还由于普遍条件恶化，实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

际工资大大减少，工人们产生了罢工的情绪，并且很快发展起来，到 4 月 1、2、3 日演变成为罢工斗争。罢工在一些企业持续了两天，在另一些企业持续了 3 天。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工人的罢工热情现在依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内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是什么样的呢？在 3 月份，政治局、上海工会联合会等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几次。在我们的党员同志中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小企业里有罢工行动，罢工运动有所活跃，但罢工只具有防御性质，只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

另一种观点说，我们不仅在小企业，而且在大企业也看到了罢工行动，虽然这些罢工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它们不仅具有防御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反攻性质。

其次，关于我们准备组织工人总罢工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辩论陷入了困境。我们应不应该利用有利形势提出准备组织工人总罢工的任务？问题就这么提出了。

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仅在小企业，而且在大企业都看到了罢工行动：就拿烟草工人的罢工来说吧，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8000 人；我们看到邮政工作人员举行了罢工，他们获得 10 元钱的加薪，并且保留了自己的工会；我们看到有轨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也获得 6 元钱的大幅加薪，等等。这一切证明，罢工浪潮不仅席卷了小企业，而且也席卷了中型企业和大企业。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这种罢工斗争不能界定为防御性的斗争。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工人转入反攻的事实，当时斗争的主动权还不完全属于工人，但当……进行斗争时，结果却是工人的胜利。关于领导。大家一致同意，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进行的。我们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领导这一运动。如果国民党能以社会保安局或某些黄色工会的名义领导罢工，即起到调和者的作用，那么在多

数情况下罢工会以工人的失败或者取得极其微小和无关紧要的成果而告终。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没有某种改进呢？近来有点儿改进，这是在党组织成功地转向实际工作，改变了工会运动方面的工作方法之后。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同志领导下进行的码头工人的罢工，我们看到了电话修理工人的组织得很好的罢工行动，这一行动演变成了罢工斗争，但它只是在拟定要求、组建红色小组、成立罢工筹备委员会等方面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看到了纺织企业的某些成果。在丝织工人罢工时，尽管党和上海工会做了工作，但还很不够，至少我们的组织在这次两万名丝织工人罢工时还不能应付裕如。尽管我们的口号和要求得到了工人的响应，但我们未能领导这次罢工斗争并使之取得胜利。现在党组织在加强那里的阵地，可能，在这个工业部门将来的罢工中，我们将会拥有更坚固的阵地。在多数情况下，罢工是完全自发发生的。这从丝织工人的罢工中可以看到。在一家企业的工厂大院召开了集会。提出了工人们表示支持的口号，之后他们立即都去了别的企业，在两小时内有两万名工人停止了工作。当然可以说，罢工者是同情我们的，但我们未从组织上去加强这次罢工行动，不管怎么说，我们想要掌握运动的尝试显得很不够，很不成功。

关于失业。在中国谁也没有统计过失业者人数，因此很难说有多少。1929年，据社会保安局统计，中国有工厂失业工人75219人。

1930年，根据日本的材料，上海有36万失业者，广州有14万，济南有16万，在南京的57万居民中，失业者有31万人。就是说这些人在登记注册时没有任何收入。因此，52%的南京居民没有收入。据日本的材料说，河南省有260万人没有任何工作。这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农民。但资料接着说，在260万人中有20万当了土匪，20万当了兵，大致同样多的人去了农村。但即使有这

些附带说明，毕竟有20^①万工人没有工作。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仍根据日本的同一资料说，失业人数达到15847万。如果考虑到饥荒和许多企业遭到破坏的情况，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如果考虑到各种失业形式，那我们会得出与这个数字相接近的数字。

党只是现在才着手组织失业者的运动。党在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带有打基础的性质。

关于党在罢工运动中的工作。党现在采取了以下方针：不再一般地谈论罢工斗争，而是积极参与组织这一斗争，领导具体的罢工行动，及时给予明确的指示。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党没有很好地制定出一个体现局部要求的纲领。那里还是旧的局部要求纲领在起作用在流行，这个纲领显然还是中共旧领导制定的，其中作为首要要求提出的是保卫苏区、支持红军等一系列局部要求。当然，在这一纲领中根本没有提工作日、工作服等问题，而只有明显的政治性要求。显然，要用这样的局部要求纲领去掌握上海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对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当党以工人群众的组织者和以贴近工人群众要求的代表者出现时，它就能很快掌握工人运动。我们在码头工人罢工时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些要求，码头工人就行动起来并取得了胜利。此后，其他船坞的工人都来询问：“是谁领导了你们，制定了要求？是谁实行了罢工？”同时他们还同我们的组织建立了联系。我们在其他罢工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我们党制定和提出了一些局部要求，这些要求反映了工人们的想法和愿望，在几天之内我们就成功地组建了300人的工会小组，成功地建立了罢工筹备委员会……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

^① 原文如此。应为200万。

都很清楚，电话修理工人将跟着红色阶级工会走。

关于利用合法机会。党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后来在准备各地的武装暴动过程中党放弃了对合法机会的利用。我们曾经有茶馆、阅览室、工人小组——这一切都给撤消了。有些地方，由于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把工人给赶跑了，例如，有过两所女工学校：它们只存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这些学校曾使女工们很感兴趣，但后来当建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女工在三八节或五一节参加街头游行示威时，她们吓得要死，就不再去学校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又开始做了。时机很有利。例如，组建了青年农民协会、女青少年工作团，该团只要有我们的一名同志^①深入进去，好好开展工作，便可以掌握 100 或 200 名女青少年工人。他们已经在开办附属青年农民协会的学校。我们的同志不知道存在救济五卅蒙难者协会这样的组织，该协会为 1925 年 5 月 30 日流血事件期间牺牲或受伤者家属提出救济要求。这个组织是合法存在的。谁也不能拿它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反帝的组织，对该组织的任何镇压行为都会是对国民党的揭露。这个组织存在着，经常提出要求，尤其是在筹备庆祝五一节时加紧了自己的活动。但我们甚至不打算利用这个组织，通过它来组织群众，并且利用它来为我们做工作。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情况很不好。成绩微不足道。实际上没有做系统的工作，而且应该说，我们对黄色工会的工作也存在不够明确之处。例如有这样的情况。在上海，黄色工会有 24 万会员。24 万这个数字不是夸大的。那里有形形色色的工会：有国民党组建的工会，有行会式的工会。例如海员工会，在那里很难开展工作，因为那里几乎没有群众集会。那里有承包人，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里可以开展实际工作。但群众性的集会却没有。这些承包人在行会会员失业时发放补贴，他们也收取相应

^① 何人不详。

的会费，享有一定的权威，要同这种权威作斗争是很难的，但毕竟可以斗一斗。我们党并没有打算同这些组织作斗争，把它们纳入国民党的组织之列。实际上，这多半是企业主类型的组织。但在上海有很大数量的海员，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我们的同志甚至不打算对它瞧上一眼，借口说，它似乎是国民党的组织。

接下来谈谈邮政工会的情况。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领导这个工会的几个人如果说不是国民党代理人的话，那也与国民党有联系。但斗争的逻辑使这些人不得不去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他们不得不违背国民党的要求同意邮政工作人员罢工，尽管国民党决定解散邮政工会，但他们反而给邮政工作人员争得了10元的加薪，并且保留了邮政工会。只有邮政工作人员能够提出这种口号，因为他们拥有罢工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是这一斗争中的先锋。国民党自然害怕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会，特别是在纺织企业。现在国民党打算把所有这些组织来个大换班，对这些工会进行改组，因为它感受到了来自这些工会的危险。不过，即使没有我们，这场斗争也在发展。

国民党在改组工会，上海将划分为10个有自己工会的地区，在工厂将成立所谓的工厂委员会，实质上这是调解劳资关系的委员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一半是企业主代表，一半是工人代表，当然，工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将是企业中的纯企业主的委员会。由于采取这种措施，我们在所谓合法工会运动方面的工作将会非常困难，因为国民党不允许在这10个区召开群众集会，开展群众工作将会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我们打入这些组织和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的尝试，何况这样的机会还是有的。党已经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尝试。英租界有轨电车工人举行了集会。我们的同志在这次黄色工会会员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的演讲受到了有轨电车工人的欢迎。于是领导这个组织的国民党人耍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花招。在管委会选举前，他们提议选我们的一名同志^①（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不敢反对这些要求。当然，如果我们在那里有支部、有很好制定的纲领、有联系等等，那我们在管委会里就会有即使不是六个人，至少也是三个人，这样就会改变这个工会的整个面貌。

这个事实说明我们是有机会的，但我们很少利用这些机会。如果我们想同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切实利用这些机会。

关于红色工会小组。实际上在上海有 600—800 名工会会员，不算海员；海员大约也有 500—600 人。其他主要是纺织工人和船坞工人。我们在兵工厂有两个小组，在冶金企业有一个小组。在所有这些工会组织中我们最多有 700—800 人。但我们有许多接近我们的兄弟组织和姐妹组织，它们都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并且处在形成红色工会小组的过程中。它们没有被估计在内，因为在可以有把握地把它们作为红色工会来谈论之前，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在上海已经建立了 23 个合法站点、茶馆、两个食堂、几个阅览室、夜校等。在两三个区开办了工人诊所，在那里找到了一名女共产党员医生和一名共产党员医生的妻子^②，后者同意开展相应的工作。

我们的前景十分良好，但我们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利用了这些前景。在 1928—1929 年期间建立的那些组织逐渐落后于时代了，这些组织由于当时的政治局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而遭到了彻底破坏，现在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进行重建工会的工作。

简单谈一谈党的建设。我们有许多怪事。例如：天津曾经有 40 名党员，其中只有一个产业支部——三四个人，其余的人甚至都不在基层组织里，都是些工作人员。他们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

①② 何人不详。

会、矿业工会、纺织工会中工作，虽然那里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会。

如果不算有其他收入的学生共产党员，那么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人员是有偿工作的，当然，所得报酬极少。我们在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况。在上海的产业支部中有360—400人，而如果把上海2月或3月的所有党员都算在一起，才有1000多人，而近400人进入了我们整个党的机关：党的机关、工会的机关、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机关等等。当然，机关很大，否则就很难进行工作。发行业务、联络业务、信使服务——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联系，因为地区很分散。这一切需要人们单独进行工作，以便相互间保守机密。这就加大了这些人的数量。拿上海来说：在产业支部有400人，在我们的所有党、工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共青团等的机关里大体上也有这么多人，还不算中央机关和各区机关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如果说在省委和各区委还开展了一些工作的话，那在基层组织里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没有进行党的教育，没有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我们在许多企业有产业支部，但那里我们没有工会小组，因为我们的基层支部没有给自己提出在那里建立工会小组的任务。我们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党员比工会会员多，如果把共青团员算在一起更是这样。需要基层支部在企业进行的许多工作没有进行。对所有问题的讨论都是绝对不能令人满意的。基层支部动员群众的工作非常不够。在这方面上海组织现在开始取得进展，而江西、香港和汉口的组织在调动我们的基层组织工作的积极性方面，暂时还只有上层组织能够转入这种实际工作，当然还做得很少，还不适应党所面临的任务。总之党内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工作条件很难苦。12月10日，我们的第二大印刷厂被捣毁，而我们参与报纸发行工作的共产党员印刷工人几乎全部被捕。这使我们党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第二天，在广州起义一周年并为此举行游行示威时，我们的6名同志在街头被捕。

过了两天，又有破坏事件^①。同一天，党的书记向^②被捕。12月20日，区委书记^③被捕，随后在香港有20人被捕，而在上海有一名从苏区带着邮件来的女信使^④被捕。她本应将随身携带的信吞掉。

1月。1月10日，即在四中全会后开始遭到破坏。这是遭到最大破坏的时期。1月底是我们党最艰难的时刻，此后党又开始加强和发展，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2月。2月10日，一家私人印刷厂被捣毁，我们曾在那里印刷过材料。2月18日在上海，我们的27名同志被捕。这是些接近右派集团的人。第二天还是在上海又有9人被捕。次日有5名积极分子被捕，而在香港有20人被捕。这一天所有联系都被切断，现正在非常缓慢地恢复。1月的10天和随后的一个时期是党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党不得不改变工作方式。从2月21日至3月10日，工作比较顺利。3月11日在上海有31人被捕，在奇江^⑤有30人被捕。3月18日有我们在安南军中进行工作的5名同志被捕。后来又有10人被捕。3月份可以认为是遭到了最大的破坏，虽然这些同志受到按中国条件来说不很严厉的判决——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以不同时期的监禁，不同于被捕后在多数情况下被枪决的做法。4月份我们又遭到一系列破坏，再次给机关某些环节的联系造成了某种混乱，但它们既没有触及中央和省委机关，也没有触及我们的基层组织——支部，而主要是打击了区里的工作人员。破坏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就是党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的情况。每次破坏对党意

① 以下删去了：12月17日无线电学校被捣毁。我只能通报报上已经公开、因而可以宣扬的事实。

②③④ 何人不知。

⑤ 原文如此。可能是九江。

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失去联系。几乎每一天我们都接到报告说，敌人发现了新的党组织。并不是因为这个组织崩溃了，它平静地存在着，在相当卓有成效地发展，但党的领导却不知道它。很清楚，如果区组织部或区委书记遭到破坏或被捕，那么相应的地址、联系也会同他（它）一起被破坏，而要过两个月甚至六个月我们的党和工会组织才能重新恢复这些联系。我们有一系列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查明，在江西省一些县的组织中存在着红色工会小组。例如，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拥有600人的组织，它在出色地开展工作和、巧妙地进行着联系。这不是一枚大头针，然而这600人党居然不知道。这是在江西省北部。这个组织不得不同鲁南的“红枪会”联系起来发挥某种作用。

干部状况很不好。非常不好，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群众运动发展非常迅速，简直没有足够的人力去掌握这一运动。各方面的需求都极大。唐山罢工有7000名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没有[应该]派到那里去的人，当然是能够领导这场斗争的人。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的人可派。我们在士兵暴动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事情就这么摆着，去收拾吧，但没有可以去的人。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据最新统计，近三个月来在上海逮捕了103名区的积极分子。就拿上海组织来说，那里有400名产业支部的成员和400名机关工作人员，150人住在城区，150人处于游动状态——来去不定。当三个月内103人接连不断地离开我们的队伍时，这当然是十分重大的损失。想靠工业中心开办学校来求发展的尝试没有成功。非常困难，非常艰难，闻所未闻的严酷条件，只有很小一点成功的可能性。靠工业中心开办学校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走什么路线呢？一方面，是增加在苏联培训干部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在苏区就地开办学校。但是，为此需要组建类似突击队的机构，向它们提出从中国同志中培养干部

的任务，以便把这些干部派往地方，让他们担负宣传工作的领导职责，如开办培养我们积极分子的党校和其他各类学校。

干部状况是灾难性的，无法用别的词来说明这种状况。它异乎寻常、闻所未闻地困难，人力极度匮乏。

关于托陈（取消）派说几句。可能大家都知道三四个月前托洛茨基写的信^①。他在信中建议在3月份遭受破坏后召开联席会议^②。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四派陈独秀分子。

第一派陈独秀分子认为，他们的队伍共计800人，分布在上海和北京两个点。

第二派——《我们的话》^③——有600多人（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第三派——《战斗》^④。第四派叫《十月》^⑤。同时，《十月》派就其人数而言是最少的，总共只有17人，但它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托派，谋求取得托派中的领导权。

在这次会议上顺便弄清了以下一点：陈独秀分子中发生了分裂。例如，陈独秀本人的得力助手彼得罗夫（彭述之）离开了陈独秀。就是这位彼得罗夫及其支持者反对同托派合并。彼得罗夫在这一点上是有理由的。陈独秀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同意合并的，而实际上，陈独秀的地位比所谓托派要强一些。他具有知识分子宗派主义倾向，显然，关于自己的人数他说了谎话。陈独秀近来进行了大量工作，他过分活跃得我们无法理解——他以各种

① 指几·托洛茨基给《中国左翼反对派（普林吉坡，1931年1月8日）》的信，载《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通报》，巴黎1931年第19期第27—30页。

② 中国托派联席会议于1931年5月1—3日在上海举行。

③ 指1929—1931年出版《我们的话》杂志的中国托派集团（见第163号文件注⑥）。

④ 指1930年出版唯一一期《战斗》杂志的中国托派集团。

⑤ 指1930年出版过两期《十月》杂志的中国托派集团。

借口发表不只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而且还有关于党的生活问题和我们党的问题的传单。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是处在我党的反对派地位。他建立了合法的站点，在上海有自己的茶馆，有自己的产业支部，虽然不大，但起初相当不错，他试图干预工人的经济斗争。简言之，他开始做我们党员长期没有做的事。他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因为他拥有某些干部。警察没有触动他，尽管它知道，在哪里出版他的机关报，在哪里印刷传单，知道他的茶馆在哪里，等等。可能，警察也知道在哪里举行会议。但没有触动他们，而在利用他们来分化瓦解共产党的队伍。陈独秀分子在利用对他们有利的警察条件，他们的工作在发展。这种工作由于他们发生分裂将会减少。彼得罗夫不仅是陈独秀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他的组织天才，是一位很有组织才能的人。这位具有特殊组织才能的人一旦脱离陈独秀，今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损失。他显然会处于孤独境地，因为他不会向我们共产党人靠拢，而会同他们一起破釜沉舟。或许最后他又会回到陈独秀那里，但他将徘徊一段时间，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陈独秀的势力。应该说，我们党没有同他们进行任何斗争，甚至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斗争。陈独秀出版了杂志^①，阐述了一些理论问题；没有文章对陈独秀的这个或那个论点提出反驳，哪怕是从理论上。应当承认，这场斗争无论在党内，也无论在这里都很软弱无力，这可能产生很不好的消极后果。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38，第 294、310—337 页。

打字稿，经过修订的速记记录。

^① 指《无产者》杂志，1930—1931年在上海出版。

402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

1931年5月7日于莫斯科

苏区和红军^①

正规红军大体是像苏联红军一样，根据同样的组织原则组建起来的，按最谨慎的统计，现在大约有10万人。如果把农民赤卫队，即所谓的农民自卫组织和农民游击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拥有武器）也算在内，那么主要在长江中游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一部分和福建等省以南的中国武装人员大约有50万人，而其中配备武器的约占一半。但是，正规军共计约10万人。外国报刊的最新资料指出，那里有10多万人。在南京同北方军阀的战争结束后的半年内，同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苏区——江西中央苏区、湘西北和鄂西南以及鄂豫皖边区的这10万部队作战的南京军队约有30个师。这50万反革命军队在同苏区红军的战斗中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战绩。没有一个事实说明，国民党军队在某个苏区给红军造成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失败。

而且，由于近半年来的战斗，红军大大增强了，这表现为它

^① 对苏维埃运动与中国红军的问题，A. Ю. 盖利斯在1931年6月10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进行了分析（见全宗533，目录2，卷宗324，第66—100页）。

在数量上增多了，技术装备基础增大了，获得了比以前更好和更多的武器装备。同时，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却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征兆，甚至比征兆更严重，即自己队伍的分化瓦解。

我在这里列举的仅仅是2、3月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下面就是2、3月份的重大情况。

在第1军地区内，国民党的第12师全部转到红军方面。还是在这一地区，从北方调来镇压红军的第33师举行了起义。同时该师的一部分转到了第1军方面，一部分去当了所谓的土匪，即流散到了农村。红军在该地区彻底歼灭了34师连同以师长、前第2军军长岳维峻为首的全部将领。四川部队的一个旅也转到了第1军方面，许多部队被解散。

在同一时期，在山东，本应从山东调到江西的一个旅也溃散了。国民党的指挥部落到了这种地步：在车站停留时不许士兵离开车厢，士兵被反锁在车厢内。指挥部担心，不然士兵就会跑掉。52师的一个旅转到了我们方面。在这个旅中有我们的一个强有力的支部。

这是一些最大的事例。至于士兵暴动、投诚、开小差等，这方面没有进行统计，但据报刊报道，在南京的军队中这种现象无疑具有相当广泛的规模。

所以，这50万人的南京军队在对红军的战斗中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战绩。

显然，所有这些投诚和起义使红军的武器，主要是弹药大大充实起来。在一些部队，即便是有两个师转过来的第1军，子弹状况也是非常紧张的，平均每个红军战士只有一发子弹。那里根本没有机枪，也没有大炮。而由于敌人的投诚，现在那里有了100多挺机枪、约10门大炮，尽管这些大炮还没有使用，另外，还获得了大量子弹。这是50万敌军不能取得战绩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国民党的指挥部不能抛弃可以用来动员国民党军队反对苏区、反

对红军的口号。国民党军队是由贫困化的农民、贫农、雇农和苦力充实起来的雇佣军，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谋求生存。由于南京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这支军队拿不到军饷。现在，除了将领们的卫队之外，没有一个师能够定期领取军饷。很清楚，对红军作战没有利害关系，战士就会分化瓦解。此外，较长时间在前线与红军对峙也必然会造成这些或那些国民党部队的分化瓦解。这也是因为红军在国民党部队中进行了很有效的政治工作。派去了宣传员，印制了传单。结果，这支军队就瓦解了。另一方面，红军是真正的农民革命军，有很有威望的无产阶级领导。在中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间流传的关于红军是土匪，没有任何苏维埃运动的种种流言蜚语，应当作为对红军的诬蔑，作为毫无用处的东西统统扔掉。这里有一些事实说明苏区居民是如何对待红军的。去年秋天，当提出占领江西第二大中心吉安的问题时，大约有10万农民，农民自卫组织和青年农民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他们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但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用手头上的东西武装自己。他们帮助红军占领了吉安。显然，如果没有这10万农民，那么红军就不可能占领吉安。这是一个事实。另一个例子。尽管我们的党组织在分配土地、苏维埃建设等方面开展政治和经济工作时犯了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错误，在1军地区内禁止贸易，在每个农村推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误，当大家知道粮食数量不多，大米很少时，便向农民提出他们应该提供大米的问题。农民在借贷条件下提供了大米——我们要在占领一座大城市后归还这些大米，还清债务。

第三个事实。由于敌人兵力对红军的优势，红军不得不从这个或那个地区撤走。这种情况在江西有，在贺龙辖区也部分地存在，全体老百姓都同撤走的红军部队一起撤离。这是去年12月份毛泽东歼灭第三师，击败南京军队第一次进攻时发生的事。所有老百姓都携儿带女和全部家当逃走了。当然这并不是正确的策略，

最好是老百姓留在原地进行斗争。但这个事实本身说明老百姓对红军的态度。

如果拿红军的组成人员来说，那么他们会提供另一些数字。大约80%的红军是由贫农组成的。有几个军，例如毛泽东的第16军和第8军，彭德怀的第3军，那里工人成分达到30%。在红军中，这样的部队的确很少。这些工人并不是产业工人，大都是汉口、长沙、南昌等城市的苦力、手工业者和工人。他们是这些地区的工业中心的工人。从南京军队中投诚过来的士兵也占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大致达到10—15%，在有些部队达到25%。

红军的内部状况。首先是关于红军内开小差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状况，除了（福建）第12军和三个主要老苏区的其他一些部队以外，在红军中没有也不曾有过开小差和暴动的情况。

没有过投敌的情况。如果说发生过个别人投靠敌军或开小差的情况，那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普遍现象。任何一支军队都有开小差的现象。中国红军中也同样有这种事。大约占组成人员的5—7%。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在任何一支军队中，这种开小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内在的原因。纪律问题。在此之前，红军所有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是由上海委任的。在这以前还没有过拒绝接受所委任的某个指挥员的情况。指挥员从上海一来到，就立即给他工作。这是独一无二的特征。也有另一种情况。第7军被认为是最差的一个军，它不够政治化。指挥该军的将军是中共党员^①。该军去年驻在广西边境时接到了李立三同志的指示，让它从广西转到广州，并在那里举行政变（这是在策划中国总暴动的时候）。该军大约有3000—4000士兵。数千人从广西省出发，进入了广东境内。但这时已是另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它让该军转向

^① 李明瑞。

湘赣方面。该军到达了那里，完成了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同时要接二连三地进行战斗。该军伤亡的人很多，它到达时已不是5000人，而是3000人，该军进行了极其艰难的行军。不过这说明，指挥部是如何对待党的指示的，红军战士是如何对待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自己指挥部的指示的。

红军的政治状况和政治机关。我们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政委和连政治指导员的设制、团以上政治部的〔设制〕和所有连队都设党支部——这是主要地区的情况，已坚定不移地进入了红军的生活和中国同志的实践。这是红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组织红军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组织如何运转。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失误，非常多的错误决定等。例如，就在那个1军，几个月前或者说大约半年前有这样一条规定占了支配地位：工人共产党员不能领导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即能写会说的人的事。这条规定已被取消。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情况，但在多数情况下，对政治工作的意义、对党组织和整个党的政策的意义基本上是理解的。

红军的指挥人员。在某个队伍产生时，在这个队伍发展的初期，指挥人员自然是从农民当中涌现出来的，老游击队员成为这些队伍的首领。在这些指挥员中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发展阶段，这些队伍的指挥人员当然会改变。这个过程大体上已经结束，但是，正在重新组建起来并加入红军的队伍，这个过程当然还在进行。今后会任命另一些人，任命更训练有素的人，一些毕业于莫斯科的军校的同志。现在可以认为，担任红军大部队领导的指挥人员大约50%是比较精通业务的军事工作人员。

至于营以下基层连队，那么这里的指挥人员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是一些自然涌现出来的农民、工人等。

军事干部的缺乏，很自然会对红军的作战行动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我们不善于对付空军。任何一个5、6架飞机的中队都能造成这样的灾难：战斗秩序被破坏，整个部队、整个团在遭到飞机轰炸扫射时会四处逃散。我们根本不会对付化学武器。现在正从山东调来骑兵部队，对当地同志来说，这又是一种崭新的武器。同志们也不会对付骑兵。

红军的胜利不是通过采取巧妙的策略或者通过制定正确的策略计划等来取得的。这些胜利是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是通过集中巨大的优势兵力取得的，而且我们的进攻常常带来很大的损失。只是靠大量的人力才能在重大战斗中取得胜利。

当地的同志说，从班长到军长的全体指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在老指挥人员中有党龄相当长的共产党员。例如，拿朱德来说，他是1924年入党的党员。其他许多同志，特别是在政治委员当中，都具有同样长的党龄，并且具有在不同地区从事相当重要的地下工作的经历。至于中下级指挥人员，他们只是近期入党的年轻共产党员。

应该说，党接收党员是很宽松的。当然，过去在苏联内战时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例如，当全师获悉布琼尼入党时，便聚集起来说：我们也要入党。常有集体入党的情况。但并没有特别宽松地吸收入党的情况。这是因为全体指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红军的指挥人员在外表上与红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据同志们说，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同国民党军队内的情况相比较的时候。指挥人员和指挥官跟红军战士一样不领军饷，而国民党军队里却存在差别很大的等级工资。红军指挥员拿用于所谓勤务开支的专款，但数额不大。指挥员跟战士吃一样的伙食。半年前贺龙军队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那里曾经有吸鸦片的现象，以前还曾用鸦片给红军战士支付军饷。曾有过因为一些细小的违反纪律的行为而枪毙红军战士的事情，有过打嘴巴的现象。但是现在，即便在日常生活方面名声很差的贺龙军队中，这种现象

也完全杜绝了。红军战士能得到食品，得到数目很小的军饷，大约是每月10分钱，够他抽烟的。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数目可能稍许少些或者稍许多些，但平均大体是10分钱。指挥员跟红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他同红军战士吃同样的伙食、处在同样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保证了多数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指挥人员之间的融洽关系。气氛是同志式的。

委员会主义。大约也是在半年或8到10个月以前，也是在毛泽东那里成立了红军士兵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存在期间对作战行动的领导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它们讨论作战命令是否合适，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是否适宜，等等。这些作战命令也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现在委员会主义没有了。党组织也不再讨论作战命令了。专门到那里去检查某些苏区工作的同志，以及从那里来的同志都谈到了这一点。

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那里一切都很好。这种印象当然是错误的，更何况红军的党组织一般都是不久前刚刚建立起来和开始发挥作用的，军队党组织本身的组成人员主要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大量缺点是很自然的。

这些缺点中最主要的缺点。

去年占领长沙时有过这样的情况。在长沙作战的只有一个第3军，但是当时在这个地区的还有第7军。实际上是3军占领了长沙，其他部队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占领长沙的3军是彭德怀指挥的，他是一位很勇敢的指挥员，一位武艺高超的刀剑手。他是前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团长。现在他是共产党员。他同自己的军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历。他指挥该军作战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没有制订共同的计划。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孤军奋战，而毛泽东却在看着。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没有协调行动。没有共同的有计划的指挥行动。

在今年2月攻打吉安时，只有20军一个军进攻吉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那里存在着党内分歧。20军军长^①想在这件事情上标新立异，标榜自己的行为，他想表明，他可以一个人去占领吉安并领导对吉安的进攻。而在吉安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资产阶级已经准备逃跑，带着行李做好了逃离的准备。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却一动不动。在同一个苏区，甚至在同一个军内，行动也不协调，直到最近还出现这种情况。

至于各独立苏区之间行动的不协调，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但这并不是指挥的过错。过错在于这些地区之间缺乏联系。

直到最近还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现象。7军、9军以及红军其他较小的部队都有这种情况，这些部队很长时间（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呆在一个地区，没有组织分配土地，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7军行军7000多公里，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起进行土地分配。

此外，有时还看到这样的情况：军队脱离群众工作。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党组织的优秀部分在红军中，最好的力量投入到了军队，如果红军的党组织在组织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等方面不去帮助地方党组织，那么这里错误和疏漏当然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所以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贺龙、邓中夏的军队中就有过这种事，邓是政治领导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土地问题等我们打败军阀后再提。没有同这一口号进行充分的斗争。显然，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鄂西的农民对贺龙的军队开始抱怀疑的态度，不甚友好。诚然，还没有发生敌对行为。

对红军、对所有红军部队的领导是由中央实行的。关于这一点以前谈过很多，但必须在这里强调这样一点，在四中全会前，中央对红军的工作很少给以关注。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央委

^① 刘铁超。

员会里李立三同志有收发报机。他把这些机器分发给天津、香港、汉口各地，却一台也不给苏区。上海的军事人员在10月份有100多人，这些人是毕业于军事学校、有专业技能的军事工作人员。这些军事人员都储存在那里，以便从上海组织暴动，他们在那里从事训练战斗队之类的工作或组织罢工（尽管连工会也没有）。不管怎么说，他们干的不是自己的事。而极需这些人的地方却没有把他们派去。常有这样的事，派到苏区去是作为一种惩罚：说什么你在苏维埃中国以外的地方工作有过错，那你就到苏区工作一段时间吧。有过这样的情况：从上海派了一名师长——托派分子^①，他在攻打长沙时表明自己是个坏人，因为他不执行作战命令，带着自己的师跑了。他被枪毙了。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历史上很成问题的党员^②被派到贺龙那里。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派他回上海，而且贺龙还托他捎带3万元钱去支援中央。他带着这些钱失踪了。应该说，送钱这个事实说明苏区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在中国，让一个将领给某地送钱，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相反，将领们只从事夺取钱财的活动。当我们的中央提出关于经费支援的问题时，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1军团和3军团，从贺龙军团和毛泽东军团那里得到了20万元，不是货币，而是银元。将来也可以指望这种支援。

大约在四中全会以前，虽然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央局的指示^③，但对苏区还是很少予以重视。借口是有一大堆困难，说什么由于有这些困难，不可能派中央委员到那里去，等等。可是又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竭尽全力在地方建立领导机构的热情。

不过近来，即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这次全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转折点）后，在主要地区，中央局已经建立起来了。例

①② 何人不详。

③ 见第373号文件。

如在江西、在第1军和贺龙那里都建立了中央局。那里还没有原来拟定的全数中央委员，但已有三四个人了，他们可以在当地实行领导。而且在像去年夏天的那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派人去。不能派人去苏区，不能发指示，因为当时还没有开通这些联络路线。不能从上海派人到苏区去是因为要冒风险，当时谁也不熟悉环境，不懂所要经过的那些省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上海和苏区之间游荡几个月，不会有任何好处。

四中全会后，中央不得不花费许多金钱和力量来建立联络线路。现在已经同各苏区建立起这样的联络线路。这种联系正在进行。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人派到苏区去，把我们的指示发到那里。要知道，过去曾存在过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局面，当时在一个苏区——贺龙那里——直到去年12月才讨论李立三7月11日的指示^①。只是过了五个月之后这项指示才到达那里。我们已经在声讨李立三了，而在那里他的指示还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加以贯彻执行^②。

应该说，所有这些左的和右的错误，甚至很难想象给它们作什么样的政治评价，这些错误是在当地犯下的，主要是因为工作人员建设新的生活，干新的事业，干很伟大的事业，却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而已经发出的指示，是7月11日发出的在政治上不正确的指示，它已经在各个苏区传开了。人们以为，已经到了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时候，于是到处都建立起来了。自由贸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0年6月11日。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见第177页注^①）。

^② 以下删去了：“上海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数量相当多。（米夫：只是没有特殊的需要。）很好，很好。但困难还是缺少足够的干部，困难在于缺少技术人员。到哪里去找我们需要的无线电报务员？需要我们自己培养。米夫同志通报了我们的无线电学校遭破坏的情况。这使无线电联系的建立推迟了三个月。而在我们还没有无线电联系之前，关于正确领导、关于对那里所发生的事件的及时反应就无从谈起。”

易被完全禁止。很少注重对苏维埃政权机关人员的挑选。结果是，一些地方农民离开了我们，就像第12军发生的情况一样，那里的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富农、旧官吏，乃至过去的地主都钻进了军队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他们甚至钻进了党的机构。从贺龙的声明^①中我们得知，在12月事变后，即在国民党反革命组织“反布什维克联盟”^②挑起的暴动^③之后，他把大约4000名异己分子——“AB团”的成员清除出了军队。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毛泽东不得不逮捕整个省委，枪毙许多人，因为“AB团”成员的名单落到了毛泽东手中。在这些人中有负责工作人员。

现在红军面临着什么样的任务呢？现在形势是这样的：关于组建特科、成立连党支部、任命政委的问题已不用再多谈了。问题只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下加强红军。这又涉及一些主要地区。问题是需要加强，需要设法在工业中心开展运动，以便派工人到红军那里去，增加薄弱地方的工人成分。只有香港在这个时期派了50名工人。至于上海，作出的这种尝试眼下还没有结果。这是一个应该加以推动，无论如何应该解决的问题，以便增加红军的无产阶级成分。在作战方面的任务是打退军阀的进攻^④。如果这次军阀进攻被击退，那么，关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建立连成一片的大苏区的问题就会变得十分迫切。完成这项任务对于苏区、对于红军来说不是力所不及的。解决这项任务的客观形势现在是最有利的。尽管军阀之间现在没有大战，但我们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有利的形势。国民党军队现在像一台破旧的拖拉机行将崩溃，要把这支军队掌握在手中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说毛泽东（见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卷，第105—107页）。

^{②④} 见第517页注^①。

^② 指1930年12月富田事变。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3—5月）。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些起义、投诚、暴动等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国民党自己现在在为维持军队而斗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现在，由于广州的政变^①，苏维埃运动在广东的处境在改善。这并不是一个省简单地脱离南京。由于发生这次政变，可以预料，我们将会看到新的事态发展，会使国民党制度进一步瓦解。

我们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总司令何应钦倾向于同广东的反蒋集团进行各种勾结。也有关于许多国民党政府部长是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私人朋友的消息。一个反对南京的大联合正在形成。我们得到消息说，同红军打过仗的第19军和第61师正在返回广州，因此，这些事态发展必然会削弱国民党军队，而我们同这支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胜利前景是很大的。

最后，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国民党没有任何打算，它甚至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哪怕是纸面上要在土地关系方面进行哪怕是最不怎么样的改革。国民党甚至没有打算解决土地危机或者哪怕是稍许缓和危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唯一政策就是杀头。这就是一切。仅此而已。确实，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在红军撤走和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个地区后，那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资产阶级报纸并没有夸大这件事（它们经常夸大红军的威力等），它们写道，鄂西地区仅仅一天之内就杀害了4000个农民。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把所有最活跃的居民斩尽杀绝的这种做法是有步骤地进行的。

农民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还从来没有过农民经济被破坏，华

^① 指陈济棠将军的部队于1931年4月28—29日占领广州，随后就占领了广东全省并于1931年5月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的新国民政府。详见：《国民会议与广州政变》，载《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7—8期（总第76—77期），第109—118页。

中的农民群众像现在这样贫困的情况。第1军从1930年9月的3000人发展到1931年5月的3.5万人，其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打败了敌军，而是因为湖南和安徽两省在最近的一次战争期间发生过军事行动，那里集结了北方军阀和南京的大量部队，这两个省遭到了掠夺，在清除这两省的军阀部队之后，那里就兴起了广泛的农民运动。第1军之所以得到发展就是因为兴起了农民运动。这也是国民党第13师和第34师如此迅速地转到红军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军队的这种状况和军阀之间的争斗为我们建立连成一片的大苏区的工作创造了再有利不过的局面。当然不用说，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红军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

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38，第338—361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原件。

4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中国委员会会议简略速记记录

1931年5月16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中国委员会会议 (简略速记记录)

库西宁同志主持。

出席：瓦西里耶夫、马季亚尔、别斯帕洛夫、费奥多罗夫、沃尔克、沃罗夫斯基^①、米夫、萨发罗夫、阿诺特、维兹涅尔、马祖特、费拉、拉祖莫娃等同志。

瓦西里耶夫：首先谈谈对文件^②结构的总的意见。第一，有许多重复。为了明确和更加扼要起见需要消除这些重复。第二，我对论断的实质有点疑问。主要的原则性问题——对中国革命的评述——挪到了最后，而把对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党的重大任务的表述放在了开头。依我看，应该从评述中国革命及其今后发展的趋势开始，然后再转向表述党的成绩和缺点及其任务。

现在谈谈对具体内容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关于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评述。这里本可以采用更确切的提法，即共产国际执委

① 黄平。

② 指《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草案，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修订后通过（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6—257页）。

会第十一次全会的提法^①。应该说，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我认为，说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近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红军并依靠红军建立巩固的苏区，扩大苏区并依靠苏区来动员非苏区的群众。对党的具体任务的这种提法不是十分明确。主要的弱点，即非苏区的党落后于苏区的运动，不见了。我曾经同库丘莫夫和沃尔克同志商定把这一点写进文件，但这里没有。由此可以得出加强党内、苏维埃政权机构和红军中无产阶级核心的任务。这是我们在十一次全会前提出的基本方针。

我们应该有区别地提出苏区和非苏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能笼统地说：你们都要无产阶级化！

除了关于组织问题的专门文件外，还应该把现在中国党在组织方面面临哪些最重要的工作环节写进这个文件。

在几个地方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在革命危机还没有笼罩中国的一些关键地区时，就不能说革命危机已经席卷全中国。我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不能把这种见解具体化吗？关键地区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上海和天津就不能说革命危机吗？或者相反，不要等到这些地区被危机笼罩，就可以说革命危机？这对中国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还有一个涉及工会国际的问题，即我们是如何提出非苏区的工会工作的。我认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如果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上，那它就能开展群众性的工会工作，加强红色工会。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使红色工会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宗派主义状态。

合法机会与非法机会相结合的问题，突破国民党专政的框框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修订后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草案（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5页）。

问题在这个文件中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是务必应该提出来的。库丘莫夫和沃尔克同志同意我的提法，但这里我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提法。

萨发罗夫：我从草案的土地部分说起。在库丘莫夫最初的草案中，有没收地主土地，把它交给贫雇农的提法。在这个草案的第 25 页上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表述。但这里应该说得更确切些。第一种提法不是偶然的。它指出了从未必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分地决定的某种危险性。在最初的草案中说，我们只夺取富农的部分土地，将它交给贫雇农。如果把富农出租的土地同似乎是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分开，而实际上这部分土地是他们积累的源泉，那么我深信，这就有点像是维护私人资本主义因素。我们应该着手处理最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农问题。而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只有在考虑到所有经济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之所以出现一些很不像话的事情，就是我们回避富农，没有触动富农。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单靠地主的土地我们是不能满足农村贫农和无产者的要求的。我们应该提出一种不致被曲解的方案。

与此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平均分配的问题。我们果真是说平均分配吗？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农夫揪住了我们的衣领，还是我们把平均分配看成是消灭封建剥削的最恰当的形式？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后一种考虑。在殖民主义条件下有理由认为，我们将主张平均分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旧的耕作方式和旧的土地分配方式的束缚，所有这些旧的界限都应该消除，不留下任何痕迹。我个人认为，应该明确修改第 24 页上的提法，这种提法说：“所有地主、资本家的土地”等……^①（念）。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不会对此引起任何怀疑的条款放在首位。说没收的土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地要通过苏维埃来分配。要直截了当和明确地说,农夫们在这么做,苏维埃在依靠群众这么做。我们认为平均分配是消灭封建土地残余和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的最根本的形式。要十分明确地提出这种见解。当谈到普遍平分土地时,要说最主要的是消灭旧的地产。把完全自愿甚至不自愿放在首位,但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并从这一点出发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提出平均分配的问题:平均分配有助于创造条件,消除旧的界限,并确立按劳动份额实行分配的基本准则。

还有一个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把农民使用过的现有的份地作为基础的问题。把自有土地和租用土地区别开来,减免它25%的国税——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应该明确规定,我们将给予什么样的土地。我们应该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关于平均分配的问题我们应该阐述得十分清楚。在这个决议中有这样的印迹:我们对不应做什么写得多,却很少写应该做什么,而应当写应该做什么。

这里应该包括指出不只是地主,而且还有其家庭成员都不能受奖励的内容。

在第2页上说“经常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农业危机”。我反对用“经常性”这个词,也不同意指出“特别是农业危机”。在殖民地,农业经济压倒一切,都要从这种农业经济出发来考虑。应当修改这种提法。

就在这一页上,还需要修改“国民党实行赤裸裸的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政策……”等的提法。应该在以下意义上提出另一种表述:要指出这种镇压的性质,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并指出它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它是靠什么来支撑的。

如果拿国民党的土地法^①同斯托雷平的法律^②作比较，那么斯托雷平的法律还是要进步一些，因为它尽管是富农的法律，但毕竟明确了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蒋介石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我们在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宣传时可以利用这一点。

第 3 页上有关于革命危机的说法。“革命危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转变为革命形势”的提法使我困惑不解。我不知道，这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十一次全会的决议。

“外国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念）。应该将这一论点同革命危机发展的前景联系起来。

第 4 页上：“稳定性和潜在能力……”（念）。“潜在能力”说得不恰当。这种表述更多地是哲学—历史性的。那里还说：“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我不反对这种提法。不过，这里应该重视库西宁同志就如何在中国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③时发表的意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影响，通过它在群众中赢得的威望来实现的，其次是通过红军，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这一点应该说一说。应该把无产阶级实行领导加以具体化。

第二部分第 6 页上说：“但中共极其无力从组织上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这种表述不能使我满意。实质不只是在这一点上，实质是缺少群众工作。有更多的潜在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里有在革命危机达到非常尖锐程度的形势下对群众工作估计不足的问题，同时应该使它成为主要推动力。

因为这一条有点从组织层面上提出问题，这使我感到困惑，因为李立三错误的问题与之很相近，使人得出一种印象，他的错误

① 见第 616 页注①。

② 1910 年 6 月 14 日关于修改和充实农民地产的若干决定的法律。圣彼得堡 1911 年。

③ 见第 398 号文件。

是纯组织性的错误。因此，这些错误的政治意义就有所忽略。

在第7、8页上对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作出了评估。多半是按时间顺序作出的。我主张，在按时间顺序作出评估时，应把整个这个时期的评估作为主要论点提出来。有过李立三的领导，这个领导干了一些蠢事，不得不加以改正，在改正的过程中又有新的错误。应该不仅从组织内部的〔角度〕，还应从政治角度作出这种评估。

应该非常具体非常明确地对右倾机会主义作出评述。

在第13页上谈到自我批评，应该非常具体地指出，这种自我批评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内涵是什么。

在第17页上谈到扩大反帝运动的必要性。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反帝运动。应该更明确地说出米夫同志在关于工人运动落后的报告^①中所说的内容。当我们说苏区的工人运动落后时，我们是指一定类型的以许多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运动。关于反帝运动这一条不仅应该从组织工作角度，而且还应该从帝国主义制度崩溃的角度提出。

在第20页上：“进一步扩大苏区……”（念）。我觉得，这一条需要稍加修改，使之面向已经开始发出火药味的战斗^②，使我们的阵地不致受到限制。

在第20页上说：“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应该直言不讳地如实地说。

在23页上：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通过苏维埃制度更有力地吸引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应该指出他们斗争的新内容。

在33页上：“在千方百计提高组织性的基础上……”（念）。这里应该说点儿别的话，应该加进某种实际含义，因为光作出许诺

① 见第401号文件。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3月—5月）。

是毫无意义的。

别斯帕洛夫：在 27 页第 28 条谈到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应该对使用童工实行限制的问题。因为这种提法在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中还有重复，并且这个问题对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我们决定提出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以下修改。党关于禁止使用童工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党一直在为这个口号而斗争。如果说我们一直在非苏区宣传这一口号并为这一口号而斗争，那么在苏区不禁止使用童工，至少在企业里不禁止使用童工那就会出现不协调。我们的建议如下。苏维埃政权应该在工业企业中按照实行 8 小时工作日的做法实行我们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关于对青年工人实行 6 小时和 4 小时工作日的纲领。至于中国的 8000 万手工业者，在那里未必能真正禁止使用童工，那么在初期，应该对这类企业提出限制使用童工的口号。

在 18 页第 20 条，我们请求作以下修改，米夫同志表示同意。（念这一条的修订稿。）

我不同意瓦西里耶夫同志关于合法主义和关于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意见。我觉得，瓦西里耶夫同志认为党和共青团开始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合法主义倾向的表现，这是夸大其词。

瓦西里耶夫：我说的是不正确的方针。

别斯帕洛夫：您谈了关于扫盲小组、食堂和茶馆，这些不是被用来争取工人群众，而只是为了慈善目的。有时还可以感觉到李立三不愿利用合法机会的方针。

瓦西里耶夫：你认为什么是利用合法机会：是利用国民党工会还是利用这些茶馆？

别斯巴洛夫：我们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必须打开通向工人的缺口，因此党应该开设这样的合法站点。不过，我们同时应该反对只是为了慈善目的而设立这些站点的倾向，因为这是典型的合法主义的表现。我们在这里提出关于建立合法站点的建议，是

因为我们曾遇到来自区委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纯粹的合法主义。他们害怕合法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反对可能出现的两种危险倾向：一方面，反对低估这项工作，而另一方面，反对合法主义倾向。要同李立三否定在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的意义的方针作斗争。在中国，问题跟在欧洲不一样，中国存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未受到国民党工会影响的工人阶级。反对国民党工会的斗争是决定性的。这很清楚，但是在中国，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除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工会的一项基本任务外，还有在内部进行的斗争、争取工人和应该有的基本的中心任务——这就是通过罢工领导工人的斗争，争取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等等。

瓦西里耶夫：如何做这些工作，是通过茶馆还是利用国民党工会的俱乐部？

别斯帕洛夫：我并不认为这些茶馆是把工人争取到党一边来的主要途径，主要的工作是罢工、是在企业的工作、是党的秘密工作。但这只是党在今年首次开始采用的手段之一。

瓦西里耶夫：是在完全忘却、忽视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的情况下采用的。

别斯帕洛夫：我并不否认忽视。

第9页上对党内右倾作了评述。关于左倾，决议主要是针对立三主义说的，但是关于错误，党内左倾表现在哪里，关于这一点决议中没有说，决议不知为什么缄口不谈。我觉得，必须对党内、工会内和共青团内的左倾作出评述。因为党刚刚开始领会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策略，因此，应该把右倾与左倾联系起来，并且表明，右倾与左倾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说的党内错误，就是这些右的和左的错误交织在一起。现在再次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与党内组织结构方面，主要是与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严重混乱现象有关的一点建议。在知识分子干部那里，存在着轻视组织工作、有时鄙视工厂工作、不理解这种工作、不善于建立支

部等问题，支部就像飞蛾一样，今天活着，明天就死去，由于委员会重叠，必须明确地说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要在一个部分里集中谈从组织上加强党的方法，何况党的组织状况由于犯错误而涣散了呢。

对工人运动的最后一点意见。在这个问题上，由于 [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如何评价工人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争论^①，需要比较详尽地指出，尤其要指出这样一些危险：一方面是同志们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明显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是上海某些同志表现出来的立即宣布在某个城市或者在整个工业部门实行总罢工的倾向。

沃尔克：关于瓦西里耶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应该提出展望。

瓦西里耶夫：我没有说展望，而是说方针。

沃尔克：关于三位一体的任务。应该说，党应该围绕三位一体的任务开展运动。中心任务是在苏维埃运动的基础上争取群众。

关于关键地区。这里应该区分两个情况。第一，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成了主要任务。当我们手中掌握了工业中心时，我们才可以这样说。另一个情况是，什么时候我们说，可以宣布全中国为苏维埃中国。当我们手中掌握了大部分疆土时，我们才可以这样说。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拥有统一的苏维埃国家时，这还不等于说，我们有了这种类型的国家，可以转向无产阶级专政了。

关于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样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质是，群众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向往，但只是没有相应的运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在企业里做群众工作。

现在谈关于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今天我察觉到了我们的观点与萨发罗夫同志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别。为了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必须实行普遍平均分配土地，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差别，差别

^① 见第 388 号文件。

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什么是自己的主要口号、自己的中心任务。我们的观点是：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没收地主土地，并具体实行，使这些土地转到农民手中。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在《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一章中说：“应该重新划定界限……”（念）。我们应该从我们现在还没有苏维埃中国这一点出发。苏维埃中国的全部实质在于，要发动非苏区的群众起来进行斗争，以自己的行动来进行自救。我们应该从苏区发生的事情在非苏区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响出发，如果在苏区我们把没收地主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作为中心任务，那么这将适合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而不会超越阶段。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从俄国的经验出发。我们俄国曾经有份地，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私有土地，那里私有意识要强得多。如果我们现在从上面打击私有意识，这不仅会在苏区，而且也会在非苏区引起反响。根据我们的方针，分地的问题要由群众来决定。

萨发罗夫：如果群众不想这么做，那就不应没收土地。

沃尔克：与此相关的有另外一条。我们有什么样的联盟？我们是拥有无产阶级与贫农的联盟还是无产阶级与贫农和中农的联盟？在这份草案中作出了正确的表述。这里说，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到群众，由群众来决定。因此谈到什么不应该做。也许，“从组织上加强”这个词不恰当，但如果你们拿整个草案来说，那么这里说的是群众工作，而不仅仅是从组织上加强。说的不是修改整个部分，而只是关于“从组织上加强”这个提法。

我同意萨发罗夫同志的意见，在第2、3条应该强调主要的东西，即我们群众工作的薄弱和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的必要性。

第三段说：“这种起阻碍作用的革命运动……”（念）。实质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群众运动中的弱点变得更加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强调指出，群众对我们很向往，而我们在这方面却很软弱，这种状况是特别危险的。这种表述应该稍加修改。

瓦西里耶夫：草案中完全没有关于贸易关系的问题。如何具体地理解贸易完全自由？那里说的是促进合作化。

萨发罗夫：那一点没有。

米夫：相反，甚至有很多。

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同志在这里发现了重复。重复是有的。但在讨论时应该注意到下面一点：同这个文件一起我们还要发去关于中国问题的下列文件。第一，土地法草案。

米夫：还有劳动法草案。还有一系列苏维埃法。

马季亚尔：这可以消除萨发罗夫同志对必须开展土地革命的某些疑虑。这里只提出了总的方针，而详细情况要在另一份专门的土地问题决议中谈到。必须提出更加详细经济决议，因为这里只能提出最基本的方针。此外，一定还要寄去一封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任务的信。在苏区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应该更详细地说一说。这里只指出，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实际上也将要解决。

关于三位一体的任务。第一，在这方面已经有文件，其中谈到三位一体的任务。这就是关于立三路线的信^①。

关于关键地区。瓦西里耶夫同志并不坚持要说得更确切些。完全有可能，中国革命将这样发展：上海作为相当关键的地区还将长时间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应当说，从中国的角度看，应该把无产阶级中心看作是关键地区。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工业中心，能有什么样的转变呢？谁也不想说，这将在所有工业中心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但是这种思想毕竟是决定性的。

关于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使我困惑不解。那里的条件很不好，党在寻找各种方法和可能，我们对此只应表示欢迎。

^① 见第 375 页注^①。

瓦西里耶夫：同时也忽视了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

马季亚尔：我要说，对中国的这些茶馆和食堂应该仔细地深入地进行研究。在所有东方国家，这些工作方式是重要和有意义的。就连工会在那里也不是像西方那样的群众性组织。这就是说，应该寻求某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工人中做工作。我们支持和欢迎这样做并不是要撤消在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的问题。但我不想说，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是中心任务。老实说，现在我并不具体地知道，我们是否摸索出了在国民党工会中做工作的具体方式。国民党并没有使我们更容易做这项工作，而是更难了，使之变得更复杂了。我们当然不应该撤消在国民党工会中工作的任务，但是如果中国同志问起，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我会老实说，我不知道。应该实地去看一看，应该研究这个问题。红色工会国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意见。

关于我们决议中的土地部分。我认为，将有一个单独的文件，我们将对其中的所有条款更详细地加以补充。我以为，现在没有必要对个别草案进行非常遥远的历史研究，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就具体决议交换意见。

对沃尔克同志的发言我想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沃尔克同志为什么没有援引关于中农的条款，那里十分确切而清楚地谈到，我们对中农应该怎么办，我们不应触及中农的私有土地。有一条是我们大家通过的，其中谈到甚至佃中农也应该得到好处，这一条大家都投票赞成，包括沃尔克同志在内。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事后又来相互批评。这样做不太好。在萨发罗夫同志援引的草案中没有谈到基本方针和群众的作用，没有谈到一切都应同群众一起来做。我觉得，如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能排除误会的表述，那就可以通过，但是对土地问题的详细阐述，我们应部分地在土地法中作出，部分地在土地问题文件中作出。在萨发罗夫同志的讲话中，我没有发现与我们的草案对立的任何东西。他建议

作出更明确的表述。这是必须办的。库西宁同志认为，应该指出我们对某些农民社团的态度。在土地问题文件中，可以对某些农民社团作出更详细的界定，并提出我们对待这些社团的方针。

关于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观点，已被奉为尊崇的对像，可谁也没有对这种观点进行过论证。谁也不支持这种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谁也不认为，这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形式。

关于富农。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关于富农土地的问题我们没有分歧意见。

沃尔克：那么如何夺取富农土地？

萨发罗夫：问题在于，怎样用五个面包喂饱5000人？

马季亚尔：据我的感觉，问题在于：我们只夺取富农土地的封建主义部分呢，还是夺取他的全部土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很明确。我并不知道，满洲的土地运动将会怎样进行，但我们还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在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土地革命的那些地区，对这个问题不应有任何怀疑，正如这里所说的，我们将夺取富农土地的封建主义部分。富农将得到份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没收他的土地，但我们也不会再给他什么。运动的规模要保证我们现在能够办这件事。我们不应提出不同阶段的问题，起先我们夺取这些土地的封建主义部分，然后再夺取资本主义部分。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很早就着手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就可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我们要指出这种危险。另一种危险则是我们延误时日，群众已经想要做，而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结果问题就会“按中国方式”来解决——那就是宰割富农。

关于贸易，在这个文件中好像有这个问题，而如果没有，那只是由于误解造成的。

米夫：有。

马季亚尔：不得不详细地专门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我基本上

是维护草案的。

沃罗夫斯基：我不明白第5页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那里说要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而这些多余土地要转入普遍分配，以利于贫雇农。在全会前东方书记处是没有这种方针的。有人说，富农只能得到份地，而且不是在好地上，而是在坏地上。这一点我比较能理解。如果说多余土地，那就会造成混乱，多余怎么理解，不多余又怎么理解？这里只是说没收地主、高利贷者、豪绅等的土地，而没有说没收富农土地。这里没有说，富农的土地要被没收，而只是说普遍分配土地。如果只没收地主的土地，那么这些土地不够，因为地主土地已经出租，由中农和贫农耕种。除了贫雇农之外，还应给红军战士分土地。从哪里去弄来这些土地呢？我的意见是，不得不从富农那里去弄土地。如果不触动富农，那么没有地方去弄到土地。

第二个问题关于工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这个问题很重要，迄今为止它还不够清楚。我不赞成说中心任务是在黄色工会中做工作。在红色工会与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的相互关系我不太清楚。也许，我是错误的，我主张取消红色工会，但我似乎觉得，没有我们参与工作也在发展。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多，但最终也没有想好。

与工会问题相联系还有茶馆、食堂等问题。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设立合法站点，可以在那里聚集工人，可以在那里同他们谈话。不过，瓦西里耶夫同志的担心也是有某种理由的。我看了关于香港组织工作的决议^①。起先那里谈到李立三的错误，谈到调和主义等。然后谈到，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两个月内派60名工人到红军那里去，两个月内安排60名同志到生产部门，两个月内成立40个辅助组织：茶馆、食堂、俱乐部和学校。后来又谈到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结果就像瓦西里耶夫同志所担心的那样。我们知道，香港存在着公开的同业公会和所谓的工会。那里共有 100 多个或者甚至 200 个工会。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会址。它们都有俱乐部，工人们经常到那里去。不应小看我们的辅助组织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开展我们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香港有 140 或 120 个海员工人宿舍，那里住着两万名失业海员。我们也应该在这些组织中开展工作。我们在成立自己的辅助组织时，应该利用已有的组织。

米夫：关于瓦西里耶夫同志对结构的意见。我提不出更好的建议。向主席团提交的草案在结构方面更差。关于革命转变的问题同最初的两个主要草案没有联系。这个草案在结构方面要好得多，各部分彼此都有联系，有总的线索。如果把基本评估和与此有关的革命转变问题挪到前面，然后再来谈任务，那就应当改变草案的名称。那样就成了关于中国革命任务和关于革命性质评估的草案。草案称之为《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因此这里没有提供危机的全面情况，更确切地说是各种危机等。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提出中国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那么所有其他东西我们只能大体上扼要地提出。因此，瓦西里耶夫同志的建议只有在改变整个决议性质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应该同意草案中提出的结构。

瓦西里耶夫同志对党的建设的意见。马季亚尔同志已经讲了制订一系列补充文件的必要性。在瓦西里耶夫同志的方案^①中，没有涉及许多很重要的问题：关于派别等的问题、关于那里存在的整个组织的混乱问题、关于一个个委员会重叠的问题等。在这一方案中简要地提到了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东西。“党的建设问题”……（念 12 页上的内容）。瓦西里耶夫同志建议的基本方面，

^① 文件没有找到。

甚至连同一些补充内容，都已纳入进去了，不过很简要。这就有必要写一封特别详细的信，党在组织建设，特别是苏区组织建设的问题上非常需要这样的信。

关于三位一体的任务。我不知道，以前在我们的文件中是否用过这个词。但基本任务已经提出来了，即组建和加强红军。不过在党的组织工作中有一些方面要求我们向党指出，有一系列其他任务，从表面上看这些任务的解决似乎与加强红军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与组建和加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向党说明，决定罢工问题、在国民党地区开展群众运动、组织士兵暴动、成立政府、组织群众斗争和苏维埃运动——所有这些任务，包括次要任务都是与组建和加强红军的中心任务相联系的。这里问题不在于“三位一体”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恰好提供了那种联系。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把基本任务同一系列党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和次要任务联系起来，从而加快了这项基本任务的解决。

关于萨发罗夫同志对富农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意见。如果萨发罗夫同志以书面形式、以比较完整的表述提出自己的建议的话，那就好了。起初我写了“坏田”，但库西宁同志建议改说“不是最好的田”，否则这可能被理解为河滩的坏田，并要开始把富农遣送到那里去。因此最好是说“不是最好的田”。这样也还会有人解释说，这不是坟地，而是某些砂石地或山地，他们正在把富农迁到那里去。

关于群众的参与问题，沃尔克同志和萨发罗夫同志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干一切事情都要经群众同意和在群众的参与下进行。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萨发罗夫同志所说的在草案中都提出来了，的确，怎样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领导权，说得有点零乱。也许，最好是把这些集中于一条。

关于反帝运动。有一条谈到反帝运动的薄弱，另一条谈到我们在罢工运动中的缺陷。我认为，提出的所有意见，包括萨发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在最后校订时可以加以考虑。

唯一难办的是中国的童工问题。我赞成关于使用童工问题宁可什么也不说，也比像这里建议的那样要好些，因为连国民党也在叫嚷禁止使用童工，但在这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如果我们明令禁止，就有可能引起工人和贫困家庭的抱怨，因为十来岁的工人得到的即使是极少的报酬，但毕竟他还是（给家里）提供了自己的一份。我个人主张删去这一条，现在不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既然我们不能说禁止，那就最好也不说限制，何况现在我们不可能提出普及教育的任务呢。我认为，这样的提法将对我们不利。

关于限制青年劳动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某个年龄为6小时，某个年龄为4小时。这最好在实践中加以区分，而我们现在不可能作死规定。也许可以这样说：在一定范围内限制，而在有利条件下则完全禁止。

关于国民党工会。瓦西里耶夫同志说，党轻视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但它也轻视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和自己的红色工会，因为在立三路线时期把作为独立组织的红色工会撤消了。现在党已担当起群众工作方面，特别是工业中心的工人中间的全部任务。我且不说一种工作是靠牺牲另一种工作来进行的，相反，一种工作会补充另一种工作。我不赞成说，现在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是主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条件下，即我们在进行改组，而黄色工会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时候。应当说，党现在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积极性的某些成果，例如在邮政工作人员和有轨电车工人那里。党已开始利用和实现现在在工人中存在的热情。我们同上海人力车夫的联系是很牢固的。在有组织的群众工会很少，因为国民党解散了许多黄色工会。在这种情况下，例如我们在丝织工人中的学校（我们在25家工厂有

6名共产党员)就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它们提供了同工人联系和谈话的机会。通过我们的合法站点,如小商贩,我们提出了散发书刊的任务。我们的合法站点开设得还很少,这只是工作的开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停下来。应该同这方面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但要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在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这会有助于我们同群众取得联系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还不得不很认真地审议一下这个决议,对它进行修订,重视大家提出的各种意见。然后,一定要寄去有关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等问题的专门信件。还需要简短而具体地谈谈工会工作。许多问题我们未能在这里涉及。如何在黄色工会中开展工作,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仔细研究。关于反帝斗争和反帝运动也一样。为贫民提出的一系列小小的民主要求原则上是对的,这种要求会使斗争更加尖锐化。例如,为什么外国孩子,而不是中国孩子要靠市政当局主要是从中国居民那里征收的捐税来学习?或者如我在报告中所谈到的支援五卅运动牺牲者协会^①。

萨发罗夫:一项具体的建议。关于中国农民被拴在自己的份地上和关于俄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的比较。我们俄国不存在像中国那样有千百万人被迫在整个土地上流浪的情况。列宁曾对有人说农民被拴在自己的地产上提出过异议。农民会起来反对封建所有制。

最后一点意见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不能提出一个总的口号,在许多地方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可能是不相同的。应当确切说明这个口号。所谓平均分配应该理解为把全部没收的土地交给农民支配,并根据这里阐述的原则进行分配。所有土地都要在我们认为有权得到土地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应该制定土地的法律准

^① 见第401号文件。

则。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平分土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这是革命进一步转变的基础。库西宁同志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表述^①。我们要通过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斗争来实现民主革命的成果，同时为使革命向最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创造最重要的条件。我的建议可以归结为，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谁可以得到土地，确立什么样的土地准则等。

瓦西里耶夫：我认为，在表述每一部分的任务时，一定要指出应该抓住的主要环节。否则，在中国同志那里可能搞成一锅粥，使我们面临的各项任务乱作一团。

至于三位一体的任务，米夫同志已经补充提出了第四项任务。我们说，应该从红军开始。如果这仍然有效，那就应该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包括组织结论。我坚持自己的建议，要把我写的组织任务提纲简要地补充进去。使它不至于分散到草案的各个部分，而要让它作为一个总的提纲增补进去，为党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针。

关于国民党和合法机会。我已说过，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对的，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组织上是错误的。我们提出的方针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极其重视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近来国民党工会具有了群众性，党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它们，利用这些机会可能是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党放弃了自己以往对国民党工会的实际立场，开始建立各种小组、食堂、小商店等。这是违背我们的指示的。国民党提出了改组自己工会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感觉到，并且十分现实地看到，它的工会正在变成它最危险的敌人，尽管我们党在那里工作得很糟糕。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我的具体建议是，让工会国际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在工

^① 见第398号文件。

会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仔细研究这个问题，而主要的方针应该是通过利用国内存在的各种合法机会以及国民党工会的主要合法机会，并通过在企业秘密建立工人群众代表的各种选举机构来冲破国民党专政的框框。

关于农民问题。萨发罗夫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所说的，我理解是对沃尔克同志就重新安排所有土地问题所宣读的意见的支持。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我们有些同志试图重新调整所有土地时，立即就出现了反革命活动。萨发罗夫同志说，所有土地都交给地方政权机构——苏维埃，由它们来分配所有土地，这是非常危险的，以致我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在决议中指出，这样的事是危险的。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方针。在应该是我们的方针和我们的意志体现的苏维埃政权法令中，一定要规定农民、贫农和中农对他们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权利。我认为，中心问题在于：土地问题要由农民群众自己来解决，而不要让两三个人、不要从上面通过法令来解决。要让当地群众自己来确定使用土地的具体形式，因为如果只是从上面通过法令来贯彻，那么这就可能成为反革命活动的起因。

信中提出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阿诺特：（译自英文）。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决议的形式。由于给中国党的专门信件中已阐述了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可以简短一些。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文件中的重复。

第二个问题涉及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涉及到它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帮助。在全会上似乎存在没有很好向共产国际各支部通报中国情况的问题。应该在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改进向各党通报中国革命情况特别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情况的问题。现在在工人阶级中间，中国1925—1927年革命时期的那种热情大大减弱了，因为解释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向工人群众通报中国实际发生的事也做得不好。我们党的机构在叙述不但是中国，而且还有

印度的工人运动时，总是以资产阶级报刊的新闻作为消息来源。只有在改进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的情况下，才能贯彻实施决议的最后一条：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帮助中国革命的任务。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富农。如果我们在这封信中作出准确的界定，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的富农，那就好了。没有这种界定，当地就可能把没收富农土地的做法错误地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库西宁：第一条意见是关于决议的结构。我们在决议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指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如果我们增加对总的形势的分析，那么决议的篇幅就会更长。我们何必要这样做呢？同我们在全会上和全会后已经说过的相比，我们能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呢？关于最后发展阶段我们可以补充点什么，但我认为，在评估局势方面我们不可能补充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制定关于任务的比较具体的决议。这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保持在或多或少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并且只限于阐述第一章所提到的基本任务。我认为，第一章所作的这些表述是正确的。

我们有两项主要任务：苏区的任务和非苏区的任务。这里使用了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个术语。我们从来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一个脱离苏维埃政权的机构。目前红军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比如在北京组建红军就不是主要任务。结果可能对非苏区的基本任务估计不足，而只是把组建和加强红军作为基本任务提出来。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不是苏区。在那里开展运动就是指在非苏区进行革命的方针。这项任务较之组建红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苏区党的建设从瓦西里耶夫同志的建议中可以吸取的只是基本意思，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应该非常简要地来表述这一点，我们不能在这个文件中对此作长篇大论。依我看，绝对有必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单独的决议或单独的指示。但是，在这里可以用几句话指出主要的东西。

关于瓦西里耶夫同志所说的关键地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十分确切的用语。一切都将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这是个很好的用语。但瓦西里耶夫同志没有作出区分。这里说的是发展革命危机，革命危机在全中国已经存在，而革命形势却还没有。关键地区这一概念涉及第31条，我觉得，瓦西里耶夫同志并没有十分准确地理解这句话。这里说的是从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有在中国的关键地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情况下才会变成中心任务。当我们谈论由两个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成了中心任务，这里我们并不是指革命转变。革命转变是一个在那里已经开始的过程，而过渡则是转变的最后阶段，这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草案中说得很清楚，革命转变现在已经是党的任务。如果这还不十分清楚，那我们就要想出一个更加清楚的表述方法。但这仅仅是更加确切表述的问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工会问题。我感到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但重要的是说明局势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两个月前有位同志^①来到共产国际，他说，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而现在另一位同志^②来到这里说，工作已经在进行。我们得到了更加准确和涉及较近时期的信息。全部问题在于，如何按中国方式来办事。至于瓦西里耶夫同志的提法：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是中心任务（瓦西里耶夫：只是在工会方面。）……这里有某些欧化的东西。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情况大概不完全是这样。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能给中国同志提出什么样的更具体

① Г. 埃斯勒。

② П. А. 米夫。

更实际的建议，我还不清楚。第14页上问题的基本提法我觉得很好。在瓦西里耶夫同志那里，主要的一点是，严重危险是对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估计不足。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后来这个思想还有所发展。但这里提出的是比较一般的建议。我认为，应该同红色工会国际的同志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谈一谈，我想，我们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具体的。这方面的每一个具体的、正确的和实际的建议对我们都是很有好处的。

萨发罗夫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我觉得，应该请他以书面形式提出来，因为很难把所有的意见都记住。在这些意见中有些是很有裨益的。我相信，萨发罗夫同志不想这样提出问题，在特别强调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时，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列宁主义口号是我们这里的主要口号。萨发罗夫同志没有这样看问题。因此，我觉得，从非苏区反响的角度来说，应该比现在这个决议更加明确地强调这个问题。分配土地——这的确是主要的，这是使农民群众摆脱封建主，摆脱地主，消灭地主这个阶级，消灭封建主，使农民群众摆脱地租、捐税，或至少大部分捐税。我有意强调摆脱，是因为正如同志们所了解的，中国不是一个存在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地主的国家，可以指望通过没收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这里的工作重心在于使农民摆脱封建主，因为租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半封建形式，是封建残余。农民可以从这种形式中解脱出来，可以从租赁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着重强调的第一点，因为这主要是使非苏区的农民革命化。第二点是实行平均分配。萨发罗夫同志在这里作出保证，他提醒不要以他强调什么来错误理解他的意思，这项工作应该根据当地农民群众的意愿，通过苏维埃民主程序来进行，而不是从上面通过命令来进行。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要求平均分配是我们作出的让步。萨发罗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说，这是消灭经济关系方面的封建主义的最根本的办法，但这不仅开辟

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也开辟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既开辟了这条道路，也开辟了那条道路。我们作出这种让步是因为存在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有可能，而这种可能如果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当我们能直接把农民引向建立集体农庄时，我们就会这样做。而在中国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向农民群众作出这种让步，但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不是只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可能是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即导致在农民中出现新富农，甚至在中农那里也出现资本主义倾向。需要指出这一点，以使中国同志不致这样理解，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方法，甚至更多。萨发罗夫同志当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依我看，完全有必要就土地问题作出单独的决议。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富农的定义。我们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富农的基本特征，可以对这个问题作某种澄清，但这至少需要整整一页篇幅。现在的这种兼有半封建特征和高利贷者性质的富农不同于新型的富农，新型富农很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产生出来。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富农。第三种类型是满洲的富农。正因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中国跟富农作斗争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此，这也迫使我们要对中国富农提出比我们迄今为止提出的更加明确的定义。从使欧洲工人、波兰等国工人更多地了解这个决议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他们不完全了解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将可以给他们看我们专门就这个问题制定的单独决议。萨发罗夫同志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有些分散，应该并为一条，这是对的。

同志们，关于具体发展道路、关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关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你们是否认为这里已经说够了？这里还应该指出苏维埃政权发展中的困难。

或许应该增加关于革命转变方面的两种倾向的一小段：一方面是想超越横在这条道路上的客观困难的主观主义；而另一方面是尾巴主义，对党在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不应对这

个问题作长篇大论，但如果最后我们用简短的一段来表述，那么这会是有利的。

我觉得，同志们毕竟还是成功地制定了基本上比较令人满意的草案，现在可否提出一个具体问题，请同志们作出自己最后的修改。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草案再拖延几周，那么实际上这并没有多大意义。一周内未必能使这个草案最后修订好。然后还要集中力量制定关于苏区党的建议、关于土地问题和关于工会的一些补充决议。

（沃尔克：还有经济决议。）

（瓦西里耶夫：关于贸易问题一定要说。）

米夫：还有童工问题。

别斯帕洛夫：在苏区可以禁止使用童工。至于手工业者，那么我倾向于米夫同志对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提法。

库西宁：这就是中国局势特殊性的一个例子。在苏区未必会因此就闹起来。大概不得不对家长们作出随机应变的让步，但是要对此保持沉默毕竟是很困难的。

瓦西里耶夫：我认为，最好还是现在就撤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提出这一要求，那么党该怎么办？要么它可能在工人阶级的反对下强行实施，要么对此保持沉默。因此，我建议现在不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得回答所有问题呢？例如，可不可以从这个草案中去掉现在我们不能作出具体补充指示的所有东西，包括关于共青团？我觉得，对于共青团可以只说一句话，必须坚决反对李立三在共青团问题上的一切曲解，并大力支持共青团。不需要别斯帕洛夫同志在这里所宣读的整个一段。我有这样一条建议：在校订时最大限度地删减所有一般性的，即可以按程序列入决议的段落——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以及所有这类东西。关于所有具体问题都写信。

库西宁：关于苏区的童工。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宣传主张消灭

童工？

瓦西里耶夫：不，不能。

马季亚尔：我建议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同青年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聚集在一起，力求这样来解决问题，既不要让孩子们受苦，也不使革命受到损失。

别斯帕洛夫：我觉得，持反对意见是不对的，因为工人将反对禁止使用童工。我知道，在斗争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口号。

瓦西里耶夫：口号是提出来过，但在实践中结果如何呢？

别斯帕洛夫：在苏区不反对使用童工，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

米夫：可以说：最大限度和有步骤地限制使用童工。

别斯帕洛夫：在工业企业中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童工。

瓦西里耶夫：14 岁以下不可能。

别斯帕洛夫：你们想想在我们俄国，什么时候提出这一要求而工人没有反对过？

库西宁：到处都有工人反对劳工法。

瓦西里耶夫：这里说的不是纲领，因为纲领已经制定了。有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有共产国际的纲领，在那里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这里说的是我们的中国同志考虑到中国条件的所有特点，实际上怎样贯彻纲领的这一条。中国 14 岁的女工已经有几年的工龄，有了孩子。现在怎么能让她们脱离工作岗位，或者不让她们去上班呢？她们已经是夫之妇。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马祖特：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别斯帕洛夫同志的意见。应该注意到苏区对整个中国乃至整个殖民地东方的意义。我们的法令将对所有的非苏区和整个殖民地东方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认为，在童工问题上，尽管在落后的工人群众队伍中可能会有反对意见，但现在不可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我们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人。因此，在考虑到种种困难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这样做。

米夫：我认为应该接受马季亚尔同志的建议：就这个问题同

青年共产国际的同志进行磋商。

别斯帕洛夫：关于共青团的总的条款也应该接受。

米夫：我也认为应该接受。

库西宁：委托米夫和马季亚尔同志就童工问题同青年共产国际进行磋商，并请他们在 24 小时内提出自己的意见。

至于工会问题，那就把材料交给洛佐夫斯基、格哈德^①、牛曼和利相斯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请同志们在 3 天内提出自己的意见。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53，第 15—5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40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141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5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6.（1776）.—中国问题。

决定：6. —（1）不反对派安德烈^①同志作为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

（2）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莫斯科文^②同志去中央苏区一事通知中共中央，如中央认为派莫斯科文同志去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又确定他在苏区逗留的期限在 6 至 12 个月之内，那么政治委员会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3）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让中共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③返回中国。

（4）不反对派沃罗洛夫斯基^④同志去上海中央组织部和海员工会工作。不过应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留在莫斯科，因此，要求把斯特拉霍夫^⑤同志作

① A. Ф. 罗特施泰因。

② 周恩来。

③ 刘少奇。

④ 黄平。

⑤ 瞿秋白。

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派往莫斯科。

(5) 关于派赖扬同志由远东局任用的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审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08，第 1、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4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142 号记录 (摘录)

1931 年 5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11. (1796) .——远东局的组成。

决定：11. ——认为派米尔顿^①同志作为远东局成员是必要的。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讨论并决定立即召回奥斯藤^②同志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09，第 1、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可能是赖扬同志（见第 404 号文件）。

② И. А. 雷利斯基。

4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 共产主义学院中国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决议

(摘录)

1931年5月25日于莫斯科

关于中国科研所工作的决议^①

听取：阿布拉姆松同志关于中国科研所从1931年1月1日至1931年5月15日期间工作的报告。

决定：1. 认为工作是令人满意的。

2. 免去马季亚尔同志所长职务，由米夫同志担任此职。

3. 认为有必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日常工作计划给研究所下达有计划的日常任务。

4. 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问题》^②杂志编委会工作的积极性。

5. 认为有必要恢复《电讯稿》^③的正常出版，为此请国际列宁学校加速印行。

6. 建议研究所安排定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各支部通报中国情况的工作，为此要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取得联系。

7. 要为苏区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帮助，这要做为研究所的一项任务，为此要同东方书记处一起列出需要编译成中

① 文件上批注：致米夫同志。

② 1929—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

③ 1927—1932年在莫斯科出版。

文的参考资料、小册子和教科书的目录。

8. 建议研究所同国外共产主义报刊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向它们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

9. 认为有必要招收 10 名中国问题研究生。

10. 支持研究所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关于调研究中国问题的约尔克、塔尔哈诺夫同志和科学院研究生甘伯格同志到研究所工作的请求。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38，第 366 页。

打字稿，副本。

407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1 年 6 月 10 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

戈卢别夫^① 1931 年 6 月 1 日在同我们谈话时讲述了江苏，更确切地说是上海的工作情况。梅尔库洛夫^② 现在被任命去接替戈卢别夫。由三人组成的省委会在戈卢别夫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现在在上海有 700 名真正的党员。所有的区委都在做宣传工作。我们有 30 个合法站点，但都没有按其用途使用。这主要是食堂和学校。我们在沪东区、沪西区和沪南区都有食堂。有时我们一天能出售 200 份午餐。我们在兵工厂有两名新同志。在 800 人的浦东火柴厂有 30 名工人提出了入党申请。他们中一部分人将被接收入党，其余的将组成各种小组。我们在浦东干得不错。最近我们领导了 800 名码头工人的罢工。吴淞的铁路员工成立了志同道合者组织，其中有足球小组，每组 16 人；在纺织厂成立了由 30 名女工组成的妇女协会。由于少先队员^③ 被捕，工会工作的情况很不好。在市政工作人员中活动的余飞越来越表现出右倾。

最近在所有居民中，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① 陈绍禹。

② 王云程。

③ 关向应。

增强了。这是由于士兵溺死一个中国人^①，杀害人力车夫一苦力^②等引起的。最近我们的人成立了七个救济被害者家属的委员会。他们要募集经费，要求赔偿等。6月7日要举行这些委员会的代表会议^③。

5月31日在同奥斯藤^④谈话时，斯拉温^⑤说，我们在江西、广东、云南、直隶、满洲、河南、山西等省有了省委。安徽、湖北、福建和湖南省（白区）以及山东省的省委在不定期地开展的工作。我们同四川和陕西省没有任何联系。

四中全会^⑥后我们有很多人被捕。光上海一地我们就平均每天损失三人。重新补充进行得不是很快。对干部的培训一定要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们正在这里为学校物色人：为〔国际〕列宁学校准备了70人，为工会准备了50人。我们在上海已有35人。必须把他们派出去。还必须从莫斯科派人来。

据斯拉温说，他们在出版半公开的日报^⑦，印1200份。《每日报道》^⑧、《党的建设》^⑨、《宣传员》^⑩都不再出版，因为机关被捣毁了。我们在筹备新的机关。干部问题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在创办区委书记短期培训班。已同斯拉温商定，从6月13日举行的下次会议开始，我们将有步骤地检查我们党的组织状况。首先是在满洲。

①② 何人不详。

③ 会议材料没有找到。

④ И. А. 雷利斯基。

⑤ 李竹声。

⑥ 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⑦ 指《群众日报》，1931年在上海出版。

⑧ 中文名称不详。

⑨ 见第642页注①。

⑩ 见第643页注①。

威廉^①走后我们就获悉，[地方]组织已收到四中全会决议。具体是：香港市委、福建的苏维埃、广东省委、皖西、满洲、福建特委、江西和广东（苏区）、陕西、河北（直隶）。从这些消息中可以得出结论，上述所有组织都赞同四中全会决议，并在动员自己的力量同右派和立三分子作斗争。关于立三主义的拥护者没有听说什么。大家都反对它，但在实践中还可能遇到重犯李立三错误的问题。例如，在满洲省委给东满委员会的信中，通知要准备举行武装暴动、没收和分配土地、杀地主等。信^②上注明的日期是1931年2月20日。不过这只是个别的例子。

但右倾危险很严重。许多组织都传来了右倾在加剧的信号。可以举出从上海传来的最典型的例子。例如，省委在5月30日发表了含有下列口号的呼吁书^③：“打倒蒋介石政权的垄断！”、“打倒临时宪法！”、“打倒同盟徒作斗争的叫嚣！”。当我们就此问戈卢别夫时，他回答说，这个呼吁书是由省委宣传鼓动部的一名成员^④起草的，由于警察当局的监视，他们没有时间加以修改。省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结论。在1931年4月丝绸工业工人罢工^⑤时，我们的同志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口号。在有轨电车车场工作人员中开展活动的余飞认为，我们不应该在我们党与国民党之间作任何区分。因此，根据他的建议我们的人把国民党的人选进了各种委员会，而且还不是工人，而是“首领”。我们局认为，右倾危险在明显增大。我们经常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并建议同这种危险进行坚决的顽强的斗争。

近来党开展了两项运动^⑥：纪念五一节和五卅运动。我们本想

① П. А. 米夫。

②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395号文件。

⑥ 见第164号文件。

较为详细地通报这件事,但遗憾的是只能谈谈上海的情况。筹备工作4月份就开始了。威廉还记得,准备工作是根据我们当时的指示进行的。根据4月中旬得到的消息,开展五一游行示威活动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我们的所有出版社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中央政治局和宣传鼓动部以及组织部都发了通告^①。[中共]江苏省委和共青团中央也发了通告^②。同志们打算在4月12日以前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并把最后10天专门用来组织和准备游行。当然,他们为此留下来的时间很少。我们曾批评过这一点。但是,即使是这点儿不充裕的时间也没有加以利用,因为很多同志被捕了。所有印刷厂和一些领导机关,例如工会机关均被捣毁。4月17日警察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我们的印刷厂、资料库和上海一些工会活动家的住宅。当时还逮捕了少先队员。没收了大约150万份呼吁书。整个书报发行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遭逮捕。这些逮捕事件使今后出版呼吁书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同志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毅力和首创精神。4月20日,街头又出现了我们用石印印刷的或者干脆用手写的呼吁书。警察简直是猛扑我们的“艺术家”。然而在墙上到处是我们的标语口号。在英国领事馆的墙上用英语写得十分显眼:“打倒帝国主义!苏联万岁!”。组织方面的情况差一些。首先,同志们为工厂的组织工作留下的时间太少。其次,在基层支部和区里开始进行辩论,因为一些同志借口同立三主义作斗争提出了极右的主张。我们根据波戈列洛夫^③向我们报告的情况给你们通报了这一点。我们对此没有作详细调查,但看上去这很像是真的。例如,沪东区党委表示反对“飞行集会”,因为这可能导致我们积极分子的

①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秦邦宪。

毁灭。共青团代表没有听从这一决定^①，独自组织了集会。党的组织作出决定，把青年说成是盲动主义者和立三分子。省党委和共青团省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解，共青团员的行动受到赞许。但同时又指出，共青团召开这些集会太晚了。成年人的抵制被说成是右倾。

五一前夕，在“为了青年、党和工会的团结统一！”的口号下举行了集会。在沪东区有60人参加，其中青年代表28名。4月30日还举行了一次由共青团组织的秘密集会，有40人参加，其中21人是青年同志。沪北区：4月25日举行了有50人参加的集会。在沪中区成立了筹备五月节的委员会，由40人（工人，学生等）组成。在沪西区的两家工厂成立了车间委员会，分别有22名和10名工人参加。在沪北区人力车夫和苦力的会议上成立了五一节委员会。一批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召开了大会（60人参加），他们讨论了五一节的事，但没有选举任何委员会。反帝同盟为了作关于五一节的报告聚集了大约100名学生和教授。没有成立任何委员会。五一节过得特别不好。举行了两次飞行集会，但任何大会也没有举行。形势对我们曾是很有利的。尽管国民党要花招，宣布五一节为“全国节日”，尽管警察采取恐怖措施，但我们的同志仍有很好的机会组织群众集会和规模不大的示威游行。五一节再次暴露了我们的软弱和与工厂的隔绝。在跟同志们谈话时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提出劝告，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和利用五卅运动。

关于五卅运动。我们一有机会就跟同志们谈这个问题。我们给这一运动的反帝性质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5月30日前夕刚好发生了许多意外事件，如帝国主义士兵溺死或枪杀中国人，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只是在需要出版书报时才很好地进行工作^②。5月30日过得特别不好。沪北区的游行示威有150人参加。沪东区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100人参加，沪中区有60人参加，沪西区有130人参加。就这些。波戈列洛夫说，5月30日前夕，我们举行了以下飞行集会：沪西区四次，120人参加，沪东区和闸北区各一次。这两次活动是我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作不力的最明显的标志，这在罢工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没有领导罢工，而在于我们甚至不能在国民党取消好不容易才宣布的罢工时与之相对抗。当然，同志们说的都是实话。还有就是国民党制造恐怖，一旦宣布罢工就关闭工厂。事实是，在5月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当局或者干脆以工人的名义在上海取消了90%刚刚开始罢工。现在上海的罢工最多只能持续2—3天。例如，上海市政委员会宣布，1931年4月我们这里发生了14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5448人，共损失工时32999个工作日，换句话说，每个罢工者罢工约1.3天。1930年4月，这个委员会宣布上海发生罢工23起，参加罢工的有9934人，损失工时共计60900个工作日。这就是说，每个罢工者有6个罢工日。企业主现在取得胜利的原因是我们太软弱，因为今年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比去年多得多。工人的情绪无疑要好得多。罢工的愿望也更强烈，但没有领导。工人没有任何组织，他们不能在工厂找到我们。因此，他们去求助于国民党。我们局在同伊思美洛夫^①、莫斯克文^②、斯拉温、波戈列洛夫、戈卢别夫谈话时对加强我们在工厂的力量给予了特别注意，并使之具有经常的意义；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系统的情况也是一样。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劝同志们把最好的力量派到工厂去。组建红色工会和产业支部的问题是关系我党生存的问题。没有这些组织我们就不能为苏区的红军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在企业没有支部和工会小组，我

① 张闻天。

② 周恩来。

们仍将是光杆司令，而工人将任凭国民党摆布。我们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劝告：怎样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在考虑到每个支部的力量和可能性等等时应该向它们提出什么样的具体任务。

党在苏区的工作。我们从对苏区人员的援助开始。据莫斯科文报告，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政治局共向苏区派了228名同志。其中172人到达了目的地。向各区派送人员的情况如下：向中央（苏）区派了67人，57人到达。向第1军派了48人，43人到达。向第2军派了39人，18人到达。向第10军派了19人，10人到达。向第8军派了4人，全部到达。向第16军派了11人，9人到达。向第9军派了14人，12人到达。向第12军派了14人，12人到达。向其他军也派了一些同志。派送和抵达的情况见下表：

派送年月	派送数量	抵达数量
1930年9月	29	19
1930年10月	21	16
1930年11月	32	19
1930年12月	36	23
1931年1月	0	0
1931年2月	36	31
1931年3月	35	33
1931年4月	39	31

共青团在5月份派了一名同志^①去闽西，一名同志^②去贺龙那里。党还派了莫洛托夫^③去第10军，徐锡根去贺龙那里，并向第16军、第7军和闽西各派了一名同志。政治局收到了来信，信中

①② 何人不详。

③ 曾弘毅。

说布雷利斯基^①、科穆纳尔^②和另外20名同志^③已经到达朱[德]和毛[泽东]那里。同一封信中还说，项英和无线电报务员^④于1月14日到达那里。他们有无线电台，但他们还没有用它来进行工作。不过你们不应认为，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得到这部电台的。我们的电台还在运送途中。他们是从敌人那里得到这部电台的。

在第1军驻扎的地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⑤。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23人，其中有20名工人。我们只知道会上通过了20项决议。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些决议，因此我们不能就此向你们说任何东西。

苏维埃代表大会本应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宁都、中央苏区、闽东、赣南和赣西以及湖北和湖南都已派出自己的代表。但本局现在还不知道，此次代表大会^⑥是否已经举行，其结果如何。我们将把1军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告诉你们。我们仅请不要就此发电报。

我们收到了苏区2、3、4月份的综合报告。不言而喻，其中对以前的错误谈了很多。不过，在许多报告中已经在谈论四中全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⑦和中央的最新指示。所有这些文件都将给你们寄去，因此我们觉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不用多写了。但我们还是想指出，我们党和共青团组织在苏区的工作已经有了转折。同志们在改正以前的错误。他们在着手从更广的角度解决问题。在群众工作中，他们采用了新的方法。在湖北长江流域新6师活动地区

① 原文如此。应为布林斯基——任弼时。

② 王稼祥。

③④ 何人不详。

⑤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1931年5月12日在张国焘领导下在新集举行的鄂豫皖边区的苏区党组织代表会议。

⑥ 指中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⑦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见第375页注①）。

和赣东北，党组织很好地开展了春播运动。贫农团和农业工人工会的成立没有再引起任何反抗。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要求我们的人有新的思想，采取新的行动。例如，我们有消息说，在一些苏区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需要成立贫农团（农村贫农团）的青年部，是否需要召开青年工人的单独会议来讨论诸如选举苏维埃之类的问题。我们劝同志们不要使这些问题过分公式化。要利用最有助于吸引劳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和在建设苏维埃政权方面进行合作的形式。

当然，你们会从大量材料中找到一些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文件^①，特别是来自闽西的文件。惊慌失措者会作出“农民对红军不好，我们的组织 90% 是社会民主党人等”……^② 的评价，他们把一伙对我们持敌对情绪的人看成是“全体农民”，而把党或苏维埃机关内的个别骗子看成是“我们组织的 90%”。我们曾在这里提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并要求他们给闽西派去政治上坚定、熟悉当地人的同志，这样的同志才能在那里对我们的领导机构进行认真的清洗。这位同志要熟悉环境并弄清楚，我们在那里有没有遇到被我们的敌人利用的内部分歧。那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同志把每一位对分地或对我们对待商人的政策提出错误建议的农民当即宣布为反革命分子，从而真的把他推向了反革命营垒。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说我们的组织 90% 属于社会民主党，这是不可能的。假如确实是这样，那么政权就会在社民党人手中，而不在我们手中。实际上一切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不应对反革命估计不足，但如果对它估计过高，那就只会帮它的忙。顺便说一句，红军近来取得的胜利最有力地证明，劳动农民是跟我们走的。我们在中央（苏）区、4 军地区和新 6 师地区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假如事情像某些惊慌失措者说的那样，那么红军的这些成绩就不可能取得。没有农民的帮助，红军就不可能进行这类战役。关于红军战斗胜利的情况我们还要谈。

共青团。

我们每周同波戈列洛夫会晤一次。温裕成的事看来是这样的：温裕成有用于结算的1500墨西哥元。当应该结帐时，他那里没有这些钱了。经过长时间的推托辩解之后他说，有一次他在自己叔叔那里过夜，他叔叔好像知道，温裕成是共产党员，求温裕成借给他1500墨西哥元。因为这位叔叔经常帮助温裕成，把他藏在自己家里，温裕成无法拒绝他的请求，便把这笔钱借给了他，条件是必须在三天后归还。过了三天，这位亲爱的叔叔只还了300墨西哥元，并许诺三天后全数还清。但是，在这三天内亲爱的叔叔消失了（这种事经常发生），温裕成去找他。当时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温裕成去同家人告别。他找到了自己的叔叔，但没有得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在许多其他类似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当一位同志还没有任何过失之前，人们会把他当作优秀的最勤勉的人来谈论，几乎把他说成领袖。但是，只要他一犯错误，有人立即就会说，他过去就是一条恶狗、懒汉等。温裕成的情况也是这样。刚一得知他不能还钱，立刻就有人说，他还有旧的过错，现在他又把用来支付煤气款的20墨西哥元“揣进了腰包”，他养着三个老婆，他扔下工作不管，违反保密规定，带着姑娘去逛公园，等等。中国共青团中央局解除了他的工作，通过了对他不利的决议。政治局和我们都同意这一决定。波戈列洛夫被委任为书记。根据你们的指示^①，温裕成被送往[莫斯科]学习，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① 见第409号文件。该文件标明的日期是1931年6月23日。其基本内容可能早些时候已用电报发去。

中央局作出决议^①，说只是为了“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才派他去学习的。

你们应该在那里非常严肃地对待温裕成。请别忘记，他在来我们这里之前，已在这里混迹于所谓的“流氓团伙”^②中了。也请你们查明，维利^③同志是否在动身前确实得知了此事（指1500墨西哥元）。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没有对我们说起这件事。

青年团正在根据青年共产国际最近来信中的指示^④、四中全会决议^⑤和维利留下的指示开展工作。四中全会决议在最重要的共青团组织中进行了讨论，并正在贯彻执行。波戈列洛夫说，尽管左的倾向依然存在，但是——无论是在共青团内还是在党内——右的危险更为严重。在广东省委，我们现在正在就对时局的评估问题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一部分同志断言，现在我们这里是一片沉寂。委员会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评估。这在共青团内引起了很大的摩擦。一部分同志反对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新省委书记^⑥。

在纪念五一节和五卅运动期间，共青团只是在上海表现出了积极性。省里还没有给波戈列洛夫发来任何消息。这一活动的结果跟成年人的一样：只是在五一节和5月30日前夕及当天举行了规模不大的“飞行集会”。

5月13日，我们同波戈列洛夫就中央和各省共青团组织状况问题进行了谈话。中国共青团中央局同江苏、广东、满洲、河北、湖南、福建、山西、安徽等省的省委有经常性的联系。同山东、四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③ Г. М. 别斯帕洛夫。

④ 可能是指第319号文件。

⑤ 见第668页注③。

⑥ 何人不详。

川、云南三省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同苏区有联系，但很不经常。

在中央局工作的有三位同志^①。发生了多起逮捕事件。而且许多逮捕事件好像是由你们的过错造成的。波戈列洛夫说，在边境逮捕了30名从你们那里回来的大学生。如果这是真的，那就一定要找到肇事者，并且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上海，共青团与党的相互关系不很好，特别是在区委，那里经常争论不休。关于五一节的争论还没有停息，又在争论关于对五卅运动的评价问题了。波戈列洛夫说，争论带有非政治性质，因为没有政治分歧，而是由于区委书记未能安排好工作才争吵起来的。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决定召开由政治局代表、共青团中央局的代表和党与共青团的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上海共青团组织正在筹备劳动青年代表会议。有两个这样的区代表会议已经举行。参加人数最多的为6人，最少的为8人^②。大约有一半参加者是非党员。上海代表会议应有23人参加。会议日程如下：（1）红军的胜利与保卫苏区；（2）对劳动青年的要求；（3）失业问题；（4）组织青年分部。我们决定在代表会议上选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将出版登有会议决议的通报，以后将定期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所在地将对外保密，但我们将知道该委员会的确切地址，我们将向那里派去执行各种委托任务的人。

大众报纸《青年之友》发行4000份。还出版其他共青团报纸，但不定期，这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的。问题是共青团没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发行机构，因此它完全要依靠党。如果成年人被捕，青年人的出版活动就得停下来。我们已采取建立它自己的出版机构的方针。最后是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常驻代表机构的问

① 秦邦宪、胡鉴鹤、何克全。

② 原文如此。

题。在最近的将来，你们不能指望有这样的代表，因为没有这样的人选。请设法忍耐一下。温裕成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中国〔共青团〕的代表。

财政问题仍然紧迫。不知维利在那里取得了什么成果？关于红色工会的工作情况、关于对罢工的领导等，我们的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将在自己的专门信件^①中告诉你们。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

遗憾的是，近来我们没有可能从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活动。最近我们收到了他们的一些材料^②，但我们甚至未能来得及阅读。我们未经阅读就把它转给你们。此外，我们还给你们寄去新的“预算”。最近我们将通过邮件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

敌人营垒。罗章龙保持沉默，大概是在等待你们的答复^③。你们务必要给予答复，这样做是为了彻底了结这件事。答复应该以信的方式寄给党。

所有其他的所谓“反斯大林集团”企图联合起来，但你们可以从寄去的材料^④中看出，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领导人互相对骂。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放弃“联合”的进一步尝试。托洛茨基会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们对他们的影响知道得很少。不久前戈卢别夫说，他们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的有40人。党今后应该同这些集团作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和他的两名支持者（其中包括他的最得力助手）^⑤已被捕。

中国总的形势。在最近两个月内，反动阵营内存在着两个关

①②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③ 罗章龙给共产国际的信没有找到。

⑤ 郑超麟。

键性的问题：第一是消灭苏区和红军；第二是所谓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及其党羽的领导下。今天就可以断言，这两项任务都遭到了失败。

（1）“赤祸”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被限制住，可以平静地说，今天它比半年前还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赤祸”的加强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红军在去年推进时开创了广阔的战线。由于我们领导红军的同志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未能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创建工作，相反，他们却以自己的行动使一部分农民离开了我们。这就有利于反革命同我们的斗争。20万国民党军队的出击和与劳动农民联系的不够使红军不得不撤退。20万国民党军队装备有炸弹和毒气。但是，一当军阀将领们来到红军驻地，并用当地的地主和职员取代苏维埃时，尽管红军和苏维埃错误很大，但农民们还是立刻就感觉到了苏维埃的好处，并开始帮助我们。另一方面，一旦红军回到自己的主要根据地，它就能用有生力量充实自己，停止退却，并整顿自己的队伍去重新发动进攻。5月中已开始出现转机。红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收复了一些失去的据点。据报纸报道和从党内消息来源获悉，朱〔德〕和毛〔泽东〕现在已在东固。我们的军队歼灭了两个师的军阀部队（公秉藩师被全歼，而石扬中（音）师部分被歼）并解除了几千敌军的武装。此外，新6师包围了长江流域陕西和湖北交界地区的敌人，而4军占领了河南省的广候^①。当然，红军的这三次胜利还没有使国民党军队丧失战斗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使敌人队伍出现了混乱，而对我们的队伍则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农民将欢迎我们返回东固，因为军阀在这些地方短暂逗留的时期压迫农民，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取得了新的经验，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并执行有利于

^① 原文如此，音译。

劳动农民的政策。在大喊大叫要在三个月，后来改为六个月内消灭红军（何应钦甚至宣称红军已被消灭）之后，蒋介石遭到了全面失败。“赤祸”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变得比以往要强大得多。

(2) 蒋介石要实现和完成中国“统一”的另一次尝试，其结果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但毕竟是一则很大的丑闻。在发生胡汉民事件后，蒋介石尽量把这件事说成是一起偶然事件，是胡汉民个人的问题，与任何政治问题无关。好像一切进展良好，至少表面上可以认为是这样。

看来，对蒋介石来说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是张学良，蒋介石在竭尽全力把张学良拉到自己方面来。经过长期谈判之后，张学良来到南京，并在那里参加了“国民会议”开幕式。蒋介石集团还没有来得及为取得对张学良的胜利而感到欣喜，以陈济棠将军为首的广州集团不仅拒绝参加国民会议，而且还把由蒋介石的信徒组成的政府赶出了广州，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并要求蒋介石辞职。为回敬蒋介石言词激烈的电报，陈济棠解除了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南京部队的武装，逮捕了军官，并且向南京宣战。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广州的行动是有准备的，并得到了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的各个集团的支持。孙科和叶夫根尼·陈^①参加广州政府、汪精卫到达广州以及所有持反对派情绪的将领们的联合，最好地揭示了中国政治危机的深刻性。当然，这种危机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威廉在上一封信中对中国的经济危机作了评述^②。我们只想补充一点：目前帝国主义者和当地反动派对减少军费开支赋予了重大意义。但是谁也不确切知道，军队今天需要花费多少，明天还要花费多少。在这方面是一片混乱。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南京

① 陈友仁。

② 见第390号文件。

和地方军阀用于军队和行政管理机关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政府没有支付能力。1931年是偿还1911年得到的一系列贷款的年份。例如,今年6月南京就应偿还大约120万元。然而,政府不仅没有能力偿付,而且还需要借新债。银行家处于恐慌之中。他们再也不想给军队拨款。(对红军的战争除外。这里自然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虽然就外债问题举行过多次谈判,但南京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们这里在贸易方面已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居民购买力变得越来越低。在国内市场起作用的工业,如纺织业、火柴和卷烟的生产在不断削减产量。我们可以援引如下例子:去年秋天,上海生产丝绸的工厂几乎全部关闭。春天这些工厂开门了。而现在即1931年6月它们因为缺少资本和销售市场又关闭了。这种日益加深的危机由于外汇事件而更加严重。到5月中旬兑换1金元要支付4.30元,而现在却要支付4.70元。今年农民中的饥荒更严重。现在报刊上已在谈论“水灾”。由于5月的暴雨,山东省的侯镇^①、江西赣江和抚河流域、青岗^②附近的羊歌洋^③流域、广州——九龙和广州——汉口铁路沿线、无锡、江西省、陕西咸阳市、浙江省嘉兴及湖北等地的全部田地都被水淹。帝国主义的报刊在完全公开地谈论,今年除了现在正在挨饿的人以外,我们这里在农村还将有7000万人挨饿。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降得越来越低。我们不来详细地向你们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你们那里材料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只指出下面一点:据资产阶级报刊资料显示,中国共有7000万失业者。而这千千万万的挨饿者和失业者使赤祸进一步加剧。这千百万被判死刑的人们不想不作反抗就白白地饿死。今天城市工人的积极性在提高,农民的游击活动在发展。甚至陷入破产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斗争。

①②③ 原文如此,均音译。侯镇可能为“荷泽”,青岗可能指“九江”。

根据上述所有事实可以断言，中国的政治危机正在转向最高阶段。反动派既不可能通过更换政府，也不可能通过撤换蒋介石来挽救局面。反动派正在寻求新的政权形式，其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就是血腥镇压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运动。

这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党的状况。取决于党能在何种程度上驾驭革命洪流，领导运动，首先是正确领导革命根据地——苏区；取决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能否摆脱危机并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中。我们在同我们的中国同志谈话时经常指出这一点，并试图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他们提出相应的建议。

致诚挚的问候！

奥斯藤^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72—80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 ① И. А. 雷利斯基。

408

盖利斯给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

1931年6月12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其规模超过1930年它同北方的最近一次战争。南京军队的30多个师（所有可能抽调的兵力）在同苏维埃和红军进行战斗。迄今为止南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2. 正当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化过程（士兵暴动、起义、部队转到红军方面）大大加剧的时候，我们看到红军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政治上在不断得到加强，原有苏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新的苏维埃运动机构在产生。例如，去年我们只有一个大的苏区（江西）和许多小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现在在华中有三个大的苏区和十几个二级苏区。在这个时期里，红军战士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大约有12万人。农民的游击运动明显扩大。

3. 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去年我们就向中共提出把建立拥有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和强大的集中统一的红军的牢固革命根据地作为

^① 日期是根据A. Ю. 盖利斯同时给П. А. 米夫寄去的信确定的（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56，第243页）。

中心任务^①。为了解决这一基本任务，应该动员党的一切力量。当时我们也加强了我们的驻上海的代表机构。

对苏区的全面进攻、苏区内部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缺少足够强大的无产阶级，使得解决这一任务变得非常之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领导苏区和红军决定着一切。

经验表明，没有我们的大力帮助，中共中央是不能胜任对工业中心的工人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的领导的。

4. 由于过去李立三领导对苏维埃运动没有给予注意，在所有苏区过去无一例外地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好”地主分地，让阶级敌对分子混进政权、党和红军的机构，忽视工人、贫农的利益，等等）之外，在许多地区还犯了“左的”性质的错误，例如：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禁止自由贸易，从肉体上消灭富农，等等。这一切都被阶级敌人极力用来同苏维埃作斗争。因此，发生了去年夏天13军和14军被瓦解、12军内开小差、20军暴动等事件。

5. 现在，由于上海方面实行了基本上正确的领导，这些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克服，苏区大体上执行着正确的路线。在纠正苏区和红军领导以前所犯的错误的方面，我们的代表处（远东局）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远东局的帮助，就谈不上克服立三主义和确立党在各个方面，包括苏维埃运动和红军问题上的正确路线。

6. 现在，由于受到挑拨，被迫召回许多远东局成员，远东局大大削弱了，不能保证对中共的正确领导。

考虑到斗争环境的复杂，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中共的领导，不仅在中央（上海），而且在地方——三个主要苏区，办法是向那里派遣人员。

^① 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31页注②）。

我们认为派遣以下同志是适宜的：

- (1) 为在上海工作的政治代表（中央领导）；
- (2) 为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军队同志；
- (3)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 (4) 向苏区各派两名代表（军政各一名）：

①江西（红1军团和红3军团）^①，

②鄂西南和湘西北（红2军团）^②，

③鄂豫皖边区（4军）。

为在上海工作可以派俄国同志。去苏区必须派外国同志或者至少是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在苏联和红军中工作的经验的俄国同志。

7. 此外，我们认为从苏区招收大约100名军政工作人员（党员）去莫斯科，让他们通过短期（9—12个月）专门训练班学习是合适的。考虑到在当地为红军，特别是为其他地区的苏维埃建设培养较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的困难，这将是今后我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帮助。

请将这两个问题（派遣人员和成立专门训练班）提交近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495，目录154，卷宗456，第250—252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当时为1军团和3军团。

② 当时为2军团。

409

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国 共青团中央局的信

1931年6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

1.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特此给你们寄去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青团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①。这项决议是根据我们（在你处工作的）代表^②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③作出的。在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④上曾对中国共青团工作的所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代表。有争议的问题是“青年先锋队”集中化和关于共青团对其在苏区的队伍的发展的政策问题。你们将在决议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与某些同志的观点相反）主张“青年先锋队”集中化。它还主张接收苏区中农青年的优秀部分加入共青团，而不是像有些同志建议的那样接

① 见《关于中国共青团的形势和基本任务（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6月12日通过的决议）》。Г. 别斯帕洛夫《中国共青团》，莫斯科1931年版，第46—59页。

② Г. М. 别斯帕洛夫。

③ 显然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最后文本于1931年7月31日通过（见第411号文件。）

④ 关于中国共青团形势的问题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6月10—11日的会议上进行了研究。

收全部中农青年加入共青团。贫雇农劳动青年应该是共青团的支柱（见决议）。

我们建议在全团内讨论本决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团的活动。

2. 提请你们注意，你们至今还没有向青年共产国际派出自己的代表。应该立即派来。

3. 鉴于近来遭受的失败，请你们注意务必本着中国共青团四中全会决议^①的精神加强团的布尔什维克保密工作。青年共产国际将在各项工作中给中央以帮助和支持。中央对本团及其今后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请采取一切措施切实贯彻执行你们四中全会正确而具体的决议。

4. 建议派温裕成同志来由我们安排。你们作出解除他一切工作的决定是不是太仓促了？至于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候选人，我们觉得，现在最适合的人选是波戈列洛夫^②同志。请把你们关于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决定告诉我们。

敬礼

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

全宗 533，目录 8，卷宗 142，第 7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全会通过的《关于地下工作的决议》。

② 秦邦宪。

4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52号记录

(摘录)

1931年7月3日于莫斯科

听取：18. (1974) .——中国问题。

决定：18. —— (1) 由于向忠发^①同志被处决，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共产党应该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红色工会国际一起开展不仅反对蒋介石政权，而且也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广泛运动。为了开展这场运动，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把具体材料交由有关的党使用，并配合这场运动在党报党刊上发表几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文章。

(2) 见特别文件。

听取：26. (1982) .——米夫同志关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有关中国局势的通报材料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决定：26. —— 将报告备案待查。

听取：34. (1990) .——关于救援在上海被捕的同志^②。

决定：34. —— 见特别文件。

① 向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处决。

② 指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被捕的R. M. 鲁德尼克和T. H. 莫伊谢延科。

[附件]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18.（1974）.—中国问题。

决定：18.—（3）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莫斯科文^①和邓中夏两同志应从上海前往苏区，并在那里自动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如果不能前往苏区，要邀请这两位同志来莫斯科呆一段时间。

听取：34.（1990）.—关于救援在上海被捕的同志。

决定：34.—为使在上海被捕的同志获释所需经费要从国际联络部的经费中拨出。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4，卷宗119，第1、4、7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周恩来。

411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飞行表决结果编写的第 38 号记录

1931 年 7 月 31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94) . ——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

决定：1. ——批准所提出的决议文本（见附件^①）。（参加表决的有：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贝拉·库恩、古特曼、切莫达诺夫、克诺林、沃罗夫斯基^②、布拉特科夫斯基、富鲁鲍滕、科拉罗夫。）

全宗 425，目录 2，卷宗 145，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36—257 页。本次和以前的俄文版本中，该文件注明的日期为 1931 年 8 月 26 日。

^② 黄平

412

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关于红色工会 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工作的决议

1931年9月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 书记处上海局工作的决议

听取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工作情况的报告^①后，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同意上海局所执行的路线以及它为反对中国的立三主义和取消主义、菲律宾的合法主义和行会习气、日本的宗派主义等偏离这条路线的行为而进行的斗争。

尽管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的活动近年来有所加强，但它仍然不能适应太平洋书记处在领导太平洋沿岸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方面所应承担的任务和应起的作用。

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联系的所有工人运动国家中，只有中国、菲律宾和日本（部分）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的视野之内和尽力的范围之内。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半岛、澳大利亚等国处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领导之外，该处只试图同这些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建立不定期的书信联系。

^① Ch. 克伦宾和 C. A. 斯托利亚尔在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 1931 年 7 月 20 日的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工作的报告（见全宗 534，目录 3，卷宗 581，第 1—70 页）。

在领导中国的工会运动时，上海局的工作有以下缺点：

(1)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工作落后于中国工人的斗争进程。

(2) 注重自我通报、事实和事件的登记工作，而不是领导工作。

(3) 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活动的领导不够具体，且目的不够明确。

(4) 对在国民党黄色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同乡会、兄弟会等）中的工作极少给以关注。

(5) 对执行红色工会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本身的指示监督不够。

建 议

1. 在最短的期限内恢复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①。

2. 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下面建立指导员机构，指导员在该局领导下在太平洋沿岸各站点工作。还必须有两三名指导员根据太平洋书记处在中国工会运动中的任务进行工作。

3. 加强该局同中国、菲律宾和日本工会运动现有的联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同印度、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台湾建立联系并确保对这些地区的领导和影响。

4.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工作的重心应该从一般政治性的宣讲和对工人运动的研究转到对经济斗争以及斗争的准备和进行过程的具体领导上来。在某些场合，当群众采取行动时，红

^① 1931年6月15日R.M. 鲁德尼克和T.H. 莫伊谢延科在上海被捕和警察袭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在上海的驻地以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停止了工作。

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应该通过自己的指导员直接参与领导罢工。每次比较重要的罢工过后都应有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执行局的来信，总结此次斗争，揭示我们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5.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应该对阶级工会的组建、对革命反对派在国民党黄色工会、行会等组织中的建立和群众工作的开展给予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

6.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应该继续出版英文通报^①，该通报应对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的所有迫切问题给予具体指示和明确答复。该局也应安排好通报的马来语和乌尔都语的出版，以便在马来亚、印尼和印度发行。

7. 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和海参崴局之间建立正常联系。

8. 将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会议^②的召开推迟到1932年年底。

全宗 534，目录 3，卷宗 581，第 73 页，卷宗 597，第 4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远东通报》（见第 175 号文件注④）。

②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第三次会议没有召开。

413

皮亚特尼茨基给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年9月10日于莫斯科

特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鲍曼同志1931年9月7日给卡冈诺维奇同志的电报^①。

为了答复鲍曼同志的电报，需要准确确定新疆（哈密地区）起义的性质。起义性质迄今为止还没有搞清楚。起义行动是针对中国当局的（反对过于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民族压迫），但它很可能是由维吾尔汗领导的。在确定起义的性质之前，不得允许维吾尔族联共（布）党员前往新疆参加这次起义。（当然，如果决定参加起义，以便从汗手中夺取领导权，是可以允许这样做的。）因此，我建议召开委员会会议，以便弄清起义的性质，说明我们对这次起义的态度。该委员会应该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加拉罕同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阿尔图佐夫同志）、工农红军第四局的代表（别尔津或泰罗夫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代表（马季亚尔同志）和中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组成。

如果政治局允许在没有弄清起义性质的情况下派遣维吾尔族共产党员，那就应该通过蒙古派遣。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以蒙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古公民身份出现^①。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16，第 6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1931 年 9 月 2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不接受关于派遣维吾尔共产党员去新疆的建议，而“在其他方面要把这个问题撤销”。

人名索引^①

A

阿布戈夫 M. 3. (化名: 阿尔弗雷德) (1901—1938/41?) —— 1924 至 1925 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25 至 1927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部长,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至 1928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 至 1930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3 年起在远东做党的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姆松, M. M. (化名: 马祖林, 马荪) (1898—1941) —— 1925 至 1927 年任 B. K. 布留赫尔的翻译。后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即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莫夫, A. A. (化名: 米罗夫, A) (1895—1937) —— 1926 至 1935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35 年 11 月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1936 年 9 月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助理、西班牙方向领导人。遭非法镇压,

^①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原编者注: 鉴于本卷提及的人名数量很大, 这里按通常做法只介绍 1927 至 1931 年间情况。有些人的情况资料没有找到。书籍、文章作者的名字, 以及纳入各机构、企业、公司名称的人名未列入本索引。

死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莫维奇，З. X.（原姓：别尔滕，化名：埃利维拉）（1892—？）——1925至1932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A. E. 阿尔布列赫特之妻。

阿尔布列赫特，A. E.（原姓：阿布拉莫维奇·切图耶夫，化名：阿尔诺、武德罗、马克斯、哈贝尔）（1888—？）——1926至1930年（断续）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1925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31年起从事教学工作。

阿尔图佐夫，A. X.（原姓：弗拉乌奇）（1891—1937）——1919年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安总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等会务（局务）委员会委员。1922至1927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侦处处长。1927至1931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局局长助理。1931至1935年任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处处长。同时在1934至1937年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执行局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阿龙施塔姆，Л. Я.（化名：布雷克）（1884—？）——1923至1933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行委员会顾问书记，1925至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驻华代表。1934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核心小组副组长。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阿罗洛维奇，A. M.（生卒年不详）——20年代末30年代初任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联共（布）滨海边区委员会巡视员。

阿马加耶夫，M. И.（1897—1944）——1925至1927年、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代表。1925至1927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2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1929至1933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1933至1937年任苏联科学

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阿诺特，罗宾·佩奇（1890—1986）——1924至1935年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至1931年、1936至1937年任英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8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

阿努洛夫，Ф. А.（生卒年不详）——20、30年代在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任教。

阿普列廷，М. Я.（1885—？）——1924至1927年为教育工作者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0年任该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成员、《泛太平洋工人》杂志责任编辑。1930至1931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宣传鼓动出版部副部长。1932年起在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工作。

埃斯勒，埃勒—格哈德·埃斯勒之妻。

埃斯勒，格哈德（化名：罗伯特·罗伯特斯）（1897—1968）——1927至1928年为德共中央候补委员。1967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29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31至1933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33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美国代表。1935至1939年在德共国外中心工作。1941至1949年侨居美国。后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艾森施塔德，А. Г.（1878—？）——1926至1929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1930年起在中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安贝尔·德罗，尤勒（1891—1971）——1932至1936年为瑞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至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7至1958年为瑞士社会党领导人。

安东诺夫，А. С.（1888—1922）——1920至1921年间为坦

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农民起义领导人。被捕后遭杀害。

安加雷蒂斯, З. И. (1882—1940) —— 1921年起任立陶宛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6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奥尔洛夫, А. Г. —— 20年代末任工农红军参谋部军校局局长。30年代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

奥尔宗尼启则, Г. К. (1886—1937) —— 1921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至1930年先后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自杀身亡。

奥赫京, А. Я. (1891—1942) —— 1927至1933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后来从事外交、经济工作。

奥辛斯基, Н. (原姓: 奥博连斯基, В. В.) (1887—1938) —— 1921至1922年、1925至193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4年任苏俄驻瑞典全权代表。1926年起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B

巴尔贝, 安里 (1902—1966) —— 1926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年被开除党籍。

巴兰多欣, М. Ф. (? —1937) —— 1928至1931年任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教员。1932年8月起任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列宁格勒州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巴兰斯基, Н. Н. (1881—1963) —— 1921至1925年任工农

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9年起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其他高校教授。

白崇禧 (1893—1966) ——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2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后任第十五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白鑫 (?—1929) ——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因变节行为被共产党人处决。

鲍尔, 马克西米利安 (1869—1929) ——1928至1929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鲍罗金娜, Ф. С. (1892—1967) ——1923至1926年任国际妇女书记处驻华代表。M. M. 鲍罗廷之妻。

鲍罗廷, M. M. (原姓: 格鲁森贝格, 化名: 银行家) (1884—1951) ——191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干部。1923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27年底起从事经济、新闻工作。1927至1932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劳动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鲍曼, К. Я. (1892—1937) ——1925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9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 1929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28至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31至1934年任党中央中亚局第一书记。1934至1936年先后任中央计划财政部、科学部部长。同时1929至1932年任党中央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鲍毓麟 (1897—?) ——1927年任奉军第四十七旅旅长, 1928年任奉军第二十五旅少将旅副。1930至1936年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1932至1937年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1937年起退休。

贝尔曼，Б. З.（1897—？）——1925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

彼得罗相（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研究生。

彼得斯，Я. X.（1886—1938）——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0至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毕苏茨基，约瑟夫（1867—1935）——1926至1928年、1930年任波兰总理。

别尔津，Я. К.（П. И.）（原姓：屈吉斯、彼得里斯，化名：老头）（1889—1938）——1924至1935年、1937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1935至1936年任特种红旗远东集团军副司令。1936至1937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军事顾问团领导人。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别斯帕洛夫，Г. М.（化名：维利、年轻人）（1904—1967）——1925至1926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26年起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26至1928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28年5月起任青年共产国际巡视员，1929至1932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1930至1931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后来从事党务、新闻工作。

波波夫，Н. Н.（1891—1938）——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2至1932年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工作。1935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

复名誉。

波波夫, Ф. И. (1896—1927)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译电员。遭国民党枪杀。

波赫瓦林斯基, Б. А. (化名: 韦谢洛夫) ——1927年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1928年起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

波克罗夫斯基, П. Д. ——1920至1926年任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1927年起任莫斯科东方大学副校长。

博罗沃伊, П. Ю. (1902—1941/42?) ——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顾问。1928年起从事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卜士奇 (化名: 普罗列塔里耶夫) (1902—1964) ——1926至1933年在苏联学习和从事教学工作。1933年回到中国后被捕, 投靠国民党。后来从事翻译、教学、外交和科研工作。

布勃诺夫, А. С. (化名: 伊万诺夫斯基) (1884—1938) ——1919至1920年, 1922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任中央书记。1922至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4至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至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德克维奇, С. Р. (1887—1937) ——20、30年代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哈林, Н. И. (1888—1938) ——1917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至1932年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拉特, И. А (1896—1939) ——1930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至1930年任中央组织分配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拉特科夫斯基, 叶日(原姓: 索哈茨基)(1892—1933)——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兰德勒, 根里赫(1881—1967)——1919至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至1923年、1925至1926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8年被开除党籍。

布劳德, 埃尔·拉塞尔(1891—1973)——1921年起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192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起任美共中央总书记。1924年起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年起为出自美共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3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 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后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至1928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布里斯托尔, 马克(1868—1939)——美国海军上将、外交官。1919至1927年任美国驻土耳其高级专员。1927年起任美国亚洲舰队司令。

布留赫尔, B. K.(1890—1938)——1934至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27年任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军事顾问、华南军事顾问团团团长。1929至1938年任特种红旗远东集团军司令。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留汉诺夫, H. П.(1878—1942)——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6至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马日内, E. O.(1894—?)——1926至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出版部副部长。1930年起退休。

布琼尼, C. M.(1883—1973)——1934至1939年和从1952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9至1952年为中央委员。1924至1937年任工农红军骑兵巡视员

C

蔡和森 (1895—1931) ——192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方局代理书记。1928年7至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29至1931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1年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蔡廷锴 (1892—1968) ——1927至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1929至1930年先后任独立第二旅旅长、第六十师师长。1930至1933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蔡运升 (1879—?) ——1929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满洲外交专员。

陈昌浩 (化名:伊祖姆鲁多夫) (1906—1967) ——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至1931年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1931至1933年为中共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后来还从事一些军政工作。

陈诚 (1898—1965)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第十一师师长。1928至1929年任南京警备司令。1929至1931年第十八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陈独秀 (化名:老头子) (1872—1942) ——1921至1922年任中共中央局书记。1922至1925年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4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后来在中国从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陈刚 (易尔士) (1906—1967) ——1927年夏秋为京西暴动领导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被监禁。1928至1929年在赣西做党的工作。1929至1930年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30年底

任中共中央驻赣西巡视员。1931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副局长。1933至1935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交通局局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陈孚木（1892—？）——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底1929年初为广州国民党左翼联盟成员。1927年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厅厅长。1928年为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委员。1932年起引退。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

陈公博（1890—1946）——1926年起（断续）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至1931年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38年投靠日本。被判处死刑。

陈济棠（1890—1954）——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8年任第四军军长。1929至1931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30年代初起控制了广东省。

陈炯明（1878—1933）——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至1922年任孙中山政府陆军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1922年6月发动反孙中山叛乱，把孙赶出广东。1923年陈被赶出广州。1925年被国民政府军打败。1925年底引退。

陈可钰（？—1944）——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1927年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7年底起引退。

陈铭枢（1890—1965）——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7至1929年任第十一军军长。1929至1931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陈乔年（化名：克拉欣）（1902—1928）——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1927至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被国民党杀害。

陈荣(生卒年不详)——1930至1931年任共青团闽粤赣边区区委书记。

陈绍禹(化名:王明、戈卢别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1904—1974)——1931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3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委员。1925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翻译。1929至193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劳动》报编辑。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至1937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陈树人(1883—1948)——1926至1928年、1931至1945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至1931年、1945至1948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28至1931年为国民党“改组派”活动分子之一。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陈调元(1886—1943)——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1927至1929年、1930至1932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29至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陈延年(1899—1927)——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陈友仁(叶甫根尼·陈)(1879—1944)——1926到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7年秋至1931年春侨居国外。1931年5至9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外交职务。

陈友生(?—1929)——1929年积极参加了上海罢工运动。被国民党杀害。

陈郁（1901—1974）——1930至1945年、1956至197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45至1956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至1931年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1至1940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后来在中国做党的工作。

陈原道（化名：涅夫斯基）（1901—1933）——1925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29至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30至1931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2至4月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4月至1932年9月被监禁。1932年底1933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陈云（1905—1996）——1930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至1969年、1977至1987年为中央委员。1931至1969年、1982至198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底至1929年初为江苏省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1929至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陈中（化名：斯捷潘诺夫）（1909—？）——1927至1930年在苏联军校学习。

程潜（1882—1968）——1926至1928年、1931至194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27年为武汉政府成员、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1927至1928年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1928至1931年被软禁。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褚玉璞（1887—1931）——1927年任直隶省督办。1927至1928年任安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8年引退。

D

达维多夫, Д. П. (生卒年不详) —— 1928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中国研究所研究生。1932年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

戴季陶 (1891—1949) —— 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1927至1948年为国民政府成员,任考试院院长。1949年自杀身亡。

戴维斯, 默尔 (生卒年不详) —— 20年代末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檀香山)太平洋委员会总书记。

戴晓云 (生卒年不详) —— 1927年底1928年初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30年夏至1931年1月任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

丹巴道尔吉, 策伦奥契伦 (1899—1934) —— 1924至1928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1929年起在苏联学习和工作。

邓恩铭 (1901—1931) —— 1925至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至1931年被监禁。被国民党杀害。

邓小平 (1904—1977) —— 1927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至1931年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1931至1933年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职务。

邓演达 (1895—1931) —— 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至1930年侨居苏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1930至1931年任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被蒋介石杀害。

邓彦华 (1893—1942) —— 1927至1929年先后任讨逆军第八路军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五旅旅长、代理第五军军长兼第十六师师长、第五十八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邓中夏 (1894—1933) —— 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8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山东省委书记。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至1933年任中共湘鄂西边区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任全国革命互济总会共产党党团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迪曼施泰因，C. M.（1886—1939）——1924至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民族处处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杜克鲁，若泽（化名：杜邦）（1904—1980）——1926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对上海法国水兵工作指导员。1929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信使。

段良弼（生卒年不详）——1930年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1931年被开除党籍。

多格马罗夫，A. A.（1901—1936）——1925至1927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从事科研工作。1927年2至8月为联共（布）驻华宣传组成员。1927年底起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31至1932年任（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后来在苏联远东和莫斯科从事党务和工会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多尔森，詹姆斯（化名：美国人、比利、怀特）（1884—？）——1926至1927年任（旧金山）《劳工新闻报》驻华记者、（北京）《人民论坛》报编辑。1928至1931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驻华代表。后来从事新闻工作。

多列茨基，Я. Г.（原姓：菲格藤施泰因）（1888—1937）——1921至1925年为俄罗斯通讯社负责人。1925年起为塔斯社负责人。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多姆斯基，留德维克（原姓：施泰因、亨里克）（生卒年不详）——1929年起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任波兰《世界》报驻莫斯科编委。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董亦湘 (化名: 奥尔林斯基) (1899—1938) —— 1925 至 1928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28 至 1932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1932 至 1933 年在 (哈巴罗夫斯克) 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33 至 1937 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内务人民委员部) 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F

樊钟秀 (樊醒民) (1888—1930) —— 1924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至 1930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军长。

方志敏 (1899—1935) —— 1928 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 年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29 年任江西苏区政府主席。1930 至 1931 年任赣东北苏区政府主席、红十军政委。1931 至 1934 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国民党杀害。

范石生 (1887—1939) —— 1927 至 1930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1930 至 1931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菲林—普普科, С. Г. (1898—?) —— 1926 至 1928 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二处副处长。

菲吕博滕, 彼泽 (1890—1975) —— 1928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 至 1932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费奥多罗夫, С. С. (1903—?) —— 1923 至 1927 年在莫斯科做共青团工作。1927 至 1928 年任共青团塔塔尔州委书记。1928 至 1930 年任共青团远东边疆区委书记。1930 至 1934 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先后任东方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费尔格德, 弗里德里希, К. (化名: 弗里茨·施奈德) (1897—1937) —— 1927 至 1928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

华代表。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费尔德曼，П. С.（化名：卡尔，Ф.）（生卒年不详）——1930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3年在联共（布）中央机要处工作。

费拉，安德烈（莫雷利）（1902—1988）——1925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处委员、共青团驻法中央政治局代表。1928至1936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法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和殖民地部委员。1930至1931年任法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6年被开除党籍。

费舍尔，露特（1895—1961）——1921至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4至1925年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党籍。

冯菊坡（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工运部部长、中共广州市委委员。1928年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28至1929年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冯任（？—1930）——1930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冯玉祥（1882—1948）——1928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至1927年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8至192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1928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团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不幸牺牲。

弗赖耶尔，Б. С.（化名：因杜斯、塞格尔）（1897—？）——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顾问。1927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弗兰克，奥托（1877—1953）——1925年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工作。1925至1929年为旅居苏联的政治侨民。回国后在德共中央

档案馆工作。

弗里克,古斯塔夫(1895—?)——1923至1924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全权代表。1929年在(上海)大都会贸易公司工作。

弗鲁姆京, M. И. (1878—1939)——1922至1929年任苏联副外贸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伏罗希洛夫, K. E. (化名:梅津采夫)(1881—1969)——1921至1961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1934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福京, H. A. (化名:年轻人、济米廖夫)(1899—?)——1926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年起为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27至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0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傅伯翠(1896—1993)——1927至1928年任中共(福建)上杭县委书记。1928至1929年任红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1929至1930年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为闽西苏区政府成员。1930年底1931年初因被指控建立“社会民主党”被开除党籍。

傅大庆(音)——1928至1931年任中共南海国家(东南亚)委员会组织部部长。

傅胜兰(化名:克雷连科)(1904—?)——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在苏联从事翻译工作。

傅作义(1894—1974)——1928至1929年任天津警备司令。1929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师师长。1930至1931年任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1931年先后任第七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G

盖茨曼, И. М. (1879—1938) —— 1928 至 1930 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代表。1931 年起做党的工作。

盖利斯, А. Ю. (化名: 米林、奈伯格、托姆、弗赖利希) (1895—1937) —— 从 20 年代起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1925 至 1926 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书记。1930 至 1931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甘贝尔格, В. Л. (1900—?) —— 1922 至 1924 年在那利曼诺夫东方学院学习。1924 至 1928 年到中国出差。1928 至 1930 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汉语教研室领导人、中国研究所学术秘书。

甘地, 莫汉达斯, К. (1869—1948) ——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首领之一、印度国大党领袖。被极端派分子杀害。

甘乃光 (1897—1956) —— 1926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1926 至 1927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农民部部长。1926 年底 1928 年初任广州市代市代。1929 至 1931 年为“改组派”首领之一。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戈尔布诺夫, Н. П. (1892—1938) —— 1920 年起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办公厅主任。1922 年起先后任人民委员会议办公厅主任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35 至 1937 年任苏联科学院常务秘书。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戈列夫, В. Е. (1900—1938) —— 1925 至 1927 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7 至 1929 年任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领导人。1929 年起任一些军事支队的队长和政委。1935 至 1938 年任驻西班牙军事顾问。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戈帕奈尔, С. И. (1880—1966) —— 1918 至 1919 年为乌克兰共

产党中央委员。1925至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28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35至1936年任共产国际干部部干部培训部部长。1945年起从事科研工作。

格克尔特, 弗里茨(1884—1936)——1919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0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执行局(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预算委员会委员。1930至1933年为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3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起先后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格雷, Л. Э.(1895—?)——1921至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海事特别处处长、远东共和国军事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侦察局海事侦察首席全权代表。1923年起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志愿船队管委会书记。1926至1927年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海军教育、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部顾问。

格列尔, Л. Н.(1875—?)——1922至1930年(断续)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部长。1930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任教。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公乘藩(1902—1982)——1930至1931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师、第二十八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1941年投靠日本。1945至1961年被监禁。

古谢夫, С. И.(原姓:德拉布金, Я. Д., 化名:格林)(1874—1933)——1920至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5年任中央监委书记。1925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美国共产党代表。1926至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长。1928年3月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书记处主任。1929年为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年起为主席团候补委员。1930年、1932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主任。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古特曼，约瑟夫（1902—1958）——1929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红色权利报》编辑。1931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33年被开除党籍。

古勋铭（生卒年不详）——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团长。

顾孟余（1888—1873）——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29至1931年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顾顺章（1904—1935）——1927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任中共中央交通科科长。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任中共中央特务科科长。1934年4月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

顾作霖（1908—1934）——1928年起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3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后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9至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至1933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3年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关向应（化名：少先队员）（1902—1946）——1927至1931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8至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8至1946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9至1930年、1931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至1931年、1937至1945年为政治局委员。1930年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

记。1931年被监禁。1932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湘鄂西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红军第三军政委。

桂富生（音）（？—1929）——1929年为上海罢工运动积极参加者。被国民党杀害。

郭亮（1901—1928）——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3至1927年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代书记，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郭妙根（化名：瓦日诺夫）（1907—？）——1928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1931年任中共鄂东地委书记。

郭绍棠（化名：克雷莫夫）（1905—1989）——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至1932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机关工作，后到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2至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1934至193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38年遭迫害，被监禁和流放至1954年。1954年恢复名誉。195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

郭寿华（化名：罗易）（1900—？）——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一个军中做政治工作。1927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郭瘦真——1926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执行委员会书记。

H

哈迪，乔治（化名：格奥尔格，乔治）（1884—1966）——1922至1926年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6年任英共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27至1930年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7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0年起任红色工会国际英美部巡视员。

哈西斯，A. И.（1894—1927）——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上海和汉口总领事馆秘书。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

领事。遭国民党枪杀。

海默，毛诺（1894—1937）——1922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局局长主任。193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1937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顾问。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韩复榘（1890—1938）——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军长、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929至1930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团总指挥。1931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因违反军纪被处决。

韩连会（生卒年不详）——1931年1至2月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副书记。1929至1931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1930年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1931年2月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党籍。1931年4月被捕后投靠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监禁。被判处死刑。

韩述曾（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任中华民国驻伯力领事。

何键（1887—1956）——1926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29至1930年任第四军军长。1929至1933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何克全（化名：凯丰）（1806—1955）——1931至1935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34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7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至1932年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党、团职务。

何孟雄（1898—1931）——1927至1928年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中共上海沪西、沪中区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何声洋（化名：奥新）（1903—？）——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29年为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员。

何应钦 (1890—1987) ——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7至1928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8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0至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何子述 (化名: 马克西莫夫、马克松) (?—1932) ——1827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至1930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0年被捕, 死于狱中。

贺昌 (1906—1935) ——1927年5月至1928年6月、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巡视员。1929至1930年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1至1932年任中共江西兴国县委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领导工作。在战斗中牺牲。

贺龙 (1896—1969)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第二方面军代司令。1928至1930年任红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委书记。1930至1931年先后任红二、红三军团总指挥。1931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领导职务。

赫梅廖夫, A. П. (原姓: 阿片) (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后来还从事军事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洪承日 (音) ——192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后藤新平 (1857—1929) ——1916至1918年、1923到1924年任日本内务大臣。1918年任外务大臣。1920至1923年任东京都知事。1925年起任日苏文化关系协会会长。1927年底1928年初访问莫斯科时参加了苏日捕鱼协定起草工作。

胡阿梅 (生卒年不详) ——1930年为上海罢工运动领导人之一。

胡佛, 赫伯特·克拉克 (1874—1964) ——美国第31届总统

（1929—1933）。

胡海（1901—1935）——1930年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0至1932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1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从事一些党务和军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

胡汉民（1879—1936）——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至8月任南京政府主席。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任立法院院长。1931年2至10月被软禁。

胡望鹤（生卒年不详）——1927年起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0至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3年1月被捕，投靠国民党。

胡敦（胡佳，化名：胡佳科夫）（1899—1938）——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翻译。1927至1928年在工农红军骑兵学校学习。1928年起在苏联从事翻译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胡兆镐（化名：彼得拉舍夫斯基）（1899—？）——1926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部顾问。

胡志明（阮爱国）（1890—1969）——1930年起为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1951年起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1946年起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胡宗铎（1892—1962）——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1928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第十六师师长。1929至1931年引退。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黄弟洪（化名：卡卢金）（1904—？）——1926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至1930年在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被捕，投靠国民党。

黄公略（1898—1931）——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独立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1928至1929年在红五军团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1930至1931年先后任红一军团第六、第三军军长。

黄凌霜 (1897—?) ——1922年1至2月为广州机械工会出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回国后从事教学工作。

黄平 (化名：沃罗夫斯基) (1901—1981) ——1927至1928年、1930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广州市委书记。1928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0至1931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1至1932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2年底被捕，投靠国民党。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翻译、教学工作。

黄琪翔 (1898—1970)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7年底1928年初在香港引退。1928至1929年在柏林大学学习。1930至1932年任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黄庆凡 (生卒年不详)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

黄绍雄 (黄绍竑) (1895—1966) ——1926至1928年为国民党中央以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至1929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至1930年任广西省政府主席。1931至1932年引退。后来还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黄士嘉 (化名：普列斯涅夫) (生卒年不详) ——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黄五一 (1892—1927) ——1927至192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J

加拉罕，J. M.（原姓：加拉罕尼扬，化名：米哈伊洛夫、沙赫）（1889—1937）——1918至1920年、1927至1934年任苏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加拉赫尔，威廉（1881—1965）——1921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43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后来为英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56至1963年任英共中央主席。1924至192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至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至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加兰迪，鲁杰罗（原姓：格里科）（1893—1955）——1926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至1930年为意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至1935年（断续）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加里宁，M. И.（1875—1946）——1919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加马尔尼克，Я. Б.（1894—1937）——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至1928年先后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远东边区委员会书记。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1929年起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30至1934年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自杀身亡。

加米涅夫, Л. Б. (原姓: 罗森菲尔德) (1883—1936) —— 1917至1927年与俄共(布) [联共(布)] 中央委员。1919至1925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6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23至192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2至1924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24至1926年任主席。1923至1926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后来从事外交、行政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加米涅夫, С. С. (1881—1936) —— 1927至1934年任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工农红军防空局局长。

加藤 (原姓: 佐野学) (1892—1953) —— 1923年起为日共中央委员。1928年9月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9年3月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 7月在中国被逮捕, 后遣回日本。1933年声明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1945年获释, 后从事教学工作。

基洛夫, С. М. (原姓: 科斯特里科夫) (1886—1934) —— 1923年起为俄共(布) 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为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 列宁格勒省委(州委) 和联共(布) 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 中央书记。遇刺身亡。

基萨诺娃, К. И. (1888—1947) —— 1925至1927年任国际列宁学校副校长、校长。1932至1935年任国际妇女书记处领导人。后来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基辛, А. А. (1885—1938) —— 1920年起为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后来从事其他经济工作。

基泰戈罗茨基, П. В. (1883—1956) —— 1927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远东国家顾问。1930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1至1933年在红色工会

国际工作。

吉尔伯特, И. И. (1899—1939) ——1924 至 1927 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7 至 1932 年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季诺维也夫, Г. Е. (原姓: 拉多梅斯利斯基) (1883—1936) ——1907 至 1927 年为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 至 1926 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 至 192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基 (1882—1949) ——1948 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24 至 1935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5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 至 1934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4 年起为主席团委员。1934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 至 1943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3 至 1945 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新闻部部长。1946 年起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蒋介石（蒋中正） (1887—1975) ——1926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 至 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 1 月引退。1928 年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1928 至 1931 年任行政院院长。后来任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蒋经国 (化名: 叶利扎罗夫) (1910—1988) ——1925 至 1927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至 1930 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30 至 1937 年在苏联工作。1937 年起在中国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78 至 1988 年在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之子。

捷斯连柯, Е. В. (化名: 捷列先柯) (1898—1972) ——1925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军事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金费太 (音) ——1931 年为上海电车工人、罢工运动积极参加

者。

金善塔 (音) (1900—?) ——1927 至 1928 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研究生。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K

卡冈诺维奇, Л. М. (1893—1991) ——1923 至 1924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 至 1957 年为中央委员。1924 至 1926 年、1928 至 1946 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6 至 1929 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 至 1957 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卡佐夫斯卡娅, Ф. Я. (1899—?) ——1923 至 1930 年任皮亚特尼茨基的秘书。1929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秘书。1930 至 1932 年在国外从事地下工作。1932 年起任皮亚特尼茨基书记处顾问。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凯洛格, 弗兰克 B. (1856—1937) ——1925 至 1929 年任美国国务卿。

凯默勒, 埃德温·沃尔特(1875—1945) ——美国经济学家。1912 至 1943 年任普林斯敦大学教授。1929 年任南京政府美国财政顾问团团长。

考尔, 玛格丽特(1897—?) ——1927 年起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 至 1930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0 至 1933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31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驻上海太平洋书记处工作。后来在美国共产党中工作。

科尔涅耶夫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1925 至 1927 年任驻华军事顾问。

科拉罗夫, 瓦西尔(1877—1950) ——1919 年起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 至 1923 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23 至 1944 年为保共中央外国局委员。1921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 年起为主席团委员。1922 至 1924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科肖尔, И. В. (1893—1937) —— 1925 至 1927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 至 1937 年为中央委员。1927 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3 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处理远东边区委员会事务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科肖尔, С. В. (1889—1939) —— 1923 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 年起为中央委员。1927 至 1930 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 至 1926 年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8 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科兹洛娃, Г. А. (1892—1935) —— 1921 至 1935 年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曾任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秘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秘书。

克德罗娃-普拉斯季尼娜, Р. А. (1886—1946) —— 1927 至 1928 年为“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管理委员会委员、主席团责任书记。

克里尼茨基, А. И. (1894—1937) —— 1924 至 1934 年为俄共（布）[联共（布）] 中央候补委员。1934 至 1937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副部长。1929 至 1930 年任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校校长。1930 年起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列普斯, М. Е. (1895—1937) —— 1923 至 1935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伦宾, 查尔斯 (1889—1947) —— 1925 至 1927 年和从 1934 年起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4 年起为美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 至 1929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0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指导员。1930 至 1931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委员。1931 至 1933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副部长。1933 年起在美国从事党的工作。

克诺林, B. Г. (化名:索科利克)(1890—1938)——1926至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7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日扎诺夫斯基, C. C. (1886—1949)——1926至192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校副校长、校长。1928至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副部长。1929至1936年在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孔白(音)(外号:麻子)——20年代末到1930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9月起在中国。

孔荷宠(1896—1956)——1928年任红五军一纵队队长。1929年任第一独立师师长。1930至1931年任红十六军副军长、军长。1931至1932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11月被指控犯了冒险主义,撤销一切职务。1934年投靠国民党。1955年被人民政府逮捕,死于狱中。

库比雅克, H. A. (1881—1937)——1923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至1924年任中央远东局书记。1927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至1928年任中央书记。后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曼宁, M. Ф. (化名:济贡)(1895—1965)——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库恩, 贝拉(1886—1938)——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1至193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30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诺夫, C. (生卒年不详)——1927年任联共(布)北满委员会对华工作全权代表。

库丘莫夫, B. H. (1900—?)——1922至1926年任莫斯科东方

大学外国年级主任。1927年任莫斯科东方大学驻华代表。1928至1929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9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部长。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代表。1931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西宁，奥托(1881—1964)——194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至193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主任。

库兹明，H. H.(1883—1939)——1925至1934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土耳其斯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军校管理总局局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后来从事外交和党的工作。

库兹涅佐夫，H. K.(1890—1937)——1928至1931年任苏联驻奉天总领事。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旷继勋(1895—1933)——1929年任川军第七旅旅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后任总指挥。1930年任红军第六军军长。1931至1932年先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后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的“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L

拉狄克，K. B.(原姓：索贝尔松)(1885—1939)——1919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25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8至1929年被流放。1932至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新闻局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斯科尔尼科夫，Ф. Ф.(化名：彼得罗夫)(1892—1939)——1924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处)部长(主

任)。后从事外交工作。

拉祖莫娃, A. A. (1899—1973) ——1927至1928年任国际妇女委员会驻华全权代表。1928至1929年在国际妇女委员会机关工作, 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顾问。1931至1936年旅居法国。1936至1937年任曼努伊尔斯基书记处殖民地问题顾问。1937年任《共产国际》杂志责任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莱文盖姆, 瓦尔特 (生卒年不详) ——1928至1929年任中国贸易公司(柏林)经理。

赖阳, 蒂姆 (原姓: 沃尔德伦, 弗朗西斯, 化名: 丹尼斯、尤因、米尔顿) (1904—1961) ——1931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1935年起在美国做党的工作。1938年起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6至1957年任总书记, 1957至1959年任书记, 1959至1961年任全国委员会主席。

雷利斯基, И. A. (原姓: 柳比涅茨基, Я. A.) (化名: 奥斯藤、奥斯廷、毕格曼、保尔、寿乌) (1893—1937) ——1925至1929年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工作。1929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秘书。1930至1931年为远东局委员 1931至1934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 1934至1935年任副部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李白萍 (? —1931) ——1931年为共青团中央局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

李宝璋 ——1926至1927年先后任孙传芳军队第七十六旅旅长、上海警备区司令。

李财舍 (音) ——1930年为中共鄂东负责人。

李福林 (1874—1952)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1928年引退。

李富春 (1900—1975) ——1927至1929年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上海沪南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29

至1931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1931至1934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李济深（1886—1959）——1926至1933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3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至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1928年为国民政府成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至1931年被软禁。后来还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李剑如（化名：阿拉金）（1902—1932）——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卫士长。1927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红六军十七师政委。1931年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1932年任第八师政委。1932年夏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李健（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团长。

李可夫，А. И.（1881—1938）——1907至1912年、1934至193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05至1907年、1920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26至1930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李立三（化名：柏山、拉宾、李明）（1899—1967）——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至1931年1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至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至1945年在苏联。1932至1935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8至1940年被监禁，后获平反。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李明瑞（1896—1931）——1926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副军长。1929年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司令、后转到中共方面。1930至1931年任红七军军长。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错

杀，死后恢复名誉。

李清长（音）——1931年任河北唐山矿业工会领导人。

李求实（1903—1931）——1927年起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委员。1927年，1929至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28至1930年先后任《红旗》报、《上海报》、《红旗日报》编辑。被国民党杀害。

李时初（音）——1929年初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旅旅长。

李特（化名：基洛夫）（生卒年不详）——20年代下半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31年在鄂豫皖苏区军校做政治工作，后任教。

李文林（1900—1932）——1928至1929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秘书长，后任江西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政委。1930年后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1932年5月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李维汉（化名：罗迈）（1896—1984）——1925至1928年、1930至1931年、1956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至1956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为中共中央巡视员。1929至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至1933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后来从事党政工作。

李侠公（化名：罗蒙诺索夫）（1901—？）——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至1929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李有臣（？—1929）——1929年为上海罢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国民党杀害。

李震瀛（1896—1937）——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28年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9至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后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1931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党籍。

李子英（生卒年不详）——1931年任中共中央考察团团长、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人。

李宗仁（1891—1969）——1924至1927年任广西绥靖督办处督办、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1928至1929年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29至1930年任广西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李竹声（化名：斯拉文）（1903—1949）——1926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1至1932年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至1934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30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长。1934年被捕，投靠国民党。

梁秉枢（生卒年不详）——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保卫团团长。

梁赞诺夫，Д. В.（1870—1938）——1921至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院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廖焕星（1895—1964）——1923至1928年为柏林大学学生、中共柏林委员会书记。1924至1927年任柏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息统计研究所顾问。1926至1928年任国民党驻反帝联盟代表，后为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研究生。1930至1931年为马恩列研究所科研人员。1932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顾问。1935至1938年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1938至1946年、1948至1949年被监禁。1951年起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从事教学工作，被平反。

列梅勒，**戈尔曼**（1886—1939）——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委员。1924至1933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来从事科研和宣传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列普谢，И. И. (1889—1929) —— 1924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林育南 (1898—1931) —— 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1930年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被国民党杀害。

刘伯承 (1892—1986) ——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步校和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央苏区军校校长兼政委。1932至1935年任红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刘伯坚 (化名：谢尔斯廷斯基) (1895—1935) —— 1926至1927年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主任。1928至1930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31至1934年任中央苏区军校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被俘，遭国民党杀害。

刘达潮 (1885—1974) —— 1929年为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一直从事工会工作。

刘敌 (生卒年不详) —— 1930年任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1931年被开除党籍。

刘林元 (1908—1967) —— 1928至1930年任中共云南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后来从事工会和党务工作。

刘明佛 (生卒年不详) —— 1928至1931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9至1930年任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刘群仙 (生卒年不详) —— 1931至1932年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妇女工作部部长。秦邦宪之妻。

刘少奇 (化名：刘祥) (1898—1969) —— 1927至1928年、1929至196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至1937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至1968年为政治局委员。1925至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副委员长。1928至1929年先后在天津、上海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9年夏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8月至1930年2月被监禁。1930至1931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职务。

刘士奇(1889—1933)——1927至1928年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红六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931年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至1933年先后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兼第七十三师政委、红二十七军军长。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杀。

刘铁超(?—1931)——1929至1930年任红一军团第二十军第三独立团团团长。1930至1931年任第二十军军长。1931年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师师长。在战斗中牺牲。

刘希奇(音)——1930年为中共鄂东负责人。

刘一钦(音)(?—1930)——上海革命运动参加者。被国民党杀害。

刘亦三(音)——1927至1928年在海参崴工作。

刘云(1904—1930)——1925至1930年在苏联军校学习。1930年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会委员。被国民党杀害。

刘子载(1905—1972)——1930年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后来从事工会和党务工作。

柳比莫夫, И. Е.(1882—1937)——1925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任全苏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理委员会主席。1932年起任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柳浦清(化名:巴布什金)(1900—?)——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卢福坦(1890—1969)——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至

193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7至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1927至192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秋至1930年7月被监禁，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1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被捕，投靠国民党。1951年被监禁，后被判处死刑。

卢贻松（化名：利亚多夫）（1904？—1938）——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至1928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28年起在苏联远东工作，期间曾在《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鲁涤平（1887—1935）——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至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师长、第二军军长、湖南省政府主席。1929至1931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31至1934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鲁易（化名：刘林）（1900—1932）——1926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1928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湘鄂西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被俘，遭国民党杀害。

陆定一（1906—1996）——1930至1935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6至1928年、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1至1934年任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罗登贤（1905—1933）——1928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9至1931年（断续）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至1932年先后任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记。1932至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罗加乔夫，B. П.（1892—？）——1925至1926年任广州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副团长。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罗米纳兹，B. B.（化名：伯纳）（1897—1935）——1925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5至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4至12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7至11月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年起从事党的工作。自杀身亡。

罗特施泰因，A. Ф.（化名：安德烈）（1898—？）——1924至1929年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至1926年任罗斯塔社（塔斯社）驻伦敦分社社长。1926至1929年任《劳动》报驻英国记者。1930至1931年任红色工会国际英美部顾问、副部长。1931至193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3年2月起为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后来从事新闻、教学工作。

罗亦农（化名：布哈罗夫）（1902—1928）——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至192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罗易，马纳米德拉·纳特（1892—1954）——1927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罗章龙（1896—1995）——1925至1927年、1928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9至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月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党籍。后来从事教学工作。

洛佐夫斯基，C. A.（原姓：德里佐，化名：亚历山大、帕帕

沙)(1878—1952)——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1至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1937至1939年任国家图书出版社社长。1939至194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鲁德尼克, Я. М. (化名:安利、亨利、马林、努伦斯、鲁埃格)(1894—1963)——1925至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1928至1931年在中国工作。1931至1937年在中国坐牢。1940年起在苏联从事教学工作。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之夫。

鲁祖塔克, Я. З. (1887—1938)——1920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至1926年、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至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M

马丁诺夫, А. С. (原姓:皮克尔)(1865—1935)——1924至1935年在《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工作。

马尔托夫, Л. (原姓:采德尔巴乌姆; Ю. О.) (1873—1923)——俄国孟什维主义首领之一。1920年侨居德国。

马海斯基, В. К. (1867—1926)——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派别的首领。

马赫诺, Н. И. (1889—1934)——1918至1921年为乌克兰南方武装反对派首领之一、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起侨居国外。

马季亚尔, Л. И. (原姓:米尔高夫,莱奥什)(1891—1940)——1926至1928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1929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近东部部长。1928至1930年任国际农

业研究所东方部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马卡罗夫，И. И.（1897—1927）——1927年8月起在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遭国民党枪杀。

马雷舍夫 B. И.（化名：克莱因斯、克莱因）、（1898—？）——1927至1928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军政培训班主任。1927至1929年在工农红军参谋部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1930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四处处长助理。1930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马列茨基，Д. И.（1901—1937）——20年代中期起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工作。1929至1932年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兼经济研究室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马马耶夫，И. К.（1894—？）——1924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1927至1931年为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马西，亚历山大（化名：贝伦斯、伯恩斯）（1905—1947）——1926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东方书记处工作。1929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1929至1932年任英国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至193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7年起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马员生（化名：佩图霍夫）（1906—1977）——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29至1930年为莫斯科中国托派组织成员。1930年3至9月、1936至1946年、1949至1954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而被监禁和流放。1955年起在中国工作，被平反。

马玉夫（马裕福，化名：尼科诺夫）（生卒年不详）——1928至1929年任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马祖特, И. Д. (原姓: 迈兹利克) (1899—1937) ——1924 至 1928 年为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24 至 1926 年、1928 至 1930 年在国外从事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系统的工作。1928 年起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至 1934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处副主任。

麦克唐纳, 拉姆齐 (1866—1937) ——1924 年和 1929 至 1931 年任英国首相。

曼达良, Т. Г. (1901—?) ——1926 至 1927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

曼努伊尔斯基, Д. З. (1883—1959) ——1923 至 1952 年为俄共(布) [联共(布)] 中央委员。1924 至 1928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 至 1943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毛春芳 (原名: 欧阳洛) (1900—1930) ——1927 至 1929 年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 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0 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 (1893—1976) ——1923 至 1924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5 至 1927 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 年起为中央委员。1930 至 1934 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5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 至 1930 年任红四军政委、前委书记。1930 年任红一军团政委、前委书记。1931 至 1932 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书记。1931 至 1934 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职务。

梅济斯, П. X. (生卒年不详) ——1926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会计, 1932 年起任主任会计。

梅利克谢托夫 (生卒年不详) ——1927 至 1928 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研究生。

梅利尼科夫，B. H.（化名：米勒、谢苗诺夫，B.）（1895—1937/38）——1925至192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1928至1931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1933至1934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联络部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蒙泰居，科尼施·特奈尔（生卒年不详）——20年代末30年代初任（伦敦）沙尔泰印（印度）、奥（奥地利）中（中国）银行董事会董事。

孟用潜（孟坚）（1905—1985）——1928年先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29年8至9月被监禁。1929至1930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北满特委书记。1930年底至1932年被监禁。后来还从事党政工作。

米茨克维奇（米茨基亚维丘斯-卡帕苏卡斯），B. C.（1880—1935）——1919至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至1928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局长、委员。1924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1927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巴尔干书记处和边区国家书记处委员。1928年起为波兰、波罗的海书记处委员。

米夫，П. А.（原姓：福尔图斯，M，化名：威廉、约瑟夫、屈珀）（1901—1938）——1926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至1929年任校长。1928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0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1936年任莫斯科东方大学校长。1937年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米高扬，A. H.（1895—1978）——1922至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76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

员，1935至1966年为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米柳京，B. П.（1884—1937）——1917至1918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至1922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至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驻奥地利和巴尔干代表。1925至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院长。1928年起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米特凯维奇，O. A.（化名：亚历山大罗维奇）（1889—1943）——1927至1928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1928至1930年在北高加索从事党的工作。1930至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责任巡视员。1931至1936年任飞机制造厂党组长、厂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缅任斯基，B. P.（1874—1934）——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

莫苍白（生卒年不详）——1927年5至11月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先后任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后被开除党籍和团籍。

莫洛托夫，B. M.（1890—1986）——1920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5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至1930年任中央书记。1921至1926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至1957年为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30至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39至1949年、1953至1956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莫斯克文，И. М.（1890—1937）——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至1934年为中央组织部委员。1927至1932年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27至1930年任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30年起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И. Н.（化名：努伦斯、吕埃格）（1891—

1964) ——1930至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国际联络处工作。1931至1937年在中国被监禁。1941至1943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Я. М. 鲁德尼克之妻。

穆索, 马纳瓦尔 (1898—1948) ——1923至1925年为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1926年在苏联。1928至1935年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旅居中国、暹罗和英属马来亚。1935年起回到印度尼西亚。1936至1937年侨居苏联。1941至1945年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工作。

N

纳索诺夫, H. M. (化名: 查理、小青年) (1902—?) ——1925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7年起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黑人科科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纳扎罗夫, M. H. (1889—?) ——1927年起在莫斯科步兵联合学校做政治工作。1930年起任高级领导人和师级军事指挥员培训班教学部主任。1936年起任滨海军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转入预备役。

尼洛夫 (原姓: 萨赫诺夫斯基, Ф.) (1898—?) ——1924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1926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四处处长助理, 后任第四十三步兵师参谋长。1927年11月起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

宁迪卿 (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7年在苏联学习。1927到1928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1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31年被捕, 投靠国民党。

牛曼, 海因茨 (1902—1937) ——1927至1929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至1932年为德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和书记处委员。1931至193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5年起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当翻译。遭

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诺林，А. Я. (1899—?)——1926至1928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员、教研究主任、负责教学的副校长。1928至1929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诺维科夫——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

O

欧奇(音)——1927年底任海南岛林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欧阳钦(1900—1978)——1927至192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组织科科长。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1930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后来从事军政工作。

欧震(1899—1969)——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团长，后任第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后来还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P

帕尔乌斯(原姓：格尔丰德，O. A.) (1869—1924)——孟什维克。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

帕霍莫夫，Н. И. (1890—1938)——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共候补委员。193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8至1934年任高尔基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5至1938年任苏联水运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帕诺夫，П. А. (1892—1938)——1927至1930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科学条令处处长助理、第三处科长。

潘家寰(化名：克柳耶夫)(1904—?)——1923至1927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27至1928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8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起在中国做党的工作。30年代上半

期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杀。

潘问友（化名：多罗宁）（1906—？）——1925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1928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被国民党杀害。

佩列佩奇科，И. Н.（1897—？）——1930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至1931年任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1931至193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佩佩尔，乔恩（原姓：波加尼、约瑟夫，化名：乔恩斯）（1886—1938）——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外交和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起旅居苏联。1924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27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1927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29年被解除共产国际工作。1930至1937年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彭德怀（1898—1974）——1934至1936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6至1966年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五师第一团团长。1928至1930年任第五军军长。1930年任第三军团司令、红一方面军副司令。1931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彭湃（1896—1929）——1927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为中共前委委员、海陆丰苏维埃运动领导人。1928年任中共广东东江特委书记。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彭述之（化名：彼得罗夫）（1895—1983）——1925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27年

8至1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4月因不同意党领导人的路线被赶出中共中央。1929年因从事托派运动被开除党籍。后来从事中国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彭寿高（化名：马洛夫）（1901—？）——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排长。1926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彭玉阶（化名：班科夫）——1927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

皮克，威廉（1876—1960）——德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18年起为德共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德共中央主席。1928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和书记处委员。1946至1954年任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主席。1949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皮亚特尼茨基，И. А.（原姓：塔尔希斯，化名：米哈伊尔）（1882—1938）——1920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至1937年为中央委员。1921至1935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至1933年（断续）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委员。1928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委员。

普拉格尔，П. А.（1910—？）——1925至1927年、1929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П. А. 米夫之妻。

普拉梅，J.（生卒年不详）——1930至1931年任香港—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董事会董事长。

普莱斯，托马斯·詹姆斯（生卒年不详）——1929年为英国驻上海威尔特希尔团第二营列兵。因杀害中国公民受审判。

普里特斯，罗伯特—在华传教士。

普利切，O. Ю.（化名：柳克斯）（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 A.（1886—1937）——1917至1918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0至1921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1年起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普列汉诺夫，Г. В.（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普舍尼岑，K. Ф.（1892—1937）——1926至1929年为联共（布）中央责任巡视员。1930至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副部长、文化宣传部副部长。1932年任联共（布）下伏尔加边区区委书记。1932至1934年任联共（布）滨海州州委书记。1935至1937年任斯维德洛夫州州委第二书记。自杀身亡。

Q

奇赫伊泽，M. M.（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工农红军参谋部第二局负责人。

契切林，Г. В.（化名：瓦西里耶夫）（1872—1936）——1925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8至1930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25至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

钱大钧（1893—1932）——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钱介盘——1927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

切尔内赫，A. C.（1892—1940）——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1927至1928年为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1年在苏联国家计委担任负责工作。1931至1933年任全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33至1935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全苏广播委员会委员。1935至1939年任苏联驻伊朗全权代表。

切尔尼科夫, A. H. (1889—?) ——1925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担任一些指挥职务。

切尔尼亚夫斯基, Л. (生卒年不详)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为《真理报》、《文化革命》杂志和《工人与艺术》杂志的编辑之一。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

切莫达诺夫, B. T. (1903—1937) ——1928 至 1930 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1931 至 1937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31 至 1933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 至 1937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秦邦宪 (化名: 博古、波吉、波格涅尔、波戈列洛夫) (1907—1946) ——1931 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 至 1945 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 年 9 月至 1935 年 2 月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总书记。1935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 至 1930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0 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任《劳动报》编辑。1931 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后任中央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死于空难。

琼森, K. B. (原姓: 杨松, 化名: 卡尔、斯科特、塞基、查尔斯、施泰因) (1882—1939) ——1923 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24 到 1925 年任美国工人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5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日全权代表处出版信息部顾问。1927 至 1929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29 至 1930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副部长。1930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符拉迪沃斯托克局领导人。1933 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任教。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丘茨卡耶夫, C. E. (1876—?) ——1927 至 1934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 至 1927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

至1927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至1929年任远东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1年起任中央预算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瞿秋白（化名：斯特拉霍夫、瞿维托）（1899—1935）——1925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至1930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31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至1935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被国民党杀害。

R

任弼时（化名：布林斯基）（1904—1950）——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至1928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8年10月至1929年3月和1929年11、12月被监禁。1930年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1至1933年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任卓宣（化名：拉法伊尔、叶青）（1896—1990）——1926至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12月被捕，投靠国民党。后来从事宣传、教学工作。

日古尔，Я. М.（1895—1938）——1925至1927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三处处长助理、副处长。1926至1927年为华南苏联军事顾问部团总部侦察处领导人。1930年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化学局局长。1936年起从事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阮啸仙（1897—1935）——1927至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农民部部长。1929年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工作。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0至1931年在满洲和内蒙古做党的工作。1931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战斗中牺牲。

S

萨发罗夫, Г. И. (1891—1942) —— 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第一书记。1929 至 1934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遭镇压, 未恢复名誉。

萨韦利耶夫, М. А. (1884—1939) —— 1930 至 1934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 至 1931 年任联共(布)中央十月革命史和苏共党史资料收集与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28 至 1930 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1930 年任《真理报》编辑。1932 年起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主席。1936 年起任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塞富林(原姓: 拉宾, А. Я.) (1899—1937) —— 1926 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沙茨金, Л. А. (1902—1938) —— 1927 至 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 至 1922 年、1926 至 1928 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0 至 1922 年任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2 年、1926 至 1928 年为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 年被开除党籍。后来从事工会和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沙因曼, А. Л. (生卒年不详) —— 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

舍博尔达耶夫, Б. И. (1895—1937) —— 1927 年起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 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 至 1937 年任联共(布)的一些州委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沈观润(化名: 博罗金) (1902—?) —— 1928 至 1930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翻译。

沈先定(生卒年不详) —— 1930 至 1931 年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

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工会运动部部长，上海印刷工会主席。

沈泽民（化名：古德科夫）（1902—1933）——1931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至1933年为中共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

盛忠亮（化名：米茨凯维奇、盛岳）（1906—？）——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33年在苏联工作。1933至1934年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被捕后脱党。

师哲（化名：卡尔斯基）（1905—1998）——1925至1927年在（基辅）军事指挥联合学校学习。1927至1929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军事工程学校学习，后任助教。1929至1938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处业务代表。1939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第二国际保育院副院长、（莫斯科）中国党校助教。1939至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刊部记者。后来在中共中央保安机关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

施存统（1899—1970）——1922至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至1924年在上海做党和共青团工作。1925至1926年在广州从事教学工作。1927年任武昌中央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夏脱党。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施塔尔曼，里哈德（原姓：伊利奈，阿图尔）（1891—1975）——1924至1927年在莫斯科军校学习。1927至1928年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给的任务在中国做地下工作。返回莫斯科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反战工作巡视员。后来为德共外国局派驻瑞典人员、派驻苏联对德战俘工作巡视员。1931至1936年在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机关工作，任《巴尔干联盟》杂志主编。

施秀良（音）——1929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会工作。

什麦拉里，博古米尔（1880—1941）——1921至1929年和从1936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至1935年为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什维尔尼克, H. M. (1888—1970) ——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1926至1927年、1930至1946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3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2至1953年、1957年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25至1927年任联共(布)的一些州委书记。1929年任冶金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

石友三(1891—1940) ——1927年任冯玉祥国民党第五军军长。1928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师、第二十四师师长。1929至1930年任讨逆十三路军总指挥、安徽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团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遇刺身亡。

史汀生, 亨利·刘易斯(1867—1950) ——1929至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

史沫特莱, 阿格尼丝(1892—1950) ——美国作家、新闻记者。1929至1949年(断续)任《法兰克福日报》和其他刊物驻华记者。

舒宾, П. А. (1878—1937) ——1925至1937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36至1937年任季米特洛夫政治助理。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舒尔曼——1927至1930年在中国研究所工作。

舒米亚茨基, Б. З. (1886—1938) ——1926至1928年任莫斯科东方大学校长。1928至1929年任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1930年起任全苏电影业联合公司主席。193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电影工业总局局长兼艺术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大林, И. В. (原姓: 朱加什维利, 化名: 柯巴) (1879—1953) ——1912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为党中央总书记。1920至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5至

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捷茨基，А. И.（1896—1938）——1924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起任党中央宣传鼓动出版部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捷潘诺夫，В. А.（1886—1936）——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1926至1928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一局第四处处长。1929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五局第二处处长。1930年起任乌克兰军区师长、师政委、军区副司令。

斯卡洛夫，Г. Б.（化名：西纳尼）（1896—1936/40）——1925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7至1928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1930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巡视员。193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美南美书记处主任，后任拉美书记处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克雷普尼克，Н. А.（1872—1933）——1917年、1925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一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193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自杀身亡。

斯米尔加，И. Т.（1892—1938）——1920至1925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至1920年、1925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莫良斯基，Г. Б.（1890—1937）——1925至1930年在《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工作。1930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书记处副主任。1935至193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陶里亚蒂政治助理。1936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责任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皮尔瓦涅克，И. И.（1883—？）——1927至1928年任苏联驻

北京领事馆代领事。

斯蓬德, А. П. (1892—1962) ——1926 至 1936 年先后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斯特卢德 (生卒年不详) ——1928 年为红色工会国际信使。

斯滕, Я. З. (1899—1937) ——1924 至 1927 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科长。1927 至 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 至 1930 年任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1932 年起任红色教授学院教授。后来从事党务、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托雷平, П. А. (1862—1911) ——1906 年起任俄国内政部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遇刺身亡。

斯托利亚尔, С. Л. (化名: 杰克、利昂) (1900—?) ——1927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驻华太平洋书记处工作。1928 至 1929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澳大利亚代表。1929 至 1930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30 至 1931 年为共产国际书记处远东局委员、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

斯托莫尼亚科夫, В. С. (1882—1941) ——1926 至 1934 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4 至 1938 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宋庆龄 (1893—1981) ——1926 至 1945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年 3 至 7 月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政府委员。1927 年秋至 1931 年夏侨居国外。1927 年起任反帝联盟名誉主席。后来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国家领导职务。

宋学良 (化名: 波克罗夫斯基) (1899—?) ——1925 至 1928 年在苏联学习。

宋子文 (1894—1971) ——1926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年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 至 1931 年任南京政

府财政部长。1929至1931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苏达科夫，Ф. И.（1897—？）——1929年3月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第四处处长。1933年任远东第四十步兵师师长。1935年10月起任外贝加尔军区侦察处处长。1938年起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任教。

苏霍娃，E. H.（1897—1963）——1924年起在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执行局工作。

苏先俊（音）——1928年初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军事部部长。1928年3月投靠国民党。

苏兆征（1885—1929）——1927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至192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8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7至1929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委书记处主席。

孙传芳（1885—1935）——1925至1927年任江苏省督军。1927年夏在南京附近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引退。遇刺身亡。

孙殿英（1889—1947）——1928年任国民党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步兵独立第二旅旅长。1929年任第十八师师长。1930至1931年参加阎冯反蒋中原大战，任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被张学良收编后任第四十师师长、第四十一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1947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在狱中病死。

孙际明（化名：卡纳洛夫）（1908—？）——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

孙科（1891—1973）——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1928年任建设部部长。

1929至1931年任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孙逸仙 (1866—1925) ——中国同盟会、中国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1912年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7至1918年、1921至1922年和1923至1925年领导广州政府。

索尔茨, A. A. (1872—1945) ——1923至1934年为俄共(布) [联共(布)]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索洛维约夫, В. И. (原姓: 赖特) (1890—1939) ——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参赞。1926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处)副部长(副主任)。后来从事外交工作。

T

塔尔, B. M. (1898—1938) ——1929至1937年先后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文化宣传部科学处处长、报刊出版部部长、《真理报》编委。1936年起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副编辑。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塔尔哈诺夫, O. C. (化名: 塔宁, O.、塔乌别, O.、艾尔贝格, O.、杨祖来) (1901—1944) ——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政治顾问。1930年起在历史、苏维埃建设和法学学院东方系学习。1932年起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塔吉耶夫 (生卒年不详) ——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研究生。

塔伊罗夫, P. A. (化名: 捷尔、捷鲁尼) ——1925至1927年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参谋部政委、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1929年7月至1932年2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助理。1932

至1935年为远东独立红旗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台尔曼，恩斯特(1886—1944)——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纳粹杀害。

谭平山(1886—1956)——1923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任武汉政府农民部长。南昌起义时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27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27年底着手建立所谓第三党。1930年起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职务。

谭延闿(1880—1930)——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任武汉政府代主席。1928年任国民政府主席。1928至1930年任行政院长。

谭震林(1902—1983)——1928年任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1929至1930年先后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唐登宗(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团师长。

唐继尧(1883—1927)——1922至1927年任云南省督军。1927年引退。

唐居方(音)(?—1929)——1929年为上海罢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国民党杀害。

唐生智(1889—1970)——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团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团总指挥。1927年11月至1929年4月、1930年1月至1931年4月引退。1929年任国民党革命军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事政职务。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化名：艾尔科里）（1893—1964）——1922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意共总书记。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

特里安德菲洛夫，B. K.（1894—1931）——1923至1931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副参谋长。死于空难。

特里利塞尔，M. A.（化名：莫斯科文）（1883—1940）——1922至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处处长。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1930至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4至1935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至193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和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特鲁巴切夫，B. И.（1895—1938）——1925至1930年（断续）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1930至193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教学工作负责人。1931至1932年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部负责人。1933至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指导员。后来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特罗扬诺夫斯基，A. A.（1882—1955）——1927年起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33年起任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1939年起从事教学工作。

滕代远（化名：李光）（1904—1974）——1927至1928年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1928至1930年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1930至1931年任红三军团政

委、红一方面军副政委。1931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田中义一（1863—1929）——1918至1921年、1923至1924年任日本陆军大臣。1927至1929年任日本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殖民大臣。

佟米顺（音）——1931年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图梅利陶，Г. Т.（1899—1938）——1927至1932年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托夫斯图哈，И. П.（1889—1935）——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4年、1926至1930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任机要处处长、中央书记助理。1924至1926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1930至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

托洛茨基，Л. Д.（原姓：布龙施泰因）（1879—1940）——1917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4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6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至1927年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遇刺身亡。

托姆斯基，М. П.（1880—1936）——1919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9年任全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自杀身亡。

W

瓦尔加，E. C.（1879—1964）——1921至1928年为设在柏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息统计研究所领导人。1928年9月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至194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后来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瓦格纳 Я. Д. (1900—?) —— 1925 至 1929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 (书记处) 责任书记。

瓦西里耶维奇, И. И. (1895—1937) —— 1926 至 1927 年为华南军事顾问团成员。1927 年 10 月起任外高加索军事预备学校校长。1928 年 1 月起为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干部进修班学员, 后任师长助理。1929 年起任白俄罗斯军事联合学校校长。后来任格罗杰科夫要塞司令、师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万选才 (? — 1930) —— 1927 年为河南镇嵩军首领之一。1927 年率部参加冯玉祥北伐军。1928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团第二十八军军长。1930 年参与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军事活动, 被阎、冯反蒋派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后因刘镇华率军叛冯投蒋而被捕, 解押至南京后被何应钦处决。

王春美 (音) —— 1928 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人员。

王尔琢 (1901—1928) —— 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参谋长, 后参加南昌起义。1928 年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在战斗中牺牲。

王戈 (音) —— 1927 至 1928 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王荷波 (1882—1927) —— 1923 至 1925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5 至 1927 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7 年 8 至 11 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5 至 1926 年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5 至 1927 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奉系军阀杀害。

王稼祥 (化名: 科穆纳尔) (1906—1974) —— 1934 至 1945 年、1949 至 1969 年、1973 至 1974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5 至 1949 年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4 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 至 1945 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 至 1930 年在苏联学习。1930 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 至 1934 年任苏区中共中央执行局

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从事一些党务、国务工作。

王觉源（化名：克罗波特金）（1903—？）——1926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王均（1891—1936）——1927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王克全（生卒年不详）——1930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月底因搞派别活动被开除党籍，后投靠国民党。遭杀害。

王伦（音）——1930年为安徽中国红军队伍战士。

王孟（音）——1926年底1927年初为广州国民党左翼同盟成员。

王平一（1905—？）（化名：奥佐林、叶利扎韦京）——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为东方大学托派组织成员。1928至1929年先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工作。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王琼森（生卒年不详）——1930年为上海专科学校学生。

王若飞（化名：涅姆采夫、涅姆佐夫）（1896—1946）——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至1931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回国后被捕，1931至1937年被监禁。1937年起担任一些党的职务。死于空难。

王首道（1906—1996）——1928至1930年任中共湘鄂皖边区特委书记。1930至1931年为中共湖南省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湖南和江西省委书记。1933至1934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和国家的职务。

王天培（1889—1927）——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1927年为贵州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任

李宗仁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7月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因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部队在江苏徐州作战失利被处决。

王一飞(1898—1928)——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长，1927年任代部长。1927年10月起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

王云程(化名：梅尔库洛夫)(1905—?)——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1931年6月至1932年7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7月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王藻文(?—1929)——1928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1至7月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28年11月被清除出省委和中共中央。1929年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王正廷(1882—1961)——1928至193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外交、国务职务。

王仲一(1901—1931)——1927年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顺直省委常委。1928年7至11月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28年11月被开除出顺直省委和取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资格。1929至1930年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死在狱中。

王拙夫(化名：唐禹)(生卒年不详)——1930至1931年为沪东区《红旗日报》记者。

汪精卫(1883—1944)——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1928至1929年侨居法国。1928至1931年任“改组派”首领。1932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38年投靠日本，后任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汪盛狄(化名：阿尼西莫夫)(1898—?)——1927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

汪弟望（音）——1930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

汪泽楷（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8至1929年为中国托派运动倡导者之一。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威格尔，В. И.（1888—1945）——1925至1927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27至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1929至1930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

威廉姆斯（原姓：米哈伊洛夫，Б. Д.）（1895—？）——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南美代表。1928至1929年任巴尔干书记处领导人副手、东方书记处近东部副部长。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美局成员。后来从事新闻工作。

维经斯基，Г. Н.（原姓：扎尔欣）（1893—1953）——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主席。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27至1929年从事经济工作。1932至1934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4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维纳格拉多娃，О. И.（1899—1973）——1923至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保密部负责人。后来求学和从事数学工作。

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В. В.（1905—1966）——1925至1927年在驻华苏联顾问机关当翻译。1928年起在中国研究所工作。

维兹奈尔（生卒年不详）——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机关工作。

韦坚（化名：阿法纳西耶娃）——2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学习。

温施利赫特，И. С.（化名：亚沃尔斯基）（1879—1938）——1925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30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至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

后恢复名誉。

温裕成 (生卒年不详) —— 1928 至 1931 年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1930 至 1931 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局书记。1930 至 1931 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 至 1928 年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1928 至 1930 年任共青团中央工人经济斗争部部长。1931 年 3 月因违反保密规定和盗用党的经费被免去一切职务。后来在湘鄂赣苏区从事军政、共青团工作。

文佐夫-克兰茨, С. И. (1897—1937) —— 1924 至 1927 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组织动员局局长, 后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工作。1927 至 1928 年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书记。1928 至 1929 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团长兼团政委。1929 至 1931 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1931 至 1933 年先后担任一些军区参谋长。1933 至 1937 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处武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沃尔金, К. Я. (1889—?) —— 1927 年 11 月至 1941 年 10 月 (断续) 任一些军区的炮兵长官。

沃尔克, Я. И. (1896—1937) —— 1927 至 1929 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建教研室教员、领导人。1929 至 1935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顾问。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沃林, М. (原姓: 别列尼基, С. Н.) (1896—?) —— 1925 至 192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秘书。1926 至 1927 年在鲍罗廷驻华机关工作, 后为塔斯社驻广州记者。1927 至 1929 年任中国研究所所长。

沃龙佐夫 (生卒年不详), —— 1929 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政组织局局长。

沃伦斯卡娅, Л. Г. (化名: 罗莎) (1901—1937) —— 1927 至 1930 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机关工作。1930 至 1931 年任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秘书。H. A. 雷利斯基之妻。

乌布利希，瓦尔特（1893—1973）——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5至1929年（断续）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8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小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9年起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5年起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至1945年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至1971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总）书记。

乌多里亚京（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研究生。

乌格拉诺夫，H. A.（1886—1937）——1923至1930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1921至1928年历任一些省委书记。1928年起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乌科洛夫，B. A.（？—1927）——1927年在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被国民党枪杀。

吴苓生（化名：洛佐夫斯基、吴丽石）（1899—1931）——1927年秋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1927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28年12月至1929年7月被监禁。1929至1930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吴佩孚（1874—1939）——1926年任北方军阀武装总司令。1926年9月被国民革命军部队打败。1927年起引退。

吴绍坛（音）——192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部长。

吴玉章（1876—1966）——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时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28至1935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后来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伍朝枢（1887—1934）——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27至1928年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1928至1931年任驻美大使。1931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武胡景 (化名:安德烈耶夫、林大生) (1899—1936) ——1924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1928至1929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0年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后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1935年起在苏联学习和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武兆镐 (化名:彼得拉舍夫斯基) (1899—?) ——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情报科顾问。

X

希夫列斯, A. J. (1898—1938) ——1928至1933年任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1933至1936年为高加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高加索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希塔罗夫, P. M. (化名:贝尔格) (1900/01—1939) ——1925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27至192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书记处主任。1928至1931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年为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至1935年任联共(布)萨哈林岛市委书记。1935年起任联共(布)乌格尼托哥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夏斗寅 (1885—1951) ——1932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5月发

动反武汉政府叛乱。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第二十七军军长、中央军第十三师师长。1929至1931年任第十三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夏霆（化名：基留钦科）（1903—？）——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夏曦（化名：梅塔洛夫）（1901—1936）——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至1936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30年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至1934年任中共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后来还做党的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

向忠发（化名：特生）（1880—1931）——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7至192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捕后投靠国民党。被国民党杀害。

项英（1898—1941）——1923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总工会副委员长。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至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至1933年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书记。1931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军职务。

萧明（1896—1959）——1928至1929年为中共顺直省委委员。1929至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0至1931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还做党的工作。

谢尔盖耶夫（原姓：切金，C. C.）（1894—？）——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工程顾问。后来任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

谢建民（化名：格里申）（1907—1938?）——1927至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来在苏联从事翻译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谢苗诺夫，Г. И.（化名：安德烈、安德雷）（生卒年不详）——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后来从事侦察工作。

欣丘克，Л. М.（1868—1944）——1927至1930年任苏联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年起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至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休卡里，М. И.（1897—?）——1923至1924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6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1928至1931年任联共（布）一些州委巡视员。1931至193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34至1935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报刊委员会主席、《工会共产国际》杂志编委、副编辑。

徐阿梅（1906—1939）——1926年投身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当选为法商电车公司机务部工会常务委员。1930年6月发动工人罢工。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9年12月遭暗杀。

徐炳根（生卒年不详）——1930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工会联合会委员长。1932年被捕，投靠国民党。

徐达文（化名：雷可夫）（1905—?）——1925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徐畏三（生卒年不详）——1931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9至1930年为中华全国纺织总工会领导人。1930至1931年为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

徐锡根（生卒年不详）——1928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

书记。1931至1932年为中共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被捕，投靠国民党。

徐孝祥（化名：亚布洛奇金）（1902—？）——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徐一虎（化名：伊夫涅夫）（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许继慎（1901—1931）——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团团长。1928至1930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任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的“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许克详（1890—1967）——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同年5月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后任独立第二师师长。1927至1928年任讨逆军第二路司令。1930至1932年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薛岳（1896—？）——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27至1928年任第四军副军长。1928至1930年引退。后来还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y

雅各布（原姓名：贝尔蒂，朱泽佩）（1901—1979）——1921至1931年为意大利共青团中央委员。1924至1926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起为意共中央委员、意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1至1934年为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1932至1937年在国际列宁学校任教，任教学部主任。

雅罗斯拉夫斯基，E. M.（原姓：古别利曼，M. И.）（1878—1943）——1919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1939至1943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至1934年任俄共（布）[联共

(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至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亚戈达, Г.Г. (1891—1938) —— 1930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至1937年为中央委员。1924至193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1925至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1934至1936年任苏联外交人员委员。1936至193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遭镇压,未恢复名誉。

严重(1892—1944) ——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一些行政职务。

阎锡山(1883—1960) —— 192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山西省政府主席。1928至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部长。1930年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三方面军总司令。1930年底至1932年初引退。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颜昌颐(化名:佐季科夫)(1900—1929) —— 1925年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会)工作。1927至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委员会)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杨匏安(1896—1931) —— 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秘书。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部长。1927年底1928年初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28至1929年在(东南亚)南海国家做党的工作。1929至1931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杨格, 欧文(1874—1962) —— 美国工业家和银行家。1929年任由国联任命的金融专家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制订了从德国征收应付赔款办法(即“杨格计划”)。

杨立安, 即欧阳立安(生卒年不详) —— 1930年在上海工会

联合会工作。

杨森（1884—1977）——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至1928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

杨树庄（1882—1934）——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至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1927至1931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杨殷（1893—1929）——1928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被国民党杀害。

杨之华（化名：斯特拉霍娃）（1900—1973）——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工作部部长。后来做党的工作。瞿秋白之妻。

约尔克，E. C.（1900—1942）——1926至1927年在鲍罗廷驻华机关工作。1928至1931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1932至1942年在工农红军中供职。

约费 C. C.（1895—1938）——1926至1928年先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书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叶夫列莫夫，M. Γ.（化名：阿布诺尔德）（1897—1942）——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顾问、广州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1927年11月起任第十八雅罗斯拉夫斯基步兵师师长兼政委。1931至1937年任一些军团和军区的政委和司令。在战斗中牺牲。

叶努基泽，A. C.（1877—1937）——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中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至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叶若夫，Н. И. (1895—1940)——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1937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至1938年任中央书记。1927年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起先后任中央干部部、组织分配部和工业部部长。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至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遭镇压，未恢复名誉。

叶挺(1896—1946)——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1927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武昌卫戍司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至1937年侨居国外。1937至1941年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军长。1941至1946年被监禁。死于空难。

伊万诺夫，К. И. (1894—1927)——1925至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工作。1927年7月起在苏联驻广州总领事工作。被国民党枪杀。

殷鉴(化名：扎卡托夫)(1903—1937)——1927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1931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共产党党团代理书记、中共上海沪中区区委书记。

尹宽(1897—1967)(化名：梁赞诺夫)——1927至1928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为中共中央党刊委员会委员。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于树德(1894—1982)——1924至1928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为中共北方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在直隶、广东、河南、湖北等省做党的工作。1927年夏脱党。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于右任(1879—1964)——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27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委员。1928至1931年任监察院院长。1931至1949年连任监察院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余笃三（化名：韦利霍夫）（1887—1933）——1927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任红四军政委、红十一师政委。后来还从事军政工作。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余飞（1902—？）——1928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32年秋投靠国民党。

俞秀松（化名：那利曼诺夫）（1899—1939）——1921至1922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至1932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3至1935年任伯力《工人之路》报副主编。1935至1937年在新疆做党的工作。后在苏联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俞作柏（1887—1959）——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1929年6至10月任广西省政府主席。1929年秋引退。

袁炳辉（生卒年不详）——1928年起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30年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至1932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书记。1932年底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袁达时（1901—？）——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初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夏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岳维峻（1883—1932）——1928至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军长。1930年起任第三十四师师长。1931年3月被红军部队

俘虏、处决。

恽代英 (1895—1931) ——1927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在南昌起义期间为中共前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书记、《红旗》报主编。1930年初任中共上海一些区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Z

泽连斯基, И. А. (1890—1938) ——1922至1927年为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1924至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1年起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理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泽涅克, И. Я. (1898—?) ——1924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8至1932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第二局第三处处长助理。后来仍在工农红军中供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曾弘毅 (化名:莫洛托夫) (1906—?) ——1925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

曾山 (1899—1972) ——1928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9至1930年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苏区政府主席。1930年先后任红四、五、六军前委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苏区政府主席、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至1934年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曾中生 (1900—1935) ——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30年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会)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至1931年先后任中共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红四军政委。后来还从事军政工作。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的“肃反”运动中

被错杀，死后恢复名誉。

张碧光（化名：扎卢茨基）——1925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张伯伦，奥斯丁（1863—1937）——1924至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张发奎（1896—1980）——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1928至1929年引退。1929至1930年任陆军第四师师长、任护党救国第三路军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广西省政府成员。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引退。1931年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张国庶（化名：瓦连金诺夫）（1905—1930）——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在中国从事党的工作。被匪徒杀害。

张国焘（化名：斯皮里多诺夫、张彪）（1897—1979）——1921至1923年、1925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主席团委员。1935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任中共鄂豫皖边区苏区中央分局书记。1931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1938年脱党。

张辉瓒（1884—1931）——1929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十八师师长。1930年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被俘后被处决。

张际春（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至1929年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1929年8月被捕，投靠国民党。

张难先（1873—1968）——1927至1928年为广东省政府成员。1928至1929年为湖北省政府成员。1930至1931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张群 (1888—?)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至1930年任上海市市长。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张善铭 (1899—1928) ——1927年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东江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1927年底1928年初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代理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张太雷 (1899—1927) ——1925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政委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起义时牺牲。

张闻天 (化名：伊思美洛夫、洛夫、思美) (1900—1976) ——1931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34至1956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0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领导职务。

张学良 (?—1929) ——上海小商人。被英国士兵杀害。

张学良 (1901—) ——1928年任东三省武装力量总司令。1928至1930年任西北边防军司令。1930至1931年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张轸 (1884—1982) ——1927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后任长沙警备区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张作霖 (1875—1928) ——1926年12月至1927年6月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任安国军大元帅。遇刺身亡。

张宗昌 (1881—1932) ——1925至1928年任山东军务督办兼山东省省长。1926至1927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1928年起引退。遇刺身亡。

赵容 (原名：孙宗可，化名：康生) (1898—1975) ——1934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至1956年、1962至1975年为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1933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至1928年在上海做党的工作。1928至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至1937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担任一些党的领导职务。死后于1980年被开除党籍。

郑长生（音）——1929年任东北边防军第一炮兵师师长。

郑超麟（化名：马尔洛托夫）（1901—1998）——192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27至1928年任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秘书。1927至1929年任《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主编。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郑复他（1904—1928）——1927至1928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被国民党杀害。

郑延禧（1878—？）——1925至1928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代办。后来还从事外交工作。

周策（化名：茹可夫）（1900—？）——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29年在指挥学校学习，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

周达文（化名：丘贡诺夫）（1903—1938）——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翻译。1927至1932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执教。1932至1938年任伯力《工人之路》报主编。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周玠珪（化名：杰米亚诺夫）（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

周恩来（化名：莫斯克文、苏、苏光、陈光、少山）（1898—1976）——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起为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夏秋任中共前委书记。1928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29至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31至1933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至1934年任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周士第（1900—1979）——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1928至1933年为第三党的积极分子。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第四十九师参谋长。后转到红军方面。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周逸群（1896—1931）——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师师长。1928至1930年先后任中共湘鄂边区前委书记、中共鄂西特委书记。1930至1931年任红六军政委、红二军团总政委、前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

朱代杰（化名：格里博耶多夫、孔）（1902—？）——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朱德（1886—1976）——1930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1934至193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至1930年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总司令。1931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国家领导职务。

朱晖日（1893—1968）——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27年夏任第四军团第十一军军长。1927年10月任广州市公安局长。1928年8月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1929至

1933年引退。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朱勉芳（？—1927）——1927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代团长，在广州起义过程中被革命官兵杀死。

朱培德（1889—1937）——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武汉政府成员、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1927至1929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29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朱瑞（化名：西利内）（1905—1948）——1925至1929年在苏联学习。1930至1931年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来从事军政工作。在战斗中牺牲。

朱绍阳（生卒年不详）——1928至1930年任中华民国驻芬兰代办、公使。1929至1930年兼任中华民国驻苏联代办。后来还从事外交工作。

竺廷璋（化名：奥布霍夫）（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在中国做党的工作。

庄东晓（化名：布勃诺娃）（1904—）——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起在中国做党的工作。

宗锡钧（化名：伊格纳季耶夫）（生卒年不详）——1927至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祖巴托夫，C. B.（1864—1917）——1902至1905年任帝俄政府警察部特务处处长、“祖巴托夫主义”（即培植在警察监护下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的政策）的创立者。

左权（化名：拉戈津）（1905—1942）——1925至1930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任红十二军军长。1931年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后来还

担任一些军事职务。在战斗中牺牲。

佐尔格,里哈尔德(化名:拉姆扎伊)(1895—1944)——1925至1928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部顾问、组织部指导员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秘书。1929年起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1930至1932年在中国工作。被日本人杀害。

本丛书第 3、4 卷勘误表

第 3 卷

页	行	误	正
7	11	时期”	时期
305	倒 3	[3]	[4]
350	8	在上海聚集 ^①	在上海聚集
	倒 1	谢廖金作为	谢廖金 ^① 作为
627	9	张作霖	张宗昌

第 4 卷

页	行	误	正
42	3	过去和现以	过去和现在
118	倒 9	“免得…	免得…
240	12	河南有长（沙）	湖南有长（沙）
401	脚注 ^①	见第 249 号文件	见第 247 号文件
502	4	陈传芳	孙传芳
508	2	第 4 条	第 4 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十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页数=430

SS号=11039433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四部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1931年的对华政策，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形成

360．马马耶夫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1年1月7日)

36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1931年1月11日)

362．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摘录)(1931年1月17日)

36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1年1月17日)

36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114次会议记录(摘录)(1931年1月25日)

36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1931年2月4日)

366．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年2月4日)

367．雷利斯基同王稼祥和沈泽民谈话记录(1931年2月8日)

368．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

369．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1931年2月11日)

370．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

371．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

372．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年2月20日)

37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 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1年2月20日)
3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定(1931年2月22日)
3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摘录)(1931年2月22、23、25、28日)
376.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和王稼祥谈话记录(1931年2月23日)
3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24号记录(摘录)(1931年2月28日)
378.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28日)
379.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摘录)(1931年3月1日)
380.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1日)
381.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张闻天和赵容谈话记录(1931年3月2日)
3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25号记录(摘录)(1931年3月3日)
3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31年3月6日)
384.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就》(1931年3月11日)
385. 库丘莫夫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运动的薄弱方面》(1931年3月15日)
38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28号记录)(1931年3月18日)
3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
388. 张闻天给雷利斯基的信(1931年3月20日)
389.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1931年3月27日)
3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摘录)(1931年3月28日)

3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1年3月30日)

392. 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记录(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

393. 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的信(1931年4月5日)

3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30号记录(摘录)(1931年4月5日)

395.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陈绍禹谈话记录(1931年4月7日)

39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4月13日)

3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35号记录(摘录)(1931年4月14—15日)

398. 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1年4月15日)

3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1931年4月23日)

4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38号记录(摘录)(1931年5月7日)

401. 米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报告(摘录)(1931年5月7日)

402.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年5月7日)

4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会议简略速记记录(1931年5月16日)

40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41号记录(摘录)(1931年5月17日)

4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42号记录(摘录)(1931年5月23日)

4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共产主义学院中国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决议(1931年5月25日)

407.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年6月10日)

408. 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1931年6月12日)

409. 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国青年团中央局的信(1931年6月23日)

4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52号记录(摘录)(1931年7月3日)

411.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编写的第38号记录(1931年7月31日)

412. 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上海局工作的决议(1931年9月5日)

413. 皮亚特尼茨基给卡冈诺维奇的信(1931年9月10日)

人名索引

勘误表

附录页